

同斯大林的谈话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同斯大林的谈话

〔南〕米洛凡·杰拉斯著

赵 洵 林 英 合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为了纪念安尤林·比万

同斯大林的谈话

[南]米洛凡·杰拉斯 著

赵 洵 林 英 合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 1/4印张 120,000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410册

统一书号：3091·471 定价：0.60元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南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时期。本书作者米洛凡·杰拉斯曾是南共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苏南关系的奠基人之一。该书通过对作者同斯大林几次谈话的追述，记载了苏南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史实。一方面肯定了当时苏联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给南斯拉夫以真诚的帮助，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另一方面对苏南两党分歧的起源、发展等史实作了叙述；并尖锐地指出：苏联党在战后对南斯拉夫党，以及东欧其它一些“人民民主国家”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这对于研究苏南关系、苏联同东欧其它国家以及和它以前友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书作者在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批评斯大林的缺点错误的同时，露骨地攻击了斯大林，攻击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相信，读者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

为了研究苏南关系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问题，特出版本书，供有关的研究工作者和党的负责干部阅读参考。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总结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具有重要意义。

前 言

在人的记忆中往往保留着对以后的相互关系产生影响最大的事件，而多余的东西却被遗忘。这是一个缺陷，因为记忆总是有所偏向，它不免把已成为过去的实际情况去适应现在的需要和未来的希望。

我认识到这点，所以在本书中尽可能准确地来叙述事实。尽管如此，如果本书仍然受到我今天见解的影响，那么这不是出于我的恶意和一个战士的偏见，而是由于记忆力本身的上述特点和力图根据现在所积累的经验阐明过去的会见。

这里所涉及到的几乎所有事实，有学识的读者已从发表的回忆录及其它文献中读过了。可是如果对某一事件从各个不同角度加以详细的描述，那末这件事就显得更加形象化和易于了解。所以我想，如果我也来描述一番是不会多余的。我认为，人和人们之间的关系比枯燥的事实更为重要，所以我特别注重这一方面。不过本书有些地方可称之为文学上的描写，这如其说是我表达思想的方法，还不如说是我想把内容写得更生动，更鲜明，更真实一些。

我在写自传的过程中，于1955年或1956年曾想到把我同斯大林几次见面情景写成一本专集，提前单独出版。然而不久我被关进了监狱，而在那里是不便从事这类写作的，这是因为所涉及的内容虽然是过去的事，但必然要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关系。

直至1961年1月出狱后，我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当然，这时的条件和我本人的观点已经由于各种经历而发生了一些变

化，所以我对这一题材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此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到人的心理状态和人道主义方面。还有，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远离了斯大林，但是关于这个人，人们继续发表如此相互矛盾的文章，以至于他的形象仍然活生生地摆在人们面前，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根据我的经验和知识对这个确实神秘的人物给以总结。

然而，推动我作这件事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即不愿意把给写历史的人，特别是给为人的更加自由的生活而斗争的战士能带来益处的事情隐瞒下去。

不管怎样，如果真实情形不被歪曲，而只是带上我的感情和思想的色彩，那末我和读者都是应该满意的，因为关于人和他们之间关系的真理无论怎样充实，总还是一些具体人在特定时期内活动的真理，对这些应该持谅解的态度。

于贝尔格莱德

1961年11月

目 录

前 言.....	1
迷 恋.....	1
疑 虑.....	66
失 望.....	98
大概，我是最后一次谈斯大林	151
作者小传	173
译后记	175

迷 恋

(一)

英国的军事使团是来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第一个外国使团，它是1943年5月着陆的。苏联的军事使团是1944年2月，即九个月以后才来到这里的。

苏联军事使团来后不久，我们决定派一个南斯拉夫军事使团到莫斯科去，特别是因为我们已派去一个军事使团到英国同级的司令部。最高司令部，更确切些说，在司令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很想派使团到莫斯科去。我想，铁托把这件事告诉了苏联使团的考尔涅也夫团长，但毫无疑问，这件事最后是由苏联政府拍来的电报才决定下来了。

对于南斯拉夫人来说，派使团到莫斯科是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的，和派使团到英国司令部相比，这件事情的性质和任务是大不相同的。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反对占领军及其当地帮凶的游击队和起义运动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南共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解决自己民族问题的同时，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之一，和“社会主义祖国”苏联是不可分离的。

在整个战争期间，党的直接领导者政治局一直同莫斯科保持无线电联系。形式上这是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实质上是同苏联政府的联系。

革命运动的斗争和生存的特殊条件已不止一次引起我们同莫斯科之间的误会。

在这里我只谈几件最重要的事情。

莫斯科直到最后，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够懂得南斯拉夫革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南斯拉夫在反对占领军斗争的同时，国内的革命也在进行着。他们之所以不愿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政府担心西方盟国，首先是英国，会对苏联表示不满，说他通过自己的共产党伙伴利用被占领国家的战争灾难之机扩大革命范围和自己的影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斗争正如通常的其它新事物那样，冲破了陈旧的观念和苏联政府及国家的不容商榷的利益的框框。

莫斯科也并不了解南斯拉夫斗争的特殊性。南斯拉夫的斗争，虽然不仅鼓舞了为保卫俄罗斯民族传统不受纳粹德国的侵犯的士兵，而且也鼓舞了苏联的官方人士，但由于苏联总是和自己的游击运动及其斗争方法相比较，因此对南斯拉夫的斗争是估计不足的。对苏联来说游击队是红军的辅助的和次要的力量，始终没有成为正轨的战斗部队。苏联上层根据自己的这一经验，完全不明白，南斯拉夫游击队怎么能变成为正轨军和国家政权，并具有自己的有别于苏联的特性和利益，而这就意味着开始自己的独立的存在。

与此事有关的，发生一件对我来说具有相当大、甚至是决定性意义的事情：

在所谓的第四攻势期间（1943年3月），事态发展到最高司令部要同地方德国司令部举行谈判。谈判的导因是交换俘虏，而其实质在于德国人必须承认游击队作为交战对方的权利，谈判双方停止杀害伤员和俘虏。除此之外，最高司令部，革命军的主力 and 成千的伤员当时处在极端危险的境地，所以我们迫切

需要任何能够取得喘息的机会。关于这一切必须通知莫斯科。但是我们非常清楚：不能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莫斯科，这是因为铁托已很了解莫斯科，而我和兰科维奇^①则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我们觉得只应该通知他们，我们正在和德国人进行关于交换俘虏的谈判。

然而，莫斯科根本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我们着想，而是马上怀疑起我们，他们不顾我们已经血流成河的疲惫的处境，非常粗暴地对待我们。我记得，1943年2月在我们突破涅列特瓦河前夕，铁托在拉马河畔的磨坊里谈到此事：

“我们有责任首先照顾我们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人民。”

这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第一次公开表示不同于莫斯科的意见。当时我第一次意识到——虽然不是直接受铁托话的影响，但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如果我们想在两个敌对世界的殊死斗争中能够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同莫斯科的完全一致是谈不上的。有关这件事我们再也没有通知莫斯科，而我化名和其它两个同志一起去德国司令部举行谈判。

1943年11月29日，在亚依茨召开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实际从法律上确认了南斯拉夫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秩序。与此同时，我们成立了民族委员会作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在这些决议起草过程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决定，在这些事情办成功之前，不要任何事都通知莫斯科。从我们前一时期同莫斯科打交道的

^① 亚力山大——马尔科·兰科维奇(1909—)，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7年参加党的塞尔维亚青年组织。地下工作时期坐过五年多的监狱，狱中结识了铁托和皮雅杰。1937年，南共进行整顿之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人之一，曾任内务部长，负责保卫工作。1966年7月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盟。——译者

经验中和从他们的宣传精神方面，我们得知，莫斯科是无法理解我们的做法的。果然，莫斯科对亚依茨决议的反映表现出如此否定的程度，以至于在苏联的专门为南斯拉夫起义运动而设立的“自由南斯拉夫广播电台”只播送了这次会议的一部分决议。可见，苏联政府连南斯拉夫革命最重要的步骤都不理解，而这一步骤能够将革命发展到建立起新的制度，从而进入国际舞台。可是直到已经清楚地看到，西方对亚依茨决议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莫斯科才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承认了既成事实。

尽管我们已得到如此使人痛心的经验，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直至1948年同莫斯科决裂后才完全明白了其中的深刻含义。尽管我们实践的方式如此不同，但我们当时认为，我们不仅在思想上同莫斯科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是莫斯科的最忠实的追随者。尽管革命和其它的实际情况越来越彻底地和不可调和地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莫斯科分开了，但是他们还是把自己的革命成果和莫斯科连在一起，归功于莫斯科所规定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对南斯拉夫人来说，莫斯科不仅是政治和精神的中心，而且是实现真正抽象的理想——“无阶级社会”的希望。这一理想不仅使他们的牺牲和灾难较容易地得以解释，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存在也变得更有意义了。

这个党正如苏联党一样是思想上一致的党，它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的因素。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的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对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把斯大林个人神化和无条件地接受在苏联发生的一切事情已达到非常不合理的形式和规模。苏联政府的任何行动，如进攻芬兰，和苏联的一切消极方面，如镇压和清洗，都去进行解释，而更奇怪的是，共产党人还想办法说服自己，这一切措施是合理的、公正的，或者更简单地，把这一切不愉快的事实从自己

的记忆中排挤出去。

在我们共产党人中间有审美力和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也有文学和哲学知识很渊博的人，但尽管如此，我们所有的人被斯大林的观点及其阐明的“完美性”所陶醉。我本人在争论中曾经常指出过斯大林文笔的简洁洗练，他的逻辑的不可摧毁性和他的思想的一贯性，把这些作为他崇高智慧的表现。然而，就在当时如果同样的东西出自另一些作者之笔的话，我会轻而易举地判断，这一切东西实际上是毫无特色和目光短浅，只是庸俗的新闻体裁和圣经式的杂乱无章的混合体。有时我们的迷信达到可笑的地步，如我们确实认为，战争会在1942年结束，因为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当这话没有兑现时，这一预见也被遗忘了，而预见者本人的超人威力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身上所发生的上述情况在整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在其它人们的身上，他们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命运服从于某个唯一的思想。他们不自觉地吧苏联和斯大林的形象描绘成为他们的斗争所需要和用以说明他们的行动的那个样子。

综上所述，南斯拉夫军事使团一方面是带着对苏维埃政权的理想化的看法，另一方面带着自己急待解决的问题的心情去莫斯科的。从表面上看，这个代表团同去英国的使团没有什么不同，但按它的组成和观点，它同时又代表着持相同政见的政治领导的非官方关系。简单说来，使团既应具有军事性质，又应具有党的性质。

(二)

因此，铁托把我作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同维利米尔·特尔

基奇将军一起列入使团的名单内，决不是偶然的，已有好几年，我一直参加党的最高领导班子。使团的其它成员也是按同样原则挑选的，都是党的或军事的领导干部，其中有一位是财政方面的专家。原子物理学家帕甫烈·萨维奇^①也参加了使团，实际上是为了在莫斯科继续进行他的科研工作。当然，我们都穿上了军装，我的军衔是将军。我想，选择我去莫斯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俄文很好，我是在监狱学会俄文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苏联，因此我既没有参加过任何宗派的包袱，也没有什么倾向性的历史。使团的其他成员也都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但他们当中也没有人会说俄语。

这正是1944年3月初的时候。

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集合使团成员和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我们原来穿的军服样式既旧又不统一，由于缺少合适的料子，我们穿上了从缴获的意大利军装改缝制过的新军装。还需要办好通过英国和美国占领区的护照手续。这些护照匆匆忙忙地被赶印出来，这是带着铁托亲笔签字的新的南斯拉夫国家的第一批护照。

几乎完全自发地产生了给斯大林送礼物的建议。送什么？从何处去弄？当时最高司令部所在地德瓦尔周围的村庄几乎全被焚毁或被抢劫一空，小城镇也被抢光。最后我们终于找到解决的办法：把一支1941年在乌日茨游击队工厂里制造的枪送给斯大林，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这一支枪。周围村庄也开始送来礼物：荷包、麻布巾、民族服装和鞋子。我们选了其中最好的礼物——一双用生皮做的便鞋，其它的东西都十分简

^① 帕甫烈·萨维奇（1909— ）留学法国的南斯拉夫核物理学家，1939年入党，参加过解放战争，并曾被调进最高司令部工作。1949年因某一重要研究成果得奖。——译者

陋。这些东西都是人民心意的表示，所以我们决定都带去。

使团还有一项使命，就是尽一切努力取得苏联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全面援助。与此同时，铁托嘱咐我们，争取通过苏联政府或用其它什么途径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南斯拉夫解放区的援助。还要请求苏联政府给与二十万美元的贷款以补偿我们在西方国家的使团的开支费用。铁托强调并要求我们向苏联说明，这一笔贷款和用于药品和武器援助的费用，我们在解放后一定如数偿还。

使团还必须把最高司令部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和文件带过去。

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探明苏联政府承认民族委员会为临时的合法政府的可能性并通过莫斯科就此问题对西方盟国施加影响。

使团是通过驻南斯拉夫的苏联使团保持同最高司令部的联系，同时也还可以利用共产国际的旧关系。

除上述任务外，铁托在给我们送行时委托我向季米特罗夫或斯大林（如果我可能见到他）了解一下，他们是否对我们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

铁托的这一指示纯粹是从形式上强调一下，他是让我们在对与莫斯科的关系上要注意遵守纪律。当然，他自己深信，南斯拉夫共产党、而且只有这个党是单独地、出色地经受了考验。我们也谈到南斯拉夫流亡国外的政治侨民^①问题。铁托的态度是：我们彼此不要互相指责，特别是如果问题涉及苏联党的机关和苏联领导人的时候。同时铁托还强调，要提防女秘书，因为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不仅要保持已成

① 指战前流亡到苏联的南共党员。——译者

为传统的游击队的道德面貌，而且应该警惕一切可能损害南斯拉夫党和党员个人的威信和优秀传统的事情发生。

我非常激动，高兴得心都颤抖了。我期待着尽快看见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家。我的信念比岩石还要坚强，这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幻想家、战士和受苦受难的人的信念，为了这一信念我在监狱里受过折磨和拷打，为了这一信念我憎恨邪恶，我流过鲜血，甚至不惜我自己的弟兄们去流血牺牲。

然而，我也有悲伤，这是因为当我要离开同志们时，这里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战斗，我们的国土还处在你死我活的激战之中，依然是战火纷飞的战场。

我比平常更热情地和苏联军事使团告了别，觉得比平时见面时更加亲切，我拥抱了我的朋友，他们和我一样也很难过，并送我们去波桑斯基·彼得罗维茨附近的野战机场。在这里我们停留了一整天，视察了机场，同那里的已具备相当专业的专业作风和习惯的工作人员谈了话，还同当地的农民谈了话，他们已习惯于新政权，并相信这个政权必然会取得胜利。

近来，英国飞机定期夜间在这里着陆，但不经常来，最多是选择某个夜晚，飞来一、两架把伤员及个别的来客运走，飞机上带来的物品多半是药品及卫生医疗用品。最近来了一架飞机运来了一辆吉普车，这辆车是英国司令部送给铁托的礼品。一个月以前一天中午，苏联军事使团乘坐一架装着滑雪板的飞机在这里着陆。如果考虑到这地区的地形和其它条件，这次降落实在是立了一次奇功，同时这又是一次颇为特别的检阅，因为有相当多数量的英国战斗机，为这架飞机护航。

我们这一架飞机的降落和起飞也被我看成是立了一次大功，因为先要降落到狭窄而不平坦的谷地里，然后又要擦着悬

崖峭壁，飞出这块狭谷。

然而，在黑暗中消失的我的国土是多么的悲惨！披着皑皑白雪而失去了本来色彩的山峦在黑暗中只能看到断裂的岩缝，山谷在漆黑一片里消失了，一直到海边都一丝光亮都看不见。下面是残酷的战争，甚至对这一块早已习惯于进行各种行军、战役和起义的土地来说，现在进行的也是最残酷的战争。人民同侵略者进行搏斗，但是自己的弟兄之间彼此的厮杀则更为残酷。什么时候在我的土地上、城镇和村庄会重新点起灯光过上正常的生活呢？它在一切仇恨和死亡之后还能获得欢乐和安定吗？

我们首先是在意大利的巴利停留下来，那里有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相当大的基地：医院、粮库和仓库。从那里我们飞往突尼斯——由于德国在克里特岛和希腊有基地，我们绕道飞行。然后我们作为英国司令员的客人在马耳他岛稍事停留，又在多布鲁克休息了片刻，在飞机向下俯望，我们看见从赤色岩石的沙漠里冲出了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火，大火映红了整个天空，景色十分奇特。

第二天我们到了开罗。英国人把我们安排到一家饭店里并给我们提供了一辆轿车。商人和服务员看到我们的五角星帽徽，所以把我们当成俄国人。可是当我们急忙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南斯拉夫人并说出铁托的名字时，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了解我们斗争的情况，我们听了非常高兴。在一个店铺里我们听到一位女售货员用南斯拉夫粗野的话和我们打招呼，她们并不知道这些是不好听的话，这些话她们是从流亡的南斯拉夫的军官那里学来的。这批军官也在那里，他们表示支持铁托，渴望参加战斗，怀念自己的多灾多难的祖国。

当我听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列曼也在开罗时，我就

请求苏联大使陪我去见见他，利用这个机会我打算向他提出我们的要求。这位美国人马上接见了我们，但是态度很冷淡，他说将在下一次总署会议上讨论我们的要求，但他表示总署在原则上只是同合法政府进行合作。

不管怎样，我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怀有原始而教条主义的看法，认为它是一切进步以及弱小和被奴役民族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我的这种看法，当我同他们的代表第一次见面时就被证实了，因为列曼先生是躺着接待我们的。他的腿部上了石膏，我把他由于伤痛和炎热而显出的烦恼看成是对我们来访的不满。加上他的那位俄文翻译，活象一个长头发的强盗，简直就是描写北美牧民的影片中的那些典型的土匪。

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理由埋怨列曼，因为我们的要求被听取了，他答应我们予以考虑。

当然，我们充分利用了在开罗的三天时间，参观了名胜古迹，访问了驻南斯拉夫的英国使团第一任团长狄金少校，他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小型的午宴。

从开罗我们飞往大马士革附近的英国基地哈巴尼亚。英国司令部的代表不愿送我们到大马士革，说那个地方不太安全。我们把这个措施看成是他们为了掩饰他们的殖民地恐怖行为，因为我们认为在那里的殖民地恐怖行动按其残忍程度并不亚于在我们国家的德国侵略者的所作所为。英国人虽然拒绝了我们大马士革之行，却请我们观看他们的士兵运动会，我们的座位在司令员旁边。我们扎紧了腰带，所有的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这样一来，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笑，那些彬彬有礼但并不拘束的英国人看起来，大概会更觉得可笑吧。

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少校，他是一位愉快而善良的老伯伯，他总是因为他的俄文说得不好而向我们道歉。他甚至忘记他是

十月革命后参加干涉军时在阿尔罕格尔学会说俄语的。他对俄国人赞叹不已（俄国人的代表团也曾在哈巴尼亚逗留过），但他赞扬的不是他们的社会制度，而是他们的纯朴和气魄，因为他们“为斯大林和丘吉尔”干杯时能一口气把一大杯伏特加或威士忌喝下去。

少校从容自若而颇为自豪地大谈他们如何同被德国间谍煽动起来的当地起义的人进行的斗争。我们看到，飞机库确实被子弹打穿了许多处。

按照我们的理论原则的观点，我们认为，“为帝国主义”而牺牲自己是不可理解的，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看待西方国家的斗争的。但在内心里我们对英国人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精神也是赞叹不已的。他们在人员少而且在不能指望得到增援的情况下，在遥远的炎热的亚细亚沙漠里坚持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如果说当时我不能从这里作出更深刻的总结，但是这一切都影响了我，后来帮助我形成了一种信念：即在我们地球上有着无数的人类生活制度的星座，并不是只有一个唯一存在的理想。

我们不相信英国人，因而不敢接近他们。我们觉得最可怕的是他们的谍报机关，在我们头脑中对它的认识还极其肤浅，所以把它神秘化了，这在我们的态度里，有着书呆子气的简单化、惊险小说的影响以及阅历浅薄的人进入一个另外的世界时的那种惶恐不安的情绪，这一切都混合在一起了。

当然，如果我随身没有带那几包最高司令部的档案的话，我们也许不至于那么紧张，因为档案中有我们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而且英国军事当局对我们携带的这几个袋子一点不注意，仿佛里面装的是皮靴或罐头之类的东西，这就使我们更加觉得可疑，因而也就越加提高了警惕性。我虽然在整个路途中

总是守着这些档案，夜里也不一个人睡在单间房里。马尔柯·彼佩尔总是和我睡在一起，他是战前就入了党的门的内哥罗人，为人朴实、忠诚，又是个勇敢无畏的人。

一天夜里在哈巴尼亚有一个人轻轻地打开了我的房门。他开门时没有声音，我却感觉到有人进来了，在月光下我看见了一个本地土人，因为我被蚊帐缠住了，一下子出不来，就大叫起来，伸手从枕头下面掏出手枪。马尔柯马上跳下了床——他总是穿着衣服睡觉——但那个土人已逃得不知去向了。

土人可能是迷了路或想偷东西。而我们当然认为这件事情是出自英国间谍之手，因而更进一步加强了我本来已经相当高的警惕性。第二天，英国人给我们提供一架飞机，送我们去德黑兰，当时我们感到非常幸福。

在德黑兰从苏军司令部到苏联大使馆这一地区——这是我们在德黑兰活动的地段——我们觉得这里已经是苏联的一部分了。苏联军官待我们很真诚，这即体现出俄罗斯人的殷勤好客的传统，又表示出世界两个不同地区的战友为共同的理想而斗争所形成的团结一致精神。在苏联大使馆里我们看到德黑兰会议期间使用过的圆桌，还看见了罗斯福所住过的位于一层楼的那个小房间，当时这一房间没有人住，一切都保留了罗斯福在时的样子。

最后，苏联飞机终于把我们送到了苏联——它是我们的梦想和希望的化身。我们越深入到苏联的蓝灰色的辽阔天际，我们就越益被一种新的、当时还是模糊的感受到的心情所支配——我似乎回到了古老的、陌生的，但是自己的故土。

我从来对任何泛斯拉夫主义情绪都很反感。我把当时莫斯科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甚至于仅仅看成是能够把保守力量都能动员起来反对德国侵略的手段而已。我那时的情绪和泛斯拉夫

主义没有什么共同点，我的认识要深刻得多，甚至于不是我的共产主义的信念所能容纳进去的一种思想。我模模糊糊地回想起，三百年来，南斯拉夫的幻想家和斗士，国务活动家和君主特别是灾难深重的门的内哥罗的君主，都到俄罗斯去朝圣，他们希望在那里取得谅解和拯救。我现在是否也在走他们走过的路呢？这里难道不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抛到风雨飘摇、多事之秋的巴尔干半岛上来了——的祖国吗？我在想：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从来不会去了解南斯拉夫人以及他们的愿望。但是，当时我坚信：莫斯科和其它国家的冲突和不睦的社会原因以及其它因素，终于从根子上被拔除了。我当时把这看成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类博爱关系的实现以及我们史前时期存在过的斯拉夫大家族的统一。

这不仅是我们祖先的祖国，而且是那些为真正的世界大同以及人类长期为征服自然而牺牲的战士们的祖国。

我和伏尔加河流域，和无边无际的灰漫漫大草原融合在一起了，如同发现了原来的自我——这是一种我自己原来也不了解的心灵的活动。我甚至想当我踏上苏维埃俄罗斯的土地时，我要去吻这块土地，如果这不被看成是一种宗教仪式或更糟糕地被看成是戏剧性场面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在巴库迎接我们的是城防司令员，他这个人话不多，又因长期过着兵营生活，参战和在军队服务，所以他身体粗壮、高大，他是一名将官。在我们看来，他是这个伟大国家为反对妄想横扫一切的侵略行为的残酷斗争的化身。他是个粗犷但又很热情的人，对我们这些又羞怯又克制的人们感到惊奇：

“这是些什么人？！又不喝又不吃！我们俄罗斯人会吃，更会喝，而最会的是打仗！”

莫斯科的色调阴暗，情绪也很低沉，而我们觉得奇怪的

是：这里大量的建筑物都是低层的。

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和对我们的接待（按等级加以区分的礼遇）和我们的热情（表现出来的热情是故意有所克制的，因为我们的斗争都具有共同的共产主义的性质）又怎么能相比呢？我们把这次战争看成是人类最后的伟大考验，把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命运都寄希望于其中。苏联这个国家，它已成为我们的以及全人类的国家，这已经是既成的现实。这里恶梦已化成宁静与欢乐，除此以外，其它的一切不都变得暗淡，失去了它的光彩和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三）

我们被安置在接待苏联军官的红军中央大厦里。这里的伙食和一切接待条件都很好。还为我们提供了一辆专车，司机叫巴诺夫，是一位中年人，他善于独立思考，但有时脾气很怪。我们通过联络官，一位长得很漂亮的青年科佐夫斯基上尉可以随时得到戏票、电影票和一切我们想得到的东西，科佐夫斯基常常以他哥萨克出身而自豪，何况哥萨克在这次战争中已经把他们反革命的过去“洗刷”干净了。

然而，我们还没有机会能够同苏联领导进行较重要的接触，尽管我到此以后马上请求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①接见我，如果可能的话，希望约·维·斯大林接见我

^① 维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0）1906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工作专家，为斯大林信任的助手，有一段时间，曾为仅次于斯大林的领导人。从1926年起进入政治局，为政治局委员，并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整个三十年代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以后的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以前任副主席。他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后称外交部长），曾为世界闻名。苏共党内斗争中一直站在斯大林一边。1957年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作为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剥夺了权力。从此以后只担任过比较次要的驻外职务。以后成为领取养老金为生的人。——译者

们，斯大林当时是政府的首脑及武装力量的总统帅。我们力图用迂回的办法把我们的愿望和需要告诉苏联当局，但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形式上还属于王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最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尽管希米奇大使和为数不多的大使馆职员已表示顺从铁托。他们虽然从表面上还是受到驻在国的尊重，但实际上比我们更无能为力。

我想通过南斯拉夫侨居苏联的党员达到我们的目的，但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流亡苏联的南共党员的这支队伍因几次清洗而为数不多了，其中最出名的人物是维利柯·弗拉霍维奇。我同他是同龄人，又都是门的内哥罗的同乡，我们两人又都在反对亚历山大国王独裁统治时期参加过大学生革命运动的战友。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受伤致残，而我又是从更严峻的战场来到这里的。他有着高尚的道德品质，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人很聪明，但是过分地守纪律，不能独立思考。他领导着“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工作，同他建立合作关系是很有益处的。但是与他有接触的关系，最高级的只有格奥尔基·季米特罗夫，因为共产国际已被解散，当时，季米特罗夫和曼努伊里斯基^①一起领导苏共中央同外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对外联络部。

我们吃得很好，受到热情的接待，但在我们所关心和需要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还想强调一

^① 季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里斯基（1883—1959），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外交家。1903年入党，地下工作时期，曾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之后，大部分时间在乌克兰担任各项职务，他是乌克兰人。他主要从事的活动是在共产国际。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第二次大战期间，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1945年至1952年任乌克兰外交部长，1952年任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1953年退休。——译者

下，在其它方面我们受到了异常周到殷勤的款待。但是，过了一个月，我同特尔基奇将军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之后，我们被接见的消息马上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时我们才有了可能进入苏联臃肿的行政机构和接触苏联社会的最高阶层的机会，所有的门如同魔术一样在我们面前打开了。

在战争期间成立的泛斯拉夫委员会最先为我们举行了宴会和会见。然而，不但共产党人，任何人都会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个委员会不仅是有意安排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组织。因为该委员会不过是一个牌子而已，完全是为宣传服务的，就是在这方面它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委员会的宗旨本身也不甚清楚，因为参加委员会的人多半是流亡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国家的共产党人，泛斯拉夫主义的团结思想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不用说所有的人都明白，必须把某种已成为过去的东西恢复起来或者如果就是不能把斯拉夫人团结在共产党俄国的周围的话，那么，那怕是能够麻痹反苏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潮，也是好的。

委员会的领导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主席是龚多罗夫将军，他是一个未老先衰，而且思想狭隘的人，同他就连极其表面的斯拉夫人团结问题也不能认真地谈一谈。委员会的秘书长是莫恰洛夫，因为他接近保安机构，因此，他更有权力，是个权威人物。他喜欢吹牛，说大话，他无法掩饰他是很有来头的人。龚多罗夫和莫恰洛夫都是红军军官，但都属于不适于在前线打仗的人，所以从两个人的情绪上可以发现那种被降职去做那些非本行工作的人们具有的隐藏在内心的压抑的心情。只有秘书娜扎罗娃（她是个过分殷勤的牙齿缝很宽的女人），表现出对斯拉夫人的好感，她的一切活动虽然都受着苏联侦探机构的指挥（这点我们后来在南斯拉夫才搞清楚的），但她仿佛对斯拉夫人真有感情，对他们遭受的苦难还是深表同情似的。

在泛斯拉夫委员会里吃的东西不少，喝的更多，而最多的是聊天和讲话。宴席间的讲话都是长篇大论，然而却空洞无物，这些祝酒的内容颇似沙皇时代，但当然不及沙皇时代那么词藻华丽、端庄。说实话，我当时对缺乏任何新鲜内容的泛斯拉夫思想感到奇怪。委员会所在地的建筑物也和委员会的思想一样，是一幢在现代化城市中类似巴洛克式^①的一类的建筑。

委员会是一种临时的、肤浅的，并非以无私的斯拉夫的团结政策为目的的产物。

为了使读者正确地理解我，我想在这里做一点补充说明，当时许多事情我都十分清楚，因此我丝毫不感觉奇怪和恐惧。该委员会是为了影响国外斯拉夫民族的落后阶层的苏联政府的驯服工具，它的工作人员同政府的公开和秘密的代表保持着联系——这一切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委员会的软弱无能和不严肃的态度，特别是它不能设法帮助我们找到通向苏联政府的道路，用以满足南斯拉夫的迫切需要。因为我当时象每个共产党员一样，受过党的教育，怀有一种深信不疑的思想：即在苏联和任何其它国家的人民之间不会有什么分歧，更不用说象南斯拉夫这样的革命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党了。虽然我把泛斯拉夫委员会看成是一个太陈腐，和争取共产主义的目标完全不适应的工具，但我还是愿意接受这个思想，主要是因为苏联领导坚持要建立这样的组织。至于委员会同保安机构的联系问题，我也和大家一样，几乎把保安机构看成是革命的神圣捍卫者——“党手中的利剑”。

我坚持苏联上层接见我这件事的性质，也有必要解释一下。我虽然很着急，但并没有去纠缠不休，而且对苏联政府根

^① 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一种建筑风格，如柏林市的建筑风格，强调力，如门柱等用雕塑的大力士顶住建筑物的压力。——译者

本没有产生任何埋怨情绪。我已习惯把苏联看成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甚至比我们党的领导和我们的革命更加崇高的力量。我从铁托和其它人那里听说过：对外国共产党人来说，长期的等待显然是莫斯科的某种风气。而我感到不安和不耐烦的只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了解我们南斯拉夫革命的急待解决的事情。

虽然任何人，甚至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自己并没有明确提出“革命”二字，但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是真正的革命。关于这些事情西方已到处大写特写了。可是莫斯科恰恰是充耳不闻，不愿看到这样的事实，甚至于那些承认这些事实是属于他职权范围的人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有的人只是不断地谈论我们如何进行反对德寇的斗争，更加顽固地强调我们斗争的纯粹爱国主义性质，并喋喋不休地提什么苏联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我在思想上根本没有想到过去否认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红军在反希特勒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在我国的土地上，在我们特有的条件下，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全世界面前进行了并不以红军暂时胜利或失败为转移的战争，而这一战争同时在改变着我们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国内外，南斯拉夫革命已经超出了苏联政府对外政策方面的需要和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这是当时每当我遇到阻挠和误会时为自己作出的解释。

我最奇怪的是，一些应该理解这些问题的人也都保持沉默或假装自己什么也不懂。我当时还不知道：在莫斯科不应急于表态，特别是在政治观点方面，要等待斯大林或至少莫洛托夫表过什么态之后，再考虑自己的观点。这点甚至象对原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共产国际的书记曼努伊里斯基和季米特罗夫来说也都成了法律。

铁托、卡德尔及其它到过莫斯科的人都曾经讲过，曼努伊里斯基对南斯拉夫人特别友好。在1936——1937年大清洗期间整个流亡苏联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几乎全部在大清洗中死去。曼努伊里斯基的友好态度使他受了连累。但是现在当南斯拉夫人也起来反对纳粹时，他当时对南斯拉夫的同情心可以解释为他是具有远见的人。不管怎样，当曼努伊里斯基表示对南斯拉夫斗争的钦佩时，他流露出某种自豪感，虽然他并不认识任何一位南斯拉夫的新的领导人，或许他认识铁托，也不过是一面之交而已。

我同他是在某一天的晚上会见的。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当时著名的苏联哲学家格·费·亚历山大罗夫^①，更重要的是他当时是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部长。

亚历山大罗夫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突出的印象，他这个人观点模糊、毫无特色或者说是一个没有什么个性的人，这就是他的主要特点。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秃头，他的脸色苍白，身体肥胖，说明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会见时他只谈一般的客套话，除了总是和气地微笑外，一句话也没有涉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起义的性质和前景，尽管我仿佛无意中偶然地提到这些问题。显然，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表示自己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所以苏联宣传机器仍然只谈反对占领者的斗争，而对南斯拉夫国内及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则保持沉默。

曼努伊里斯基也没有表示自己的鲜明立场，但他以激动而

^① 格奥尔基·费多罗维奇·亚历山大罗夫（1908—1961）苏联哲学家，1928年加入共产党。从1934年起在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工作，1939至1947年为该部负责人。他的《十九世纪西欧哲学史》一书，于1944年出版，该书受到日丹诺夫的公开批判。1950年他曾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文章的哲学部分进行注释。1954—1955年任苏联文化部长，后任白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译者

热烈的心情表示对南斯拉夫的问题很感兴趣。我早就知道他很有演讲才能，这点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讲话时生动活泼、形象呼之欲出、而且逻辑性又很强、思想清晰、完整。他是位个子矮小背有些驼的老年人，黑黑的肤色，留着一撮小胡须。他说话时S和Sh不分，却十分柔和，更奇怪的是显得无精打采似的。在一切方面都十分殷勤、周到，遵守礼节到令人觉得难以为情的程度，他的举止留有明显的上层社交界的气质。

我在谈到南斯拉夫起义发展过程时说，在南斯拉夫以新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按其实质来说是和苏维埃一样的政权。我特别强调的是农民的新的革命作用：我把南斯拉夫起义几乎看成是农民起义与共产党先锋队相结合的产物。曼努伊里斯基和亚历山大罗夫虽然没有反对我的看法，但也没有赞成这一看法的任何表示。

虽然当时我认为斯大林在一切问题上起主要作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我仍然希望曼努伊里斯基能在观点和思考问题方面会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和主动精神。他的活跃和对南斯拉夫斗争的赞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使我十分感动，但这次会见告诉我，曼努伊里斯基在制定莫斯科政策（包括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中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他在谈到斯大林时，总是力图把自己恭维的话语给以“科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例如他说：

“要知道，完全不可理解，一个人能够在决定命运的战争时刻起如此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人身上竟然能够集中了那么多的才能——他是国务活动家、思想家，又是军人！”

我关于曼努伊里斯基不起什么作用的想法后来完全得到了证实。他后来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外交部副部长（他是乌克兰的

犹太人)，而这意味着他已彻底离开了一切真正的政治活动。不过，作为共产国际的书记，他一直是斯大林手中的驯服工具，这还因为他过去不完全是布尔什维克，他曾经是托洛茨基领导的所谓“区域派”^①小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1949年我在联合国大会上见到过曼努伊里斯基，他是代表乌克兰在大会上发言，反对“帝国主义者”和“铁托法西斯集团”。他的讲演的才能只剩下肆无忌惮的胡说，他的思想的洞察力只剩下连篇的空话。这已经是一个完全无用的衰老不堪的老头子——不久他就从苏联特权等级的阶梯上滑了下来，以后就再也无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季米特罗夫的情况不同。

那次我在苏联逗留期间我曾见到他三次，两次是在苏联政府医院里，一次是在他的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

每次他给我的印象都是他的疾病缠身的样子。他有哮喘病，呼吸困难，皮肤颜色很不健康，一块红，一块白的，完全是病态现象。耳朵后边的皮肤干巴巴的，象得了皮癣似的。头发脱落了，稀少得露出了他那枯萎了的黄色的头皮。

然而，他的思想活跃、敏锐而新颖，和他的缓慢而疲倦的动作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未老先衰的、体力已完全衰竭的人，还在发射着强大的智慧和热情。他的面貌也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他鼓溜溜的蓝眼睛发射出那紧张思考的光辉，那高

^① “区域派”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参加的人有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及大部分是从布尔什维克分裂出来的列宁格勒“前进派”小组成员，他们企图劝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和解，组成统一的党。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他们和孟什维克决裂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批准“区域派”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译者

高的大鼻子和突出的下巴。他虽然没有能够讲出他所考虑着的一切，但他谈吐坦率，思想坚定不移。他当然了解南斯拉夫事件的实质，但也认为考虑到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不必过早地涉及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真正共产主义性质。我也和他一样，认为在宣传中首先要强调反占领者的斗争，不要涉及这一斗争的共产主义本质。但同时我想让苏联的领导层和季米特洛夫本人明白，至少在南斯拉夫没有必要强制要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行动，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次战争和国内战争都已证明，共产党是国内的唯一现实的政治力量。我这一观点的意思是不承认南斯拉夫的流亡王国政府，总之，实际上不再承认君主政体本身。

我同季米特洛夫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把南斯拉夫国内发生的事件和形势全都告诉了他。

季米特洛夫坦率地承认，他没有想到，南斯拉夫成了最有战斗力最善战最机智的党，原来他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法国党身上。他回忆起，铁托在1939年底离开莫斯科时曾发誓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将会洗刷各种宗派分子留下的污点，并证明他们是无愧于自己的光荣称号的党。季米特洛夫当时劝铁托不要发誓，而是要机智和勇敢地行动起来。他告诉我说：

“您知道吗，当提出要任命南斯拉夫党的书记问题时发生了分歧，我同意瓦尔特^①任书记，他是工人，坚定而严肃。我很高兴，因为没有看错人。”

季米特洛夫似乎颇带歉意地提到，苏联政府没有能够在南斯拉夫游击队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他曾把南斯拉夫的情况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也很关心这件事。这是真的，因为

^① 瓦尔特是约瑟普·铁托在共产国际用的化名，在采用铁托这个名字以前，他一直用这个化名。——译者

1941—1942年苏联飞行员确实企图打通到南斯拉夫游击队基地的道路，但是没有成功，而一些被派出去的流亡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党员也都给冻坏了。

季米特洛夫也回想起我们就交换俘虏同德国人进行的谈判，他说：“当时我们为你们担心，幸好一切都顺利地结束了。”

我没有说什么，不想把谈的话超过他提出的范围。如果他提出要了解一些细节的话，我也不会再多讲了。但是我担心他会问我不好回答的问题，这个想法是多余的——因为在政治上那些已经取得了良好结果的事情，是很快就会被人忘记的。

季米特洛夫确实什么也没有坚持，因为共产国际在事实上已经解散了，他本人的工作任务是搜集各国共产党的情报以及需要时向苏联政府和党提出建议。

他还告诉我，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想法最初是怎样产生的：这件事是苏联与波罗的海国家合并的时候发生的。就在那时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传播共产主义的主力是苏联，所以一切力量应该直接在苏联的周围团结起来。然而，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解散之事被搁置下来了，主要是担心别人会怀疑：这一定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下作出的，因为当时苏联和德国人的关系并不坏。

季米特洛夫是得到斯大林尊重和在他面前享有威信的人。他是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当然领袖，当然这点并不太重要。

这个问题在我同季米特洛夫以后两次会见中被证实了。第一次会见时我把南斯拉夫的形势告诉了保加利亚党中央的成员，第二次会见时我们谈到保南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以及保加利亚的斗争情况。

在同保加利亚中央会见时，除了季米特洛夫外，参加会见的还有科拉罗夫^①、契尔文科夫^②等人。

我第一次去拜会时就见到了契尔文科夫，但他没有参加谈话，所以我当时以为他是季米特洛夫的私人秘书。第二次会见时，他还是沉默着，态度克制，可是后来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变了。我从费拉霍维奇^③和其它人那里得知，契尔文科夫是季米特洛夫的妹婿，在大清洗时他已被列为逮捕对象。在他当教员的政治学校里已发出关于“揭发”他的通知，可是他躲到季米特洛夫家里来，季米特洛夫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把这件事情处理了，他才幸免于难。

在清洗期间，受害最深的是那些地下党的流亡在苏联的共产党员，因为没有人保护他们。保加利亚的党员很幸运，因为季米特罗夫是共产国际的书记，是很有威望的人物，他拯救了

① 瓦西里·科拉罗夫（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员，1949年继季米特罗夫之后任总理。他也是共产国际的老战士，1922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保加利亚，历任保加利亚临时主席（1946年）、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年）等职务。——译者

② 伏尔科·契尔文科夫（1900—1980）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1919年入党。1925年因参与密谋索非亚大教爆炸案，与其妻子（季米特罗夫的妹妹）一起逃往苏联。在苏联列宁党校毕业后，参加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工作。1937年苏联大清洗运动期间，任列宁党校校长，直至该校于1941年停办为止。第二次大战期间，领导对保加利亚进行广播的苏联“赫里斯托·鲍泰夫”广播电台的工作。1944年9月9日回到保加利亚接受共产党书记处的工作。1950年1月继科拉罗夫之后任总理。同年11月任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死后，辞去总理工作，任文化部长，后来又恢复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苏共22大以后，保共于同年十一月召开了全会，将他开除了政治局。——译者

③ 维利科·费拉霍维奇（1914——）1935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门的内哥罗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组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方面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1944年底回国任南共党《战斗报》主编和外交部副部长。是南斯拉夫出名的理论家，杰拉斯离开领导职务之后，他和卡达尔都是理论界享有盛名的权威人士。——译者

许多人。流亡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党员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保护，或者勿宁说互相间又争权夺利、想方设法要证明自己对斯大林和列宁主义的忠诚，实际上他们为自己掘了坟墓。

科拉罗夫是个七十高龄的老人，已经老态龙钟，而更重要的是从他身上可以看得出多年来他已不从事政治活动了。他很象是“紧密派”^①时代和保加利亚党起义年代的遗老。科拉罗夫的大脑袋如其说象斯拉夫人的头型，还不如说象土耳其人的头型。他的五官都很粗犷，鼻子高高的，嘴唇厚厚的。他的头脑全都是已经流逝的往事，和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而且言谈中颇带有几分恶意。

在叙述中，我并没有只限于分析，我还描绘了我们国内被烧杀的恐怖景象；我告诉他们战前入党的一万人中如果幸存下来的有两千人，就很不错了，我当时估计我们的战士和居民大约牺牲了一百二十万。我讲完后，科拉罗夫只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在您看来，马其顿人讲的话更近似保加利亚语还是塞尔维亚语？”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已同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过几次严重的摩擦，因为后者认为，既然保加利亚占领了马其顿，那么当地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也应该转归他们来领导。共产国际的表态终于结束了这一争执，他们同意了南斯拉夫的观点，但这时德国已进攻苏联了。以后，随着德国（也包括保加利亚）必然失败形势的来临，围绕着马其顿及起义问题的摩擦也越来越尖锐了。费拉霍维奇在莫斯科也指出过：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提出了对南斯拉夫马其顿的领土要求。诚然，在

^① “紧密派”是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左翼，后来发展成共产党。1923年保加利亚共产党进行了反对赞科夫将军军人集团的武装斗争，该集团不久前发动了政变并杀害了农民领袖亚历山大·斯坦波利斯基。——译者

这个问题上，季米特洛夫的态度和其它人的态度有些不同，他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摆在首位。但是我想，连他也没有认为马其顿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尽管他的母亲是马其顿人，而他又对马其顿人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在回答科拉洛夫的问题时，也许颇有不敬之意，我说：“我不知道马其顿人的语言是近似保加利亚语还是塞尔维亚语，但是我知道马其顿人不是保加利亚人，马其顿地区也不属于保加利亚。”

季米特洛夫听了我这样说很不舒服，他的脸红了并摆手说：“这并不重要！”，并把话题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去了。

我已不记得，当我和季米特洛夫第三次会见时，有谁在场，不过契尔文科夫多半是参加了会见的。这次会见是1944年6月初在我即将回南斯拉夫之前进行的。我们谈的是有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然而，当时谈这一问题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当时保加利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游击队。

我坚持，保加利亚应该建立自己的游击队，把武装行动开展起来，我说，等待保加利亚皇家军队发生倒戈的事，那只是幻想而已。我所依据的是南斯拉夫的经验：只可能有个别的军官从旧的王国军队中转到游击队方面来，所以共产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经历千辛万苦，从小到大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显然，季米特洛夫尽管认为应该更加主动地开始组织游击队，但是他也抱有上述幻想。

但看得出来，他是了解我们不能了解到的情况的。当我指出，南斯拉夫与德国占领时期已经粉碎旧的国家机器，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扫除它的残余势力。此刻，季米特洛夫说了这样一句话：“再过三、四个月，保加利亚自然会发生巨大转变——红军不久就要开到保加利亚边界了！”

保加利亚和苏联虽然没有处于交战国的状态，当时我已经看得很清楚：季米特洛夫指出红军是解救保加利亚的决定性因素。他当然没有明确地讲出来，红军将要进入保加利亚，但显然，他当时已了解这种形势即将发生，并向我作了暗示。

由于季米特洛夫的这种看法和打算，使我强调游击活动的看法失去了实际意义。所以我们的谈话转到相互交换对其它一些问题的看法，然后他表示向铁托及南斯拉夫战友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我想应该提一下季米特洛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问题。他同大家一样，对斯大林是尊重和钦佩的，在他的态度中没有明显的奉承和崇拜。他对斯大林的关系是一个服从领袖、遵守纪律、而又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革命者的态度。他特别强调的是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作用。

对我描述了当时的苏联的情景，他说：“当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人们普遍失去了信心，产生了混乱不知所措的情绪。苏联政府搬到古比雪夫市去了。可是斯大林还留在莫斯科。我当时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档案正在转移。我建议斯大林，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一个给德国士兵的宣言。他虽然认为这个作法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同意了我的建议。不久我被迫离开莫斯科。可是斯大林仍留在莫斯科，并决定保卫莫斯科。在这悲惨的日子里，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时，他在莫斯科红场上检阅了军队，部队接受了他的检阅，从他的身旁走过直接开往前线。当苏联人们知道了斯大林还坐镇莫斯科并且听到莫斯科的讲话时，他们所受到的巨大鼓舞是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为此他们恢复了自己的信念，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而这一点比拥有一支好的部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

在这次的会见中，我认识了季米特洛夫的夫人，她是苏台

德区的德国人。此事大家都讳莫如深，因为当时大家对德国人都自发地怀着深仇大恨，对这些事他们比对反法西斯的宣传更容易接受。

季米特洛夫的别墅非常豪华，那里应有尽有，缺乏的只是欢乐。季米特洛夫的独生子已经夭折了，一个弱小男孩的像片挂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季米特洛夫作为战士还能经受得起失败和享受胜利的喜悦，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已是精疲力竭的老人，他只能对向他表示同情关切的周围的环境用沉默表示感谢。

(四)

在我们到达莫斯科前几个月，苏联宣布在苏联境内成立了一个南斯拉夫旅。前此不久，还建立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队伍。在南斯拉夫时，我们总是不明白，苏联境内怎么会有那么多南斯拉夫人，就是偶然来到苏联的少数政治流亡者也都在清洗时失踪了。

到莫斯科后我才弄明白了，原来所谓南斯拉夫旅的主力是克罗地亚卖国贼巴维里奇派往苏联前线德军那里去的一个团，用以作为和德国人合作的象征而派出的。然而巴维里奇的部队在那里运气不好，这个团在斯大林格勒被击溃了，全团官兵被俘。在经过一般的清洗之后，改编了这个团，组建了以该团团长麦西奇为首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旅。以后，又从各处招来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政治流亡分子，把他们作为政治干部派到这个队伍里去工作，苏联军官——军事专家和保安工作人员——负责培训和审查人员的工作。

苏联代表一开始想让这个旅的军衔和配带的军徽和南斯拉夫皇家军队一样，但是弗拉霍维奇坚决反对，所以他们同意采

用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用电报往返的形式商谈妥军衔和帽徽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弗拉霍维奇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帽徽和各种徽章变成了幻想和妥协的混合体。最后这一问题还是由于我们的坚持终于解决了。

在南斯拉夫旅问题上，没有发生其它实质性的分歧，当然如果不把我们对保留老团长领导该旅表示不满计算在内的话。俄国人保护了他，他们认为，他已经表示悔改，而且这样做，对团结下级能起良好的作用。麦西奇给我的印象是，他已完全没有斗志，和其它许多人一样，他之所以改变态度，只是因为怕被送到俘虏营去。他本人对自己的地位也不满意，因为大家都明白，麦西奇在旅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只是走走形式，当作摆设而已。

这个旅驻扎在克洛姆纳附近的森林里。就住在地下工事里面，他们冒着俄罗斯冬日的严寒进行训练。

起初我对旅内实行的严酷的纪律表示惊讶，我总感到对这个军队提出来的目标，与向这些人员灌输这一目标，使之相信这一目标的方法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在我们游击队里只有同志间的友爱和团结，只有当发生抢劫和违法乱纪行为时才采用严厉的惩罚措施。在这里一切都建立在盲目服从的基础上，就连腓特烈一世时代的普鲁士人也在他们面前大为逊色。我们在南斯拉夫已经学会和教育了其它人的那种自觉纪律在这个旅里连个影子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旅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无论对苏联教官的过分严厉，或者对昨天还站在德国人一边和我们作战的士兵，我们都毫无办法。我们进行了一次视察，讲了话，马马虎虎地讨论了一些问题，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能够改变。同军官们的例行设宴招待当然是少不了的，他们不停地为铁托和斯大林举杯，还为斯拉夫人的兄弟友情互相拥

抱，但很快都喝得酩酊大醉，一无所剩了。

我们这次还有一个附带的任务——研制第一批新南斯拉夫的勋章。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如果说勋章、特别是“1941年纪念章”质量不高的话，这不是苏联工厂的罪过，而是因为我们从南斯拉夫带来的图案太一般、太差了。

那时监督外国人部队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茹科夫将军。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生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年纪不大，很机灵，幽默而善于开一些不太伤大雅的玩笑——他的这些品质在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中并不少见。关于南斯拉夫旅，他告诉我说：“如果考虑到我们所接受下来的是些什么货色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旅是相当不错的。”

的确如此。后来在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这个旅表现得并不怎么样，虽然他们的损失是巨大的，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军队指战员的素质差，更不是因为从组织上看它是一支畸形的队伍，以及军官完全缺乏与自己不同的军队配合作战的经验，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这里的作战方式完全和东线的作战的方式不同。

茹科夫将军也为我举行了宴会。墨西哥的武官在同我说话时表示愿意援助南斯拉夫，但遗憾的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援助怎样能够运到南斯拉夫的国土上。

离开莫斯科前夕我出席了茹科夫将军的午宴。他同他的妻子住在两个起居室一套的房间里。房间舒适，但很朴素，当然在莫斯科的条件下，又是战时，这样的房子已经显得够豪华了。茹科夫是很忠诚的干部，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在实现共产主义方法的问题上，他崇尚暴力胜于主义。我们之间的关系多少可算是亲密的，但是彼此都很克制，这是因为任何因素都不能排除我们之间的习惯和观点方面的差别，因为只有每个人

保留了自己特点的时候，政治友谊才是宝贵的。

告别时茹科夫赠给我一支军官用的自动步枪，一件朴实的但在战时很适宜的礼物。

那时，我也有过性质完全不同的会晤——同苏联侦探机关的会晤。我在红军司令部招待所里通过科佐夫斯基上尉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衣着朴素的小人物，他并不隐瞒自己是以国家保安机关的名义同我打交道的。我们约会第二天见面，而且使用的秘密接头的方法之多，使我这个多年的老地下工作者都认为这一切都是多余的、老一套的、故弄玄虚的复杂方式。在我住处不远的胡同里有一辆小轿车等我上车，然后我们在城里兜圈子，我们换了一辆，又在一条街上下了车，步行到另一条街上，在这里从一座大楼的窗户里给我们扔出了一把钥匙，我们用这把钥匙把三层楼上的一套豪华住宅的房门打开了。

住所的女主人（如果她是女主人的话）是一个金发的北方人，她生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是一个漂亮、身体强壮而丰满的女人。她丰满的体态使她更增加了姿色。在我们见面时，她的美丽和魅力，看起来并不起什么特殊的作用。她比带我来这里的人级别更高，因为她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而带我来的那个人却在作记录。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的情况如何，而对南斯拉夫其它政党的兴趣并不怎么大。我感到厌恶，因为这很象是警察局的审问，但我知道作为共产党人，我有责任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如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个成员要召见我，我也不会产生怀疑。然而，为什么这些人需要了解有关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情况呢？这些特工人员的责任不正是要同苏联的敌人及各共产党内可能出现的奸细作斗争的吗？尽管我有这样的疑问，我还是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不过，我回避答复任何具体的问题，不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特

别回避谈论涉及党内摩擦的问题。我回答时感到一种厌恶情绪在支配着自己，因为从道义上我实在不能背着我的同志谈论他们的任何情况，我从内心里不愿意在无权了解我们党内部情况的人的面前，讲我们党内的情况和我个人对他们的评价。我这种厌恶情绪当然使我的主人感觉出来了，谈正题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边喝茶吃点心，边进行不太紧张的同志式的谈话。

可是，我同苏联社会活动家的会面更多一些，也更亲切一些。

那时，在苏联与同盟国的外国人之间接触并没有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战争正在进行着，而我们是唯一发动反希特勒起义的党和民族的代表，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心。寻找新思想、新题材的作家，寻找有趣故事情节的电影工作者，想得到写文章的新资料和情报的记者，请求作为志愿者去南斯拉夫作战的青年男女，都来找我们。

苏联最大的报纸《真理报》约我写关于南斯拉夫斗争情况的文章，《新时代》杂志要我写关于铁托的文章。

无论写第一类或第二类的文章，在编辑部我都遇到了困难。

《真理报》把有关我们斗争的性质及其政治后果的部分基本上删掉了。在我们党内，我们把一些文章的内容纳入与党的路线相吻合的轨道的事也是有的，但这只是在文章偏离党的路线太明显，或者当有人提出了十分微妙的问题的时候。然而《真理报》却把一切涉及我们斗争的实质性内容——新政权和社会变革——全部删掉了。不仅如此，它还企图改变我的文风，把每一个具有特色的提法都给删掉、缩短了句子，改变了我的语气。我的文章变得枯燥无味。在我同一个工作人员争吵了一阵之后，我只好同意他们歪曲我的文章，因为我意识到没有

必要为此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登载这样的文章还不如什么文章都不登。

同《新时代》杂志的争论就更加厉害。在这个杂志社对我的风格和热情改动得比前一篇少一些，但是凡是谈到铁托个人的特殊和突出作用的几乎所有的地方或者被抹去棱角或者被删掉。在我同《新时代》某一工作人员第一次见面时，我同意改变某些非原则性的小问题。当我第二次和他见面时，我已经懂得在苏联除了斯大林之外不能称赞任何人，因此我才同意作了其它的改动，当时《新时代》的工作人员毫不掩饰地告诉我：

“由于斯大林同志的原因，这样做是不恰当的，这就是我们这里的规矩！”我还想指出，我之同意作某些改动，是因为我的文章从总的方面看，还保留了其实质和风格。

对我和其它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来说，斯大林的领导作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也提高其它的共产党领袖的地位，具体来说，例如铁托这样的人，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有功劳的。

需要补充一下，铁托本人对这篇文章很满意，因为据我所知，在苏联报刊中，还没有对任何在世的活动家给予过如此高的评价。

（五）

其中的原因在于，苏联的舆论界——当然是共产党舆论界，因为在苏联不存在其它的积极而公开的舆论——当时对南斯拉夫斗争很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战争的进程改变了苏联社会的气氛。

回顾过去，我可以说：当时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信念，战争期间苏联人民再一次表明了自己对祖国和革命基本原理的忠

诚，因此战后不需要各种政治上的限制，也不需要一小批领袖或者至少是一个领袖在意识形态及其它方面的垄断。在苏联人民眼前，世界发生了变化。显而易见，苏联不会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领袖和革命理论家正在出现。

那时，这种气氛和情绪不仅没有影响苏联领导的威望，相反，帮助了他进行战争。况且还有许多原因，使苏联领导也支持了这种幻想。此外，铁托，更确切些说是南斯拉夫的斗争改变了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力量的对比，而丝毫没有威胁苏联的阵地，相反，巩固了这一阵地，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宣传和支持这一斗争。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情况。苏联政权，更确切些说是苏联共产党，虽然同西方民主国家结成了联盟，但是在斗争中它感到自己是孤立的，因为只有他们是为自己的生存和为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而战斗。由于第二战线还没有开辟，更确切些说，当俄国人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第二战线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役，因此每个普通俄国人，普通战士都感到自己很孤立。南斯拉夫起义使苏联的领导和人民都消除了这种孤立感。

我作为共产党员和南斯拉夫人对处处受到的爱戴和尊重、特别是在红军中所受到的热爱和尊敬而深受感动。在一个被缴获的德军武器展览会上，我心安理得地在签名簿上写道：“我为在这里没有南斯拉夫武器而自豪！”，在这个展览会上可以看到欧洲各国的武器。

我们被邀去参观西南战线，这里是伊·斯·科涅夫^①元帅

^① 伊凡·斯切潘诺维奇·科涅夫（1897—1973）苏联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解放哈尔科夫（1943年）和基洛夫格勒（1944年）战役中赢得了空前的盛誉。战后出任维也纳盟国管制委员会苏方代表。1946年至1955年任陆军总司令。从1955年起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总司令。1960年因病辞职。他是1953年处决贝利亚的特别法庭庭长。——译者

指挥的第二乌克兰战线。

我们的飞机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镇乌曼降落了，这里，战争和无限的人类仇恨所带来的破坏和创伤到处可见。

当地的政府为我们举行了晚宴和安排了我们同本城社会活动分子的会见。在这破烂不堪的楼房内所举行的晚宴是不会愉快的，而乌曼市的主教和市委书记就是当着外国人的面也无法掩盖他们之间的互相恶感，而他们各自按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反德国人的斗争。

我已从苏联的党的工作人员那里知道，战争一爆发，俄罗斯大主教就不经过政府允许开始散发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油印通谕，而这些通谕不仅在大主教所属的宗教界中，而且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了响应。这些呼吁书从形式上也是吸引人的，它们和千篇一律的苏维埃宣传材料不同，它们给人以一种古老而虔诚的爱国主义的新鲜感。苏维埃政权很快随机应变并开始依靠教堂的支持，尽管还继续认为这是旧社会的残余。在战争灾难降临期间，宗教感情活跃起来并开始在苏联扩散。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使团团团长科尔涅也夫将军告诉我们，许多人、甚至是很多负责的同志在面对德寇的生死存亡时刻都曾经想去信仰东正教，认为这是更加长期起作用的精神刺激因素。他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东正教去拯救俄国！”

今天，那些不能想象当时落在俄国人民头上的打击是如何沉重的人，不懂得当时每个人类社会所能接受和发展的思想只是如何能保存和改善社会生存条件的人，他们对上述的思想状态是无法理解的。科尔涅也夫将军虽然是一个酗酒成性的人，但他并不愚蠢，而且对苏维埃制度和共产主义是忠贞不渝的。我是在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而革命运动是靠自己思想的纯洁性为自己生存而斗争的，所以科尔涅夫将军当时的假设在

我看来是可笑的。然而，当乌曼市的主教为斯大林举杯，把他称之为“俄罗斯国土的统一者”时，我并不觉得奇怪，这证明俄国人的爱国主义，也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是多么强烈呵。斯大林本能地明白了，如果不求助于俄国人民的传统愿望和民族精神的话，那么无论社会制度还是政权都经不住德国侵略军的打击。

但主教巧妙地但好象是随便地强调教会作用的时候，乌曼市委书记简直无法掩饰自己的恼火。而最使书记恼火的是居民的消极情绪——他在占领时期所领导的游击队人数少到不足以对付亲德的乌克兰警察。

确实如此，乌克兰对战争和苏联胜利的消极态度是无法掩盖的。当地居民给人的印象是忧郁和沉默，他们对我们丝毫兴趣都没有。我们唯一接触的人是军官，他们对乌克兰人民的情绪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用过分乐观的调子谈论他们，可是我们的俄国司机骂他们没有好好作战，现在还要俄国人解放他们。

第二天，我们顺着红军胜利前进的道路踏着乌克兰春天的泥泞出发了。我们到处看到被炸毁的东倒西歪的德国人的装备，这更加衬托了红军的英勇善战和强大的威力。但是，我们更加佩服的是俄国士兵的能吃苦、有毅力和谦虚的美德，他们能一连几天、几星期在齐腰深的泥水中不吃不睡，坚持打退德国人的猖狂进攻。

今天，如果放弃我当时的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心情，我仍然和过去一样，对红军，尤其是对他们的核心——俄罗斯士兵，给以极高的评价。

苏联的军官，特别是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政治上受到的是片面教育，尽管如此，在其它方面他们具有积极主动性，广阔的文化知识和认识水平。严厉的和无条件的（但不是没有意义

的)纪律,自觉服从于主要目标和任务。苏联军官不仅具备很好的专业知识,他们同时还是属于苏联知识分子中最有才干和胆略的那一部分。他们的报酬虽然相对而言是很不错的,但是他们并不组成一个隔绝于外界的特权阶层;上级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求不高,首先要求他们勇敢指挥,亲临战场。例如:在雅斯地区的军团长的指挥部离德军前线只有三公里。斯大林虽然在军队中搞了大清洗,特别是在高级指挥系统中,但是这点所带来的危害并不象人们所估计得那样严重,因为他同时毫不动摇地提拔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军官——忠于他的每个军官都明白,他们的风发的志向会得到支持。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对高级指挥体系所进行的调动和安排如此迅速和果断,使人们看到,他真是精明强干并愿意给最有才干的人提供晋升的机会。他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方面,在军队里培养绝对服从政府、党和他个人的精神,为加强军队战斗力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惜一切;另一方面,迅速提拔最有才能的人才。

在红军里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军长讲的、当时使我感到十分奇怪、但确是很勇敢的提法,他说:“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时,战争将是极端残酷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战争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因此共产主义必须消灭阶级,到消灭了阶级的时候人类就没有进行战争的必要了,——这点苏联指挥员和我一样都是很清楚的。但是,这位将军象其它许多俄国士兵和我一样,在残酷的战斗中通过战争的痛苦历程,感觉到以后还会出现另一个遥远的真理:即正是在全人类都处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时,人和人之间的斗争才会达到最残酷的程度。这是因为制度不可能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各种不同的宗派为了人类的“幸福”,将会惨无人道地消灭人类。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苏联军官们虽然把这一

思想深藏在他们的心中，可是我没有忘记，而且当时也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即使他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保卫的社会里也存在着深刻的对抗性分歧时，但他们无疑已模模糊糊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人虽然不能在某个特定社会和在某种特定意识下生活，然而他的生活还从属于某些其它的、同样重要的、不可动摇的法则。

在苏联，我们已对许多事物逐渐习惯了。可是当我们离开前线的前夕，科涅夫元帅司令部在一个比萨拉比亚村庄为我们举行的酒会，使我们这些坚信只有通过苦行僧的禁欲主义才能取得并已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党和革命的儿子感到十分惊讶！

一些对服务员来说长得太漂亮、打扮得太妖艳的少女，不断端来大量的精美食品——鱼子酱、干鱼脊肉、鲑鱼、鲜黄瓜、腌蕃茄、火腿、烤仔猪和辣干酪，接着又端来红果汤、热热的肉饼，最后是足有几寸厚的蛋糕和一盘盘南方水果。这一大堆东西简直要把桌子压弯了。

可以感觉出来，苏联军官在酒会以前就已经望眼欲穿，要在酒会上大吃大喝一阵。但对南斯拉夫人来说，这是一次大考验，因为他们也必须喝酒，尽管这和他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他们军队和党的传统是不相吻合的。在酒会上，他们都表现很好，尤其是如果想到他们不习惯喝酒，他们借助于精神高度集中和毅力才帮助他们经受住了无数次的“干杯”，而没有醉倒。

我和往常一样喝得很少而又谨慎，我的借口是头痛，当时我也确实患有头痛症。而我们的捷尔基奇将军太惨了，他本不会喝酒，但是他应付不了俄国兄弟们，特别是他们举杯要为斯大林干杯，而且又是在他们刚刚为铁托干完杯的时候。

陪同我们的苏联总参谋部的上校最可怜了。因为他是“后

方兵”，元帅和他的将军们利用自己比他军衔高这一有利地位拼命地冲击他。科涅夫元帅完全不顾上校体弱多病这点，他正是因为在前线多次受伤才调到总参谋部工作的。元帅直截了当地命令上校说：“上校，为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胜利干一百克酒吧！”

大家沉默无言，都在看着这位上校，我本想替上校说几句好话，但是他却站起来，立正后把酒喝下去了，不久我们就看见在他那高高的、苍白的前额上冒出了一颗颗的大汗珠子。

负责同前方保持联络的军官，前方指挥部的军官都不能喝酒，除非前方确实平安无事。据说，在同芬兰打仗时，日丹诺夫建议斯大林，为对付严冬每天发给士兵一百克白酒，从那时起，红军的这一习惯保留下来。在进攻前夕还加一倍。别人告诉我：“这样可以使士兵更感到无忧无虑，奋不顾身了。”

科涅夫元帅也不喝酒，因为医生发现他肝脏有病不让他喝酒，当场也没有比他军衔高的军官，所以没有人命令他喝酒。

科涅夫元帅，五十岁，身材高大，一头金发，他的脸虽然消瘦但很精神。他因为同意公认的“哲学逻辑”——“应该让人们时常有娱乐的机会”，所以鼓励大家大吃大喝，但是他有卓见，对自己和下级具有充分的信心，和别人不同。

随同我们去前方的《真理报》记者——作家波列沃依，在我们面前常常过分夸耀他的国家的英雄气概和其它长处，他也向我们讲了不少说明科涅夫的超人毅力和勇敢的轶事。有一次，当科涅夫所在的瞭望哨遭到德军迫击炮的猛烈攻击时，他假装用望远镜进行观察，但实际上却斜着眼睛看他的军官表现如何。每个军官明白，如果他表现出丝毫动摇的话，他就立刻会被撤职，因此他们都不敢警告科涅夫，说他的生命正在受到多么大的威胁。周围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但是科涅夫本人在他

的观察全部结束后才离开瞭望哨。还有一次，弹片打中了他的腿，他仍然继续留在前方。

科涅夫是一位斯大林式的新型指挥员，尽管他提升并不象罗柯索夫斯基那样迅速和轰轰烈烈。他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即参加了红军，那时他是一位青年工人，后来他几度在军校学习，一步一步地得到提升。他是经过战斗洗礼提拔起来的将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军队骨干的特点。

沉默寡言的科涅夫只用几句话向我讲述了刚刚结束的科尔松——谢甫琴柯战役的情况。在苏联，大家是把这次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提并论的。当谈到德军最后惨败的景象时，他显得洋洋得意，他说：拒绝投降的八万、也许是十万德军被逼到一块小小的地段，然后用坦克击溃了他们的重型装备和机关枪基地，最后哥萨克骑兵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元帅笑着说：“我们允许哥萨克骑兵尽情地砍杀敌人，甚至连举手投降的敌人的手，他们也都给砍掉了！”

应该承认，当时我也为德军这样的下场而高兴，因为纳粹分子自称他们是优秀种族也把战争强加给我的祖国。在这一场战争中丧失了一切传统的人道主义原则。与此同时，一种恐怖感控制了我，因为一切确实也只能如此，而又不能是另一个样子。

我当时坐在这非凡人物的右侧，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提了一些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第一，苏联在战争开始时的那些高级将领：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为什么被调离他们的岗位？

科涅夫回答说：“伏罗希洛夫是一个大无畏的人，但是他没有掌握现代化战争的方法。过去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赢得胜利。伏罗希洛夫曾经指挥过军事活动的国内战

争期间，空军和坦克实际上并没有起作用，而在现代化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飞机和坦克。布琼尼从来没有掌握很多知识，以后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他简直是没有用处的人，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沙波什尼科夫从来都是参谋部的专家。”

“斯大林呢？”我问道。

科涅夫假装不感到惊奇，稍考虑片刻，然后谨慎地答道：

“斯大林是全才，他出色地掌握了整个战争的特点，所以能够保证顺利地指挥战争。”

他没有多讲，也没有讲什么吹捧斯大林的那些老调子。至于斯大林在纯军事战役方面有那些领导才干，他也没有谈什么。科涅夫是异常忠于党和政府的老共产党员，但在我看来，他在军事方面的观点是相当固执的。

科涅夫也送了礼：他把他自己的望远镜送给了铁托，赠给我的是手枪。这支手枪我一直保留到1956年，那年我被捕时被没收了。

在前方，普通士兵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及主动精神是到处可以见到的。遭受灾难的俄国在极端紧张的形势下全力以赴地争取最后胜利。在那些日子里，整个莫斯科，包括我们在内，象孩子一样为“礼炮”，即欢庆胜利的烟火而兴高采烈，因为这胜利是用多少大火和死亡，希望和痛苦换来的。对南斯拉夫战士来说，这也是他们祖国所遭受到的灾祸中的欢乐。那时，苏联似乎除了这辽阔无际的国家亿万人民的忘我紧张精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我只看到了这些，主观地在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划了等号，因为我也渴望这个制度，正为它而奋斗。

(六)

下午五点钟，我在泛斯拉夫委员会刚刚讲完话正开始解答问题时，有人轻轻在我耳边告诉我得赶紧结束报告，因为有一件重要的、紧急的事情要办。我这次作报告，不仅引起我们南斯拉夫的干部、而且引起了苏联人的重视，莫洛托夫的助手A·洛佐夫斯基把我介绍给经过挑选的听众。南斯拉夫问题对盟国也成了越来越密切关注的问题。

我向听众道了歉，也许是别人替我道了歉，我还没有讲完我的想法，就同捷尔基奇将军一起被领进街上的一辆比较陈旧的轿车里。汽车开动后，一位不认识的公安上校告诉我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要接见我们。那时，我们的军事使团已住到莫斯科银松村郊区的别墅。我想起我们要送给斯大林的礼物，因此很不安，怕我们如果去取礼物的话，那么就一定会迟到了。可是什么都考虑到了的国家保安机构连这点都想到了——我们的礼物已放在汽车里上校旁边。因此，一切都已就绪，连我们的服装也都准备好了，因为十天以前我们就穿上了苏联服装厂给我们做好的新衣服。现在的任务是不要着急，慢慢听上校讲些什么，尽可能少提问题。

少提问题这点我已经习惯了，但是我无法控制我的激动心情，这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感情，这时我感到我的脸色苍白，高兴得使我心慌意乱了。

对一个来自战场，来自革命前方的共产党员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吗？

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这是对我们游击队战士以及我们人民的英雄主义及艰苦奋斗的最高的承认。对于那些经过监牢，

参加过战场厮杀，经受过精神上极痛苦的转折和进行过反对国内外共产主义敌人的斗争的人来说，斯大林的形象甚至比斗争中自己的领袖形象还要高。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脑子里，他是理想的化身，是最崇高理想的化身，所以是某种完美无缺的、永远正确的人。斯大林是今天斗争胜利和未来人类大同的化身。我知道，只是因为偶然巧合，我才成为他所接见的第一个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我是那样感到自豪和兴奋，因为我可以把会见的情况告诉自己的同志，把一些情况告诉我的南斯拉夫战士。

一瞬间，苏联的一切阴暗的东西都消失了，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一切矛盾也没有意义了或没有分量了，似乎这一切都未曾发生过。这一切使人不愉快的东西，在我此刻内心中产生的一切庄严而美好的思想面前消失了。和斗争的规模比较，我个人的命运算得了什么？在未来所实现的理想面前，我们的矛盾又算得了什么？

读者应该了解，我当时相信，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党的其它反对派确实是间谍和暗害者，所以对他们所采取的残酷无情的手段是罪有应得，正如对所有其它阶级敌人那样。如果说，我也曾发现一些从苏联回来的人在谈到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总是吱吱唔唔不敢说什么，我当时认为，这只涉及一些枝节问题或过失行为，等于是在健康的机体上面为了毫不保留地挖出坏肉时而碰了一下好肉，这是季米特罗夫告诉铁托的话，铁托曾把他的话转告过我们。所以我把斯大林的残酷无情的做法，正如宣传中所讲的那样，看成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措施。在我们眼里，斯大林的形象和他的历史地位一样更加提高了。我至今还不敢断定，如果我了解到审讯和清洗的全部真相的话，我会怎样行动。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良心会经受严重的危

机，但我还是会继续当共产党员——相信有一个比实际存在的更完备的共产主义存在着。因为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来说，更重要的不是手段，而是我们为之奋斗要达到的目标。此外，在我们这个分崩离析和多灾多难的祖国，对盼望摆脱百年奴役和落后，超越现实的我和我的同胞来说，共产主义是最明智的和最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

我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我们的汽车已经到了克里姆林宫门口。在这里换了另一个军官给我们，汽车继续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冷冷清清的广场上奔驰，这里周围除了长得细细的、还没有发出嫩芽的小树外，此外就没有其它的植物和有生命的东西了。军官给我们指了一下炮王和钟王，这些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炮和没有响过的钟是大俄罗斯的诡诞的象征。我们看见左边是伊万大帝的纪念钟楼，然后是一大排古老的炮。又过一会儿，我们到了一座不高的长方形的楼前，十九世纪中叶，这样的房子是为做办公室和医院建筑的。又有一名军官在这里等候我们，他把我们带进去了。在楼梯旁我们脱下了军大衣，在镜子前面梳了梳头发，然后上了电梯，我们到了第二层，这是铺着红地毯的长长的走廊。

在每一个拐弯处都有一名军官向我们行军礼，他们都是年轻而漂亮的小伙子，头上戴着克里姆林宫内部警卫用的浅蓝色帽子，笔直地站在那里。当时以及以后的许多岁月，我都为这里无比的整洁而惊奇不已，因为整洁到了不敢相信在这里还有人生活和工作的程度——地毯上铺着的白布上^①看不到一根毛发，铜把手上没有一个污点。

① 在国外，楼房走廊、过道楼梯等处的地毯上都铺着白色的布，经常换洗，以保护地毯并给人以异常清洁之感。——译者

最后，我们被带到一个不大的办公室，朱可夫将军已在这里等候着我们。一位矮个子胖胖的中年工作人员请我们坐下，他自己却从桌旁站起身来，走进另一个房间去了。

一切进展得很快，这位工作人员马上回来了并告诉我们，可以进去。我原以为起码还要经过三间办公室，才能见到斯大林，但是门一开，我们一迈进门槛，就看见了斯大林。他从隔壁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走出来，从开着的门可以看到里边的巨大的地球仪。莫洛托夫也在这里。他身体结实，皮肤雪白，身穿藏蓝色的讲究的西服，站在长长的会议桌旁边。

斯大林站在办公室中间迎接我们，我第一个走上前去，进行了自我介绍，捷尔基奇边立正行军礼边报告了自己全部职衔，而我们的主人只说了一个字“斯大林”，这使我们感到很滑稽。

我们又同莫洛托夫握了手，然后坐下，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右边是莫洛托夫，左边是我、捷尔基奇和朱可夫。

这间办公室是一个不大的长长的房间，没有任何豪华奢侈的陈设。在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上方挂着列宁的像片，在会议桌上方的墙上挂着苏沃罗夫和库图佐夫像，都镶在同样木制刻花纹的框子里，这些像都和各省的彩色照片差不多。

表现最随便的是主人。他穿着元帅服，软底靴，没有佩带什么勋章，只有一枚金星，即苏联英雄勋章挂在左侧胸前。在他的举止中看不到任何做作和大人物的架子。这不是画像和纪录影片中的威严的斯大林——不是那个行动缓慢，举止从容的人。相反，他一分钟也不能安静，一会儿摆弄他那个英国邓希尔公司生产的带白点标记的烟斗，一会儿用蓝铅笔把谈话的主要题目记到纸上，马上又把记下的东西用斜线划掉（在讨论某一题目快结束时），他的头一会儿转到左边一会转向右边，坐着也一

刻都不能安静，总是动来动去。

还有一点我很觉得奇怪：他个子很小，身材也不好看——身躯短并不魁伟，四肢太长，左手和右肩显得不太灵活。他的肚子不小，头发稀少，从前额到头顶并没有秃的地方。他的脸色很白、面颊红润，后来我知道，这是长期坐办公室的人的特征，在苏联上层社会中称之为“克里姆林宫的脸色”。他的牙齿发黑，也不整齐，有些往里歪。就连两撇胡子也不浓密，不给人以威严之感。但不管怎样他的面孔并不令人讨厌，而是有一种民间的、农民的、一家之主的表情，那不断转动的黄眼睛里有着某种严厉和狡猾的混合体的东西存在着。

他的口音也使我惊奇，可以感觉出来，他不是俄罗斯人。但是他的俄语词汇很丰富，他对俄罗斯谚语和典故运用自如，语言生动而流利。后来我才了解，斯大林对俄罗斯文学非常熟悉，仅此而已，其它的知识就仅限于政治史了。

只有一点对我来说并不是突然的，即斯大林的幽默感，那种颇为粗鲁而充满自信，含蓄而深刻的幽默感。他对别人的谈话的反应迅速而果断，丝毫也不犹豫，虽然他能把话听完，但是显然不愿意听长篇大论。他对莫洛托夫的态度很说明问题，很明显，斯大林把他当作自己身旁最亲信的同事，但以后我才弄明白：在政治局委员中莫洛托夫是斯大林唯一以“你”相称的人^①，这表示对他的重大的信任，虽然俄国人对相当亲近的人也往往有以“您”相称的。

谈话是以斯大林问我们对苏联的观感开始的。我说：“我们深受鼓舞。”

他说：“我们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可令人鼓舞的，虽然为了

^① 俄国人对亲人、好友、亲密的同志称“你”，对一般关系的人称“您”。

使俄国好起来我们尽了一切的努力!”

我记得很清楚，斯大林说的是俄国这个词，而不是苏联。这就是说，他不仅提倡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欣赏俄罗斯的爱国主义，而且把自己和它等同起来。

当时，我们来不及考虑这些问题，因为斯大林很快把话题转到同流亡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关系方面，他对莫洛托夫说：

“有没有可能使英国人上圈套承认铁托，承认这位唯一实际上真正在反对德国人的力量。”

莫洛托夫笑了，可以感觉其中的嘲讽和自负：“这点完全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南斯拉夫国内的情况太熟悉了。”

我在苏联机关里，特别是在苏联宣传中从来没有看到这种直截了当和开诚布公的态度，因此非常高兴。我立即感到我喜欢和能适应这种气氛，特别是因为和我谈话的这位伟人，和我一样，对待现实问题也持有毫不加掩饰的态度。当然，不必解释，斯大林只是在自己的人之间，即在忠于他和支持他共产党路线的人之间才持这种态度的。

斯大林虽然没有许诺承认民族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加强这个政府是很关心的。提出讨论的问题和斯大林的观点是如此明显，使我完全不必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显然，如果时机适宜，即如果苏联和英国之间，确切些说民族委员会和王国政府之间能够寻找出临时妥协的办法的话，苏联政府会立即承认民族委员会。

但是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必须寻找另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

然而，关于援助南斯拉夫军队问题倒是完全得到解决了。

当我提到要借贷二十万美元时，他说，这数字太微不足道

了，不会对我们有太大的帮助，而且马上可以把这笔款子交给我们。当我提到，将来在解放以后我们一定归还这笔用以供给我们的武器和其它装备的贷款时，他确实生气了：

“您在侮辱我，你们在流血，而我为提供给你们们的武器还要向你们要钱吗！？我不是商人，我们都不是商人，你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我们有责任和你们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

可是援助如何具体进行呢？

最后决定，向西方的同盟国请求在意大利建立苏联空军基地，从那里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

斯大林说：“试试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同盟国的立场和他们愿意在多大的程度上援助铁托。”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如果我记得确切的话，这个基地（共拥有十架运输机）很快建立起来了。

斯大林还继续谈这个问题，他说：“飞机帮不上大忙，因为一个军队不可能靠飞机提供供应，而你们已经是一个军队了。需要的是轮船，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船，因为黑海舰队被消灭了。”

朱可夫将军插话说：“在远东我们还有军舰，是否可以把它调到黑海，用这些军舰运送武器和其它装备。”

斯大林粗暴地、不容争辩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时，那看上去善于克制，谈笑风生的斯大林变成另一个斯大林了。他说：

“您的脑袋里哪来的这些糊涂思想？您怎么啦，难道不是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吗？远东也在打仗，一定会有人不让我们到达远东，或者干脆击沉这些船队。出的真是馊主意！应该去买船。向谁买呢？现在船都不够用。土耳其吗？他们的船不多，也不会卖给我们。埃及？对，可以向埃及买船。埃及会卖给我们，什么都可以卖给我们，包括船都会卖的。”

是的，我们所看到的是真正的，不能忍受异议的斯大林。我在南共党内也已习惯于不许争辩的作风，每逢我自己对某一问题决心已下，要作出最后决定时，也倾向于这样的作风。

朱可夫元帅默默地、迅速地记录了斯大林的一切命令。

但是，形势的发展已经没有必要用购买船只的办法去援助南斯拉夫。主要原因是东方战线的战斗进行得很快，红军不久就到了南斯拉夫边界，完全可以从陆地上帮助南斯拉夫了。我认为，那时斯大林确实想援助我们。

这就是我们谈话的实质。

同时，斯大林也想了解我对一些南斯拉夫政治家的看法。他问我，对米兰·加甫里洛维奇的看法怎样，他是塞尔维亚的农民领袖，驻莫斯科的第一任大使。我说：这是一个滑头的人。

斯大林自言自语地评论说：“是的，有的政治家认为，政治上的狡猾是最主要的。加甫里洛维奇给我的印象还不是愚蠢的人。”

我补充说：“不能说他愚蠢，但是他是没有远见的政治家。”

斯大林问我，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娶了什么人。当我说希腊公主时，他开玩笑说：

“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看，如果我或者你也要某个外国公主的话，那么，也许会带来点什么好处吧？”

莫洛托夫也笑了，但他言行克制，没有笑出声来。

最后，我把礼品献给了斯大林，这些礼品此时显得多么简陋而贫乏。但他没有表示出任何鄙视的意思。他看到草鞋时说：“草鞋？”他把枪机搬开又扣上，在手上掂了掂，又说：“我们的枪轻一些。”

会见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已是傍晚时分，陪同我们的军官也似乎被我们兴奋的心情所感染，他很高兴地看着我们，在任何细小的问题上都设法满足我们的要求。

在这个季节里，北极光出现时莫斯科也可以看到，所以周围的一切呈紫红色，时隐时现，显得那么迷人，整个世界似乎是非常现实的，比我们一直生活着的现实世界更加美丽。

我的心情也是如此美好。

(七)

那时，我同斯大林还有一次更主要和有趣的会见。

我记得那天，正是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的夜晚。

这次也没有任何人预先通知我晚上有什么事，仅仅告诉我，晚上九点钟必须到克里姆林宫去。晚上来了一辆车，就把我带走了。连我们使团的人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

我被带到原来斯大林接见我们的那栋楼里，但换了一个房间。我们到那里时莫洛托夫正在穿大衣和戴帽子，他说，我们到斯大林那里去赴晚宴。

莫洛托夫不爱讲话。即便是和斯大林在一起，当他的心情较好和周围都是自己的亲信，而且当气氛轻松和较随便时也是如此。莫洛托夫连在和人谈话时也是滴水不漏的。然而在汽车里他却问了我，除了俄文还掌握哪国语言。我说：法语。我们又谈起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力量和组织性问题。我强调，南斯拉夫共产党开始打仗时还处在地下，所以军队数量相对而言不多，约一万人，但是组织性很强。

我又补充说：“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布尔什维克党。”

莫洛托夫反驳我说：“您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我们

的党非常软弱，是一个组织上没有紧密联系、分散而人数很少的党。”他继续说，“我记得我在战争初期受党的委托从彼得格勒秘密来莫斯科时，我简直找不到地方过夜，不得已只得冒险，在列宁的妹妹家里躲了一夜。”

莫洛托夫告诉我列宁的这个妹妹名字叫玛利亚·伊里尼奇娜。

汽车驰速每小时八十公里，不停地开着。看来，交通民警知道这辆车的什么特征，一路都给它开了绿灯。驶出莫斯科市区后，我们在柏油公路上行驶。后来我知道它就是政府大道，战后很长时间，也许现在还是这样，只有政府的车辆才能走这条路。不久，我们到了一个哨口。坐在司机旁边的军官从通风玻璃后面翻出来一个什么小牌子，警卫就放我们进去了。右边的小窗是开着的，莫洛托夫发现了我被过堂风吹着，就把玻璃摇上来，我这时才发现玻璃很厚，于是我才知道我们坐的是防弹小汽车。我想，这是一辆派克牌汽车，1945年铁托从苏联政府那里得到一辆和这辆一模一样的汽车。

晚宴前十天，德国人对驻在德瓦尔的最高统帅部发动了一次空军陆战队的袭击。铁托和外国军事使团不得不退到山里。南斯拉夫领导不得不进行长途的艰难的行军，为此花费了许多为进行政治等活动所需要的宝贵时间。食品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苏联的军事使团把这一切都详细报到莫斯科了，我们在莫斯科的军事使团也同有关的苏联军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当他们进行组织援助南斯拉夫军队和最高统帅部时帮助他们出主意。苏联飞机组织夜航到南斯拉夫空投武器和食品。诚然，成效不大，因为空投的物资都落在广大的森林地区，而没有多久我们的军队又不得不放弃我们驻扎的这片森林地带。

在路上，莫洛托夫问我，对这一形势有什么看法。他对此虽然感兴趣，但并不激动，是为了得到更确切的情况而问我的。

我们又走了四十公里，拐到左边的公路上，就驶入小云杉林。又是一个哨口，走不远就到了大门口，我们面前是一片云杉林中的一座别墅。

我们刚从过厅走进一个小厅，斯大林出来了，他这回身穿一件扣子扣到领子的普普通通的上衣——就是那件从战前的照片上大家都熟悉的上衣。他的这一装束使他的个子显得更加矮小，而且也更觉得平易近人，简直是象在家里一样。他把我们带进一间不大的办公室，说也奇怪，这办公室好象是空的，没有书，没有画，木板墙上光光的，什么也没有。我们坐在一张不大的写字台旁边，他马上问起有关南斯拉夫最高参谋部的事情。

从他的提问中，他同莫洛托夫之间的差别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

从莫洛托夫口里，是不可能了解他的思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他的性格内向、令人捉摸不透。而斯大林的性格活跃、几乎到了无法安静的程度。他提问题时——他是在问自己，也在问别人；辩论时，也是和自己也和别人辩论。我不是说，莫洛托夫没有热情，也不是说斯大林不能克制和假装出各种样子，后来我也看到过他们两人也有不同于上述的表现。我只想说，莫洛托夫的表情从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不管谈论涉及什么事情和什么人；而斯大林，当他在自己党的小圈子里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丘吉尔曾形容莫洛托夫是完全现代化的机器人。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他的外表和他的特征之一而已。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相比，也是那么冷静、谨慎，遇事从各方面进行

周密的计算得失，然而，斯大林的天性是热情的，易于冲动的，同时他又具有各种不同的面孔。而且他进入每个角色时，都表现得如此真实，以至于在人们看来，他从来不会假装，每次都是非常真诚。正因为这点，他比莫洛托夫具有更深的洞察力，预计事物可能发生的各种可能性，更有远见和更加灵活。因此人们对他们两人的印象是：莫洛托夫对一切问题，包括共产主义及其最终目标，都看成是相对的东西，他之所以服从这些东西并非出于自己主观愿望，而是因为客观的必要。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什么永恒的事物。他把自己和自己的一生都交给这种变幻莫测的不完美的现实，而这个现实的世界每天都把某些新的因素强加于他。对斯大林来说，他也认为一切都在变化着，一切都是流逝着，但这只是他的哲学观点。因为在变化着的事物的背后，及其内部，在某种现实的背后及其内部，都隐藏着某些绝对的伟大理想，是他自己的理想，而他认为只有由他去改变和破坏这一现实本身及消灭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时候，他才能接近这一理想。

回顾过去，我觉得，具有相对论观点和善于处理日常事物的莫洛托夫，同具有狂热的教条主义，更深远的洞察力和本能地感知未来即明天事物的可能性的斯大林，是互为补充的。此外，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领导，莫洛托夫便是能量有限的人；但是对斯大林来说，他也是必不可少的。两个人虽然都不择手段，但是在我看来，斯大林还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想办法适应客观形势。对莫洛托夫来说，选择手段本来就无所谓和不重要的事情。我想，他不仅纵恿斯大林办很多事，而且支持他和想办法消除他的动摇。在实现把落后的俄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帝国这一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斯大林（这要感谢他的全面才干和洞察力），但是对作为实干家的莫洛托夫也不能低估他的作

用。

莫洛托夫从其性格和生理条件来看，似乎命运注定地要起这样的作用，他身体结实，性格稳重、沉着、思想集中，能吃苦耐劳。他酒也能比斯大林喝得多，但是当他举杯祝酒时，言词简短而且会产生直接的政治效果。他的私生活很一般，所以当一年后我认识了他的谦逊而清秀雅致的妻子时，我有这样的印象，我觉得任何另外一个能完成他所需要完成的某些职责的妇女都能代替他。

同斯大林的谈话是从他激动地问起有关最高参谋部及其所属部队的命运开始的。他不安地说：“他们会饿死！”

我向他说明，这是不可能的。

他仍然说：“怎么不可能？多少次饥饿消灭过许多战士！饥饿是任何军队的可怕的敌人。”

我向他解释说：“那个地方总可以找到一些食物的。我们曾面临过更艰难的处境，也没有被饥饿压倒。”

我把他说服了，使他放心了。

接着他又谈起有关援助我们的可能性问题。苏联的前线还是太远，不可能派战斗机护送运输机。有一阵子斯大林发了脾气并骂飞行员说：“他们是胆小鬼，白天不敢飞行！胆小鬼，简直就是胆小鬼！”

莫洛托夫对此问题很了解，他袒护飞行员，说：“不对，他们完全不是胆小鬼。战斗机没有那么远的航程，因此运输机还到不了目的地就会被击落。运输机的实际载重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们还要为回程不得不带上足够的汽油。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们只有夜里才能飞行，而且所带的物品也很少。”

我支持了莫洛托夫，因为我知道，苏联飞行员为了帮助南斯拉夫的战友曾自愿建议白天飞行，在没有战斗机保护下飞

行。

同时，我同意斯大林所说的，在现在迅速发展的复杂形势下，铁托应该有更为固定的驻在地，而且这个地方应该是不至于时时都会受到敌人的袭击。当然，斯大林这时也考虑到苏联军事使团的意见。此时铁托由于他们的坚持，同意搬到意大利，从那里再撤到南斯拉夫的维斯岛。铁托在维斯岛一直坚持到红军进入南斯拉夫。诚然，这次谈话斯大林并没有想到这次撤退的具体计划，但是他脑子里已在考虑此问题了。

同盟军已经同意为援助南斯拉夫战友在意大利领土上建立苏联的空军基地。斯大林一再强调加快调拨运输机和建好基地本身的迫切性。

对这次德军的袭击我对铁托所抱的乐观态度，使斯大林的情绪好起来，所以他把话题又转到我们和同盟军的关系，首先是同英国的关系问题上了。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见的主要目的。

他的想法的实质是：首先不要使英国人感到“害怕”，他指的是，我们应该避免一切使他们感到南斯拉夫现在正在进行革命，共产党即将上台的事情。

斯大林生气地说：“你们的帽子上为什么非要戴上一个红五星？形式是次要的，主要的是结果，可是你们却突出什么红五星！说实在的，红五星现在并不必要！”

但是，他也不掩饰，他的不满并不十分强烈，只是埋怨而已。

我向他解释说：“摘掉红五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已成了传统，在我们战士的眼里它代表着一定的含义。”

斯大林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并不坚持，他又把话题转到和同盟军的关系问题上，他说：“也许你们以为，既然我们和英国

是同盟国，所以忘记了他们是什么人，丘吉尔是什么人？对他们来说，最高兴的事是如何想方设法危害自己的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总是想办法给俄国人和法国人使坏。丘吉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丘吉尔是这样的人，如果你一不小心，他连最后一个铜板也从你的衣兜里偷走。是的，是会把你的衣兜里的最后一个铜板偷走的！实实在在地，连最后一个铜板也不留下！罗斯福呢？罗斯福不一样，他把手伸进衣袋去的是要掏出一大把钱。和丘吉尔不一样，丘吉尔连小铜板也要。”

他几次提醒我们，一定要提防英国的情报机关和他们对铁托人身安全所搞的阴谋诡计。他说：“他们已经杀害了西科尔斯基^①将军，铁托对他们就更不必说了，为了铁托牺牲自己的两、三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他们并不珍惜自己人的生命！他们搞掉西科尔斯基的事不是我编造的，是贝奇什告诉我的——他们让西科尔斯基上了飞机，然后把飞机击落，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和证人。”

斯大林多次重复了他的这一提醒，回去后我把他的嘱咐转告了铁托。当铁托于1944年9月21日夜里从维斯岛上秘密地转移到在罗马尼亚的苏联占领地区时，这一提醒显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接着斯大林又谈起我们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关系问题。王国政府的新代表是伊万·舒巴什奇博士，他保证要搞好同铁托的关系，承认人民解放军是同占领军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斯大林坚持说：“不要拒绝同舒巴什奇的谈判，无论如何也不要拒

^① 弗拉基斯拉夫·西科尔斯基（1881——1943）是波兰军事将领及政治活动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及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1941年由他签署了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的议定书。1943年因飞机失事牺牲。——译者

绝。不要马上向他发动进攻，先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同他谈谈。你们不可能立即得到承认，应该找到过渡的办法。同舒巴斯奇要谈判，也许有办法同他达成某种协议。”

他坚持这样做时虽不是斩钉截铁，但是相当坚决。我把他谈的一切话都汇报给铁托和中央委员。我认为，这对著名的铁托——舒巴什维奇协议起了一些作用。

斯大林请我们用晚餐。在大厅里我们在一张世界地图前面站住了，在这张地图上苏联的领土是用红色绘制的，所以显得比平常大一些。斯大林指着苏联地图继续就他刚讲过的英国和美国的 attitude 问题说：“他们永远不会甘心让这么大的领土永远是红色的，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我注意到了这个地图上的斯大林格勒地区，它从西面用蓝铅笔圈起来，这显然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夕或期间划上去的。他注意到我的目光，我觉得他是很满意的，但并没有流露出自己的感情。

不记得借着什么话题，我说：“如果没有工业化，苏联是不可能坚持和进行这样的战争的。”

斯大林补充说：“我们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争吵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只是在这张地图前面，他唯一一次提到他的这些对手，而且用的词是：“争吵！”

餐厅里有两、三名苏联上层人物在那里站着等候我们，但政治局委员除了莫洛托夫没有第二个人。我忘记了那几个人的名字，他们一整夜什么也没说，一直沉默着。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非常形象地描写，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为他设的晚宴。其实，在斯大林家中的晚餐都是那个样子。

在一间没有什么豪华布置、但很舒适、高雅的大餐厅里，在一张长桌子的前半段上面摆着各种菜肴，这些菜肴都用沉甸甸的银制钵子盛着，上面盖着加过温的盖子，另外还有各种饮料，旁边摆着空碟子和其它餐具。每一个人都自我服务，坐到空着的那一半段桌旁。斯大林从来不坐在主人座位上，他总是坐在一个固定椅子上，即主人座位左侧第一个位子。

食物和酒的种类繁多，多半是荤菜肉食和烈酒。但其它一切都很简单，并不奢侈。如果斯大林不按铃，服务人员不许进来，只有一次需要叫他们进来，是因为我想喝啤酒的缘故。进餐厅的只能是值班军官。每人吃什么，吃多少，都随自己便，只是喝酒是强制的，不管是举杯祝酒或者并没有什么理由都要喝酒。

这样的晚餐通常要进行六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从晚上十点钟开始，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四、五点钟。大家不慌不忙地吃喝，随便说话、谈论，从开玩笑到极为严肃的政治甚至哲学问题。

在晚餐过程中的这样非正式的气氛中，苏联的相当一部分政策被正式地通过。也正是这种晚餐形式成为斯大林单调而阴郁生活中的最经常的和最适当的娱乐方式，是他唯一的乐趣。

斯大林的同事也习惯于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夜间他们都在斯大林或某一个领导人家里度过，第二天午餐前他们都不到办公室里来，但是一来就待到深夜。这使上层行政机构的工作遇到一些困难，但他们也适应了。外交使团也适应了，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和某一政治局委员保持联系。

对政治局委员和其它高级领导人是否出席这种晚餐，没有什么专门规定。通常是那些有工作要同某人商量或与当前工作有关的人被邀请出席晚餐，但范围总是很狭窄，所以出席者把

能出席斯大林的晚餐看成一种特殊的荣誉。只有莫洛托夫是常客，我想这不仅因为他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改为外交部长），而且因为他实际上是斯大林的副手。

晚餐过程中，苏联领袖们都很亲近，个人关系最好。每个人谈自己所负责部门的最新消息，当天会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话以及自己对未来的设想。丰富的食物，大量的（但不是过量）白酒使气氛比较活跃、亲密而毫不拘束。没有经验的人甚至似乎不会看出斯大林同其它人的差别。然而，这种差别是存在的：大家都注意地听他说的话，没有人敢固执地反驳他，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关系很象是一个以严厉的家长为首的宗法制的家族，大家都很怕他。

斯大林吃东西的量，甚至对比他身体强健的人来说也显得太多了，他更喜欢肉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山村出身的人。他也喜欢吃一些特殊风味的菜肴，这个具有各种气候条件的国家，特殊风味的美味是数不胜数的。但是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固定的菜是他特别喜欢的。他喝酒不多，常常只喝少量的红葡萄酒和一杯伏特加酒混在一起喝。我没有一次发现他有过醉意的时候，同莫洛托夫不一样，更不用说贝利亚（他简直是一个大酒鬼）。在这类晚餐中经常吃得过饱的苏联领袖们白天吃东西很少，他们没有正常的进食的时间，许多人为了“减轻饮食过量的负担”，每星期总有一天只吃水果和果汁。

在这种晚餐过程中，整个大俄罗斯领土、新占领的国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被改变着。然而，没有任何人会支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的伟大的创作，可以设想，有多少优秀的作品在这里永远地被埋葬了。

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听到关于党内反对派和镇压他们的话题。显然，这完全是斯大林自己和秘密警察的职责范围的事

情。由于苏联领袖们也都是人，所以他们的良心也往往使他们故意忘记这些问题，何况因为回忆这些事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很愿意对这样的事保持沉默，只字不提。

上面我写的只是在这次会见时、在自由的气氛里，很自然地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的探讨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回想起南斯拉夫人同俄国的以前的关系时，我说：“俄国沙皇不了解南斯拉夫人的意愿，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式的进攻，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解放。”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兴趣同其它苏联领导人不同。他不问我们有多少牺牲和破坏，只是对我们国内所形成的内部关系和起义运动的实际可能性感兴趣。就是这些情况，他也不是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而只是在谈话过程中进行了解的。

有一阵子，他对阿尔巴尼亚发生了兴趣，他问：“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我回答：“在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事情和南斯拉夫相类似。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的最古老的民族，比斯拉夫人甚至比古希腊人还要古老。”

斯大林问：“他们居民点的名称怎么是斯拉夫族的呢？也许，他们和斯拉夫人还是有一些关系吧？”

我还是解释：“斯拉夫人过去住在山谷里，土耳其人侵占时期，阿尔巴尼亚把斯拉夫人从那里挤出去了。”

斯大林顽皮地挤了一下眼睛说：“我还指望，阿尔巴尼亚人多少还是同斯拉夫人有点联系呢！”

我在讲到南斯拉夫的斗争方式和战争的残酷时，对斯大林说：“我们不收容德国人的俘虏，因为他们也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打死了。”斯大林微笑着打断了我的话：“我们的一个战士有一次押送一批德国人，在路上他把所有的人都打死了，只留下一个

人。到了目的地后，当人们问他，其它的人呢，他说：‘我完成了最高统帅的命令：消灭一切敌人，直至最后一人，所以给你们带回来这最后一个人。’”

谈话时，当他谈论德国人时说：“他们这个民族很怪，很象个羊群。记得，童年时看到，带头羊到那里，羊群就跟着它。记得，革命前我在德国时，一批民主社会党人在开代表大会时迟到了，原因是等着检查他们的票，或类似这种事情。难道俄国人能够这样办事吗？有人说得很好：在德国不可能实现革命，因为这会踩坏他们城市里的草地。”

他还问我一些物品用塞尔维亚语该怎么说。自然，很快就发现了俄语和塞尔维亚语有极大相似之处。

斯大林感叹地道：“说实在的，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呵！”

大家也讲了一些笑话，斯大林很喜欢我讲的一个笑话。我说：在一次少有的休战期间，土耳其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在一起交谈。土耳其人问，为什么门的内哥罗人总是喜欢挑起战争。门的内哥罗人说：“为了抢劫。我们很穷，所以总是四处寻找，什么地方可以得到东西。你们呢？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土耳其人说：“为了尊严和荣誉。”门的内哥罗人说：“对了，每个人为了得到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而打仗。”

斯大林大笑起来并评价说：“实在是这样，这意思太深刻了——每个人为了得到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而打仗！”

莫洛托夫也笑了，但这是很有节制的微微一笑。确实如此，他是没有能力说出点幽默话和享受幽默的人。

斯大林还问，我在莫斯科见到了哪些领导人。我说，季米特罗夫和曼努伊里斯基。

他说：“季米特罗夫和曼努伊里斯基聪明得多。”

提到季米特罗夫，他谈起了解散共产国际之事，他说：“他们西方人^①太卑鄙，根本没有和我们讲过一句要解散国际的事。我们是很固执的人。如果他们那怕提到或和我们谈过有解散共产国际的想法的话，那么我们至今也不会解散它。当时共产国际的情况越来越不正常。我同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②当时绞尽脑汁想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共产国际总是推行自己的那一套，结果冲突越来越多。同季米特罗夫合作还比较容易一些，同其它人合作就很困难。然而最重要的是——对各国的共产党来说必须找出自己的民族特点并在本国范围内坚持斗争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共同的共产主义中心，那实在是很不正常、很不自然的现象了。”

晚餐期间来了两份电报，斯大林都让我看了。

第一份电报里写的是舒巴什奇在美国国务院的讲话。舒巴什奇的观点是：我们南斯拉夫人不能反对苏联，也不能推行反俄罗斯的政策，因为我们国家一向有着强烈的斯拉夫民族的和亲俄的传统。斯大林对这个观点的反应是：“这是舒巴什奇在吓唬美国人！可是他为什么要吓唬他们呢？对，是在吓唬他们，可是为什么？为什么？”

接着当他发现我表示奇怪时，他说：“他们在偷我们的电报，我们也偷他们的。”

第二份电报是丘吉尔拍来的。他通知，明天开始在法国登陆。斯大林拿着这份电报嘲笑地说：“对，如果没有下雾的话，会登陆。至今为止，总是能找出什么借口不登陆，我怀疑明天是否也会发生什么不登陆的理由。他们也许明天会碰上德国人呢。如果他们碰上了德国人，会怎么办呢？登陆也许又办不成

① 指西方的共产党。——译者

② 即莫洛托夫的名和父名。——译者

了，又是象以往一样，总是许愿，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

莫洛托夫和往常一样，结结巴巴地说：“不会的，这次会是真的。”

这次并没有给我这样一个印象——即斯大林是真的怀疑同盟军的登陆之事，他只是想拿他们开开心，嘲笑他们一番，特别是耻笑他们前几次拖延登陆的理由。

综合一下这一晚餐对我的印象，我想，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斯大林有意识地吓唬南斯拉夫领导人，使他们减少同西方的来往；而同时他力图使南斯拉夫的政策服从自己的需要，使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变成自己对西方政策的附属物，特别是在同英国的关系方面。

斯大林依据自己的思想和实践以及自己的历史经验，认为最可靠的只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铁拳里的东西；他认为，不在他警察控制内的一切人都是潜在的敌人。战争的进程使南斯拉夫革命摆脱了他的控制，在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对自己有能力掌握它，满怀信心，因此斯大林不能直接指挥他们。他了解了这一点，所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利用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对待西方国家关系方面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企图把这些领导人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使他们的政策服从于自己政策的需要。

苏联领袖们的生活的天地，这也是我所生活的天地，在我面前逐渐开始呈现出它的另一个面貌：即在一切实方面都存在着骇人听闻的无休止的斗争。一切都集中到“报复”二字上，只是从形式上有各种不同表现而已，最后能活下来的只是能量更大和更狡猾的人。我这个对苏联领袖满怀钦佩之心的人，现在在他们一刻也不放松的警惕和毅力面前，感到头昏眼花、目瞪

口呆了。

这是这样一个世界，在他面前除了胜利和死亡，没有其它任何选择。

这就是斯大林——新社会制度的缔造者的形象。

我告别斯大林时，又一次问他，对南斯拉夫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

他答道：“没有，你们自己最了解该做些什么。”

我回到维斯岛时连斯大林说的这点也向铁托和其它中央委员作了汇报。对自己莫斯科之行，我总结为：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行动，首先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

在我们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嘱咐我把最高苏维埃赠给铁托的礼物——一把宝剑转交给他。在回南斯拉夫路经开罗时，我又在这珍贵的礼物之外，补了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礼物——一副象牙国际象棋。

我不以为这是一种象征，但今天我想，就是在那时，在我的心灵深处已经酝酿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有别于斯大林的世界的。

座落在云杉林中的斯大林别墅的上空已经炊烟缭绕，早霞满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经过又一个不眠之夜显得很疲倦，他们在门口和我握手告别。汽车把我带进黎明前还在梦乡中的莫斯科，那披着晨露的、六月的天空一片蔚蓝的莫斯科。一种我刚踏进俄罗斯土地时的那种感情又涌上我的心头：如果从这个国度看我们的世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也并不怎么大。也许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思想也并非高不可攀，不能被人理解，他的思想以及他本人，苏联社会的真理最终将展现在人类的面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这是在战争期间我的美好的理想。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什么是更现实的事物，就是今天，我也不能告诉人们，什么事物对人类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人们都生活在理想和现实之中。

疑 虑

(一)

如果我不曾因为自己的直爽性格而成为牺牲品的话，我也许不会第二次去莫斯科，并在那里再一次见到斯大林。

事情发生在1944年秋天，红军突破战线进入南斯拉夫和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以后，那时发生了个别和成批的红军战士危害南斯拉夫公民和军人的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些严重的事件为数之多，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和共产党不能不视其为政治问题。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红军看成是模范的、理想化的军队，南斯拉夫军队自己队伍内部对待任何甚至是微小的抢劫和强奸行为是毫不留情的。理所当然，我们对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比普通公民更惊得目瞪口呆，这是因我们的公民根据他们老一辈的经验，认为任何一个军队都有抢劫和强奸行为，因此，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共产党的敌人，乘机利用红军战士的违法乱纪行为攻击尚未巩固的南斯拉夫新政权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因而使我们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不仅如此，红军的最高司令部对人民提出的意见和抗议都充耳不闻，使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们对强奸行为和强奸犯是采取纵容姑息的态度，有意袖手旁观的。

当铁托从罗马尼亚回到贝尔格莱德后，他马上就到莫斯科

去了，他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因为解决红军的纪律问题亦属急不可待的问题之一。

有一次铁托召开了一个会，卡德尔、兰科维奇和我都参加了，我们决定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也夫将军谈这个问题。为了使科尔涅也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商定：参加会见的除了铁托外，还有我们三个人，此外还加上两位南斯拉夫杰出的指挥员——佩科·达普切维奇^①将军和科查·波波维奇^②将军。

铁托用非常缓和的、很有礼貌的形式向科尔涅也夫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所以当科尔涅也夫用粗暴和侮辱的方式表示拒绝时，我们感到非常突然。我们把科尔涅也夫是作为同志和共产党人请来的，可是他却大喊大叫地说：

“我代表苏联政府抗议对红军的这种造谣中伤，她……”

我们对他的解释和劝说都是徒劳无益的，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强大势力和军队的暴跳如雷的代表，而这个军队是“解放者”。

在谈话过程中我说：“我们的困难还在于我们的敌人利用这

① 佩科·达普切维奇(1913—)南斯拉夫的军事将领。1933年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求学时入党。他的军事生涯是从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开始的，当时他任纵队连长。1941年南斯拉夫遭德军入侵，他在自己的家乡门的内哥罗领导游击队起义，随后很快被提升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工作，1945年获得“人民英雄”勋章。次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军长，该军驻于的里雅斯特港、南斯拉夫管区内，后被派往指挥希腊北部游击队作战。1953年起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因杰拉斯事件受牵连，被降职。——译者

② 科查·波波维奇(1908—)出身于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名门望族，留学巴黎，是一位律师、诗人。1933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并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回国后被捕，后被释放，仍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加入游击队并逐步担任军政部门的领导工作。1945至1953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来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译者

点攻击我们，他们把红军和英国军队加以比较，认为英国军队没有那类违法乱纪的行为。”

科尔涅也夫正是对这句话反映特别强烈，他简直是什么也不愿意听了，他说：“你们把红军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进行这样的相比，对这种侮辱性的作法，我表示最坚决的抗议。”

南斯拉夫政府是在红军进入南斯拉夫的领土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了解到红军战士不法行为的情况的。根据公民们的反映，共发生了一百二十一起强奸行为，其中有一百一十一一起是强奸后还杀了人；此外，还有一千二百零四起抢劫并伤害人事件发生。如果考虑到红军只是进入南斯拉夫东北部小小地区的话，那么这些数字就并不算小。因此，南斯拉夫政府必须把这些事件看成是政治问题，从性质上看，它之所以严重还在于这一问题变成了我们党内斗争的题目。共产党人对这些行为还应该从道德方面提出问题：难道这就是我们朝思暮想的堪称模范的红军吗？

同科尔涅也夫的会见是不欢而散的，不过我们发现，此后苏联司令部对待红军战士的不法行为约束严厉一些了。至于我，在科尔涅也夫走后，我们的同志对我刚才说的那句话都表示不满，不过有的人态度缓和一些，有的激烈一些。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想把苏联军队同英国军队加以比较，在贝尔格莱德只有英国的军事使团。我只是说明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从政治角度作出反映，没有想到由于科尔涅也夫将军的不理解和固执态度把这一问题复杂化了。何况，我完全没有想到去侮辱红军，我当时对红军的热爱并不亚于科尔涅也夫将军自己。当然，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不能对强奸我国的妇女（而且我从来把这些行为看成是最卑鄙的罪行之一），侮辱我们的战士和抢劫我们的财产无动于衷，保持沉默。

我的这些话，加上其它一些因素，成为南苏领导之间第一次冲突的起因。尽管后来发生了更有分量的事件，但是苏联领导人和代表总是不断地提到我说过的这句话。随便提一下，无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政府没有给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它一些领导人颁发苏沃罗夫勋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没有给佩科·达普切维奇发勋章，所以我和兰科维奇建议铁托授予达普切维奇以人民英雄称号。毫无疑问，正是我的这些话，成为苏联代表于1945年年初在南斯拉夫散布我是“托派”的谣言的原因之一。以后，他们自动停止传播这一谣言，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罪名毫无根据，另一方面由于南苏之间关系有所改善。

我说出那番话后不久，我感到自己非常孤立，这不仅是因为和我最亲密的人对我的批评非常尖锐和严厉，也不仅因为苏联领导把事实过分夸大，使之显得更加尖锐化，而且在同样程度上也出于我本人的内心的痛苦。

事情在于，我当时正处于内在的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这是每一个真诚和全心全意地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当他遇到他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同上层领导之实践背道而驰的时候，迟早会必然发生的苦闷。在我内心这一状态的发生，并不完全是因为我对红军的理想化的思想和红军的行为之间所看到的矛盾。我明白，红军虽然是“无阶级”社会的军队，但“毕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其中必然还会有“旧的残余”。我的内心矛盾是由于苏联领导和苏联司令部，对强奸行为所采取的充耳不闻或甚至于纵容、赞许态度而产生的，特别是由于他们不愿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更不用说想处理对我们的意见所表现出的愤慨了。我们的动机是诚恳的，我们是想保护红军和苏联的威信。苏联和红军在南斯拉夫人民中的威信，是我们党的宣传

工作多年以来全力以赴地进行的努力所取得的，可是，我们良好动机遇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呢？回答的是：粗暴和拒不承认，这是大国对小国，强者对弱者的典型态度。

苏联代表企图利用我善良的意见作为自己对南斯拉夫领导耍威风，不断挑衅行为的根据，这使问题更加尖锐和复杂化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苏联代表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夸大和歪曲我的话？苏联代表为什么要利用如此歪曲的形式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说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感谢红军，而红军在解放首都的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帮助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巩固自己在首都阵地等等，这又是为什么？

对此，并没有（在这个基础上也不可能）答案。

我和其它同志一样，对苏联代表的另一个做法也产生怀疑。例如，苏联领导宣布，为了帮助贝尔格莱德，他们要赠送相当数量的小麦。但是，事实表明，这批麦子实际上是来自南斯拉夫国土上的粮仓，这是德国人从南斯拉夫农民手里没收的粮食。苏联司令部完全把这些粮食和许多其它物品一样当作自己的战利品。苏联侦察机构招募了大批白俄侨民和南斯拉夫人为他们服务，甚至把手伸进中央委员会内部。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付什么人呢？我所管理的宣传部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同苏联代表们共事时时的摩擦。苏联的宣传总是歪曲或低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斗争，而与此同时却要求南斯拉夫的宣传服从苏联的需要，纳入苏联宣传的轨道，只不过开始时，他们提出这些要求时比较谨慎，后来就越来越不加掩饰了。苏联代表们大吃大喝成风，达到不象样子的程度，而且还企图把南斯拉夫的上层领导也拖进这样的风气里去，这在我和其它许多同志的眼里只能是证实了我们对苏联人的观察是正

确的：他们言行不一，口头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道德败坏。

两个革命和两个政权尽管有其相似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但是当它们初次接触时，不可能没有摩擦。然而，因为这些摩擦发生在特殊的和内部的意识形态领域，所以它们的表现形式只是不同的道德选择，看起来好象是有着共同信仰的正统的中心不能理解一个小党和穷国的良好愿望，为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由于人们对周围的认识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所以我突然“发现”了人同自然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我开始和青年时期一样去打猎，这又使我突然感到：美好的事物不仅只存在于党内和革命之中。

然而，使人伤心的事情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

(二)

1944—1945年冬天，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了。其中包括中央委员、工业部长安德利·赫勃朗^①和总参谋长阿尔索·约万诺维奇^②，此外还有我当时的夫人米特拉^③，

① 安德利·赫勃朗(1899—1948)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克罗地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事工运活动，曾坐牢二十年。被释放后，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书记。民族解放运动一开始，于1941年即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战后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如工业部长，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国民议会主席团委员，以及联邦计划委员会主席。1948年被审查，并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据说1948年自杀身死。——译者

② 阿尔索·约万诺维奇(?—1948)战前南斯拉夫的职业军官，门的内哥罗人。参加游击队并参加组织人民解放军的工作，在1946年以前，曾任总参谋长。1948年铁托被开除共产党情报局时，他曾公开站在苏联一边。随后企图逃离南斯拉夫，被部队发现，当场击毙。——译者

③ 米特拉·米特罗维奇(1912—)1933年入党，南斯拉夫著名的女共产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游击队出名的女战士，以后逐渐提拔到领导岗位。1945年以后任塞尔维亚教育部长，后在联邦政府执行委员会工作，南共中央委员。——译者

她，除了告诉我苏联领导人的政治声明外，还可以告诉我他们的私下谈话的内容，对这些都是我特别痛苦地想弄清楚的事。

整个代表团和个别团员都不断因南斯拉夫局势和个别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立场而受到指责。苏联领导人往往从某些具体事实出发，然后无限夸大和上纲上线。更糟糕的是，代表团领导人赫勃朗同苏联代表的关系搞得十分亲密，总是向苏联领导作书面汇报，并把苏联对我们的指责都推到团员们的身上。赫勃朗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发泄对撤销他霍尔瓦提共产党书记职务的不满，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在监狱中表现不够坚定（这是我们后来才了解到的），而他显然是用这种办法掩盖他上述表现。

那时，把情报交给苏联党并不算什么不轨行为，因为任何南斯拉夫人也没有把自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的中央对立起来。不仅如此，就连我们党内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向苏联中央委员会保密过。然而，赫勃朗的做法，就是在那时的情况下已是一种挖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墙脚的行为。我们始终未了解到，他究竟向苏联提供了什么情报。但是，根据他的态度和个别团员所反映的情况，可以完全正确地判断，赫勃朗给苏联中央委员会写了许多信，目的是挑拨离间，要求苏联对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以便在南共中央实现对赫勃朗有利的改组。

当然，他的所作所为都被他说成是为了坚持原则，而且是利用了南斯拉夫人犯过的比较明显的过错和弱点作为自己的依据的。而最重要的还在于：赫勃朗认为，南斯拉夫不应该有自己独立工业和经济建设计划，而应该包括苏联的建设计划之中，相反，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却认为，必须和苏联合作，但与此同时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这个代表团所承受的最后的精神上的打击，无疑是来自斯

大林。他把全团请到克里姆林宫，照例设宴招待，并且安排了只有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才能看到的场面给他们看。

他批评南斯拉夫军队的管理方法，但直接点名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丝毫不留情面！他非常激动地诉说，红军在战争中所经受的痛苦和他们在被破坏的国土上连续作战几千公里时所遇到的骇人听闻的苦难。他满面泪痕，喊道：

“这样的军队却受到了杰拉斯的辱骂！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是如此热情地接待了他！我们的军队为了你们不惜流血牺牲！杰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么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难道他能了解一个经过几千公里浴血战斗的战士的心吗？如果这样的战士和妇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东西，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不断地举杯，奉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开玩笑，和第三种人寻开心，嘲笑他们一下；他和我的妻子接吻，因为她是塞尔维亚人。然后，他又为红军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得不到南斯拉夫人的感激而流了眼泪。

他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到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但过多地提到斯拉夫人、斯拉夫民族、俄国人同南斯拉夫人的联系，最后还是回到红军的英雄主义、苦难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话题上来。

当我听到这一切，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而且简直是惊呆了。

今天，我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把我选为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因为我“指责”了红军的行为，而是想用这些办法把我拉回到他那方面去。我对苏联及他本人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和钦佩，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我从莫斯科回到南斯拉夫之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描写我

同斯大林的会见。这篇文章他很欣赏。苏联代表只是劝我，如果以后我再登载这篇文章的话，最好删掉关于斯大林脚太大的那一句话，并多提一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的亲密关系。斯大林善于很快能摸透人的性格并特别善于利用人们的弱点，这使他必然懂得，不管他使用政治上提拔的方法（我对这点是完全无所谓），还是使用从思想上整我一下的方法（我对苏联党的感情并不比对南斯拉夫党的感情深些），把我拉过去他都不会成功。只有唯一的方法能对我发生影响——那就是利用我的情感，即我的真诚和我当时对苏联的迷恋。于是他选择了这一途径。

然而我的情感和真诚同时也是我的长处，当我碰到对方的虚伪和不公正时，我这两点很容易转化成为它们的反面。所以斯大林从来没有企图直接把我拉过去，而我在实践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联的不公正和追求霸权这一特点，所以逐渐克制自己容易感情用事的弱点，越来越变得坚定和果断了。

今天确实很难判断，在斯大林的表现中哪些是逢场作戏，哪些是真正令他伤心而流泪。我个人认为，在斯大林身上这两方面很难分辨清楚，他作戏给人看时是如此逼真，在别人看来，他对自己所说的话真是深信不移，完全出自真情实意。他完全能把握争论的每一关键时刻，及时处理争论中的转折，善于适应提出的每一个新问题，甚至于每个新来的人。

就这样，代表团垂头丧气，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南斯拉夫。

在斯大林流了眼泪和指责我对红军“背信弃义”之后，我就更加孤立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并没有消极，我拿起笔杆和书本，在我自己内心中寻找解决我所处的困境所带来的问题。

(三)

但是，事态是向前发展的，南苏关系不能永远停留和保持在与军事使团和军队接触的水平上。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着，而且全面开展起来，因而也就越来越带有国与国之间的性质。

四月，为了签订互助条约，南斯拉夫将派出一个代表团到苏联。代表团由铁托率领，陪同他的是外交部长舒巴什奇^①，还有两位经济部长——B·安德烈也夫和H·彼得罗维奇。我也参加了这个代表团，显然是想通过直接接触来解决围绕“侮辱”红军问题而发生的争论。铁托让我参加了代表团，苏联对此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我也和大家一起上了苏联飞机。

这是四月初的一天，因天气很坏，飞机颠簸得很厉害。铁托、多数代表和陪同人员，甚至包括飞行员，都感到不舒服。我也有不适之感，但和他们的情况不同。

当我知道这次我也去以后，直至同斯大林见面之前，我一直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总觉得我仿佛是作为一个悔过者去的，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因为我没有什么过可悔。在贝尔格莱德，我周围形成了一种气氛，都认为我已经越陷越深，是一个“不能自拔”的人了，对我来说，没有别的什么立功赎罪的出路，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斯大林的宽宏大量，不纠既往上面。

① 伊凡·舒巴什奇(1892—1955)克罗地亚政治活动家。1939年任克罗地亚州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国外，在盟国坚持下，1944年6月1日被任命为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总理。在维斯岛签订的铁托——舒巴什奇协定后，舒巴什奇将它的政权和铁托政权合并。在临时联合政府内，曾一度任外交部长。——译者

飞机逼近莫斯科，而我的内心又出现了我所熟悉的那种孤独感。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同志和战友是多么轻而易举地抛弃了我，因为同我的接触会影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会引起人们怀疑自己是否也犯了“偏离”正确路线的错误。就是在飞机上我也没有摆脱这种感觉。我同安德烈也夫的关系从来都是比较随便和坦率的，我们曾在共同斗争和在监牢里共患难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正是在艰难困苦中最容易表现出每个人的个性和建立真正的友谊。可是现在呢？他似乎很同情我，但是他爱莫能助，而我也不愿意低声下气主动去找他，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意让他的处境变得困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在支持我。在艰苦的地下斗争时期，我就很熟悉彼得罗维奇，我们之间的接触主要是在学术领域方面。但我现在却连找他谈我们当时在进行不断争论的题目——即塞尔维亚政治史问题也不敢了。铁托根本不提我的问题，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对我的问题他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对我的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但是我感到，他个人出自政治原因是和我站在一起的。因为他这次带我去莫斯科的行动以及对我的问题表示沉默本身就说明了他对我所持的态度。

对我来说，我的那种一般人都具有良心（即那种自然地追求善良和公正的思想）和我所处的和积极活动的环境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冲突——这是被束缚在一定范围内的抽象目标，和受到现实可能性制约的运动之间的矛盾。我在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认为这一冲突乃是渴望改变世界和我自己所从事的运动，同掌握决定大权的人们对我们缺乏理解所形成的矛盾。

我的顾虑随着我们接近莫斯科而越来越厉害了。

从飞机上往下看，是一片荒无人烟、空旷的大地，冰雪已经消融，露出了黑黝黝的沃土，那里河流纵横，弹痕遍地。天空

多云，天气阴沉沉的，下面的东西看不清楚。觉得我不是在现实的世界中飞行着，仿佛这个世界是既没有天空，也没有陆地，也许我梦中见过这样的情景，但我又觉得它比起前此所经历的一切感受则又显得更现实一些。我确是飞行在天和地之间，即在我的良知和事业之间、在我追求的目标和可能性之间。在我的记忆中只能留下了这种不现实的梦幻和令人痛苦不堪的飞行的巅巅。这时，我已没有了以前的对斯拉夫问题的兴趣，对革命狂热也几乎没有了，我的感情和我第一次来到这块俄罗斯苏维埃土地及和这块土地的领袖会见时有所不同了。

此外，我还看见铁托痛苦不堪的样子。被旅途劳顿折磨得脸色苍白的铁托，他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他讲了话，参加了一切礼节性的仪式。

率领接待人员来欢迎的莫洛托夫冷冰冰地同我握了手，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仿佛我们并不相识似的。还有一件事也做得令人不舒服，他们把铁托送到专门为他准备的别墅去了，而我们都住在《大都会》^①饭店。一种迷惑不解和灾难临头的心情越来越冲击着我。他们的这些做法当然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姿态。

第二天或第三天，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我在电话中听到一个女人的娇滴滴的声音：“我是卡佳。”

我问：“哪个卡佳？”

“就是卡佳，您大概把我忘记了吧？我必须同您见面，我一定要和您见面！”

我费劲地回想：“卡佳？卡佳？不，我不记得认识有这样一个。”于是我马上产生了怀疑：我想一定是苏联秘密警察让我

① 《大都会》饭店位于红场上，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还是一流的饭店，但不是招待贵宾的宾馆。——译者

上勾，以便以后他们可以诬陷我们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并不严格遵守生活上的道德观。“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如同其它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一样有无数的暗娼，这一点对我来说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和新鲜。但同时我也十分清楚，这种人只能通过秘密侦察机关才能和高级外宾进行联系，因为外宾在这个国家里得到比世界其它地方更严密的保护。所以我非常平静地回答对方：“不要打扰我！”就把电话筒放了。

我以为，这种下贱卑鄙的方法只用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因为我是党内的领导，我认为有义务检查一下，彼得罗维奇和安德烈也夫是否也遇到类似的麻烦。同时，我还想把这件事告诉他们，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他们说，是的，也有人给他们打过电话，但不是卡佳，而是娜达沙或瓦娃！我把一切情况解释给他们听，并且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要他们绝对不要和任何人有任何联系。

我的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感到轻松，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唯一目标，但另一方面我更加警惕起来，我思索着：为什么要干出这样的事来？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连想也不敢想去问问舒巴什奇博士。他不是共产党员，我不想把苏联的阴暗面在他面前暴露，更不想把他们阴谋诬陷共产党人的做法告诉他。但是，我坚信，任何一个卡佳也不会给舒巴什奇打电话。

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得出这样的结论：认识到正是共产党人是他们的工作目标并使之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然后在东欧国家建立霸权的保障寄托在成为他们的工具的这些人的身上。然而，我已产生疑心，并且对这样的方法感到恐怖。我对他们想把我变成他们的工具的企图进行了反抗。

那时，我还没有能力认识到：我可以是共产党人、同时也

是不做别人工具的自由人。

(四)

关于签订苏南两国间的同盟条约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条约是例行公式，我的任务只是核对一下译文。

四月十一日晚上，在很小的范围内于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正式签字仪式。公众方面（如果在当时的条件下还可以用这样的称呼）参加仪式的只有苏联的电影摄影工作人员。

最值得提到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是斯大林举着杯要和一个服务员碰杯。这位服务员窘惑不堪，非常不好意思，这时斯大林问道：“你难道不愿意为苏南友谊干杯吗？”于是那位服务员就乖乖地拿了酒杯，一饮而尽。

看到这一场面我感到十分虚伪，或者说觉得有些荒诞。然而，大家都在怡然微笑，似乎要用这种举动证明，他们看到斯大林对人民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

这时我又一次见到了斯大林。从他的表情看不出他有什么成见，但也没有莫洛托夫的冷冰冰的面孔和虚伪的礼节。斯大林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关于红军表现的争论，看起来并没有被忘记，也没有被谅解，所以我仍然被忏悔的火焰烧得头昏脑胀。

在克里姆林宫的小型晚宴中，斯大林的表现也和上述的情况差不多。

晚宴后，我们一起看电影。斯大林说，他对枪响已听腻了，所以我们没有看军事影片，放映的是关于集体农庄的并不出色的幽默故事片。在电影放映过程中，斯大林不断插话，对情节评价时，他很象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把艺术加工看成是真

实的故事。第二部电影是战前的，叫《如果明天爆发战争的话……》。影片中，表现打仗时使用了毒气，德国侵略者后方发生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影片结束后，斯大林不紧不慢地说：

“现在的实际情况和影片上演的差不多，只不过没有使用毒气，德国无产阶级也没有举行起义罢了。”

大家因喝酒、饱餐和电影而感到精疲力竭。斯大林又一次默默地同我握了手，不知为什么，但我感到我的心里平静了些，有些怡然之感。也许，这是因为周围气氛还能忍受？或许因为我的内心里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看法，它给了我心上的平静？大概两者皆有。不管怎样，我觉得，没有斯大林的宠爱，我也照样能活下去。

不过，一、两天之后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喀捷莲娜大厅中举行的盛大宴会时，斯大林的态度有某种解冻的迹象。总的来说，他在进餐饮酒时，情绪比较好一些，也比较活跃一些。

按当时苏联的礼节，铁托的座位在斯大林左侧，在加里宁（当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右侧。我的座位在加里宁左侧。莫洛托夫和舒巴什奇坐在斯大林和铁托对面，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其它客人的座位设在侧席。

起初，气氛不太自然，很拘束。在座的人除了舒巴什奇都是共产党人，但是举杯时相互称呼“先生”，非常严格地遵循国际上规定的礼节，似乎这是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代表之间的会晤。

我们通常都是在正式讲演和礼节之后，以朋友相待，是作为具有共同目标的同一运动的关系亲密的人共聚一堂的。因此，这种礼节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就令人感到更加明显，因为当时南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因为苏联追求霸权和共产主义世界

内部进行争夺权威的斗争而受到破坏。这又一次证明，现实生活并不受个人的愿望和某种公式的约束，而是把人们料想不到的形式强加于它。

这时，苏联和西方同盟国在军事关系方面正在度他们的蜜月，苏联怕对方指责他们，说苏联对待南斯拉夫，不象是一个独立国家对另一个独立国家的关系，因南斯拉夫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后来，当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在东欧的地位巩固了，到那时苏联才企图抛弃一切条约及其它的“形式”，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和“民族主义的”残余。

后来斯大林打破了官方拘谨的气氛，只有他一个人能这样做，因为他可以不会承担“犯错误”而受批评的风险。他随便地站了起来，举杯并称铁托为“同志”，还说他不愿意再称他为“先生”了。他的这一举动使大家感到亲切，气氛活跃起来了。舒巴什奇博士也高兴地笑了，不过很难相信他的笑会有多大的诚意，然而对他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头脑和固定原则的政治家来说，装模作样本来就是他的本性。斯大林开始开玩笑，说俏皮话，捉弄坐在桌子对面的人，高兴地说一些唠叨话。气氛越来越活跃了。

加里宁老头子眼睛实在不行了，他勉强能摸到酒杯、盘子和面包，我总是在旁边尽力照顾他。铁托一、两天前被加里宁正式接见过，他告诉我，老头子还不那么衰老。可是，根据铁托所注意到的细节及我在宴会上的观察，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斯大林当然了解加里宁已经衰老不堪，所以当加里宁对铁托抽的南斯拉夫香烟表示感兴趣时，他很不得体地开了个玩笑说：“不要拿了，这是资本主义的香烟！”香烟从加里宁颤抖的手中掉了下来。

斯大林大笑起来，那样子活象牧神^①。几分钟后，狂笑之后的斯大林又为“我们的总统”加里宁举杯，但这只是对一个除了躯壳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的人的连篇空话而已。

在这类范围更大的场合，对斯大林的神化，人们感觉得更加直接、更加突出。

今天我可以这样说：斯大林的神化，用现在的语言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不仅是斯大林自己造成的，而在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他周围的官僚们造成的，因为他们需要有这样的领袖。

然而，关系逐渐被颠倒过来：被那些捧上了天的神化了的斯大林逐渐达到如此强大的程度，结果他完全可以不理睬把他捧上天的人们的期望和需要。

一个身材矮小笨手笨脚的人走进了金碧辉煌、五光十色的宫殿，一切都为他让路，多少狂热、倾倒的眼光目送着他，只要他开口说句什么话，宫殿的随从都要竖起耳朵记住他的每一句话。他个人是如此相信，对这一切他简直是视而不见了。饥饿正笼罩着他的国家，到处一片废墟，已经遍体鳞伤。他的军队和那些陶醉于白酒和胜利之中的肥头大耳、满胸勋章的元帅们已经踏遍了半个欧洲。他完全有把握，在下一回合的较量中他们将踏遍另一半欧洲。斯大林明白，他是人类历史中最独裁的人物之一。但这并不使他感到不安，他相信，他是在主宰历史的裁判。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使他的良心受到谴责，尽管他本人或者根据他的命令已消灭了几百万人，那些在与他共事的几千名亲密的战友，仅仅因为他们对他的政策和措施，真正能把国家和人民引向幸福，平等和自由的天堂表示了一些怀疑，

^① 罗马神话中头上有角的神。——译者

就被他当作叛徒们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手的数量越小、力量越弱，他对他们采取的斗争方法就越加骇人听闻，为时也最长久，手段也最残忍。然而他却胜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是良心？它是否存在？在他的哲学和实践中，良心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人吗？不过是人类繁殖生产力的产物。

诗人因为有了他而充满了灵感，乐队为他奏着颂歌，哲学家和研究所为他说的每句话发表大本大本的著作，而被他判了死刑的人喊着他的名字走上刑场。现在他成了人类历史上赢得了最大的一次战争的胜利者，他在占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国家中掌握着绝对权力，这一权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不断扩张。因此，他相信他的社会中没有矛盾，他的国家在各个方面比任何其它社会都优越。

他和自己的近臣——他的所谓“同志”开玩笑，不仅是因为他的沙皇式的宽厚的胸怀，然而他作为一国之君的威严，如他所做的那样，仅仅表现在他从来不和自己开玩笑。他之所以和人们谈谈笑笑，是因为他有时喜欢从奥林匹斯^①下到人间，以表明他是一个活人，用以时刻提醒人们，脱离集体的个人就等于零了。

我和大家一样，也被斯大林及其玩笑所陶醉。但是我的脑子和内心深处还有那么一个清醒的和不安的角落：我看见了这一切病态表现，我也无法同意斯大林的那种开玩笑的举动，不满意他有意识地没有和我讲一句合乎人情的和同志式的话。

（五）

但不管怎样，当我被邀请参加斯大林别墅里举行的小型宴

^① 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诸神居住的地方，那里有着铜制的宫殿。——译者

会时，我还是感到既突然又亲切。舒巴什奇博士当然一点也不知道，南斯拉夫方面参加那次宴会的只有我们这些共产党员部长，苏联方面参加的人只有斯大林最亲密的助手：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安东诺夫将军、贝利亚，当然，还有莫洛托夫。

和往常一样，我们在晚上十点钟集中到斯大林别墅的桌前，我是和铁托一起来的。坐在主席座上的是贝利亚，右侧是马林科夫，我挨着他，再下面是莫洛托夫、安德烈也夫和彼得罗维奇，左侧是斯大林、铁托、布尔加宁和安东诺夫将军，他当时是副总参谋长。

贝利亚也是小矮个子，在政治局内大概没有比斯大林高的人。贝利亚也是个胖子，脸色又苍白又黄，手心软而潮湿。当我看到他的四四方方的嘴唇和透过夹鼻眼镜看着对方的那双青蛙般的眼睛时，我简直是如同触了电一般，因为他实在太象伏伊科维奇——贝尔格莱德王国警察局的一个局长，他的专长就是折磨共产党员。我用巨大的毅力才摆脱了这个不愉快的比拟，这是因为他们两人不但从外形上很象，他们两人的全部表情——自信、蔑视、拍马奉迎和谨慎的混合体——也都太相象了。贝利亚和斯大林一样是格鲁吉亚人，但从他的外表上看不出来。格鲁吉亚人通常是黑头发，身材消瘦，而从贝利亚的外貌上看不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可以说是斯拉夫人，也可以说是立陶宛人，而可能性最大的是混合血统的人。

马林科夫更矮更胖，但是他是典型的带有蒙古血统的俄罗斯人（颧骨高高的，肌肉松弛，一头漆黑的头发）。看上去，是一个不露声色，寡言内向的人，注意力集中，他的个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但在他那厚厚的几层脂肪下面似乎存在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活跃而机灵，有一双很聪明而无所不见的眼睛。长期以来，大家都知道他是斯大林在党务方面的非官方

的副手。一切同党组织有关的事情——党的干部提拔和撤换的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干部档案制”就是他发明的。几百万党员和后补党员详细的历史、经历、自传都存放在中央，并且在莫斯科不断地按需要予以加工和修改。我利用这次机会，请他帮我找一本斯大林的《论反对派》，这本书因为摘录了大量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引文因而不公开发行了。第二天我得到了一本旧书，它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

布尔加宁身穿将军服。他生得很漂亮、是个非常典型的大个子俄罗斯人，留着老式的小胡子，说话异常谨慎。安东诺夫将军还很年轻，是一位身材匀称、英俊、生着一头黑发的美男子，他不随便讲话，只是谈到和他有关的事时才开口。

当我面对斯大林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充满了信心，尽管他这次会见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理睬我。

直至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以后（这要感谢各种饮料，干杯和玩笑所起的作用），斯大林才认为，到了同我结束争执的时候了。他半开玩笑地给我倒了一杯白酒，建议我为红军干杯。我没有马上领会他的意图，建议为他的健康干杯。

他笑着，用考验的眼光看着我说：“不必，不必，还是为红军干杯！为什么？您难道不愿意为红军干杯吗？”

我当然干了这杯酒，尽管我在斯大林的酒宴上，除了啤酒，我总是尽可能不喝其它酒类的。我不喜欢喝白酒，因为酗酒同我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但我也从来不是主张禁酒的人。

接着斯大林问我，红军在我们那里出了些什么事。我告诉他，我完全不想侮辱红军，而只是想指出一些个别人的错误，和我们因此而遇到的政治方面的困难

斯大林打断我的话说：“是的。您读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书吗？您看到人的灵魂和心理状态是多么复杂吗？您想一想，一

个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战友和最好朋友的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对周围事态怎么会是正常的呢？在如此可怕的战争之后，他和妇女玩一玩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把红军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军队，就是红军里没有那些刑事犯的话（这些刑事犯是我们让他们参军的）^①，红军也不会是理想化的军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少校飞行员戏弄了一个女人，出来一位工程师，这位骑士要保护这个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枪，喊着说：‘你这个后方的老鼠！’就一枪把这位骑士——工程师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这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战时我作为最高统帅有权过问这类事情，我释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他现在是一位英雄。必须懂得战士的心情。是的，红军不是理想化的军队。但重要的是，它应该打击德军，而且打得很好，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后来，在我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惊奇地听到有比这种“谅解”更高水平上的“谅解”红军战士的过失。苏联士兵在东普鲁士进攻时，坦克兵不加区别地压死了德国的逃难者——妇女和儿童。这件事传到斯大林那里，并请示应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们给自己的战士上的课已经太多了，现在就让他们发挥主动性吧！”

斯大林问我：“我们军事使团的团长科尔涅也夫将军为人如何？”

我不愿意再谈科尔涅也夫和他的使团的什么坏话，尽管能够谈的有许多许多。

^① 为了补充兵源，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允许刑事犯人参军上前线，立功赎罪，战争胜利后释放回家。这样的犯人在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里最多，他们作战勇敢，但纪律极坏。——译者

斯大林继续说：“这个人并不笨，但是实在可怜，是一个酒鬼，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

接着斯大林就我只喝啤酒（我就连啤酒也不喜欢喝）开心说：“杰拉斯和德国人一样，只喝啤酒，他是德国人，真的，他是德国人。”

我并不喜欢这个玩笑，因为那时，就连一小批站在我们一边的德国共产党人流亡者，在莫斯科的地位也是最低的。然而我听了他的这些话并没有生气，心里没有产生愤怒之情。

从表面上看，围绕红军问题的争论就此结束了，斯大林对我的态度也和以往一样也很真挚。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948年南苏中央之间发生了冲突，此后，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他们的来信中又利用和歪曲了关于红军纪律问题的争论和所谓我“侮辱”红军的事件。

斯大林有意地半开玩笑半恶意地挖苦铁托，他说南斯拉夫军队仗打得不好，同时对保加利亚军队给了很高的评价。不久前（冬天的时候）补充了大量新兵的南斯拉夫军队，第一次参加了较重要的正规战斗行动，打得不好。斯大林显然了解具体情况，他还是挖苦地说：

“保加利亚军队比南斯拉夫的强。保加利亚军队本来有弱点，军内还有过敌对分子。他们枪毙了十个二十个，一切都解决了。保加利亚军队确实很好——受过训练，纪律性强。你们的南斯拉夫军队还是游击队，没有能力应付重要的阵地战。冬天，德国的一个团就把你们一个师打垮了。一个团对一个师！”

过一会儿，斯大林举杯，建议为南斯拉夫军队干杯，但没有忘记补充说：“为一个能在平原上打得很出色的军队干杯！”

铁托忍着，没有对斯大林的话做出反应，当斯大林针对我们开心时，铁托面带笑容默默地看着我，我对他表示赞许和同

情。当斯大林说，保加利亚军队比南斯拉夫的军队好时，铁托忍不住了并高声说，南斯拉夫军队很快会克服自己的缺点。

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关系中，总象是有一种特殊的、不能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的特点，似乎在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彼此都记恨在心的什么事情，而他们两人又不知为什么互相间都不愿意把此事开诚布公谈出来。斯大林很注意不要有什么事伤了铁托本人，但又总是对南斯拉夫过分挑剔。铁托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前辈，很尊重他，但同时又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他对斯大林指责南斯拉夫总是予以反击的。

有一次铁托谈到，当前社会主义产生一些新现象，社会主义的表现和过去不同了。斯大林听到后说：

“现在，社会主义就是在英国君主制度下也是可能出现的。不是处处都需要革命。最近英国工党代表团来过我这里，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是的，新现象很多，就是在英国王国的条件下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斯大林从来没有公开地主张过这样的观点。不久，英国工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并把百分之二十的工业收归国有。但不管怎样，斯大林始终没有说过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的，也没有称工党为社会主义者。我想，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主要是在对外政策上他和工党政府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和冲突。

在谈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说，南斯拉夫政权实质上是苏维埃政权，共产党掌握了所有经济命脉，国内也没有什么反对党。斯大林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不对，你们那里不是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戴高乐的法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产物。”

铁托补充说，南斯拉夫产生了一些新的情况。这场讨论没有结束，但就此停止了。

我从内心深处并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我想，我的意见和铁托的意见没有什么区别。

斯大林也讲了他对正在进行着的战争本质上的特点的看法：“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他也大致上讲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政策，他说：“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都不敢！”他重复着这句话，并有力地用食指在空中划着。

有人提出，德国人在今后五十年内不会恢复元气。斯大林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不对，他们会恢复，而且会很快恢复起来。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有很熟练的数量很大的工人阶级和技术知识分子，再过十五至二十年，他们又会站得很稳了。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总而言之，如果斯拉夫人团结起来，任何人都不敢碰他们一下。”

有一次他站起来，提提裤子，似乎要和谁打架似的，然后他自我陶醉地说：“战争快结束了，再过十五——二十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

他的话使人毛骨悚然——可怕的战争还在进行着呢！但是他对所选择的必须走的道路充满信心，对他所生活的世界及自己所领导的运动的未来将必不可免要发生的事有着充分认识和估计，这些都使人们敬佩不已。

那天晚上他所讲的其余的话，大都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总而言之，尽情地吃喝，干了无数次杯，祝酒的话也都没有什么意义。

莫洛托夫讲述了斯大林如何开了丘吉尔的玩笑，他说：斯大林举杯建议为侦察员及特务机构干杯，用此暗示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利玻利半岛的失利，原因是英国人没有

得到确切的情报。同时，莫洛托夫也很得意地提到丘吉尔的精细和幽默感。他说，有一次丘吉尔在莫斯科喝了一大杯优质的葡萄酒，然后说，他完全有资格得到一枚苏联高级勋章和接受红军的衷心的感谢，因为过去在外国干涉时期^①入侵阿尔汉格尔斯克时，他教育了红军如何能把仗打好。归根结蒂，看起来，苏联领袖虽然不喜欢丘吉尔，但是他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知道他是一个有远见的、危险的“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

铁托在回别墅的路上，在汽车里说：“这些俄国人，真见鬼，怎么喝那么多酒，简直是腐化堕落。”他也是不能多喝酒的人。

我当然同意他的意见，而且又一次完全徒劳地想搞清楚，究竟为什么苏联的上层领导如此大量而经常地酗酒。

在从铁托的别墅返回城里的路上，我总结了一下这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没有什么争吵，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加大了，因为一切争论的问题是按两个完全自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作为政治原因得到解决的。

我们在季米特罗夫那里也度过了一个晚上，为了把晚上的活动安排得满一些，他邀请了两三个苏联演员，他们为我们演出了短小的节目。

当然，我们谈了有关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将来联合的问题，但是谈得很简短，涉及的东西都是很一般的，并没有详谈。铁托和季米特罗夫共同回忆起共产国际时代的事情。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友好往来，不是政治会见。

当时季米特罗夫感到很孤独，因为保加利亚的侨居苏联的党员都随红军回到保加利亚去了。

^① 指十月革命后外国出兵干涉苏联的时期。——译者

当时，在季米特罗夫的情绪中可以感觉出他很疲倦和有些优柔寡断。其中的原因（至少部分原因）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谁都不愿公开讲出来。当时保加利亚虽然已获解放，但是斯大林不允许季米特罗夫回国，理由是时机未到，因为他如果回去，西方会把他归国看成是在保加利亚公开推行共产主义。似乎保加利亚施行的方针，如果季米特罗夫不回去，人们都看不见似的！在斯大林的宴会上也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不知是什么意思，斯大林挤了一下眼睛说：“在保加利亚，季米特罗夫回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在这里过得也很好。”

我们当时就开始怀疑（尽管没有什么充分证据）：斯大林在保加利亚没有把事情安排就绪之前，他就不肯让季米特罗夫回国！

我们的疑虑还没有发展成为确信苏联在谋求霸权，但是我们对此已有所觉察。我们也就不得不同意斯大林虚构出来的说法，他说他担心季米特罗夫会迅速使保加利亚向左转。

当这些问题在它发展的初期，我们的这些疑虑已经绰绰有余了。

这样一来，就又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斯大林当然是天才，但是季米特罗夫也不是蠢才，斯大林怎么会比季米特罗夫更好地了解保加利亚应该干什么呢？把季米特罗夫留在莫斯科，违背他的意志去行事，难道不影响他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内及人民中的威信吗？归根结蒂，为什么要围绕季米特罗夫是否回国问题，玩弄这么复杂的手腕呢。然而与此同时，俄国人对这件事又都守口如瓶从不提起，连对季米特罗夫本人也一句不说，这是为什么呢？

在政治上，比起任何其它领域来，发生的一切事件，多半是从思想上的分歧和怀疑对方居心不良开始的。

(六)

我们途经基辅回国，根据我们和苏联政府双方的愿望，我们要拜会一下乌克兰政府的成员，为此，我们在那里停了三天。

当时乌克兰共产党书记和政府主席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他的外交部长是曼努伊里斯基。他们来迎接我们，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这三天的时光。

1945年战争正在进行中，所以还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愿望——赫鲁晓夫和曼努伊里斯基问我们：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这一问题毫无结果，因为斯大林很快就遇上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所以他根本没有考虑如何加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独立性的问题。至于能言善辩的十分活跃的曼努伊里斯基老头子他是一位没有部的部长，他以后还在联合国说了两、三年的空话，然后突然失踪了——消失在那些由于斯大林或另外什么人的愿望而造成的无数牺牲者的大海之中了。

赫鲁晓夫的命运则完全不一样，尽管当时谁也猜不出他的前程将会如何。

他从1939年起就属于最高级的政治领导阶层，不过不象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或卡冈诺维奇那样受斯大林的信任。在苏联的上层中，大家认为，赫鲁晓夫是精明的实干家，在经济和组织方面具有难得的才干，然而作为演说家和作家则完全不为人所知晓。他是在三十年代清洗后被提升到乌克兰的领导岗位上来的。至于他在清洗中起了什么作用，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对这些事都毫无兴趣。不过，我很了解在斯大林的俄国是怎样提拔人才的：需要的是在血腥的“反富农”和同“反党”

分子斗争中的运动里坚决果敢而又能随机应变的人。特别是在乌克兰，除了上述那些罪行外，还要加一个——“民族主义”的罪行。

赫鲁晓夫的高升（那时他还相当年轻）对苏联来说，并没有什么奇特的：作为国家干部他经受了各种考验——政治和其它考验，并靠自己的忠诚、伶俐、机警、聪明顺着党的阶梯一步一步地爬了上去。他和多数领导者一样，是革命之后新起来的、斯大林式的一代党和苏维埃干部中的一员。战争开始时，他正好是乌克兰的最高领导人。当红军不得不撤离乌克兰时，赫鲁晓夫在红军里得到一个很高的政治职务（但不是最高的），他是陆军中将。德军被打退后，他又回到乌克兰，成为基辅的党和政府首脑时，他仍然穿着他的中将的军服。

我们听说，他本不是乌克兰人，而是俄罗斯人。大家都对此表示沉默，他自己也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乌克兰连政府主席都不是乌克兰人，那实在是很不得体的事。我们这些善于对有损于我们理想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去进行解释的共产党人也对此表示奇怪：难道在一个比法兰西民族人数还多的民族里，在一个比俄罗斯民族具有更高的文化的民族里，连一个能承担政府主席的职务的乌克兰人都找不到吗？

还有一点他们也无法掩盖：即当德国人占领了他们的家乡乌克兰以后，乌克兰人往往离开红军，而在德军撤出之后，却有二百五十万乌克兰人应征入伍参加红军。那时，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小规模战斗还在继续进行（天才的俄国将军瓦杜丁是这一运动的牺牲者之一），我们对下述解释是不能满足的：他们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顽强活动的恶果。那么必然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在苏联所有民族确实都是平等的，那么民族主义又从何而来呢？

乌克兰的社会生活正在明显的俄罗斯化：戏剧用俄语演出，一些报刊是用俄文出版的，——这些都使人感到惊讶。

但是我们还想不到要在这些或其它方面埋怨赫鲁晓夫这位好客的主人，因为他作为好党员只能服从他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和领袖及导师斯大林的一切指令。

所有苏联领导人都具有实干精神，他们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圈子里常常也很直爽，赫鲁晓夫在这两方面都是突出的代表人物。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当我仔细阅读他的讲话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知识面没有超出俄罗斯古典文学，他在理论方面的造诣没有超出中级党校的水平。除了在各种训练班获得的这些表面的杂七杂八的知识外，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他靠自学和自我修养，靠在多种实践中所获得的活的经验。他这些方面的知识是无法估量的，因为有时我对他理解的那些很少人才会知道的某些知识的细节方面惊奇不已，与此同时又为他对一些起码的原理一无所知而感到不可理解。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具有生动而形象表达的才能。

和其它苏联领导人相比，他实在太爱说话，他常常喜欢运用民间谚语和成语——这是当时领导人的风格，被认为是他们联系群众的一种表示。但是由于他本来就平易近人，言行自若，所以他的这一习惯不显得那么做作。

他也具有幽默感。他和斯大林的幽默感的区别表现在：斯大林主要在幽默中表现出他的智慧，因此显得有些笨拙和犬儒主义的东西，而赫鲁晓夫的幽默则纯属民间性质的，因此显得粗俗，但是生动活泼，仿佛是取之不尽的。现在，当他身居高位^①，全世界都在注意他时，可以看出，他在控制自己的言行，

① 指赫鲁晓夫当权的时候。——译者

但其本质并未改变，从这位苏维埃国家的主人的身上仍然容易认出他是一个来自民间的人。应该指出，在一切共产党里，没有受过完全的教育自学出来的人和一些学识浅薄者之中，他的自卑感最少。他比他们任何人更少考虑用某种光彩夺目的形式及公式化的词句去掩盖自己的无知和弱点。他滔滔不绝倾吐出来的那些大量的老生常谈的话都表现出他的真正无知和仅仅在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公式，然而讲这些话时，他是坦率的，是出自他的信念的。他的语言及表达方式比斯大林更受人欢迎，尽管他们的听众都没有变，都是广大的党员和群众。

他穿着没有熨过的半新不旧的将军服，他对普通党员和公民的日常工作的细节都很关心，在这点上他在苏联领导人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当然，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相反，是为了巩固它的基础，改善它的现状。当别人是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取汇报并发号施令的时候，赫鲁晓夫却在下面调查和了解情况，并就地发出指示，纠正缺点和错误。

任何苏联领导人都不到集体农庄去，偶尔去一趟也是为了参加宴会或者是摆摆样子的。而赫鲁晓夫和我们一起去集体农庄，他坚信集体农庄制度的正确性，并同庄员们一起用大玻璃茶杯饮酒。与此同时，他到温室、猪圈去视察，和人们讨论一些实际问题。在返基辅的路上，他还继续就在农庄里没有讨论完的问题发表他的看法，并公开谈论农庄的缺点。

在一次乌克兰政府各经济部门的会议上，我们看到他在处理大规模的事业中的非凡的实干才能。他的人民委员和南斯拉夫部长不同，他们不仅都是内行，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实事求是地估计现实的可能性。

他是一个身材矮胖，结实、性格活泼、动作灵巧的人，仿佛是用一块木料刻出来的一样。他吃东西时好象是大块大块地

把食物吞下去，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保护自己的那个钢质的假牙床^①。斯大林及其亲信，如果说他们没有美味崇拜狂的话，起码是有美食癖。对赫鲁晓夫，在我看来，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他象每一个过分疲倦的人那样，重要的是好好地饱饱地吃上一顿，当然，那就要看他是否有这种可能就是了。^②赫鲁晓夫的日常伙食是丰盛的，由国家供给，不用他私人付款。赫鲁晓夫不讲究吃喝，然而吃的量不少于斯大林，酒喝得比斯大林还多。

他是非常灵活的人，和所有的实干家一样，特别能适应环境。我想，如果某件事能给他带来实际利益的话，他是会不择手段地去把它干成的。他和一切来自民间的煽惑者一样，这样的人往往甚至于相信自己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也会轻而易举地放弃对他不利的那些方式，并且随时准备用道德标准和最高的理想准则去解释自己的这种举动。他喜欢这样的谚语：“打架时没有时间选择木棒”。他也利用这个谚语去解释他不打架时也需要木棒。

我上述对赫鲁晓夫的描写，虽然对今天的赫鲁晓夫来说，似乎说这样的话不大相宜。我只是叙述了自己当时的印象，也只是随便提了一下我现在的一些想法。

我当时并没有发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有什么不满。提到斯大林时，他很尊敬，他十分强调自己同斯大林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告诉我们，在德军入侵的前夕，斯大林从莫斯科打电话给他，要他加倍注意，因为有消息说，德国人可能明天（即6月22日）有军事行动。这件事我只是作为我记得的

① 他动过手术，牙床和颌骨都是假的。——译者

② 这里指斯大林每天彻夜的晚宴和赫鲁晓夫的繁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译者

一桩事把它写在这里，并不是想驳斥赫鲁晓夫关于德军的突然袭击应归罪于斯大林的说法。突然袭击的行为是斯大林错误的政治估计所产生的后果。

不管怎样，在基辅有一种新鲜感，这要感谢赫鲁晓夫的不检点和务实的精神、曼努伊里斯基的热情和基辅的美丽；这个城市以其辽阔无垠的平原、混浊的大河两岸突起的山峦，令人觉得和贝尔格莱德十分相似。

然而，如果说赫鲁晓夫给人留下了坚强、自信和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的印象，基辅给人留下了智慧的、精心建筑的美的印象的话，那么就整个乌克兰来说，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没有什么特色的、精疲力竭和陷于绝望中的国度。

我对苏联的实际情况了解得越深入、我的疑虑就越多。要使我作为一个人的良心和这些事实相妥协，就越来越成为非常困难的事了。

失 望

(一)

我于1948年初第三次会见了斯大林。这次会见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正是苏联同南斯拉夫领导之间发生冲突的前夕。

在这次会见之前，南苏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事件，因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苏联同西方之间的关系已开始变为冷战性质，已经成为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了。

在我看来，关键的事件有：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希腊的内战和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情报局——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南斯拉夫和苏联是坚决反对马歇尔计划的唯一两个东欧国家；南斯拉夫主要是由于当时我们持有革命教条主义的观点，所以反对，苏联是害怕美国的经济援助会动摇刚刚用武力征服的帝国。

当我作为南斯拉夫代表为出席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法共代表大会来巴黎时，莫洛托夫恰好在巴黎举行同西方国家代表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莫洛托夫在苏联大使馆接见了我们，我们在下面的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一、抵制马歇尔计划，二、批判法国党的所谓“民族主义路线”。莫洛托夫特别问及我对大会的印象。他还谈到由杜克洛主编的《新民主》杂志，他认为

这份杂志本来应该体现共产党的一致意见，因此他说：“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也不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

关于马歇尔计划问题，莫洛托夫对是否应该同意召开东方国家参加的会议表示犹豫，他认为，如果东方国家参加会议，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讲坛，但只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就退出会议。我并不同意这个方案，但如果俄国人坚持的话，我也会同意他们的建议，我们政府的看法也是如此。但是莫洛托夫从莫斯科得到政治局的指示，连召开会议也反对了。

我回到贝尔格莱德不久，在莫斯科要召开东欧国家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研究对待马歇尔计划的态度。我被任命为南斯拉夫代表。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在于集体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不反对参加马歇尔计划。苏联飞机已经在贝尔格莱德机场等候我，这时莫斯科来电报说，召开会议的理由已不存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了。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也是由于上述原因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当各国党的观点同苏联的观点不一致时，用这种形式进行协商。早在1946年夏天，建立这种各国共产党能够协调自己的观点和交换意见的机构的想法已提到日程上来了。那时斯大林、铁托、季米特罗夫都谈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一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拖了下来，未能实现，关键在于，苏联领袖要找出实现此计划的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于1947年秋天终于来临，毫无疑问，这是直接和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巩固自己对东欧国家的领导相联系的。

在波兰西部（原德国领土）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只有两个共产党——南斯拉夫和苏联——坚决主张建立情报局。哥穆尔

卡反对这个主张，他谨慎地但毫不含糊地提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

随便提一下一个插曲，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名称“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是斯大林想出来的，他认为今后每当西方宣传机构它们要引用该杂志的每篇文章时，就不得不重复地提到这个口号^①。但是斯大林的期望并没有实现，由于杂志的名称太长而且宣传意义太明显，所以西方有意地直接用“情报局杂志”这个称呼代替了杂志的名称。情报局的地点也是斯大林最后定下来的。代表们决定把所在地设在布拉格。晚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斯兰斯基^②乘汽车回布拉格去了，以便和哥特瓦尔德^③协商一下。夜间，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同斯大林通了直线电话（就连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找一个破烂的旅馆做情报局地址的事，不同莫斯科通直线电话也决定不了）。尽管哥特瓦尔德勉强同意了设在布拉格，但斯大林却又下命令把共产党

① 这个杂志的名称就是当时的口号。——译者

② 鲁道尔夫·斯兰斯基（1901—1952），捷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6年起任《红色权力报》社长，1928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35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希特勒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斯兰斯基逃往苏联，1944年以前一直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捷克解放时，随红军返回捷克斯洛伐克，任党的总书记，出席过1947、1948和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1951年9月被撤去领导职务，三个月后被捕入狱，1952年被判处绞刑。——译者

③ 哥特瓦尔德（1896—1953），捷克斯洛伐克和国际共运活动家，1929—1945年任捷共总书记，从1945年起任捷共主席，自1948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他于1912年参加革命运动，1921年被选为捷共中央委员，1925年被选为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书记，1938—1945年驻苏联，主持捷共国外领导中心的工作，1945—1946年任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阵线政府副主席，1946—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席，他是斯大林路线的忠诚执行者，1953年参加斯大林葬礼后回国，患脑溢血逝世。——译者

情报局设在贝尔格莱德了。

在南苏关系的深处两个平行的过程正在进行着，表面上是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完全一致，而实际上对各种问题各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行动。

当南斯拉夫最高领导的大型代表团（铁托、兰科维奇、基德里奇^①、涅什科维奇^②）于1946年夏在莫斯科时，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斯大林拥抱铁托，预言他未来在欧洲范围内将起的作用，与此同时又明显地蔑视保加利亚人和季米特罗夫本人。但不久，围绕着合营公司问题两国开始发生争执和分歧。

隐蔽的摩擦在不断地继续着，这些摩擦非共产党世界是看不见的。但是在党的上层却不断地爆发着：关于苏联侦察机构招募情报人员的问题，这种招募活动在我国的国家 and 党的机构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得尤其厚颜无耻，这主要是出自苏联领导对南斯拉夫革命的蔑视。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代表们对南斯拉夫把铁托和斯大林相提并论，反映十分强烈。南斯拉夫同东欧其它国家进行的独立联系以及南斯拉夫在这些国家里威信的提高，他们的反映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

摩擦很快转到经济关系方面上来，特别是当南斯拉夫人认

① 鲍里斯·基德里奇（1919—1953）南共领导人之一，斯洛文尼亚人。1928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党的活动。1941年参加游击队后任斯洛文尼亚部队政治委员，1945年任斯洛文尼亚总理。1946年被派往莫斯科研究苏联经济。同年秋天回到南斯拉夫后，一直领导经济工作。他曾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主张完全由国家计划领导，他死后以上政策有了改变。他是南共的政治局委员。——译者

② 布莱哥耶·涅什科维奇（1907——）塞尔维亚共产党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41年参加铁托领导的游击队。1945年任塞尔维亚总理。原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1952年被撤职。——译者

清楚了：在实现五年计划期间，他们除了和我们进行通常的贸易往来之外，我们并不能从苏联那里得到更多的援助。斯大林遇到我们反抗后却说什么，对友好和同盟国家来说，合营公司的形式是不适宜的，所以答应给予我们各种援助。然而与此同时，苏联的贸易代表利用了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化，也利用了南斯拉夫把苏联看成是无私的不谋霸权的国家这一幻想，而取得了经济利益。

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一样在东欧国家中是少数在粉碎了法西斯侵略的同时没有借助红军作为决定性因素，就实现了国内革命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社会改革比其它国家都走得更远一些，而这个国家又正处在形成的苏联东方集团的最突出的地位。希腊正在进行国内战争，西方指责南斯拉夫在其中起了挑拨作用并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所以南斯拉夫同西方，特别同美国的关系已紧张到了极点。

今天，当回忆往事时，我认为，苏联政府不仅非常满意地在注视这种关系紧张化的进程，甚至还为关系的恶化采取了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只能限制在不伤害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当莫洛托夫在巴黎听到南斯拉夫打下了两架美国飞机时，他简直要和卡德尔^①拥抱，但同时莫洛托夫又告诉他，不要再打下第三架了。苏联政府并没有直接支持希腊起

① 爱德华·卡德尔（1907—1979）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之一。原为斯洛文尼亚的一个教师，1928年入党。1931年被捕入狱，坐牢两年。1934年至1937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列宁党校学习，并留校授予教授职称，在党校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铁托合作改组南斯拉夫共产党。194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做领导工作，1943年成立临时政府时任副总理。1945年政府正式成立后，连任该职。1951年起兼任外交部长及政府改组委员会主席。他被公认为南斯拉夫优秀的理论家。

——译者

义，所以，南斯拉夫因此是孤独地坐在被告席上唯一的国家。但是苏联也没有采取任何坚决措施去平息这次起义，一直到斯大林觉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利时为止。

把共产党情报局的地址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决定也是这样，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对南斯拉夫革命的承认。但其背后隐藏着苏联的阴谋：南斯拉夫领导必须忘记对待本国革命的自满情绪，要服从所谓的共产党的国际团结，这实际上意味着承认苏联的霸权，满足苏联的政治及其它官僚们的贪得无厌的要求。

现在我觉得还应该谈谈斯大林对各国革命的态度，包括南斯拉夫革命在内。

由于莫斯科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刻拒绝支持中国革命、西班牙革命，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支持南斯拉夫革命，所以人们有根据地认为，总的说来，斯大林是反对一切革命的。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太正确的。斯大林是反对超出苏联国家利益范围的革命，他本能地感到，在莫斯科以外建立革命中心就是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垄断地位的威胁。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因此，他只在一定范围内支持革命，即在他还能控制它们时就采取支持的态度，一旦它们开始从他的手掌中溜掉，他就随时准备抛弃它们。我认为，在苏联政府的政策上，至今为止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

斯大林把国内的整个组织制服了，对国外的行动也不能有不同的态度。他在进步及自由的概念同自己国家一个政党的利益之间划了等号，所以在其它国家里他也只能作为指挥者为所欲为。他使自己也服从于他的事业，因此他成了专制和官僚主义、偏见和愚昧无知——即他强加于自己国家的一切劣根——的奴隶。

常言说得好：在剥夺别人自由时，必然要丧失掉自己的自由。

(二)

我去莫斯科的理由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对待阿尔巴尼亚政策方面发生了分歧。

1947年12月底，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一份电报，要求南斯拉夫中央派我或者另一同志来莫斯科协调两国政府对待阿尔巴尼亚的政策。

分歧的表现是各方面的，在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斯彼鲁·纳库自杀之后，这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已经全面发展起来。南斯拉夫派出更多的各部门的专家去阿尔巴尼亚，还给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各种食品，尽管南斯拉夫自己也很不宽裕。合营公司也开始建立起来。两国政府原则上同意这样的观点：即阿尔巴尼亚应该同南斯拉夫联合起来，这样做就能使南斯拉夫国内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也会得到顺利的解决。

南斯拉夫政府给阿尔巴尼亚援助的条件，比起苏联政府给予南斯拉夫的条件要优惠得多，也公正得多。然而，事情并不在于公正与否，而在于这种关系的实质，阿尔巴尼亚的部分领导暗地里反对这种关系。

斯彼鲁·纳库这个人身材不高，体质很弱，是个非常敏感、细致的知识分子。他当时负责阿尔巴尼亚政府的经济工作，他第一个起来反对南斯拉夫，要求给阿尔巴尼亚独立发展的自由。他的观点不仅在南斯拉夫，就是在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会里也遇到了坚决反对。反对他最坚决的是科奇·佐治^①（阿尔

^① 科奇·佐治（1911—1949）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和南斯拉夫游击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阿尔巴尼亚解放后任内务部长。在铁托与共产党情报局关系破裂后，他被以所谓“托派”和“铁托分子”的罪名处决。——译者

巴尼亚的内务部长，后来因同情南斯拉夫而被枪决)。佐治是阿尔巴尼亚南方的一个工人，老革命家，他被认为是最坚定的共产党员，尽管党的总书记和政府主席是恩维尔·霍查，当然，霍查比起佐治无疑是更有学问和更加机灵的人。霍查也参加了批判纳库的队伍，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并不明确。可怜的纳库在被指责为沙文主义异常孤立的情况下，大概就在开除他党籍的前夕，自杀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死成为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紧张化的起点。

当时，这一事件并没有公开，是后来1948年南阿冲突公开后，恩维尔·霍查把纳库捧上民族英雄的宝座。但是，这件事给两国领导留下很深的印象，从庞杂的共产主义公式的武库里拿出的任何词句，比如说什么纳库是怯懦者、是庸人等等，也消除不了这一深刻的印象。

苏联对纳库死亡的真正原因，对南阿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了解。在地拉那的苏联使团越来越扩大了。苏联、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南阿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背着苏联的地方，但是应该承认，南斯拉夫政府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并没有同苏联商量。

苏联代表越来越经常地对南斯拉夫有关阿尔巴尼亚的一些措施表示不满。我们发现，恩维尔·霍查周围的亲信同苏联使团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了。一些苏联代表的指责也不断提到日程上来：如果南斯拉夫人不愿意同苏联建立合营公司的话，那么，为什么又同阿尔巴尼亚人建立了这类公司呢？如果南斯拉夫要求往国内派苏联专家的话，那么，为什么自己还派出专家到阿尔巴尼亚去呢？如果南斯拉夫自己需要外国专家的话，那么他们的人怎么能称之为有资格发展阿尔巴尼亚的专家呢？南斯拉夫作为贫穷和落后的国家，为什么又突然承担起援助阿

尔巴尼亚的任务呢？

由于苏南两国政府之间的这些分歧，莫斯科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了，它想在阿尔巴尼亚取代南斯拉夫的地位。然而在南斯拉夫人看来，这是极不公正的，因为要同阿尔巴尼亚联合的不是苏联，再说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共同边界。与此同时，也越来越清楚地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的上层领导已转向苏联，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们的宣传上。

所以当苏联政府建议取消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分歧时，贝尔格莱德表示双手欢迎，不过我至今仍不了解，为什么斯大林要我到莫斯科去。

毫无疑问，我给斯大林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爱冲动和性格直爽的人。我想，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把我看成是这样的人。我的这个特点有利于进行关于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的公开争论。

我还认为，斯大林想把我拉到他那边去，以便分裂南共中央并使它屈服。已经站在他一边的有赫布朗和朱约维奇。但是对赫布朗，因为他同王国警察有些不明不白的联系，所以已在背对背地开始对他进行审查，而且他已经被开除中央委员会了。朱约维奇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又是中央委员，但是，他并不属于在为党的统一斗争中和在革命过程中在铁托周围所形成的那个圈子。还在1946年，我随同铁托去莫斯科时，铁托提到我有头痛的毛病，斯大林曾邀请我到他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去休养。但是我并没有去，主要是因为他的邀请没有通过大使馆正式提出，所以我把斯大林的表示只看成随便说的一句客气话。

记得，我是1948年1月8日（大约是这个日子）带有双重心情从南斯拉夫出发到莫斯科去的。我一方面因斯大林邀请我本人，因而从心里感到荣幸，但同时内心深处怀疑他这种做法不是偶然的、对铁托和南斯拉夫中央是不怀好意的。

在贝尔格莱德，并没有给我什么特殊的指示和嘱托。这些指示我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因为我本人是属于南斯拉夫的最高领导层，而我们的共同观点早已定了下来：即苏联领导对我们党已定了的南阿联合的方针应有所克制，不应当讲一些没有分寸的话，也不应该要求我们执行某种其它的特殊路线。

南斯拉夫军队利用我去莫斯科的机会也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去讨论装备方面和军事工业方面的需要的问题的。当时的总参谋长科查·波波维奇及负责军事工业生产的米埃尔柯·托多罗维奇也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当时的军队总政治部主任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捷姆波，也和我们同去，以便了解红军在这方面的经验。

我们是乘火车去莫斯科的，怀着愉快的心情及莫大的希望上路了。但同时也遵循已定观点：南斯拉夫在解决自己问题时要走自己的路，主要靠自己的力量。

(三)

我们过早地把我们的观点透露出去了，那是在南斯拉夫驻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使馆的宴会上说出去的，当时在场的有安娜·波克^①（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和其它一些罗马尼亚政治活

^① 安娜·波克（1893—1960）罗马尼亚犹太族人，母姓罗宾逊。她是1921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党的领导人马赛尔·波克结婚。1924年夫妇两人离开罗马尼亚去共产国际工作。1936年回国后被捕。她的丈夫波克死于莫斯科大清洗运动。她因两国交换政治犯而得重返莫斯科，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导苏联广播电台对罗马尼亚的广播，并协助将苏联境内的罗马尼亚战俘组成以图尔多·弗拉迪米列斯库命名的一个师。后随苏联红军回罗马尼亚，于1947年7月出任外交部长，不久并任命为副总理。1952年被加以所谓“异己分子”的罪名，被解除职务，后指控为“波克—卢卡右倾反党分裂集团”，受警告处分，几年后逝世。——译者

动家。

除了格鲁波维奇大使外，他后来作为莫斯科的拥护者移居到国外，其它所有南斯拉夫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不能成为绝对的样板，因为情况不同了，东欧各国的条件和相互关系各不相同。我当时注意到，安娜·波克一方面很注意听，但保持着沉默，或者勉强表示同意一些说法，她总是力图避开讨论这个敏感的问题。一个罗马尼亚人，可能是波德纳罗什，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而另一个罗马尼亚人，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真心实意地同意我们的看法。我当时就认为，这类的谈话是多余的，因为我坚信，我们的观点都会被转告给俄国人，而他们会把这些观点看成是“反苏”的，“反苏”这个词当时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同义语。与此同时，我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力图缓和自己的说法，强调了苏联的功绩和苏联经验具有原则性的意义。然而，这些好话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强调的问题是，每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选择自己的道路。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苏联的上层完全不允许有什么差别和进行任何妥协的，特别是在他们共产主义队伍的内部更是如此。

我们虽然只是路过罗马尼亚，但是处处都遇到一些不正常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苏联对罗马尼亚和其它东欧国家的态度：当时这些国家还处于被直接占领的状态之下，他们的财富经过各种渠道已被掠走，主要是经过合营公司。俄国人几乎没有在这些公司里投入什么资金，他们的股金只不过是从德国人手里得到的资本，他们直接把这些资本宣布为自己的战利品。同这些国家的贸易也同与世界其它地方的贸易条件不同，根据是签订过各种专门的协定，按这些协定苏联的购买价格低于世界市

场，可是出售价格则高于世界市场。只有南斯拉夫例外。这些我们是知道的。罗马尼亚的贫困和政府的软弱无能及唯命是听、毫无骨气，使我们更加愤慨。

苏联代表的蛮横无理，目中无人，我们认为这是对人的侮辱。我记得，当驻雅司的苏联官员说出：“看，罗马尼亚的这些肮脏的雅司^①吧，再瞧瞧罗马尼亚人吃的这些玉米面粥吧！真要命！”我们当时听了这样的话，是多么的惊讶不已呵！

他接着还重复了爱伦堡和维辛斯基批评罗马尼亚贿赂和偷盗的话：“他们不是一个民族，只有以此为生的坏职业！”

在那个温暖的冬天，雅司确实象一个肮脏和荒芜的巴尔干的小省分，它那山丘、花园、四面环绕着花厅的房屋都很美丽，然而只是比较熟悉这个城市的人们才能看到它的美。可是我们很了解，苏联的外省的城镇，一点不比雅斯好，可以说还不如雅斯。最使我们恼火的是那种以“优秀民族”自居的自大狂和大国习气。罗马尼亚人对我们的殷勤和尊重态度，使我们更加感到罗马尼亚人所处的低下的地位，与此同时，我们又为自己的独立自主精神感到自豪，因此，我们和他们讲话时就更随便一些。

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态度和想法是“可能的”，是正常现象，因为“俄国人就是如此”，因为他们本来就很落后，又长期脱离了外部世界，而且革命传统也已经消失了。

我们在雅斯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挂着政府专车的苏联火车来接我们，陪同的人还是那位苏联公安机构专门负责南斯拉夫事务的科佐夫斯基上尉。但这次他显得更拘束和闷闷不乐，

^① 雅司是罗马尼亚的一个省分，这里泛指罗马尼亚的一切小城市和地区。——译者

这当然不仅是因为在他面前的都是部长和将军，而是因为在我們同苏联“同志”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某种捉摸不定的、无法解释的、官方的冷淡的气氛。

我们所乘的专车设备豪华、饮食精美、服务周到，但也就仅此而已。对车厢的其它方面我们却尽情地挖苦了一番：巨大的铜制门把手、古老的各种装饰品多得不得了，厕所的马桶之高，坐上去两腿要悬在空中。难道他们想用这些东西表示自己的强大和国家的威力吗？难道有必要如此炫耀自己吗？还有更想不到的事情：在这象沙皇时代一样豪华的车厢里，列车员在他的休息室里用笼子养了一只母鸡，还在笼里下了蛋。这位低工资的、穿着破旧的列车员说：“有什么办法，同志们！工人总得想点办法过日子，家庭人口多，生活艰难。”

南斯拉夫的火车虽然也不是全能正点运行的，可是在这里，火车晚点几小时，并没有人着急，工作人员只是不缓不慢地回答你说：“总会到达目的地的。”

俄国总是使用一切办法要表现俄罗斯人的及其民族精神的一贯传统，他尽力在对抗工业化所需要的紧张、繁忙的作风并发挥行政当局的无限的权力。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积雪埋住了房屋，只露出一些屋顶，周围依然一片被战争破坏和令人恐惧的景象，沿途都是被烧毁的车站、小木房子，正在清扫道路的都是穿着靴子、戴着头巾的妇女，人们只有一杯开水和一块黑面包。

在这饥饿和荒凉之中，只有基辅这次还给我留下了美丽、清洁、文明、有审美力、追求时髦事物的印象。虽然由于夜幕笼罩着一切，我们看不见第聂伯河和辽阔平原上的风景，但是基辅却非常象贝尔格莱德，是一个前程无限、拥有百万人口的、人民精心而有计划地建造起来的大城市。在基辅我们只停

留了片刻，等候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任何乌克兰领导人都没有来迎送我们。这是一个披着银白霜雪的夜晚，也是披着忧伤的黑纱的夜晚。只有我们的车厢灯火辉煌，在这破坏和贫穷的海洋里，只有我们的车厢里到处都很舒适，应有尽有。

(四)

我们到达莫斯科几小时之后，当我们正在和南斯拉夫大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促膝谈心时，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苏联外交部问我是否觉得很疲倦，并说斯大林当晚就想接见我。事情办得这么快，对莫斯科来说是少见的。外国共产党人来这里后总要等很长时间，所以在他们中间流行一句话：来莫斯科容易，离开可就难了。如果我真已精疲力竭的话，我也会举双手同意马上答应斯大林的邀请。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很羡慕我，科查·波波维奇和托多罗维奇^①一再提醒我，不要忘记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我是和他们同路来的，我借一路同行的机会，已经详细而具体地了解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我真正地因能够得到斯大林接见而高兴，但同时我也清醒地考虑着这样匆忙行事的原因。在我同斯大林以及其它苏联领导人度过的这个夜晚，这种双重的心情始终在支配着我。

和往常一样，大约晚上九点钟我被送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等着我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我知道日丹诺夫在政治局里是负责同外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的。

在通常的寒暄之后，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谈到正事上来，他

^① 米雅尔科·托多罗维奇，(1913—)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从事青年运动时期入党。第二次大战时期参加游击队。解放后在国防部工作，历任特需供应局长，农业部长和农林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译者

说：“在你们的阿尔巴尼亚那里，中央委员在自杀！这太不好，太不好了！”

我解释说：“纳库·斯波鲁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系，他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内部把自己孤立了。”我还没有谈完，斯大林出乎意料地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这时，他把右手的手指并拢起来，放到嘴边，作出好象要吞食下去的动作。

我对斯大林的手势和他表现感情的方式大吃一惊，几乎到了目瞪口呆的程度。我不知道我的心情是否反映在我的脸上了，但我还是力图把他的话当成玩笑，看成是斯大林过分简单和形象地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法。所以我又解释道：“我们不是要吞并阿尔巴尼亚，我们是要进行联合。”

这时，莫洛托夫插话说：“这就是吞并的意思！”

斯大林还做着刚才的那个手势，说道：“是的，是的，就是吞并。但是我们同意这样做，你们要去吞并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

整个谈话气氛，尽管使用了这种表达方式，还是真诚的和友好的。就连莫洛托夫说出那句吞并的话时，也表现出对他来说是少有的、半开玩笑的亲切语调。

和阿尔巴尼亚保持亲近的关系和进行联合的问题上，我是抱有诚恳的、当然是革命的动机。我和其它许多人一样，认为在阿尔巴尼亚政府确实是自愿的条件下，这个联合不仅给南阿两国带来直接的利益，而同时又会结束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传统的积怨和冲突。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一措施会把数量众多，居住集中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合并到阿尔巴尼亚去，那时他们就会已成为南阿联邦中的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南斯拉夫如果要解决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

除此之外，其它一切可能性都不现实，因为简单地把南斯拉夫这块领土连同那里的阿尔巴尼亚居民交给阿尔巴尼亚的做法，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会遇到不可抗拒的抵制。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不能对阿尔巴尼亚人要求合理的联合提出什么异议，况且我也曾向意大利提出给南斯拉夫人以同样的权利。对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我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它只能巩固我的这个想法：阿尔巴尼亚人，特别是北方的阿尔巴尼亚人，按其性格和生活习惯都特别象我所出身的门的内哥罗人，他们的生命力和维护自己民族传统的意志，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放弃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方针而去同意斯大林的观点。然而斯大林的话马上在我脑子里引起了两种想法：第一，南斯拉夫实行的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上出了差错；第二，苏联同波罗的海国家的联合问题实际上是前者吞并后者，莫洛托夫的话就是证据。

这两种想法汇合在一起，对我成了很大的思想负担。

也许，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政策方面确实有阐明得不太明确和执行得不完善的地方，但不管怎样，这完全不是“吞并”的行为。这时我脑中又出现了一个想法：也许这一政策不符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愿望，而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把他们的愿望和整个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愿望等同起来了。纳库为什么自杀了？与其说他是“庸人”和“民族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更象一个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也许，阿尔巴尼亚人也象我们南斯拉夫人一样，在同苏联的关系上，愿意保留自己国家的独立性？如果违背人民的意志，利用阿尔巴尼亚的孤立和贫困而实现联合的话，那么，这会不会导致不可挽救的冲突和困难呢？阿尔巴尼亚人是具有古老传统的一个整体，但作为一个民

族，他们还很年轻，所以他们才有这种不可抗拒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他们会不会把联合看成是失掉自己的独立性和放弃自己民族独特的风格和生活方式呢？

当我脑中出现第二个想法时——即苏联已经吞并了波罗的海的国家，我马上把这个想法和第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我在不断重复地确信：我们南斯拉夫人绝不能和阿尔巴尼亚通过这样的途径去进行联合。至于说其它什么帝国主义（如德国）要镇压阿尔巴尼亚，把他变成反对南斯拉夫的基地，这种危险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斯大林的话又把我拉回到现实进行的谈话之中。他说：“在您看来，霍查这个人怎么样？”

我避免给予直接和明确的回答。但是斯大林说出的意见恰好表达了南斯拉夫上层对霍查的看法，他说：“他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庸人，对吗？对，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在他们之中，大概最坚定的人是佐治吧？”

我对他提的这一问题的回答。

斯大林结束了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谈话，时间连十分钟都不到。最后，他说：“我们之间没有分歧，您亲自替苏联政府起草一份给铁托的电报，明天交到我这里来。”

我怕自己没有听懂，又问了一遍，他又重复让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起草一份给南斯拉夫政府的电报。

起初，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是对南斯拉夫关于阿尔巴尼亚政策的赞许的最高表示。但第二天我在起草这份电报时，我又想到：将来他们会不会利用这份电报反对我国政府。所以我谨慎和简短地只写了几句：“杰拉斯昨天抵莫斯科，在当晚会见中，双方认为，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这份电报并没有拍到南斯拉夫，但在以后的莫斯科同贝尔格莱德冲突中也没有被利用反对南斯拉夫。

其它问题的讨论也没有进行多久，而且也都是些次要问题，如关于共产党情报局设在贝尔格莱德，情报局的机关报，铁托的健康，诸如此类。

我趁机提出关于给南斯拉夫军队和军事工业提供装备问题。我指出，我们在同苏联代表接触中常常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借口“军事秘密”拒绝给我们这种或那种设备。斯大林站起来，喊道：“我们同你们没有什么军事秘密。你们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你们没有什么军事秘密。”

他走到办公桌旁边，叫布尔加宁听电话，简短地命令说：“我正在这里接见南斯拉夫客人——南斯拉夫代表团，你们应该立即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只进行了半小时，接着我们就乘车到斯大林别墅去参加晚宴。

（五）

我们乘坐的是斯大林的轿车，似乎还是那辆我曾和莫洛托夫在1945年坐过的那辆车。日丹诺夫坐在后边的座位，在我的右侧，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坐在我前排的折叠座椅上。途中，斯大林把玻璃隔板上的小灯开了^①，灯下面挂着一块怀表，我看时间是二十二点钟。他就坐在我的前面，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已经驼了的背，他那满是条条皱纹的老年人的后脖子卡在元

^① 苏联为高级领导装配的轿车上，在司机座位和后面座位之间，装有玻璃隔板，以便于首长们谈话时，不被司机听见。——译者

帅服坚硬的领子上面。我当时想：这就是我们时代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助手也都在这里。如果在我们身边有一颗炸弹爆炸，把我们炸得粉碎的话，那么这样的惨祸将会是多么轰动世界的事件啊！这是突然出现在我脑中的可怕的念头，它如此出乎我的意料，使我自己感到震惊不已，于是我怀着忧伤而同情的心，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位老爷爷，他的整个一生的精力，直到今天，都在关怀着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胜利和幸福。

为了等待其它客人的来临，斯大林、日丹诺夫和我在过厅的世界地图前面停了下来。我又一次看到用蓝铅笔勾出来的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又注意到我们目光所向，而我又一次发现，这使他愉快。日丹诺夫也看到我们交换了目光，并且插过来说：“这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开头。”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说。

据我记忆，当时斯大林正在地图上寻找哥尼斯堡，因为他想要把这个城市改名为加里宁格勒，我们的眼光在列宁格勒周围寻找，这一带的地名从叶喀琪琳娜时代起，都是用德文名字。斯大林不喜欢德文命名，他对日丹诺夫说：“都改过来，莫名其妙，这些地方怎么至今还用德文名称！”

日丹诺夫拿出一个小本子，用铅笔把斯大林的指示记了下来。

此后，我同莫洛托夫一起到地下室去上厕所，地下室有一个厕所，里面有几个马桶间和一排便池。莫洛托夫边走边开始解裤子扣，还说：“我们把这个称之为装货前要把旧货卸出去！”

我虽然长期坐过牢，监狱里的人们对有些事不怎么注意羞耻，但是我在莫洛托夫这位比我年长的人面前感到不好意思，于是我进了马桶间并把门关了起来。

然后，我们进了餐厅，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日丹

诺夫^①和沃兹涅先斯基^②已在那里等候着了。后边两个人在我的回忆录中还是新出场的人物。

日丹诺夫个子也不高，留着褐色的短胡子，前额很高，鼻子尖尖的，脸色红红的，一种病态的红润。他是受过教育的人，在政治局里算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认为，他虽然也具有人所共知的狭隘偏见和公式化等特点，但他的知识面却相当广泛。他虽然什么都懂一些，甚至包括音乐在内，但是我不觉得他在某一个科学领域中具有较渊博的知识。他是非常典型的唯智论者，他多方面的知识是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得到的。再说，他是一个无耻的文人，一个犬儒主义者，这就更令人讨厌，因为在这样的知识分子气质后面往往可以隐藏着一个对待从事文艺和思想领域工作的人们的态度似乎“宽厚”的暴君。那时正好是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文学和艺术领域问题决议的时候，也就是说，对在战争期间从官僚主义的党的监督下滑出来的最低限度的选择题材和形式的一点点自由遭到残酷冲击的时期。那天晚上，日丹诺夫讲了一个最新笑话，讲的是列宁格勒如何领会了他对作家左琴柯的批评，他说：这位作家的食物卡^③被收走了，一直到莫斯科出面干涉之后，收走食品卡的人

① 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丹诺夫（1896—1948），从1935年起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又选为正式委员。负责思想工作，在文艺创作中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针，负责战区反对西方文化影响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列宁格勒保卫战领导人之一。在创建共产党情报局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译者

②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大清洗运动中，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整个苏联经济计划和调整工作。1939年被任命为副总理。卫国战争期间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41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1948年为正式委员。194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中，因他写了一本有关经济政策的书，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逮捕入狱并被处决。——译者

③ 苏联食品卡和我国的粮、油票和副食品本相同。拿走了食品卡，就没有面包和其它供应了。——译者

才宽宏大量地还给了他。

沃兹涅先斯基是苏联计委主席，他年纪不大刚过四十岁。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一头金色的卷发，有着突出的颧骨，高高的前额。他给人的印象是穿着整洁，有文化修养，说话很少，性格内向，他总是愉快地微笑着。我在战争期间读过他写的关于苏联经济问题的著作，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作者是一个严肃而深思熟虑的人。后来这本书在苏联受到批判，沃兹涅先斯基从肉体上被消灭了，其中的原因至今还不清楚。

我相当熟悉沃兹涅先斯基的哥哥，他原来是大学教授，当时正好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的教育部长。

1946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斯拉夫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同沃兹涅先斯基的哥哥之间，有过非常有意思的争论。我们共同得出一个结论：被官方承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狭隘和片面的。在另一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更是不谋而合的，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确切些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后，正在出现一些新的现象，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还没有研究过的一些新变化。他那漂亮而聪明的脑袋大概是在疯狂的清洗中被砍了下来。

晚宴一开始，不知是谁，可能是斯大林本人建议让每个人都猜猜当时的气温是在零下多少度，然后作为惩罚，错说了多少度就得喝几杯酒。我幸亏在饭店里看了温度表，又因夜里温度下降所以又减下了几度，因此只错了一度。记得贝利亚说错了三度，还说这是他故意说错的，这是为了想多喝几杯酒。

晚宴这样开始，使我的头脑中出现了异端的想法：即这些关在自己小圈子中的人们，还可以为了多喝酒想出其它一些毫无内容的借口，例如猜什么餐厅有多长，桌子有多重，等等。

鬼知道，他们也许确实已经这样做过了。象这类用猜测温度而决定喝酒数量的做法，使我马上想到，这些拥簇在他们年老的领袖周围并决定着人类命运的苏联上层人物的生活是多么脱离人民，多么空虚和多么贫乏。我还回想起，俄国的沙皇彼得大帝也曾经和自己的近臣们举行过类似的宴会，他们也是尽情地大吃大喝，直到醉滥如泥，不省人事的程度，并且在他们的宴会上决定着俄国及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宴会过程中我始终摆脱不了这种生活空虚的感觉，尽管我自己总想不去考虑它。斯大林的衰老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虽然我尊重他，热爱他，而且我还在不断地培养自己对他的这种感情，然而我无法从我的头脑中驱出我的异端的想法。

我觉得他的衰老中，有某种悲哀和病态的因素。

然而这悲哀是看不见的，这是因为我想到连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会衰枯、殒死而感到悲哀。至于病态的因素在他身上是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来的。

斯大林早年就好吃好喝，可是现在他表现的贪吃的样子，仿佛是害怕他再也得不到那些他喜爱的美食佳肴似的。但酒喝得少了，他谨慎到似乎喝每一口酒时都在考虑是否会危害他的健康。

他思维能力的衰退更加明显。他总是喜欢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西伯利亚流放、高加索的童年等等。谈到一些眼前新事物时，总要和往事联在一起进行比较，例如说：“对，记得过去也有同样的情况……”

这两三年中，他的变化实在太太，简直使人无法理解。我在1945年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个灵活喜动的人，思想活跃而新鲜，具有幽默感。那时战争正在进行，虽然，斯大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战争上面，紧张到了极点，已经

把它用尽了。现在那些毫无内容和平庸的玩笑会引起他发笑，而我讲的一个政治笑话，说的是斯大林如何让丘吉尔和罗斯福上了当的故事，他根本没有听懂，而且还象一般老年人那样生气了。我看出，在座的人都感到窘促和有些难为情的样子。

只有一点没有什么变化，他还是那个粗暴、尖刻、多疑的斯大林。他连莫洛托夫的话也要打断，可以感觉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了。所有的人都奉承他，在他尚未表态之前每个人都避免谈出自己的意见，他一旦表了态，就都急忙地表示赞成。

和过去一样，谈话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上。我的回忆也只能按这个方式来安排。

斯大林提到原子弹时说：“这是很厉害的东西，厉害呀！”他的脸上露出赞叹的神情，这神情明显地表示：他在没有得到这个“厉害的东西”以前是不会甘心的。但他没有提到苏联是否已有原子弹，或正在研制的过程中。

原来，当一个月后我和卡德尔见到季米特罗夫时，他保密地告诉我们，俄国人已经有了原子弹，而且比美国投到广岛的那颗原子弹还厉害。我现在想，季米特罗夫的话与事实不符，俄国人当时还处在研制原子弹过程中。不过，既然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就如实也写在这里。

当天夜里和后来在接见保加利亚代表团时，斯大林都讲过，德国的分裂状态要持续下去：“西方要把西德搞成他们那个样子，我们要把东德建成我们这样的国家！”

他的这一思想是新的，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还来自苏联对东欧的整个方针。1946年夏天，斯大林和其它苏联领导人在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面前宣布整个德国应该是我们的，也就是说是苏维埃的，共产主义的。这一声明我是不理解

的。当时我问了一位在座的同志，我说：“俄国人打算怎样实现这点呢？”对方回答：“这点我也就知道了！”

我想，就是宣布这一声明的人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们不过是被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而且寄希望于西欧的经济及其它方面衰落和崩溃而忘乎所以了。

宴会快结束时，斯大林突然问我：“为什么在南斯拉夫党内犹太人很少，而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解释说：“在南斯拉夫，总的来说，犹太人不多了而且大部分属于中层。唯一杰出的犹太党员是彼雅杰^①，他自己认为他与其说是犹太人，还不如说是塞尔维亚人。”

斯大林回忆说：“彼雅杰？矮个子，戴眼镜？想起了，他来过我这里。他的职务是什么？”

我回答：“中央委员，《资本论》的翻译。”

他打断我的话，带着挑衅般的神情大笑起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没有犹太人！你们是反犹太主义者！杰拉斯，您也是反犹太主义者！”

他的话和他的笑当然应该按相反的意思去理解，我懂得这是他的反犹太主义的一种表示，同时也逼我表示自己对犹太人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犹太人问题的看法。我没有说话，只是笑。要我表态很容易，因为我从来都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我把共产党人只分为两类：好的和不好的。不过，斯大林自己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他已挑衅地提

^① 莫萨·彼雅杰（1889—1957）南斯拉夫的党的理论家。1920年南共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下党时候在工会中宣传共产主义工作，被捕入狱，被判处徒刑20年。服刑期间，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次大战时期和杰拉斯一起在门的内哥罗起义。战后任国民议会、后为联邦人民议会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联邦人民议会主席。他是南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五十年代病故。——译者

出了这一难以启齿的问题，也就感到满足了。

坐在我左侧的是沉默寡言的莫洛托夫，右侧是好说话的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谈起他同芬兰人之间的来往，以佩服的口气谈到他们交付赔偿物资时十分准确，他说：“交货准时，包装出色，质量优等。”他最后说：“我们犯了错误，没有占领这个国家，要是占领下来的话，那么，现在一切事都好办了。”

斯大林说：“对，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过分顾虑美国人会有反应，可是他们连手指头也没有敢动一下。”

莫洛托夫说：“哼，芬兰是一个不好咬的小胡桃！”

在这段时间里，日丹诺夫正在和音乐家在一起开会，要做出一个有关音乐的“决议”。他喜欢听歌剧，并且问我：“你们南斯拉夫有歌剧院吗？”

我对他的发问感到奇怪，我说：“南斯拉夫有九个歌剧院。”同时我在想：他们对南斯拉夫的了解实在太少了，看来，他们只把南斯拉夫当作地理概念才发生了兴趣。

日丹诺夫是唯一只喝桔子汁的人，他向我解释说，他有心脏病。我问他：“这种病的后果严重吗？”

他以他惯有的微带讽刺的口气微笑着说：“我随时都可能死掉，也可能活很长时间。”从他的表现，确实可以发现，他太容易激动，他的反映是神经质的，过分敏感的。

当时苏联新的五年计划刚刚通过，斯大林没有明确地、专门对谁地随便说了一句：必须提高教员工资。然后对我说：“我们的教员队伍特别好，但是他们的工资水平太低，必须想点什么办法。”

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这时我也想到我们南斯拉夫的教育工作者工资太低，生活条件太坏，而我们又无力帮助他们。

沃兹涅夫斯基一直不说话，他的举止一直象一个在长辈面

前的小字辈。斯大林对他只说过一次话：“有没有可能在计划之外给建设伏尔加——顿河运河筹出一部分资金来？这件事太重要！我们应该找出资金来！从军事观点看，这件事也很重要，万一打起仗来，我们有可能被挤出黑海，因为我们的海军力量太弱，而且还长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那么，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呢？你们想想，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如果我们有了这条运河，那么我们黑海舰队就可以开进伏尔加河，那时海军的帮助有多大呵！所以这条运河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沃兹涅夫斯基同意要找出资金，拿出小本子，记下了。

我早就对两个问题（这几乎是我个人感兴趣的问题），很想知道斯大林的看法。

一个是理论问题：即无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还是在其它书籍中，我没有找到对“人民”和“民族”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的解釋。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党人中间早就被看作是民族问题的专家，所以我询问他的意见，并且还补充说，在他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中也没有说这个问题。那本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的，从那时起，大家公认，这就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点。

对我的问题，首先回答的是莫洛托夫：“人民和民族是一个概念。”

但是斯大林反驳说，“不对，瞎说！这是不同的概念。”并解释道：“民族，这是大家所知道的概念：是具有某种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而人民是特定民族的劳动人民，也就是说，有着共同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劳动者。”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他说：“这是伊里奇的观点，这本书是他校定的。”

另一个问题和陀斯妥也夫斯基有关系。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在许多方面把陀斯妥也夫斯基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的作家，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攻击。

斯大林的回答很简单：“他是个大的作家，也是个大的反动派。我们不出版他的著作，因为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坏，但他是个大作家！”

我们的话题转到高尔基。我说，我认为无论从方法还是从反映俄国革命的深度来说，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不谈方法问题，说道：“不对，他的最优秀作品是早期写作——《奥库罗夫小城》、他的短篇小说和《福马·高尔杰也夫》。至于反映俄国革命问题嘛，那么在《克里姆·萨木金》这本书里没有写革命，书中只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叫什么来着？柳蒂科夫还是柳托夫？”

我改正他说：“库图佐夫。柳托夫是另一个人。”

斯大林继续说：“对，库图佐夫！革命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十分片面、非常不够，就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他的早期作品也强得多。”

我已经很清楚，斯大林和我彼此都不了解，我们的爱好、情趣也太不一样了。我过去也听过一些大作家的意见，他们和斯大林一样，认为斯大林指出的那些作品是高尔基的最优秀的著作。

在谈到苏联现代文学时，我也或多或少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也认为肖洛霍夫最好。斯大林说：“现在有比他好的。”并说出两个人的姓名，其中有一个是女作家。

关于法捷耶夫的《青年进卫军》一书的争论，我避而不谈。当时开始批判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党性不强，而我对本书的批评恰好相反。我认为太公式化、太肤浅、太平庸。我对亚历

山大罗夫的《哲学史》也是持这种看法。

日丹诺夫讲了一下斯大林对康·西蒙诺夫爱情诗的评价，斯大林说：“这诗只要打印两份就够了——一份给她，第二份给他！”斯大林声音嘶哑地笑着，其它的人都跟着大笑起来。

晚宴上少不了贝利亚的下流的玩笑。他们逼我喝了一杯胡椒酒^①。贝利亚咧开嘴笑着说，这种酒对生殖腺有不良反应，他还用最粗野和下贱的话形容了一番。在贝利亚讲话过程中，斯大林仔细地看着我，正要大笑起来。可是当他看到我那副不耐烦的样子，他的表情也严肃起来。

就是不出此丑行，我也摆脱不了要把他同贝尔格莱德的王国警察局的警察署长乌伊科维奇相比较，他们是如此相象，使我简直感到自己已被乌伊科维奇——贝利亚的肥大而湿冷的魔掌抓住了。

我觉得在这长达六小时的晚宴上，最重要的是围绕着谈话内容（不管与谈话有关与否）的那种气氛。在大家所说的话的背后，总是感到有着什么更为重要的内容，某种必须讲出来，但大家谁都不会也不敢讲出来的事情。那种拘谨谨慎的谈话方式，对所谈的话题的精心选择更加使你感觉到这些内容，仿佛这些没有讲出来的话，人们是都可以听得见了。我的心里已经准确无误地知道这一内容：即他们对铁托和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要把我拉到苏联政府方面去。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最突出的是日丹诺夫，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氛，表现在和我谈话时流露出来的那种真挚亲密的关系。贝利亚用他的大青蛙式的半睁着的眼睛看着我，一种自我满意的嘲笑的表情一直挂在他那四方的肉乎乎的嘴唇

① 一种用胡椒浸的白酒，通常是为治感冒用的。——译者

上。而在这一切人和事的上面屹立着斯大林——殷勤周到、非常稳重的和非常冷酷的斯大林。

话题和话题之间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我内心的紧张和在我周围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了。我很快就选好了防御策略，显然在这以前这种策略在我的脑子里已经下意识地形成了：我准备直截了当，非常简单地对他们说：我看不出来，南斯拉夫和苏联领导人之间有什么分歧，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诸如此类……我虽然在关键时刻从来没有动摇过，但现在一种强烈而固执的对抗情绪冲击着我的心。我有自知之明，如果斯大林和其它人逼我作出道德上的选择：要他们还是要自己的良心，具体表现为要他们的党还是要我们的党，要南斯拉夫还是要苏联的话，我很容易从防御状态转到进攻状态。为了事先掌握主动权，我几次好象是无意地提到铁托和南共中央委员会，但我提时特别有分寸，使对方难以开始自己的谈话。

斯大林拿出了拉私人关系的拿手好戏，但这是徒劳的。他想起1946年他曾托铁托邀请过我来苏联养病，于是问我：“您为什么没有来克里米亚？为什么拒绝了我的邀请？”

我对这个问题是有所准备的，但对斯大林没有忘记此事我又一次感到不快和奇怪。我解释道：“我本来等待苏联大使馆发出邀请，我觉得冒昧地从命给您添麻烦是很不便的。”

斯大林继续考验我说：“那里的话，有什么麻烦呢？是您自己不愿意来！”

我退回我的堡垒，——冷静地克制着自己，缄默着。

就这样，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斯大林和他的那一伙冷酷而善于暗算人的阴谋家（我确实把他们看成是这样的人）无疑已感觉出我的反抗。而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正是如此。我避开了他们，他们也没有敢激起我的反抗。他们当然认为，他们没

有预先安排好就摊牌当然是走错了棋。我却识破了他们可耻的把戏，我感觉到内心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如此巨大，它甚至于可以抛弃我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一切。

晚宴以斯大林举杯建议为纪念列宁而干杯结束的。他说：“为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我们的一切，干杯！”

我们都站起来，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干了杯，我们这些醉意朦胧的人们很快把这一气氛忘记了，而斯大林脸上的表情还是那样激动、庄严，而同时又是那么阴沉。

在我们宴毕回去之前，但已离开餐桌时，斯大林打开了一架巨大的自动唱机。他还企图跳个高加索舞，看得出来他的节奏感还不错，但他很快就停下来不跳了，并苦恼地说：“老了，我已经是老头子了！”

他的助手们（暂不称他们为近臣）都来安慰他说：“不，不，您怎么能这么说！您的气色很好，您的举止动作都还很健壮，真的，象您这样的年纪……”

后来斯大林又放一张唱片，花腔女高音的颤音是用狗的吠叫声伴唱的。他狂喜不已，哈哈大笑，高兴极了。当他发现我的惊奇和不满的表情时，他仿佛表示歉意似地解释道：“不，这花招想得很有点聪明，有点鬼聪明。”

我走时，大家还都留在那里，但也已经准备动身回家了。的确，在这么长的宴会之后，一切的话都说尽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没有讲为什么要举行这个宴会！

（六）

没有过两天，我们被叫到总参谋部去谈谈我们有什么愿望

和要求。

还在火车上我就提醒科查·波波维奇和米埃尔卡·托多罗维奇，依我看，他们提出的要求过高，很不实际。我特别不能想象，如果俄国人连建立民用工业都不愿意认真帮助我们，他们怎么会同意帮助南斯拉夫建立军事工业呢？要求援助我们海军舰队，我们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海军舰队，他们自己还没有呢。要是说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统一体，部署在亚得里亚海的舰队是苏联的还是南斯拉夫的，都无所谓，——这一道理是说服不了我的，因为恰好在这个团结一致的背后有着很多裂痕，更不用说，苏联政府对一切不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都不信任，而且很明显，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本国利益。然而，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愿望，贝尔格莱德已经审查和批准了，我无奈，只好支持他们。

主持这次会谈的是布尔加宁。出席会谈的有高级军事顾问，包括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①元帅。

首先，由我概括地谈了我们的需要，然后由托多罗维奇和波波维奇作了具体补充。

苏联代表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仔细询问了我们的具体要求，并都一一记下来了。

总参谋部是一座外表简陋的大楼，它的缺陷试图用豪华的装饰品、镀金设备和漂亮的窗帘弥补起来，但于事无补，效果不大，我们离开这座楼时非常满意，确信，我们的事情已开了头，不久，真正的具体工作即将开始了。

表面上也是如此：不久，托多罗维奇和波波维奇被叫去参

^① 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苏联元帅。1945年2月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员，同年6月任这支军总司令员，1950—1953任苏联陆军部长，1953年以后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译者

加各种会议。可是，形势又起了变化，一切都停止了，苏联代表告诉我们，“出现了复杂情况”，因此必须等待一下。

我们已经明白：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们也并不感到奇怪。不管怎样，把谈判拖下去，只能使我们对苏联现实及对莫斯科跟贝尔格莱德的关系问题上持更加强烈的批判态度。况且，我们没有工作了，所以不得不把时间消磨在各种晚会和莫斯科古老的但是第一流的戏院里。

任何苏联公民都不敢来拜访我们，因为我们虽然来自共产主义世界，但还是属于外国人的范畴，而苏联的法律规定，苏联公民不得接触外国人。我们的一切接触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这使我们非常恼火和感到受了耻辱，因为在南斯拉夫并没有这些限制，对苏联的代表和公民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也迫使我们对他们做出应该持批评态度的结论。

我们的批判还不是综合性的，只是由许多具体事例组成的。伏克曼诺维奇——捷姆波发现苏军的官兵宿舍缺点很多就公开提了出来。科查·波波维奇和我因在莫斯科饭店住单人套间太寂寞想搬进一套两人住房间，但在一位“电工”来把这套房子收拾一番之前，不让我们搬进去。我们这才明白了，他是在安装窃听器。莫斯科饭店虽然是一座新盖的最大的饭店，但里边的设备总是出故障：房间很冷，水管漏水，从东德运来的浴盆不能用，因为下水道不通，水都流在地板上。浴室没有钥匙，这成为科查·波波维奇开心的借口，按他的说法，建筑师懂得，钥匙可能被丢失，所以把浴盆放在门边上，使洗澡的人能用脚顶住门。我常以留恋的心情，回想我在1944年住在“大都会”饭店小房间的情景。那里的设备虽然陈旧，但很结实和好

用，保管得好，上了岁数的工作人员会说英语和法语，待人有礼貌，态度和气。

有一次我听见浴室里有人发牢骚，我一进去，看到两个工人，一个工人在修理顶棚上的电线，他站在另一个工人的肩膀上。

我问：“这是怎么搞的，同志们！为什么不搬个梯子来？”

工人埋怨说：“我们向管理处提了多次想要个梯子，意见都白提了，我们就一直这么凑合着干活，真受罪！”

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发现“美丽的莫斯科”的大部分是闭塞的大村庄，无人管理也没有建设。我们的司机姓潘诺夫（我从南斯拉夫给他带来一块手表送给了他作纪念，我们之间建立了友谊）。他怎么也不相信，纽约和巴黎的汽车会比莫斯科多，但他对苏联的新型轿车质量不好也表示不满。

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参观沙皇的陵墓^①时，一位导游的姑娘带着民族自豪感滔滔不绝地讲“我们的沙皇”。俄国人的优越感处处都表现出来，而且是以一种畸形和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就这样，我们每走一步，都发现苏联现实生活中我们前所未见过的情景：落后、原始、沙文主义、大国主义，与此同时，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们正在力图克服这些缺点，使各方面都能转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的超人的英雄气概。

因为我们知道，在苏联领导人和政治机构顽冥不化的头脑里，任何小小的批评意见都立即被看成是出自反苏的立场，所以我们自然不去接触俄国人，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又由于我们是负有政治使命来到这里的，所以我们之间也互相提醒

^① 俄国沙皇和名人如普希金等人的大理石的灵柩都安放在教堂里，实际并非陵园。——译者

不要有什么“不妥”的行为和“不慎”的言论。我们处在这种被隔离的状态中，于是我们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来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记得，我们为了对付窃听器开始注意自己在饭店和办公室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谈话时总是开着收音机。

苏联代表必然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同他们的紧张关系和互不信任的气氛逐渐增加起来。

这时列宁的水晶棺从外地运回来了，战争期间把它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天早晨我们也去瞻仰列宁墓。本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瞻仰本身又激起我们一种新的前此未有的恶感。在我们缓缓地走下陵墓时，我看见一些戴着头巾的普通妇女在胸前划十字，仿佛她们来了圣者的木乃伊^①的前面似的。不过，我自己也仿佛被一种从少年时代已被遗忘的神秘的感情控制着。况且，周围的一切布置——花岗石的结构、肃穆笔直的哨兵、投到列宁身上的看不见从何处来的微弱的光线，以及列宁的遗体本身，已经干枯、白得象石灰一样，头上有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似乎是人为地贴在上面去的——一切都给予人们的正是这种神秘的感觉。尽管我对列宁这位天才异常尊敬，但在列宁的遗体旁边造成的这种神秘气氛，在我看来，则是很不自然的，而主要是反唯物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

当时，如果我们就是忙得不可开交的话，我们也想去看看列宁格勒，这个美丽的革命城市。为此我拜访了日丹诺夫，他欣然同意我们去列宁格勒参观。不过，我也注意到他仍然很拘谨，会见的时间还不到十分钟。虽然如此匆忙，他也没有忘记问我对季米特罗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有关他去布加勒斯特

① 东正教的大主教死后封为圣者、圣徒，将其尸体做成木乃伊放在一个木盆子里，基辅这种教习尤甚，基辅大教堂的地下室里存放着许多这样干尸体，朝拜的信徒们在尸体面前划十字。——译者

访问时发表的声明有什么想法。在季米特罗夫这次去拜访期间，他提出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协调工业计划和建立关税同盟的主张。我说，我不喜欢他这个声明，因为他过早地和孤立地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确定下来了。日丹诺夫对这一声明也不满意，可他未说出原因，但不久这一原因暴露出来了，我在后边还要专门讲这个问题。

大约在这时南斯拉夫的一位外贸部代表波格丹·茨尔诺勃尔尼亚也来到莫斯科。他同苏联有关机关谈判时，主要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他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去找当时的外贸部长米高扬。^①

米高扬接见我们时，态度冷冰冰的，很不耐烦。我们的要求之一，是希望俄国人把他们答应交给我们的那些留在他们占领区的火车车厢，这些车厢中许多是从南斯拉夫拉走的，而俄国人反正也因为苏联的轨道比我们的宽，无法使用。米高扬问我们：“你们考虑过没有，按什么条件，什么价格我们把这些车厢交付给你们？”

我回答说：“很简单，你们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

他简单明确地说：“我管的不是送礼，我管的是贸易。”

我和茨尔诺勃尔尼亚坚持要修改关于出售苏联影片的协定，因为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协定，对南斯拉夫非常不利。我们的努力也失败了，米高扬借口说，东欧国家也会以此为先例来修改协定，所以，断然拒绝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① 阿那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1895—1978），亚美尼亚共产党人，他在长期担任苏联对外贸易和食品工业部长期间，表现了非凡的才能。1926年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为正式委员。1937年以来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据许多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回忆时反映，他与大清洗关系最少，对他也印象不错。斯大林死后，他一贯支持赫鲁晓夫。世界舆论公认他是“明智的共产党人”，1958年访问之后，在西方博得了很高的声誉。——译者

然而，当谈话转到出售南斯拉夫铜矿问题时，他的态度马上变了，他表示愿意预付任何数量的外汇或实物购买我们的铜。

我们的谈话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只是把毫无效果，漫无止境的谈话继续下去而已。很明显，驶往南斯拉夫方面的苏联机器的轮子已经刹车了。

列宁格勒之行，使我们觉得轻松一些，给我们以一种新鲜的感觉。

在访问列宁格勒之前，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能超过南斯拉夫起义地区和游击队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的事物存在。然而列宁格勒超过了南斯拉夫的革命实践，如果说按其英勇气概没有什么超过的话，那么按其集体牺牲精神方面肯定是超过了南斯拉夫的。在与后方切断了供应和联系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没有燃料和食物，继续处于重炮的轰击和飞机的不断轰炸之下，在1941—1942年这一个冬天冻死和饿死的达三十万人之多，人们饿得以人肉充饥，却毫无投降的念头。但这只是一般的情况。

当我们直接接触到了现实，即接触到牺牲精神和英勇气概的具体事例，会见了参加过或目睹过那场战争的幸存者时，我们才感觉出列宁格勒这篇史诗的伟大，才能感到人类——俄罗斯人民当他们的精神生活、国家及其整个生存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作出多么伟大的奇迹。

我们和列宁格勒领导人见面时，我们怀着无比钦佩的心情，还感到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上的温暖。他们大部分都是朴实的、有文化教养的、勤恳、努力工作的人，他们曾经经历了这个城市的伟大的悲剧，而且直到今天在他们的心中还蕴藏着这场悲剧的伟大精神。他们生活比较单调，所以对来自另一个国

家，带来另一种文化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欢迎。我们很快而且很容易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因为我们都是有过相同命运的人。我们根本没有想在他们面前埋怨苏联领导人，但我们发现，这些人处理和对待他们管理的这个城市及居民的生活问题的态度，比起莫斯科来，更真诚，更合乎人情。

在我看来，我会很快地同他们找到共同的政治语言，因为我们很快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当我在两年后知道这些人也未能逃脱极权主义的残害时，我的确没有感到突然，他们仅仅因为敢于作个真正的人而未能摆脱这样的命运。

在我们愉快而令人悲伤^①的列宁格勒旅行中也有不愉快的插曲——陪同我们旅行的列萨科夫是一个十分讨厌的人，苏联那时还有不少出身于工人及来自其它基层的干部。观察一下列萨科夫吧！他文化水平低，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可以判断：他不久前还是一个普通工人。如果 he 不想掩盖自己的这些缺点，而且不去想完成那些他力所不及的任务的话，那么这些缺点也算不了什么大毛病。实际上，他确实不是靠自己的本领和智慧被提拔上来的，而是从基层被硬调进中央机关来的，并被分配管南斯拉夫事务。他既是一个谍报人员，又是一个党务干部。他以党的工作人员的身份非常愚蠢而笨拙地搜集有关南斯拉夫及其领导人的情报。

列萨科夫个子不高，脸上有许多疙瘩，牙齿黄而小，领带结得歪歪斜斜的，衬衣总是放在裤子外面，他特别怕别人说他没文化。如果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不是官居要职，不总是挑起我们（主要是我）同他进行不愉快的辩论的话，那

^① 这里指列宁格勒战后的悲惨的情景。——译者

么，人们对他还是会有好感的。他夸口说，“日丹诺夫同志已把所有的犹太人从中央机构里清洗出去了”，可是同时又赞扬当时几乎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匈牙利政治局。我想，苏联领导虽然暗地里反对犹太主义，但是在苏联看来，对匈牙利来说，那些在匈牙利人民中间没有扎下根的人是最合适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完全服从苏联领导人的意志。

我们已听说而且自己也发现，当苏联当局想要除掉某一个人，然而又没有充分理由时，通常的办法是通过情报人员把有损某人名誉的事散布出去。列萨科夫有一次“保密地”告诉我，米可夫元帅之所以被贬职是因为他在柏林收罗了许多珍宝。他说：“您要知道，斯大林同志不能容忍不道德行为的！”关于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他说：“您想想看，已经发现，他是出身于犹太血统！”

非常明显，列萨科夫虽然很不聪明，但他很了解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关系和我们中央的工作方法。他说：“任何东欧党的上层里，没有象你们党那样的一个善于团结合作的四巨头。”

他没有说出这四个人的名字，但我是知道的，他指的是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和我。我半信半疑地在想：也许这“四巨头”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也是一颗难咬的胡桃吧！

（七）

眼看一天一天白白地过去了，无事可做，科查·波波维奇决定先回国，让托多罗维奇留在莫斯科听结果，就是说等待苏联领导什么时候开恩——恢复谈判。我本也想同波波维奇回

去，但是贝尔格莱德通知我，卡德尔和巴卡里奇^①要来莫斯科，要我和他们一起参加同苏联政府就有关“已形成的困难局势”进行谈判。

卡德尔和巴卡里奇于1948年2月8日（星期日）抵莫斯科。苏联政府本来邀请了铁托，但是贝尔格莱德推托说铁托身体不适——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两国之间互不信任的气氛——所以派卡德尔来。与此同时，也邀请保加利亚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来苏，这一消息当然是那位列萨科夫告诉我的，他还故意强调说，保加利亚派来的是“大头头”。

此前不久，1月29日的莫斯科《真理报》表示不能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措施，并声明和他的有问题的、臆想出来的联邦和邦联以及“关税同盟”断绝一切关系。这是一个警告，是苏联政府将要采取更加强硬方针和某些具体措施的预兆。

卡德尔和巴卡里奇被安排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因此我也搬到他们那里去了。当天夜里，卡德尔的妻子已经睡了，卡德尔也睡下了，我坐在他的旁边，尽可能低声地把我来莫斯科后的印象以及同苏联领导接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的总的印象是：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给予我们什么真正的援助，我们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苏联政府力图将南斯拉夫置于被占领的东欧国家的地位。

卡德尔这时（也许是刚抵莫斯科时）告诉我，同莫斯科争论的直接导火线，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政府之间已达成关于南斯拉夫两个师进驻阿尔巴尼亚的协定。这两个师已经

^① 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1912—）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1933年学生时代参加南共地下党，1934年被捕入狱，判处三年徒刑。1941年参加游击队。第二次大战后任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理。1946年为出席巴黎和平大会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现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译者

组建完毕，南斯拉夫的空军一个团已经进驻阿尔巴尼亚，这时莫斯科表示坚决反对，而且根本不愿意听我们对进驻理由的解释，我们告诉苏联：南斯拉夫两个师所以进驻阿尔巴尼亚，是为了一旦希腊的“保皇法西斯分子”进攻阿尔巴尼亚时，用以保护阿尔巴尼亚的措施。莫洛托夫在致贝尔格莱德的电报中，竟以将发生公开冲突相威胁。

派遣两个师的做法，我是完全不赞成的，这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于是我问卡德尔：有什么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他说，他也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没有参与此事。

我不能相信这种发了疯似的说法：即南斯拉夫的两个师是应恩维尔·霍查的要求进驻阿尔巴尼亚的。这完全是莫斯科教唆霍查这样干的，以便找到借口给南斯拉夫政府加上帝国主义阴谋扩张的罪名。我这样说完全不是为了减轻霍查后来对待自己同志和本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和残暴的丑恶行为的责任。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怎样解释它是另一回事，我们应该保留实事的本来面目。

南斯拉夫的两个师进驻阿尔巴尼亚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但我认为，他们的态度并不是真诚的，但今天具体分析此事件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当时已经被破坏了的南苏关系的背景，而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当时的贝尔格莱德同地拉那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我和卡德尔在公园散步时，我受到苏联谍报人员的监视，但他们无法窃听到我们的内容，所以满面愤怒。我和巴卡里奇一起继续和卡德尔讨论，这次谈话我们谈得更加详尽，内容也更广泛、深刻，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尽管我们在得出结论时有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但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我和往常一样，还是主张作出更坚决和果断

的反应。

在1月10日以前,苏方没有任何表示和动作。10日晚上9点钟,他们派车把我们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大楼里。我们在那里等候保加利亚人——季米特罗夫、科拉洛夫、科斯托夫^①约十五分钟左右,他们一到,我们就都被带去见斯大林。

苏方代表是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②、佐林^③,他们坐在斯大林的右侧,保加利亚代表科拉洛夫、季米特洛夫、科斯托夫坐在斯大林的左侧,我们——卡德尔、我、巴

① 特立伊乔·科斯托夫(1897—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曾任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虽然他是一个反铁托分子,但持有“首先考虑保加利亚利益”的观点。1949年3月被解除职务,同年12月被起诉。曾因在审判时翻案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后被处决。——译者

② 米哈依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1902—1981),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两枚社会主义劳动勋章、四枚列宁勋章、一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的获得者。1921年入党。出身于农民家庭。1918—1920年从事贫农委员会的活动,以后在青年团工作。1928年在莫斯科经济学院毕业,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经济。毕业后在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经济学院任教。曾积极参与大清洗活动,特别是反对布哈林反对派的斗争。1931—1934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35年以后在罗斯托夫·斯塔罗波尔等区的区委书记(区等于我们的省)。卫国战争期间在高加索北部军区司令部工作。1944年任立陶宛共和国中央政治局主席。1946年调入苏共中央工作。194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9—1950年兼任《真理报》总编辑。此后历任苏联外交委员会主席(1954)、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自1955年起)。赫鲁晓夫时代支持过赫鲁晓夫,为权威人士,被苏联称之为理论家,共运专家,国际事务活动家等。死前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译者

③ 瓦列里安·亚力山大罗维奇·佐林(1902—),苏联外交官。历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1941),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5—1948),外交部副部长(1948)和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1956—1958)。1960年以后为苏联联合国常任代表。1965年任苏联驻法国大使。从1974年起任苏联外交部特命大使,苏共20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22大和23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三次曾获列宁勋章及三次曾获其它勋章。——译者

卡里奇——坐在苏联人的右侧，斯大林坐在首席的座位上。

当时，有关这次会见，我曾经向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写了报告，但是今天我无法查阅这份报告，只好根据自己的回忆和有关这次会见公布的材料，把当时情况写下来。

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照例简短地说明，在以苏联政府为一方以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政府为一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从党的或国家的观点上看无论如何这是不能允许的。

他们举出下面的例子，用以说明分歧的所在是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之间签订了友好条约。然而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它的观点：即在同保加利亚没有和苏联签订和平条约之前，保加利亚不应与它国签订任何条约。

本来莫洛托夫还想详尽地讲一讲季米特洛夫在布加勒斯特发表的有关成立东欧各国联邦的声明（季米特洛夫在他的声明中还提到包括希腊在内），以及他讲话中谈到的成立关税同盟和协调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工业计划等问题。但是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过于感情用事了，随心所欲讲了许多话。他的讲话，铁托的讲话，在西方都被认为是在我们同意后讲的。比如说：波兰人曾来我们这里访问。我问他们，有关季米特洛夫的声明，你们有什么想法？他们说，是件好事。我告诉他们说：这不是一件好事。这时他们才说，如果苏联政府这样认为，那么他们就持同样的看法：这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原来以为，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是得到苏联政府同意的，所以才表示赞同这一声明。季米特洛夫后来想通过保加利亚通讯社更正一下他的这一声明，可是他已经什么也无法更正了。这还不算，他还举一个例子说，过去奥匈帝国阻挠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建立关税同盟，这就使人们很容易想到：过去的

阻力是德国人，而现在的阻力则是来自俄国人。问题就在这里！”

莫洛托夫继续说，保加利亚政府要同罗马尼亚建立联邦的事，事先并没有和苏联政府商量一下。

季米特洛夫想缓和一下所涉及的问题，他强调说，他不过是泛泛地提过建立联邦的事，但并不具体。

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不对，你们已经就关税同盟及协调工业计划问题达成了协议。”

莫洛托夫补充说：“成立关税同盟和协调经济计划意味着什么呢？这不就是建立一个国家吗！”

当时，虽然没有人把问题的结论说出口来，但会见的实质性问题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即“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任何关系，如果不符合苏联政府的利益和未经苏联同意，这些关系是不能发展的。显而易见，在具有大国主义思想的苏联领袖们的概念中，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而且总是提醒人们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红军解放的。对他们来说，季米特洛夫的声明和南斯拉夫的缺乏纪律性和具有自主精神不仅是异端行为，而且是渎犯了他们“神圣”权利的举动。

季米特洛夫想要解释和辩护一下，但斯大林总是打断他的话，不让他把话讲完。

这就是斯大林的本来面目，他的机智变成恶毒的粗暴，他的固执变成毫无调和之余地。这时他还是克制着自己，不要使自己狂怒以至不可收拾。他始终没有丧失掉现实感，在责骂保加利亚人时，他知道就是不谴责他们，保加利亚人在他面前也是唯命是听的，所以他责骂的真正目标是南斯拉夫人，如俗话说：骂女儿是骂给媳妇听的。

季米特洛夫在卡德尔的支持下指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

在布莱德没有宣布保南已经缔结了一项条约，而是宣布双方谈话将导致签订一项条约的协议。

这时斯大林喊道：“是这样，可是你们并没有同我们商量！我们是从报纸上才知道你们的这些勾搭的！你们如同大街上的娘儿们一样，满嘴胡说八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新闻记者马上就抓住了而且如获至宝！”

季米特洛夫继续为他们同罗马尼亚建立关税同盟辩解道：

“保加利亚的经济困难实在太太，如果没有同其它国家的亲密合作就无法发展下去的。至于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的确我是说得过了头了，这也是事实。”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您是想标新立异，一鸣惊人！您完全错了，你们的联邦是不可思议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有什么历史联系？一点也没有！更不必说保加利亚同匈牙利和波兰的联系。”

季米特洛夫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他说：“在保加利亚和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斯大林顽固地、毫不留情地说：“区别很大！这有什么可隐瞒的！列宁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承认错误并且要尽快消灭这些错误。”

季米特洛夫用一种和解、几乎是屈从的口气说：“是的，我的确是错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些错误，可以学习到如何处理对外政策，并取得教训。”

斯大林尖刻地嘲笑他说：“学习！搞了五十年政治，才想起纠正错误！你的问题并不在错误，而是立场问题，你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不同。”

我斜着眼睛看了季米特洛夫一下：他的两耳通红，在他脸上生有金钱癣的地方出现大块大块的红晕。他稀少的头发乱

了，那一缕缕的头发贴在他那满是皱纹的脖子上。我非常同情他。这位“来比锡审判案的巨狮”^①曾经在戈林和法西斯主义不可一世的时候，向他们进行坚决的回击，揭露他的诬陷。现在却落到如此垂头丧气的地步。

斯大林还继续说：“关税同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联邦，这都是胡闹！至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联邦那是另一回事，这些国家之间有着历史的以及其它方面的联系。这个联邦可以建立，而且越快越好。是的，越快越好，如果可能，明天就建立起来！是的，明天！现在我们就马上讨论这个问题。”

不记得是谁，可能是卡德尔，说建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联邦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斯大林更确切地说：“不好，首先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然后保南两个国家再同阿尔巴尼亚建立联邦关系。”

接着他又补充说：“我们认为，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都应该建立联邦。”

争论一时平静下来了。

斯大林再也没有发挥他的有关建立联邦问题的思想，他后来仅仅几次重复说，要立即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联邦。根据他的上述观点及当时苏联的外交官员的某些隐约可见的暗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联领导人当时正在考虑改组苏维埃联邦的计划，确切地说，即把“人民民主国家”囊括进它的版图：乌克兰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合并，白俄罗斯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合并，巴尔干国家在当时的条件

^① 指1933年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当时季米特罗夫被诬陷入狱，但他在法庭上以共产党人大无畏的气概，向全世界揭露了“国会纵火案”的目的及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罪行。——译者

下，完全可以参加进俄罗斯联邦！不管这些计划是多么隐蔽，如在雾中，抑或纯属设想，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斯大林正在为东欧国家选择一种解决的办法和组织形式——以便他们能够长期和牢固地处在莫斯科的统治和霸权控制之下。

就在这关税同盟和保罗条约问题似乎已告结束的时候，科拉洛夫老头子忽然想起了什么重要问题似的发了言，他说：“我看不出，季米特洛夫同志有什么错误，因为我们事先曾把将同罗马尼亚签订条约的草案送给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并没有表示反对关税同盟，只是不同意关于侵略者这一概念的理解。”

斯大林把头转向莫洛托夫问道：“条约草案送给我们了吗？”

莫洛托夫丝毫都不在乎的样子，尖刻地说：“是的，送来了！”

斯大林露出非常失望的样子，同时凶狠狠地说：“我们也做出一些蠢事。”

季米特洛夫抓住了这一新情况，说道：“这就是我发表声明的依据，草案送到莫斯科，我没有想到，你们会反对这个草案。”

斯大林还是毫不妥协：“胡说八道！您如同一个共青团员不自量力。您总想震撼世界，似乎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你们和南斯拉夫人做些什么事，总是不让别人知道，从来不打招呼，我们都是在大街小巷里才听说你们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将既成事实放在我们的面前。”

当时领导保加利亚经济事务的科斯托夫也想谈一点意见，他说：“作为一个弱小而又不发达的国家，实在太困难了……我想提出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

斯大林又打断了他的话，让他去找有关的部门，在这次会见中主要解决三个政府和三个党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

终于轮到卡德尔讲话，他红着脸——这是他激动的标志——把头缩到肩膀里，讲话时在不应该停顿的地方停顿下来。他说，在布莱德签订的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的条约，事先寄给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除了对条约的期限从“无限”改为“二十年”之外，没有提出别的意见。

斯大林默默地用责备的眼光看着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把头低了下去，紧咬住嘴唇，实际承认了卡德尔的话。

卡德尔继续说道：“这一条意见我们采纳了，此外就没有别的分歧意见了……”

然而斯大林还是打断了他的话，态度还是那样凶狠，但没有象对待季米特罗夫那样带有侮辱口吻，说道：“胡说！有分歧，而且分歧是很深刻的！有关阿尔巴尼亚的问题，您还能有什么可说的？你们把部队进驻阿尔巴尼亚的事，就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卡德尔反驳说，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这样做的。

斯大林喊道：“你们的行动可能导致国际上的严重纠纷，因为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你们是怎么想的？不管你们如何辩解，事实总归是事实——你们要把两个师开进阿尔巴尼亚，事先又完全没有同我们商量。”

卡德尔解释说，这一切并没有最后定下来，根据他的回忆，南斯拉夫政府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没有一次不事先同苏联政府协商过。

斯大林喊道：“说谎！从总的来说你们是不和我们协商的！这不是一两个错误的问题，是你们的原则——指导思想错了，对，是你们原则错了。”

卡德尔的话被打断了，他没有再说什么，就这样，他的观点没有能够讲完。

莫洛托夫把文件拿了出来，读了南保条约中的一段话：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将“本着联合国的精神努力合作以支持任何保卫和平，反对一切侵略温床的倡议。”

然后他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季米特洛夫解释说：“此处的含义是把自己反对一切侵略温床的斗争和联合国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又插话说：“不对，这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是最普通的共青团员玩的把戏！这不过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响亮的词句而已，只会给敌人提供借口。”

莫洛托夫又回到保罗关税同盟问题上来，强调说，这是两个国家合二而一的开始。

斯大林说，关税同盟一般是不现实的。在争论再一次稍稍平息下来以后，卡德尔说，有些关税同盟实践证明是很不错的。

斯大林问：“举个例子说说看。”

卡德尔说：“例如，比尼卢三国的同盟，通过这一同盟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进行了联合。”

斯大林说：“不对，荷兰没有参加，只有比利时和卢森堡，简直是不值一提的胡闹。”

卡德尔说：“不对，荷兰也参加了。”

斯大林仍还坚持说：“荷兰没有参加。”

斯大林看着莫洛托夫和佐林，又看看大家的神情。我很想告诉他，在“比尼卢”这个名称里“尼”是代表荷兰，因为“尼德兰”是荷兰的正式名称。但大家都不说话，我也就不便开口，于是“比尼卢”同盟里就没有荷兰的地位了。

斯大林又回到协调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经济计划问题上来，他说：“如果在合作之后马上要开始争吵，这是没有意义的事

情。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联合那是另一回事，他们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彼此之间早已存在着这一共同的愿望。”

卡德尔强调说：“在布莱德会议上决定开展工作以促进逐渐向建立保南联邦的方向发展。”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不对，不应该‘逐渐’，而应该‘立即’建立起来，如果可能的话，就在‘明天’。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先联合起来，然后把阿尔巴尼亚也联合进来。”

斯大林接着把话题转到希腊起义问题上，他说：“应该把希腊起义的事收起来。”他就是这样说的“收起来”。又对着卡德尔问：“你们相信希腊起义会成功吗？”

卡德尔回答说：“如果外国干涉不有所加强，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

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尔的话，继续说道：“如果，如果！根本没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们以为，英国和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会允许在地中海切断他们的运输命脉吗？简直是胡闹！我们没有海军。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

这时有人谈起中国共产党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中国的情况不同，远东的形势也不同。诚然，我们也可能犯错误！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建议中国同志想办法同蒋介石协商，达成一项临时性的协定。他们口头上同意了，但回国后还是自己干起来了——集中了力量，狠狠地打击了蒋介石。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错了。但希腊的情况不同，要毫不犹豫地收起起义。”

我至今还不清楚，为什么斯大林如此反对希腊起义。我

想：那时其它新建立起来的国家还没有被完全征服，还没有控制在自己手里，也不可能再打算在巴尔干半岛上再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希腊，这样做没有好处。又何况他考虑到这会引起国际纠纷，因为纠纷可以变成一种威胁的形式。这样一来，他或者会被卷入一场战争之中，或者至少会威胁他已经占领的领土。

至于有关中国革命的绥靖政策问题，在这里无疑也是对外政策方面的机会主义起了作用。也许，他考虑到：世界上出现一个新的共产党领导的大国对他的事业及他的帝国会是一种威胁，况且，他根本没有任何希望从中国内部让它屈服于自己的指挥棒之下。不管怎样，他知道，每个革命，仅仅因为它是新生的事物，就必然会成为独立的地震发源地，它会去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政权和国家。在中国问题上，他尤其担心和恐惧，因为中国革命就其重大意义来说，并不亚于十月革命本身。

争论开始平静下来。季米特罗夫又提出同苏联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又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个问题我们将同保南联邦政府一起讨论。”

接着科斯托夫提出有一项技术援助条约订得很不公平。有关这个问题斯大林让他写个“条子”告诉莫洛托夫。

卡德尔问起意大利政府提出要求把索马里交给他们托管，对此问题应持什么态度，因为南斯拉夫并不想支持这个要求；可是斯大林却持相反的意见，他问莫洛托夫，是否已经作了答复。斯大林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的，他说：“从前，国王之间如果不能就战利品达成协议的时候，他们就把引起争端的领土送给最弱的诸侯，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把它夺回来。”

斯大林快要结束他的谈话时，他没有忘记引列宁和列宁主义来掩饰他的要求和命令。他说：“我们，列宁的这些学生，也

经常和列宁有过分歧的意见，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论，但是后来经过辩论，把观点一致起来，就又继续前进了。”

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

这次，斯大林没有请我们到他家里去赴宴。应该承认，当时我心里感到悲伤和难过，因为当时在我这伤感的人的情绪上，对他还有着强烈的爱慕之心。

我很难过而且心上感到残酷、冰冷的空虚。在汽车上我本想把自己对会见的失望心情告诉卡德尔，但是他也情绪很坏，用手势表示要我不要讲了。

这不意味着，我同他的意见不一致，而是我们各自的反应不同而已。

卡德尔真是心乱如麻，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上看得出来：第二天，他被带到克里姆林宫去签署苏南两国进行协商的条约时，——没有说明书，也没有进行仪式——他把字签错了地方，所以又不得不再签一遍。

当天，在斯大林办公室的过厅里，我们同季米特洛夫约定：我们将到季米特洛夫那里去进午餐，以便商讨有关联邦的问题。我们是机械地去讨论这件事的，这是因为纪律性和苏联政府的威信当时还在起着作用。但会谈的时间很简短，大家都无精打采，我们都一致同意，待我们回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之后再行联系。

当然，一切都变得毫无结果，因为在一个月后，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保加利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用信件的形式开始攻击南斯拉夫领导。真相已经大明，关于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会谈只是一个圈套，其目的是破坏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团结，这是任何一个有思想、有理想的人不愿意主动套在自己头上的绞索。

这次同保加利亚代表团的会见，我还记得。科斯托夫对我们十分周到，态度和蔼可亲。我觉得奇怪，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他是对南斯拉夫持敌对态度的人，即所谓“苏联”的人。原来，他也是主张保加利亚独立自主原则的人，他之所以对南斯拉夫人非常生气，是因为他认为南斯拉夫是苏联的主要帮凶，或者也许南斯拉夫自己想把保加利亚及其共产党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后来科斯托夫因为被诬陷里通南斯拉夫而被枪决了。而南斯拉夫的宣传机构一直到他死之前都还攻击他。可见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南保之间的互不信任和误会已经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

就是在这次会见中，季米特洛夫还谈到原子弹的问题。当我们在他的别墅前和他告别时，他好象顺便地谈了一句：“问题不在批评我的声明，而是另有缘故。”

季米特洛夫当然也和我们一样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他没有力量，也许是因为他本人不象南斯拉夫领导人那样有能量。

我并不担心我们在莫斯科会出什么事情，不管怎样说，我们毕竟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代表。虽然如此，波斯尼亚的森林这时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在德军攻势最残酷的日子里，我们曾经隐蔽在这块地方，那时我们在清澈、冰冷的泉水旁边憩息身心，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我甚至对卡德尔或者另外一个什么人说：“赶快回到我们的大山和森林里去吧！”

有人责备我，说我把事实过分夸大了。

三、四天后我们离开了莫斯科，清晨我们被送到伏努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送别国宴的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飞机。在飞机起飞之后，我感到一种童年时代的喜悦，同时又是严肃的心情中的一种喜悦，这种感情在我的心中越来越强烈了。与此同时，斯大林谈的有关希科尔斯基将军命运的故事在我的记忆

中却越来越淡薄了。

我难道还是四年前怀着忠诚、坦率、纯洁的无限向往着苏联的那个我吗？

在接触了现实之后，我的又一个理想破灭了。

这是否是为了一场新梦的开始呢？

大概，我是最后一次谈斯大林

(一)

我本来认为我写了《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之后，有关斯大林的问题我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我象往常一样，往往遇事估计不正确，这次我又估计错了，正如不久前我希望的那样，当我写完《不完美的社会》一书之后我本打算不再研究《意识形态问题》了。

然而，斯大林仿佛还活着，他还到处徘徊，而且还会久久地在世界上游荡。仿佛大家都拒绝接受他的遗产，然而还有许多人从他的思想中为自己吸取力量。赫鲁晓夫否定了他，然而他自己就曾对斯大林歌颂备至。现在的苏联领导人 不 赞 美 他 了，但他们还在斯大林的阳光下取暖。就是铁托，在他和斯大林决裂了十五年之后，又重新把他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去尊敬。就是我，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也许我对斯大林问题进行的许多思考，不就是证明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吗？

斯大林到底是个什么人？他是国务活动家吗？一个杰蒙^①式的天才吗？他是篡夺了政权的暴虐狂、罪犯？或者是教条主义的牺牲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如何利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对他所进行的事业是怎么想的？他对自己、对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怎样估计的？

① 杰蒙是莱蒙托夫长诗《杰蒙》的主人公，他是被上帝处罚为既不能进天堂，又不能下地狱的幽魂，他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游荡，无论他的爱，他的一吻，或他的恨都能致人以死命，但他又是无所不及的。——译者

这仅仅是有关他这个人物想到的几个问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现代世界的命运，特别是关系到现代共产主义世界的命运，因此，我认为这些问题具有深刻意义，它将长久地、不以时间为转移而存在着。

在我同斯大林谈话的一些内容里，他的两个信念，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他的第一个思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945年说的。他的第二个思想是1948年讲的，这是我准确地记得的。

他的第一个思想大致是这样表达的：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前提、出发点是正确的，那么一切其它的问题就必然由此产生，它们也都将是正确的。他的第二个思想是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谈话中有人（也许就是我）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是生气勃勃的，是具有现代精神的，斯大林对此问题仿佛是已经早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已经做出了不容争辩的结论了，也许，他这样的表示也是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的。他说：

“是的，毫无疑意，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但他们也有缺点。不应该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受德国的古典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对他们的影响更深。然而当时列宁却已经摆脱了这些影响。……”

他的这些判断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新奇之处，因为根据每个人的信念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将人们的观点和行动区分为“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这种共产主义的习惯的判断方法是众所共知的事。人们狂热地把列宁奉为马克思的唯一保卫者和继承者，也是有目共睹的事。然而斯大林上述两个判断中，不但有他独见的因素，而且对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

斯大林解释说：思想的前提是胜利的基础和保证，他的这

一观点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他的这个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相矛盾吗？马克思认为一切思想的基础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或斯大林的这种观点，不是有意识地讲出来的，难道不也十分接近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吗？因为唯心主义的哲学主张说：起决定作用的和第一位的是理性和思想。问题很清楚，斯大林在他上述的判断中没有体现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①而斯大林却说，理论和思想没有被群众掌握之前已经是取得胜利的力量了。试看一看1928年7月布哈林在赞同加米涅夫评论斯大林的思想时说：“斯大林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理论，如果当他需要抛弃某一个人的话”^②，那么为什么斯大林这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批判态度的论断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自己还没有发现呢？

尽管人们发现了他的这些问题，然而在我们上述的斯大林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有着它本质上的一贯性。布哈林在批评斯大林没有原则性时（如果不去考虑布哈林的顽强的派性方面），我认为，布哈林的批评和斯大林所持的思想是决定性因素的这一观点并不矛盾。斯大林党内的对手——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以及其它一些人在与斯大林的斗争中都遭受了失败，其中一个带本质性的（如果不是最带本质性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比起其它的任何人，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遇事有独道之处，他是一个比较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③。当然，在斯大林的风格中，没有托洛茨基具有的那种五光十色的华丽的文彩，他分析问题却具有布哈林的那种敏锐的智慧。斯大林对问题阐述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0页。——译者

② 罗伯特·康古斯特著《大独裁者》第81页。纽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1968年。——译者

③ 在这一点上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意本书作者的观点。——译者

对社会现实合理的透视，是走向新的胜利的力量领导。他从某一现实中，从相应的条件和环境中取得的思想，看起来似乎是很一般的，平凡的，没有巨大分量的。然而这只是它的外部形式。

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是理论不能脱离实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当共产党人能够实现他们的学说和实践统一的地方，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就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妖魔般顽强的力量，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学说与他的权力及国家的威力结合起来。因此，斯大林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家；他之所以发表讲话和写文章，只是为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正是在他的这种思想和实践的结合，求实精神和非抽象的实用主义中，显示出斯大林观点的力量和独立性。……

还应该指出：一切东方的教条主义者和西方的严肃的研究斯大林问题的学者，由于他们忽视了或者没有对他的观点的这一本质给以足够的认识，或者只从文章的词句中表面地进行研究，所以，在今天去理解他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夺得了政权，就感到十分困难了。

有必要再强调一次：十月革命以后离开苏联社会和苏联国家的需要，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存在什么斯大林的思想观点。这是关系到他的党生死存亡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这种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权力，变成为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1972年版。——译者

“领导”的、统治的力量。托洛茨基称斯大林是“我党最杰出的才能平庸的人。”^①布哈林讥笑他说：“斯大林是受着激情的冲动而不妊的著名的理论家。”^②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带有派性情绪的尖刻的言词，并非实质性的判断。斯大林的确没有认真地从理论上思考过问题。他并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探讨。然而，在理论、意识形态和党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党的官僚阶层、党的显贵的需要相结合方面，斯大林的思想，他的思维能力比他的对手更有价值得多。党的官僚阶层支持斯大林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就象希特勒当年的那些冗长的讲演，在今天看来几乎是狂人的呓语，但在当时他曾用他的这些呓语争取到千百万德国人的支持，并把这些千百万“一向十分理智的”德国人投进了死亡的战场。斯大林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恰恰相反，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当斯大林为了新生的、蜕化了的官僚阶层的生存和特权去说明“当前迫切的任务”时，当他把新生的官僚阶层和俄罗斯的强大和工业化的任务混为一谈，相提并论时，托洛茨基这时正在高谈阔论他的世界革命的奇特的理论和各种方案，而布哈林则进行教条式地埋头深入钻研某一理论的各种细节。

与此同时，斯大林象每一个天赋甚高的政治家和手腕高强的行政领导人那样，善于把别人的思想给以现实的可行的形式。比如说斯大林的著名的论点“在苏联一国的范围里建设社会主义”，本来是布哈林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日益发展起来的思想。……在各种作品中，这样的做法称之为剽窃、抄袭或模仿。

① 罗伯特·康古斯特著：《大独裁者》第71页，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69年版。

② 罗伯特·康古斯特著：《大独裁者》第71页，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69年版。

虽然如此，在斯大林生前，没有人否定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今天也没有一个理智的、头脑清楚而聪明的人愿意这样做。人们不同意的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家和作为贯彻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从品质方面对他过去所做的这样或那样的评价。

(二)

以上我谈的是斯大林的品质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争论某人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范围里是某人的继承人，这是非常表面而且是非本质性的问题。只有那些没有远见和创造性处理问题能力的人，才可能是一贯忠实、准确的继承人。我们谈论的问题是政治，在政治中各种神话、离奇的事情乃是不可避免的、天天都有的现象；这里我所谈的具体的情况，是指有关驳斥对列宁遗产所持的那种教条主义的，蓄意煽惑人心和书呆子气的态度和作法。因为凭引用列宁文章的引语可以证明形形色色的、各式各样他的事业的继承人都是忠于列宁的，也可以证明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属于他的。我们只有把列宁的意向和斯大林如何实现这些意向的、以及斯大林的对手——持不同政见的人提出的方案进行比较，我们才能够接近真理。

我们也无法回避去分析所谓列宁遗嘱，因为它在教条主义者、尤其是在反苏的各种争论中起过而且今天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列宁的《遗嘱》实际上是他于1922年12月22日夜间中风后，左半边身体瘫痪之后口述的一封信。次日，即12月23日医生允许他每天口述四分钟。于是他开始口述给代表大会的一封信，25日口述继续进行，26日才口述完毕。

这封信的一部分是涉及列宁建议代表大会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100人及支持托洛茨基提出的有关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信的这一部分于12月26日交给了斯大林，因为当时他是党的总书记。根据一些猜测，斯大林怀疑列宁更倾向于托洛茨基的意见，所以他打电话给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对她破口大骂，借口说她不尊重医生的嘱咐，允许列宁研究政治问题，置列宁生死于不顾。不知克鲁普斯卡娅是否把她挨骂的事告诉了列宁，但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在12月25日的口述记录中是这样说的：“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之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①十天以后，即1923年1月4日又补充了下面一段说明：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我想这句话应该说：“在一切方面都不必和斯大林有什么不同，只有一点要胜他一筹”——杰拉斯），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②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份《遗嘱》和列宁往常的那种尖锐、一针见血、表达思想准确的风格不同，《遗嘱》中的话是不确切的、模棱两可的，尤其是在关键的地方。列宁非常清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也预见他们之间的冲突意味着什么。然而在12月23日列宁第一次口述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他回

① 《列宁全集》，1957年中文版，第36卷，第617页。

② 《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36卷，第618页。

避公开谈这一问题，而是采取了打预防针的措施，建议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50—100人（当时只有27人），“为了加强中央机关，为了改善我们的机关能够严肃地进行工作，也是为了……党的一切方面的命运”^①（大概应该是：为了党本身的命运——杰拉斯）。

简直不可理解的是：象列宁这样的人，他能够明察秋毫，具有无比丰富的政治经验，千锤百炼了他的党，使这个党用他的思想形成了当时的面目，他是一次伟大革命和一个大国的首脑，已经尝过了“历史”和权力能令人陶醉的毒酒，他怎么会认为，而且好象是突有所悟似地认为只有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才能够拯救“党的一切方面的命运”呢？列宁的思想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难道他的智力已经衰退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于改变了他一向主张的思想——即居于首位的是原则和力量，而突然大讲起数目字的意义的吗？难道他忘记了辩证法，忘记了在一切现象中都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吗？列宁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本质的那些热烈的意见为什么这里一点也没有了呢？仿佛第一次怕他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和目标会遭到破坏。

更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列宁在第二天，即12月24日的口述中才谈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谈到他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分裂。仿佛他在一夜之间进行了反复的思考，改变了他的想法，才敢于公开地把这个问题谈出来。

12月24日的口述中说：“我们的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的不稳定性是可能产生的，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说得很不明确，他没有提到他不断阐明过的不容争辩

^① 《列宁全集》，1959年俄文版，第36卷，第545—546页。——原注这一段中文版中没有。——译者

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显然是在担心工农“联盟”的分裂。然而这一思想和下面口述的一段话既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也与上述事实本身没有联系。列宁的口述中说：“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闹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到100人。（昨天的数字的吸引力还没有离开列宁的思想——杰拉斯）。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①

列宁在生命危险的时刻，对他来说，根本不会去考虑和研究“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在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民主百万倍的苏维埃政权下”^②，一个人会“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这样的事是怎样发生的？显而易见，他不仅担心党的命运，他也在担心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比他的总书记大得多的无限的权力。在列宁身上也有着大家都熟悉的“人的弱点”，即某个人的“历史上的作用”越大，这个缺点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即将思想和权力，权力和他个人等同起来。

但是研究这样的问题会使我们偏离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

① 《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36卷，第616—617页。——译者

② 《列宁选集》，1956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第2卷，第38页。——原注

即在列宁的同事和战友中，他认为谁应该是他的继承人呢？显而易见，他的继承人绝不是斯大林，也不是托洛茨基，因为前者太粗暴，后者又热衷于行政方面。而其它优秀的中央委员中，列宁也没有认为有人是他的能够胜任的继承人。

列宁口述说：“我不打算再评述其它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①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此处可能是笔误，从意思上看，他应该是他们——杰拉斯），正如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②（这里的问题在于1917年他们都是参与了反对列宁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斗争的。——杰拉斯）

现在请大家注意列宁讲下面一段话时的逻辑性及其诚恳的态度吧！是什么缘故，当列宁谈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的一段事件”时，他一面强调说，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然而也不能去责备他们两人。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强调指出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呢？我想，当问题涉及到政权的问题时，为了以防万一，重新提一下已经“被原谅的”“错误”也是没有害处的事……

列宁提到两位年轻的中央委员，他也和对其它人一样，在

① 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10月10日（23日）和16日（29日）党中央会议上的投降行为。当时他们发言并在表决时反对列宁提出的关于立刻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中央两次会议上遭到迎头痛击后，就在10月18日的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指出布尔什维克在准备起义，并且说他们两人认为起义是冒险行动。这样，他们就把党的最大秘密（中央关于在最近时期组织起义的决议）出卖给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了。同一天，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中斥责了这种行为，把它叫作前所未闻的工贼行为。（见《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26卷第196—199页。）——译者

② 《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36卷，第617页。

前半句夸奖了他们的优点，在后半句则指责了他们的缺点：

“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该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①

这里还想补充一点：在1923年4月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增加至40人，在1925年5月，即在列宁逝世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至63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的“遗嘱”，但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不公布列宁的这份“遗嘱”。更值得提及的是：托洛茨基根本不承认列宁留下过“遗嘱”。^②当然，他的这一意见，在他没有可能查到列宁的手稿之前，是一直坚持的。

列宁的“遗嘱”很有必要进行专门的、全面的分析。然而从上面引证的片断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列宁没有把他掌握的权力交给任何一个人，同时，他只有对斯大林，没有指出他有政治上的缺点，而仅仅指出他个人性格等方面的毛病。这个评语也符合历史事实：即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始终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1927年10月23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夸耀自己是有原因的，他说：“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

^① 《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36卷，第617页。——译者

^② 斯大林著：《论反对派》，莫斯科，1928年，第723页。——原注

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①

那么，在实践中列宁遗产的情况又如何呢？实际上是谁把他的事业继续下去的呢？路易·费舍在他写的《列宁生平》一书中得出的结论说：如果列宁那管是再能活十年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争吵就不会发生如此悲惨的变化，苏联也不会淹没在全面的暴行之中。这一观点是能够使人信服的，因为它有着更广泛的理论性的意义。然而，可惜列宁并没有能再活十年，因此，关于继续列宁事业的问题应该以现实为背景来进行研究，即研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斯大林和反对派的斗争、斯大林的恐怖政策，研究斯大林接收下来的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全部面貌。

这样做的话，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也是因为围绕着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以及今天共产主义运动的活生生的现实的许多方面，许多不同的、敌对的势力和思想也还仍然在进行斗争的缘故。

决定论的观点提出：象如此落后的俄罗斯和全面渗入国家一切领域的意识形态，除了使用全面的行政暴力的途径，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推动共产主义的运动。我们抛开这个观点不去管它，然而，我认为列宁事业最彻底、最自然的继承人正是斯大林。甚至，如果假设斯大林有可能把列宁也消灭了的话，这和我上述的结论也没有矛盾。这是列宁学说必然导致的结论：因为列宁和那些宣传理想社会的人（包括马克思在内）不同，他是为取得某一种全面的权力进行了斗争，运用这样的权力去建设一个社会，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也象马克思那样，把这

① 《斯大林全集》，1954年中文版，第10卷，第153页。——译者

一政权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思考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工人阶级的监督和压力，而列宁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党来实现这一专政的。一个非假说的理想的——即全面的权力和作为假说的理想的权力等同起来了。

人们可以在一切方面指责斯大林，然而有一点却不能指责他，这就是他没有背叛列宁建立起来的政权。赫鲁晓夫没有理解这一点，他不能也不敢去理解这一点。他把斯大林的权力说成是他的“错误”——即说他离开了列宁和列宁主义。他这样做并没有在知识分子和人民中给自己建立声望，而且破坏了他和党的官僚阶层的关系，因为对这个阶层来说，党对一切其它社会使团一样，它的历史就是它的生命的一部分。乔治·肯南指出：1945年以后的德国政权并没有否认纳粹的罪行，然而他们反对纳粹分子所采取的措施比起纳粹的罪行来是不相称的。德国政权传统的连续性没有中断。与此同时，苏联的任何一个领袖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不是在继续他们党的事业，创造他们党的历史。列宁的政权，在采取了某些改变了手段的条件下在斯大林时代曾经继续存在下去。当然我说的不仅仅是政权，但主要的当然是政权。这个政权今天仍然在某些改变了的面貌和形式下继续存在着。

（三）

斯大林党内的一切对手、政敌都是在非现实的世界里活动，虽然他们脱离现实的程度不同，有的多些，有的少些。托洛茨基热衷于革命——一头钻进了世界革命。布哈林埋头于经济的研究，当然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务的基础是经济问题，他们曾经探讨往昔的“公社制度”^①和计划理想的未来。而斯

^① 这里指俄罗斯的宗法公社制度。——译者

大林沿着列宁走过的道路，他逐渐地明白了：如果不改变党的作用和它的意义，就不可能保存新的制度。在党政合一的革命时期，党的权力比政权要大。后来的变化仅仅是：按照列宁关于国家是使用强制手段的暴力机关的指示，政权的权力大于党——表现在秘密警察和它的整个组织系统。

当然，这些变化都是潜移默化、逐渐发生的，仍旧保存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形式，也就是说保存了意识形态领域中和各种形式主义的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也注意到：作为政权本身会为自己带来特权和“在历史中的地位”，那么问题就十分清楚了，为什么从党取得了政权的第一天起，党内就出现了权势欲的思潮：不是斯大林创造了一个极权的党的官僚阶层，而恰恰相反，这个阶层为自己找到了象斯大林这样的领袖。

正是因为斯大林理解了当时的现实和未来的前景，所以他才能够出奇致胜地抓紧了时机，打败了他的敌手，赢得了政权。被击败了的斯大林的这些对手们，他们对党的感情和热爱逐渐地变成了他们的弱点，而对斯大林来说，利用他们对党的感情是他对付他们的主要手段：即在“党的面前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要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干了最卑鄙无耻的罪行——说自己是叛徒，组织怠工，进行暗害和谋杀等等。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斯兰斯基案件，在匈牙利发生的拉伊克案件，大概还有其它国家进行的类似案件，苏联的检察员们都和他们的东欧各国的小兄弟商量过，并且交流过“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当然要完结这样的案件没有刑讯室和刽子手是办不到的，正如中世纪宗教法庭对待异教徒和魔鬼那样，而我们时代的这些审讯，其中新的东西仅仅是理由、论证和手段而已。

斯大林并没有消灭了党，他改造了它，“清洗”了它，把它

变成了现实的、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的工具。象《卡拉玛佐夫兄弟》里面的伟大的中世纪宗教裁判者^①一样，他明白了：应该把上帝杀死，这里的上帝是指党的和谐的集体和平等的社会，用以拯救他的法典——即苏联的制度和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的组织。百依百顺地能跟在他后面走的，不仅仅是政治官僚阶层，而且他要求全世界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也能为他的马首是瞻，因为形势所迫，他们不能不把他们的命运和苏联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而斯大林把他和国家等同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如何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即象具有严谨的智慧的陶里亚蒂和象英雄人物季米特罗夫这样的人，怎么也会没有“发现”斯大林的笨拙的谎言，而和骇人听闻的大恐怖妥协呢？

各种“胜利”不但增长了斯大林的威望，而且他自己陶醉于这些胜利不能自己：他把政权、思想和斯大林等同起来，变成三位一体了……正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毫无选择地可以在世界上体现一样。

（四）

列宁逝世三个月之后，即1924年4月斯大林在他讲的《列宁主义问题》讲义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这部讲义把列宁的思想肤浅化了，简单化了，但同时给它作了定义，也仿佛像恩格斯对待马克思的著作一样，他写了《反杜林论》，把马克思的思想系统化了，并给它作了定义。当然，斯大林这样作并非由于偶然，但却过于轻率，有失检点。他早已理解了列宁主义的实质，并且把它树立起来，作为自己

^① 陀斯朵也夫斯基的名著《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之一伊凡，他是一个半疯的病人，他常常觉得在自己面前出现一个伟大的中世纪的宗教裁判者。——译者

的大旗。因此，在苏联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的观点和行动都占了上风。许许多多的成绩和胜利都是政治家们所目睹的现实，可以“证明”“我们的”——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思想观点是无比优越的，正确的。

我想，也正是这些原因马克思的学说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什分量了，虽然他仍然忠于这一学说的本质——即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建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那些突如其来的暴跳如雷的愤怒的发作并没有使他失去理智，他能够用几个月，乃至于用几年的时间仔细地、用心思考地去研究某一问题或者他的某一敌手。他也是这样对待思想问题的：当他在列宁逝世后，急于要建立“列宁主义”的时候，大概他已经感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不足之处。大概，转折的时刻是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当时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的民族入侵了苏联，想要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思想取得胜利的唯一国家彻底毁灭。

他早已把国际共产主义的活动置于苏联党的控制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它的结局仿佛又一次证明：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如果能够存在下去，它只能把自己置于苏联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建立了政治官僚制度，并且宣扬、鼓励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是为了在这样的制度和思想上巩固他个人的权力，而且他认识到只有采用这种形式才可能保存俄国的革命和共产主义。战争结束不久，他开始否认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①著作的意义，虽然列宁曾对这位理论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① 冯·卡尔·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参加过1812—1815年和法国作战。曾任柏林军校的校长。崇尚黑格尔哲学思想。他的有名的著作《战争论》中指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得到列宁高度的评价。
——译者

斯大林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发现了比冯·克劳塞维茨更好的理论家，非常简单，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军队在战争中被苏军消灭了，而这次战争可能是俄国人民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次战争。

斯大林从来没有公开谈过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损于他们的言论会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中产生信仰的危机，与此同时，也就是威胁着他的事业和政权。他认识到：他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他比较彻底地、系统地发展了思想和行动、认识和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的原理。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否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或那一条的原则，对斯大林来说，是无所谓的。难道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列宁，不是都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是“为了领导实践的”，而不是只去收集他的每个原理；他们不是还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然而，这一问题的内容要广泛和复杂得多。任何一种制度，特别是专制制度，它所全力以赴要达到的目的，是统治者有能力巩固这种制度所具有的状态。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就不无武断的地方），当它成为官方的，即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它就不能不被僵化成为教条的状态。因为一个国家和它的统治阶层，如果每天都改变它的统治方法（且不必说去改变它的理想），那么这个国家和它的统治阶层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它们应该生存下去——在斗争和劳动中去适应从内部到外部都在变化着的现实。这样的情况就“迫使”领袖们《离开》理想，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在他们的拥护者和人民的心目中保存，如果可能还要加倍地提高他们个人的伟大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它的“科学性”和密闭性的与世隔绝的政权

促使斯大林毫不动摇地用最残酷的手段去消灭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异端分子——生活本身使他们不能不“背叛”，也就是说改变那些意识形态中“最神圣的”原理。斯大林警惕地守卫着意识形态领域，然而这仅仅作为权力的一种手段，用以使俄罗斯强大起来和提高他个人的威望。因此，那些认为自己就是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本身的官僚们今天还在摇着古老的手摇琴，奏出枯燥的曲子说：斯大林虽然有“错误”，但“他为俄罗斯做了许多事情”，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在斯大林时代谎言和暴力应该被提高到最高原则的程度……然而，又有谁知道：在斯大林的明察秋毫，洞悉一切，非善良的头脑中，也许他认为谎言和暴力就是辩证法中的否定呢？而且他也认为通过这一否定，俄罗斯乃至整个人类最后就可以走向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幸福呢？！

在生活中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斯大林把共产主义思想引向了极端，因此，共产主义思想和信仰这一思想的社会都开始退化了。当他还没有来得及清除掉他的内部的敌手，当他刚刚宣布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当战争还没有结束，这时在苏联的社会里以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出现了新的思潮和流派。可以说，当斯大林论述“思想原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候，他用他的世界的语言、思想和制度来说服别人的时候，他说的这些东西和其它的政治领袖所说的内容也都是一样的，其它的政治领袖们也说：如果我们的思想反映了社会运动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思想鼓舞人们使他们组织起来，那么，我们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而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敏锐的思维能力，而且他的思想形成之后是坚定不移的。我记得，在他在场的情况下，不可能给他提出什么意见或者暗示，如果有人提出来，他马上就会发现。如

果我们还记得他曾赋予思想以多大的意义的那些提法（虽然对他来说，这只是一种手段）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就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他也看到了他所建立的社会制度的不完美的方面。在这方面，今天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明，特别是在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著作中写得更加清楚。她说：当他知道在古比雪夫为莫斯科撤退到那里的党中央机关的子弟建立了一所专门的学校时，他惊叹地说：

“真要命！你们哪，你们的这些该诅咒的等级制度！”^①

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官僚主义的等级制度，这也正是斯大林的最不共戴天的敌人托洛斯基曾经提出过的问题。骇人听闻的大清洗，几百万人被处决和在集中营的生死线上挣扎着的人们，这就只能加深了社会的不公正，这种情况又反过来要求新的暴力，新的浩劫和清算。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用他那颗残酷的心毁灭了自己的家庭。最后，在他自己的周围只剩下了一片空虚和恐怖展现在他的面前：他逝世前一段时间，他从画报上剪下了陌生人的孩子的照片，贴在自己房间的墙上，然而他并不愿意看见自己的亲孙儿孙女。……这对人们、特别是对那些只用教条主义的头脑去进行单一方向的思考、把人的生命和他们的追求置于所谓的“历史的必然”之上的人们将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因为在实际上，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大的胜利者，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是遭受了最悲惨失败的人物。他死后没有给人类留下一件可以经历时间考验的、不容争辩的、众所公认的宝贵的财富。^② 他的一切胜利都变成了失败——包括他本人和他的思想。

那么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如

① 斯维特兰娜·阿里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1979年中文版。——译者

② 这里作者指他的思想、著作和事业。——译者

此地步了呢？

斯大林的言行作为一种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涉及共产主义运动和当时的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这里指出的是：思想和人、和领袖、运动的关系，暴力在社会中的作用，神话在人的生活中的意义，群众、人民、民族的亲近、友好的条件等一系列的问题。斯大林已经属于过去了，但有关上述这些问题的争论和类似这些问题的争论，不久以前才刚刚开始。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所认识的斯大林，是一个活生生的、热情的、易于冲动的人，但是他是具有极高的组织才能和善于控制自己言行的人物。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难道他能管理这样的现代化的大国和领导如此艰巨、可怕的、极其复杂的那些作战活动吗？

因此，我认为当围绕着他这样的政治家进行争论的时候，诸如刑事犯、暴虐狂等等概念都具有次要的意义，而且这都是离奇古怪之词。在这样的争论中我们要避免去犯错误，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中，政治并不能摆脱所谓的低级的欲望和迷误。只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政治乃是人的各种倾向、追求的总和，因此，政治就不可能清除各种犯罪和狂症的因素，变成为纯洁无瑕的政治。所以很难找出（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犯罪行为和政治暴行之间的界限。因此，每一次新的实行暴力的极权者的出现，思想家们就不得不去进行新的自己的调查，分析、总结和概括。

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界限存在于理智和感情，必然性和主观性之间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强奸了历史的人，即便我们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罪行和暴虐症的话，也是如此。例如，如果我们同意在那样具体的条件下集

体化是明智的和必需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实行集体化政策，也不需要去消灭成百万“富农”。然而，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教条主义者，他们不同意上述的意见，他们认为斯大林是醉心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受到托洛茨基责备他为机会主义的压力，而且国家正受到法西斯入侵的威胁，一旦入侵，他们就可以在“阶级敌人”中找到支持他们的人。然而，对那些被诬陷的党内“反对派”队伍中进行的控制和血腥的清洗，他们能提出什么可以证明这些作法是正确行为的理由呢？这些人对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并没有构成任何的威胁。相反，他们所以变得完全无能为力保卫自己，而且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恰恰是因为他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忠于这个制度和意识形态。

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并不只限于大清洗，大清洗不过是恐怖政策的典型表现罢了。苏共党内的一切反对派在不同程度上都赞成惩处“富农”和其它“阶级敌人”。他们全体都是自愿地把自己的脖子伸进了意识形态的枷锁之中，因为他们的理想目标和斯大林是一致的，共同的。在责备斯大林没有研究某一专门问题的同时，布哈林自己研究科学问题——研究经济学和哲学，用他自己的幻想来建立经济基础。从本质上说，他们谁也没有用新的目光发现新的东西、新的理想。斯大林的大清洗，对他们每一个人，毫无例外，都是突如其来的。大清洗使斯大林个人突出起来，逐渐地变成了这以后所形成的那个样子，并且开始铺设他的事业的基础。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用残酷的、肆无忌惮的大清洗的方法，在思想和他的权力、国家和他个人之间划上了等号。当真理成为绝对的，不可争议的和相信会是完全无阶级的社会里，事情的结局也只能如此。目的本身把手段神圣化了。斯大林的事业把

一切道义的、精神的，也就是那些在生活中长远起作用的因素铲除了。这就是斯大林这个人物之谜，也就是衡量他的事业的真正的尺度。

1969年7月于贝尔格莱德

作者小传

米洛凡·杰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于黑山省科拉申城附近波里亚镇。他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法律和文学。1932年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年被捕，坐牢三年，1935年被释放。1937年南共党内斗争中，他是属于铁托一派的，赞助铁托改组了南共党。1937年杰拉斯被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被选入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1941年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入侵南斯拉夫之后，南共党派杰拉斯和皮雅杰组织起义。1943年末杰拉斯参加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主席团（这个组织的第二次会议在雅伊则召开，会上宣布该组织为南斯拉夫最高立法机关，拥有国会的一切权利）。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会议任命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被宣布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杰拉斯在政府中任部长职务。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改名为临时人民议会，杰拉斯参加了议会工作，并兼任黑山省事务部部长。1948年杰拉斯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局书记。1953年初杰拉斯任南斯拉夫副总统，他是当时四位副总统之一；1953年末他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以杰拉斯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曾多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他曾提出和准备了南斯拉夫经济改革方案，后来当他被捕入狱期间，政府对他的方案进行了简化和改变了一些地方，但却实行了他的方案。

杰拉斯认为党成为统治阶级并产生了道德、思想蜕化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之后，他同党和政府发生了冲突。从1953年10月至1954年1月，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他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谴责国家的管理走向了斯大林的管治方法，他坚持要成立第二个政党，他反对党干涉司法机关的工作。（根据杰拉斯的意见，“司法机关应该是国家和法治机关，也就是人民的机关，而不应该把党的队伍中的政治利益和意见强加予它……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以意识形态为论据，而是以法治原则办事呢？到什么时候判决将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的基础，而不是只依据法律条文呢？”）（1953年12月31日《斗争报》）1954年1

月1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中央特别全会上(南斯拉夫共产党已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通过决定撤销杰拉斯党内外及政府的一切职务,理由是他具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是要取消南斯拉夫的党。”(苏联大百科全书1957年第二版第49卷第334页)黑山共和国撤销了杰拉斯党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1954年3月他被开除出党。1955年1月他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监外执行,案由是“发表了诽谤性的声明,在他的声明中恶意地歪曲了南斯拉夫的情况”。1956年10月29日杰拉斯公开赞同匈牙利事变,批评了铁托的制度和共产主义本身。为此他被判处了三年徒刑,狱内监禁。在狱中期间,他得以把他写的《新阶级》的手稿送出监狱交给了出版人,该书于1957年10月出版后,他又第二次被判刑,刑期增至七年。1961年1月他被提前释放,然而过了三个月,他又因发表了《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而被关进监狱,因为他被指控在该书中“泄露了国家的秘密”。在狱中杰拉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如《麻疯病患者》等等),还写了一本描写黑山的君主彼得二世涅戈什的书,涅戈什是政权和教会的统治者,也是塞尔维亚优秀的文学代表人物。此外他还翻译了英国作者米尔顿的《失乐园》。狱中杰拉斯还写了自传体的名为《没有权力的国家》一书。

1966年12月他被释放出狱(他服刑的这个监狱是奥匈帝国时代出名的斯列姆斯克·米特罗维查监狱),但没有恢复他的公民权。在南斯拉夫国内他没有公开演讲的权利,他的著作不能出版,没有发还他战斗岁月曾授予他的那些勋章、奖章等等。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政府允许他出国讲学和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1969年他的《不完美的社会》一书出版了,这本书也和其它的著作一样,在南斯拉夫列为禁书。1970年4月杰拉斯正要出国讲学,准备了一系列的报告,然而这次出国签证被取消了。据有关方面透露,取消他出国之行无不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因为他出去讲学这个月正值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活动月。

在苏联,杰拉斯的名字在具有民主情绪的公民中间是颇有声望的。在这个圈子里,他们熟悉的译成俄语的唯一的一本书,是《新阶级》,而且这本书还是节译的。

译 后 记

本书所涉及的是苏南关系史中的一段重要的记载，它有着文献性的性质，对研究苏南关系、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以及苏联和它以前的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有参考价值。书中描述的生动事实，作家当时的感受，非亲临其境和参与这一事件的人，是很难写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颇有些象阿里卢耶娃（斯大林的女儿）写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本书只谈了苏南关系，作者未涉及南共的党内问题。作者在本书中所持的某些观点，是不能同意的，这些问题我们相信读者会作出判断，我们认为本书的价值在于作者提供的史料。

本书译自1970年西德《播种》出版社出版的俄译本。这个译本和英译本比较，内容上有些出入的地方（1963年中文译本是根
据英译本转译的），我们想这可能因为塞语和俄语更接近些，也因为俄译本出版时，曾经过作者亲自校阅过（作者是精通俄语的），他自己对原文有所增减之故。所以我们想俄译本更接近原著。此外，俄译本中，作者增加了一章《大概，我是最后一次谈斯大林》，后面还加了一个《作者小传》，小传未说明是谁写的，估计是出自俄文版译者之笔，当然，它代表了撰写者的观点。其中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重译此书是考虑到1963年出的中文译本仅出了几百本，经过十年动乱，已所余无几，许多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人都没有见过此书。为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故译了这个版本。

本书这次翻译时有所删节。

本书在译制过程中参考了司徒协同志的译本，特向司徒协同志表示感谢。译者为本书作注释时，参考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和英译本的《人名选注》。

我期待着我的朋友和读者指正译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

赵 洵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于北戴河

同斯大林的谈话

密洛凡·德热拉斯著

(供内部参考)

33114
700

同斯大林的談話

密洛凡·德热拉斯著

司徒協譯

(供內部參考)

125629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New York, 1962

根据美国哈考特、勃雷思与世界公司 1962 年版
轉譯。英文本由迈克尔·B·彼得罗維奇譯自塞尔
維亞—克罗地亚文。

2p06/50

· 供 內 部 参 考 ·

同斯大林的談話

[南斯拉夫] 密洛凡·德热拉斯著

王 毅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编印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63 年 3 月第一版 1963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5 · 字数 112,000

統一书号 3003 · 673 定价 0.72 元

目 录

前言	1
一、狂喜	3
二、疑虑	61
三、失望	89
結束語	135
人名選注	140

前 言

忘掉瑣事而記着那些被后来的事件证明为最重要的东西，本来是記憶力的常規。然而，这也是一个弱点。既然有所偏，就不免对过去的实际情况有所側重以使它适应現在的需要和将来的希望。

我是認識到这一点的，因此我尽可能如实地提供事实。如果书中仍然掺杂着我今天的一些見解的話，那么，这既非出于恶意，也非出于卫道精神，而是由于記憶力本身的特点，由于我是根据現在的見識去說明当年的遭遇和事件的。

这本书里所讲的事实，博覽群书的讀者大部分都已經从回忆录和其他著作中讀到过。可是，一件事从几个角度更詳細地去說明，就更容易理解和更确实，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也来議論一番，这并不是无用的。我坚决认为，人，以及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比枯燥的事实更重要。因此，我对前者更多注意。而如果这本书里有可以称为文学的东西的話，这与其說是由于我的表达風格，还不如說是由于我想使这个題材更加动人、明朗、真实。

在我写自傳的过程中，曾在1955年或1956年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把我同斯大林的会見单独写成一本书，以便早日单独出版。可是，我进了監獄，而在監禁的时候是不便从事那种性质的写作的，因为，尽管我的书談的是过去的事，却不能不碰到当前的政治关系。

直到1961年1月获釋以后，我才重新想起那个旧念头。但

是，鉴于情况已经改变，而我自己的见解也有所发展，这次我必须用相当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题材。首先，我现在更多地注意这些历史事件的心理方面，人的方面。另外，关于斯大林的记载仍然矛盾百出，他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我也认为有必要在本书的结尾，根据我个人的见识和经验，对这位确实神秘的人物作出我自己的结论。

最重要的是，我内心感到，凡是对于写历史的人、特别是对于那些为更自由的人生而奋斗的人可能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我都必须无所隐瞒。无论如何，如果无损于真理，即使它是包涵在我的激情和我的论断之中，读者和我也都会满意的。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怎样全面，关于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理，永远只能是关于特定的人们、在特定时间内的人们的真理。

1961 年 11 月 貝尔格莱德

一、狂 喜

(一)

第一个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来的外国軍事使团，是英国的使团。它是在1943年5月空降着陆的。苏联的軍事使团則是在九个月以后，即在1944年2月，才来到那里的。

苏联使团到达以后不久，我們就觉得需要考虑派遣南斯拉夫軍事使团去莫斯科的問題，特别是因为我們已經派遣了一个这样性质的使团到相应的英国司令部去。在最高司令部里，也就是当时在最高司令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員当中，有人热烈希望派使团到莫斯科去。大概铁托曾經把这件事口头通知了苏联使团团长考尼夫；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問題是由苏联政府拍来的一封电报解决的。对于南斯拉夫人來說，派使团去莫斯科有着多方面的意义；而且使团本身的性质和目的，也和派往英国司令部的那个使团大不相同。

大家知道，組織游击队和起义运动来抗击德意占領軍和通敌分子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南共在通过最殘酷的战争来解决本民族的問題的同时，仍然把自己看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員，同苏联——“社会主义的祖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整个战争期間，党的核心机构政治局一直設法用无綫电同莫斯科保持联系。在形式上它是同共产国际联系，但同时也就是同苏联政府联系。

战争所造成的特殊条件和革命运动的繼續存在，已經在南

共和莫斯科之間引起多次誤會。這裡，我想談幾件最重要的事情。

莫斯科從來就不十分了解南斯拉夫革命的實際情況，不了解南斯拉夫在抗击占領軍的同時，也在進行國內的革命。產生這種誤解的根源在於蘇聯政府深怕西方盟國，主要是英國，可能埋怨蘇聯利用被占領國的戰禍來傳播革命和共產主義影響。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鬥爭，也像其他一些新事物那樣，並不符合蘇聯政府和國家的固定看法和觸犯不得的利益。

莫斯科也不理解南斯拉夫戰爭的特殊性。儘管南斯拉夫人的鬥爭非但大大鼓舞了蘇聯的軍人（他們正在抵抗納粹德國的侵略，保衛俄國的民族有機體），而且也大大鼓舞了蘇聯的官方人士，但是，後者仍然過低估計這一鬥爭。其原因之一是他們用自己的游擊隊和自己的作戰方法來衡量南斯拉夫的鬥爭。蘇聯的游擊隊是紅軍的一支可有可無的輔助兵力，始終沒有發展成為一支正規軍。蘇聯領導人根據自己的經驗去看問題，就不能理解南斯拉夫的游擊隊是能夠轉變為正規軍和政府的，而且日後也會具有與蘇聯不同的利益和身份，一句話，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

關於這一點，有一件事我認為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說有決定性的意義：1943年3月，在所謂第四次攻勢中，最高司令部和德國司令部舉行了一次談判。談判的目的是交換俘虜，而談判的實質則是使德國人承認游擊隊為交戰對手的權利，以便彼此殺害傷員和俘虜的事得以制止。當時最高司令部、大部分革命軍和千百名我們的傷員，都處於極端危險的境地，我們需要我們所能得到的每一個喘息機會。這些情況理應通知莫斯科，但是，我們知道（在鐵托，是因為他了解莫斯科；在蘭科維奇，則更多地是出於本能），最好不要把一切都告訴莫斯科。結果我們只是簡

单地通知莫斯科：我們將同德国人就交換傷員問題舉行談判。但是在莫斯科方面，他們甚至不願意設身處地為我們想一想，他們不顧我們已經血流成河的事實，居然對我們懷疑起來，給了我們一個嚴厲的答复。我還記得當時鐵托的反應是怎樣的。那是在1943年2月我們突破尼爾塔瓦河戰綫的前夕，鐵托正在蘭馬河畔的一個磨坊里，他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照顧我們自己的軍隊和我們自己的人民。”

這是中央委員會的任何一個成員公開表明我們同莫斯科有差別的第一次。這也是我自己第一次意識到（這並不是受鐵托的話的影響，但也並非毫無關係），如果我們要在對立的兩大世界的這一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生存下去，這種差別性就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1943年11月29日在亞依茨召開的反法西斯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那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實際上等於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在南斯拉夫建立新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同時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員會來擔任南斯拉夫的臨時政府。黨中央在開會準備這些決議時，決定事後再把這一切通知莫斯科。我們從以前同莫斯科交往的經驗和莫斯科的宣傳方針都可以看到，它是不会諒解我們的。事實也的確是這樣。莫斯科對這些決議的反應是如此消極，以致決議的某些部分甚至連自由南斯拉夫電台（這個電台是為了南斯拉夫抵抗運動的需要而設在蘇聯的）也沒有廣播。可見蘇聯政府對於南斯拉夫革命的最重要的行動也不理解，這一行動已經把革命轉變為一種新的秩序並將其帶到國際舞台上來。直到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國家對亞依茨會議的決議採取諒解態度的時候，莫斯科才改變立場來適應現實。

但是，不管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對這些經驗感到多么痛心（他們只是在1948年同莫斯科決裂以後才能理解這些經驗的意義

的)，也不管他們有多么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有人在思想意識上忠於莫斯科的義務，把自己看成莫斯科的最堅定不移的追隨者。儘管切身的革命利益和其他現實越來越徹底而不可挽回地把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同莫斯科分离開來，但是，他們卻把這些現實，特別是把自己的革命成就，看成自己同莫斯科和它所倡導的思想綱領血肉相連的例證。對於南斯拉夫人來說，莫斯科不僅是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中心，而且是一種抽象的理想——“沒有階級的社会”——的實現，這種理想非但使他們的犧牲和苦難變得輕鬆和甜蜜，而且也在他們自己眼中使他們自身的存在有了意義。

南斯拉夫共產黨不僅像蘇聯共產黨那樣在思想上團結一致，而且他們對蘇聯領導的忠誠是黨的發展和活動的要素之一。斯大林並不只是不可爭辯的天才領袖，而且他就是新社會的理想和美夢的化身。對斯大林個人的偶像崇拜和對蘇聯一切事物的或多或少的盲目歌頌，已經達到不合理的程度和不合理的形式。蘇聯政府的每一項行動，例如進攻芬蘭，蘇聯的一切消極方面，例如審訊和清洗，都加以辯護和解釋。更可怪的是，共產黨人居然成功地使自己確信這些行動是正當的，切合實際的，並且從內心中消除了那些不愉快的事實。

在我們共產黨人中間，有些人具有修養很高的審美觀念和豐富的文哲知識，然而我們卻不僅傾倒於斯大林的觀點，而且傾倒於這些觀點的“完美”的提法。我自己在討論中就曾多次提到他的文体的水晶般明晰、邏輯的洞察幽微和論斷的妥貼周到，好像它們是最高智慧的體現似的。然而，就是在那個時候，要是別人寫出同樣性質的東西的話，我也不難看出這樣的文体是枯燥的、貧乏的，是庸俗的新聞體裁和聖經語調的生拼雜湊。有時這種偶像崇拜達到了可笑的地步：我們曾經認真相信戰爭將在

1942年結束，因為斯大林是這樣說的，而在沒有應驗的時候，他的預言也就被人忘掉了，這位先知的超人能力一點也沒有受損失。其實，發生在南斯拉夫共產黨人身上的事情，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也曾發生在一切使個人命運和人類命運完全服從一個理想的人的身上；他們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鬥爭需要，按照為這一鬥爭辯解的需要來描繪蘇聯和斯大林。

由於這種情況，南斯拉夫軍事使團是一方面懷着蘇聯政府和蘇聯的美妙形象，一方面帶着自己的實際需要到莫斯科去的。表面上，它同派往英國的使團相似；但是它在成員和概念方面，實際上給一個非正式的紐帶蓋了一個具有同樣觀點和目的的政治領導的烙印。更簡單地說，使團既須有軍事的性質，也須有黨的性質。

(二)

因此，我以黨的高級幹部的身份同維利米爾·特爾基奇一起被鐵托指定參加使團，決不是偶然的。（那時我參加黨的領導核心已有好幾年了。）使團的其他團員也是以黨幹部或軍事幹部的身份被挑選出來的，其中有一位是財政專家。使團還包括原子物理學家巴甫列·薩維奇，他此行的目的是到莫斯科從事他的科學工作。和我們一起的還有雕塑家安東·奧古斯丁契奇，領導上讓他暫時脫離戰時的艱苦生活，以便能繼續從事他的藝術工作。不過我們這幾個人倒都是穿上了軍裝的。我的級別是將軍。我想我所以被選上，部分是因為我熟悉俄文（我是戰前在監獄里學會的），部分是因為我以前從沒有去過莫斯科，因此在我身上沒有任何過去的派系活動或路線偏差的包袱。使團的其他成員也都沒有到過蘇聯，可是他們沒有一個精通俄文。

这时候是1944年3月初。

我們花了几天的时间来集合使团的成員，准备行装。我們的軍装是旧的，而且各种顏色都有。由于缺乏布，新的軍装只能从被俘的意大利軍官的軍装改制而成。我們还必须要有护照，以便通过英国和美国的領土。我們匆忙地赶印了这些护照。这是新南斯拉夫国家的第一批护照，上面有铁托的亲笔签字。

有人几乎自发地建議送給斯大林一些礼品。可是，送什么礼品？从哪儿来？那时最高司令部設在波斯尼亚的德瓦尔。周圍一带几乎全部是被搶劫一空的村庄和劫后的荒凉的小城鎮。虽然如此，还是找到了解决办法：把一支1941年在友集斯的游击队工厂制造的步枪帶給斯大林。找一支这样的步枪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接着，礼品开始从各个农村送来了——荷包、毛巾、农民的衣服和鞋子。我們从其中選擇最好的——一些用生皮做的凉鞋和其他同样簡陋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些东西具有这样的性质，我們才决定应当把它們帶去作为人民的誠意的表示。

使团的一个任务是安排好苏联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的援助。同时，铁托囑托我們通过苏联政府或其他途徑为南斯拉夫的解放区获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我們还要向苏联政府要求二十万美元的貸款来抵补我們在西方国家的使团的开支。铁托強調說，我們应当声明，当我們国家获得解放的时候，我們將如数偿还貸款以及武器和药品的援助。使团必須攜帶最高司令部和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的档案文件。

最重要的是，它必須探明苏联政府有沒有可能承认民族解放委員會为合法的临时政府，并在这个問題上对西方盟国施加影响。使团将通过苏联使团与最高司令部保持联系，它还可以利用共产国际原来的途徑。

除了使团的这些任务之外，在我們动身时铁托还囑托我从

季米特洛夫或者斯大林（如果我能見到他的話）那里了解一下，對我們黨的工作是否有什么不滿。鐵托的这个命令純粹是形式上的；要我們注意我們同莫斯科的紀律关系——因为他确信，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經出色地而且是独一无二地經受了考驗。我們還討論过在国外流亡的南斯拉夫黨員（战前逃往俄国的共产党人）的問題。鐵托的态度是，我們不要卷入和这些流亡分子的互相指責中去，特别是如果这些人曾經和苏联机关或干部有关系的話。同时鐵托还強調說：我必須留神办事人員，因为有各色各样的人。我了解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不仅要保卫已經成为傳統的黨的道德，而且要避免可能損害南共和南共黨員的聲譽的事情。

我兴奋地期待着立即同苏联見面，激动得渾身顫抖。我相信苏联是历史上第一个賦予空想家的迷夢、战士的决心和烈士的苦难以真正意义的国家。我的这个信念比鋼铁还要坚强，因为我也曾在牢獄里受过折磨和拷打，也曾憎恨过，也曾洒过鮮血，甚至不吝惜我自己的弟兄的鮮血。

可是，我也有感傷，我不願意离开战斗着的同志們和进行殊死斗争的祖国，它已經变成一片戰場和烟火瀰漫的廢墟了。

我向苏联使团告別，感到比平时的見面更加亲切。我拥抱我的同志們，他們也像我那样激动。然后我动身到鮑桑斯基·彼特罗瓦茲附近的临时機場。我們在那里停留了一整天，視察機場并且同那里的工作人員談話，他們已經具备一个正規服务机构的 attitude 和作风了。我們还和农民談了話，他們已經逐漸习惯于新政权并且認識到这个政权必然取得胜利。

最近，英国飞机經常夜間在这里着陸，但是数目不多，最多一个晚上降落两三架。它們运走伤员和临时乘客，运来一些物資，通常是藥品。不久以前，一架飞机居然运来了一辆吉普

車——这是英国司令部送给铁托的礼物。就在这个机场，一个月以前的一个中午，苏联军事使团乘坐一架装着滑雪板的飞机降落了。从这里的地势和其他条件来看，这次降落的确是真功夫，从它有相当多的英国飞机护航来看，它又像一次特别的检阅式。

我认为，我的飞机这次先降落然后再起飞也是了不起的，这架飞机必须低空飞越锯齿形的岩石，以便降落在狭窄而不平坦的冰面上，然后再从那里起飞。

我的祖国在黑暗中是多么悲哀和颓丧！山岭上白雪皑皑，被黑色的岩缝所撕裂；山谷已被幽暗吞没，一直到海边和海上都没有一线光明。在我们下面就是战争，比以往任何战争更加可怕，它是在一块习惯于战争和革命的脚步声和呼吸的土地上进行的。整个民族正在同侵略者进行搏斗，同时，自己的弟兄却在更残酷的战斗中彼此厮杀。什么时候明灯能重新照亮我们祖国的乡村和城镇呢？在所有这一切的仇恨和死亡以后，它能享受到欢乐和安宁吗？

我们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巴利，那里有一个相当大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基地——医院、仓库、粮食和装备。从那里我们朝着突尼斯方向飞行。由于德寇在克里特岛和希腊有基地，我们必须绕道飞行。途中，我们在马耳他岛停歇，由英军司令招待。晚上抵达多布鲁克的时候，正赶上看到从红色岩礫的沙漠里升起的一片浓密的火光冲向天空的情景。

第二天我们抵达开罗。英国人周到地把我们安置在一个旅馆里，并且把一辆汽车交给我们使用。商人和服务员把我们当做俄国人，因为我们帽子上有五角星。但是当我們提到我们是南斯拉夫人或者说到铁托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地发现，他们是知道我们的斗争的。在一个商店里，女售货员用粗俗的南

斯拉夫話招呼我們，她是从流亡軍官那里天真地学来的。有一批这样的流亡軍官，一心願意打仗和朝夕怀念受难的祖国，因而表示拥护铁托。

当我知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李曼在开罗，我就要求苏联公使帶我去見他，以便向他提出我們的要求。这位美国人毫不拖延地接待了我，但是冷淡地說，我們的要求将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下次会议上予以考虑，并且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原則上只同合法政府打交道。

我对西方資本主义抱有原始的和教条主义的看法，认为它是一切进步以及弱小和被压迫民族的不可調和的敌人，这种認識甚至在我第一次同西方資本主义的代表見面时就得到了证实。我注意到李曼先生是躺着接見我們的，因为他的腿受了扭伤，显然由于这个緣故和天气炎热而煩惱，而我却誤解为是对我們的來訪表示厌烦。他的俄文譯員——一个相貌粗魯、毛发很多的巨人，在我看来就是美国牧童故事片里的坏人的形象。但是我沒有理由对于訪問这位彬彬有礼的李曼感到不滿意；我們提出了要求，他答应予以考虑。

我們利用在开罗逗留三天的机会，观光了这里的名胜古迹。当时英国駐南斯拉夫使团的第一任团长狄金少校正好在开罗，于是我們又成了他的友好的宴会上的客人。

从开罗，我們飞往巴格达附近哈巴尼亚的英国基地。英国司令部拒絕我們開車到巴格达去，理由是那里不太安全。我們认为他是想掩盖他們的殖民恐怖統治，我們以为这种恐怖統治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德国人对我国的占領。英国人虽然不讓我們到巴格达去，却請我們参观他們的士兵的运动會。我們去了，并且坐在司令的旁边。我們的軍服被帶子扎得东凸西凹，風紀扣和所有的扣子都扣得紧紧的。我們的样子連自己也觉得滑稽，

更不用說那些有礼貌的懶散的英国人了。

我們有一位少校陪着，他是一个愉快的好心腸的老家伙。他不断地抱歉說，他的俄文不好——他是在俄国革命期間英国干涉阿尔罕格尔斯克的时候学会俄文的。他对俄国人很热情（俄国的代表团也在哈巴尼亚停留过），这倒不是因为他們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他們的单纯，尤其是因為他們能“为斯大林，为丘吉尔！”一口喝干一大杯伏特加或威士忌。

这位少校从容不迫而不无自負地談到他們同那些被德国特务煽动起来的当地人进行的战斗；在那場战斗中，飞机庫也被子彈打穿多处。按照我們的教条的想法，我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更不用說是合理了）“为帝国主义”牺牲自己——我們就是这样来看西方国家的斗争的。但是在我們自己内心里，我們是贊賞英国人的英雄气概和大胆无畏的，他們在遙远的酷热的亚洲沙漠里冒险前进，并且取得了胜利，尽管他們的人数很少而且毫无获得任何援助的希望。虽然我当时不能从这一点得出广泛的結論，但是它确实帮助我終于認識到：在我們的世界里，并不是只有一种理想，而是有着数不尽的并列的人类制度。

我們怀疑英国人，因此對他們敬而远之。由于我們對他們的間諜—情报机关抱有一种极肤淺的看法，我們的恐惧就更加严重了。在我們的态度里，夹杂着陈腐的教条、惊险小說的影响和涉世不深的新手的怯懦。

当然，要不是那些口袋里装满了最高司令部的档案文件，还装了共产国际和我們来往的电报，我們的恐惧也不会这么大。我們还认为值得怀疑的是，無論哪里的英国軍事当局对于这些口袋都不感兴趣，好像这些都是装着鞋和罐头的口袋一样。說实在的，我在整个旅途中一直把它們放在身边。为了避免我晚上一个人睡觉，馬尔科和我睡在一起。他是战前入党的門的内哥罗人，

單純，然而非常勇敢，对党忠誠。

一天晚上，在哈巴尼亞，一個人輕輕地打开了我的房門。尽管門沒有吱呀作聲，我却驚醒了。在月光里看到一個本地模樣的人。由于給蚊帳絆住了，我大叫一聲并伸手在枕下拔出手槍。馬爾科跳下床來（他是穿着衣服睡覺的），但是這位不速之客不見了。十分可能是一位本地人迷了路或者是想進來偷點東西。但是他的微不足道的出現却使我們看到了英國間諜的長臂，因此我們的高度警惕性進一步提高了。第二天，英國人派飛機送我們到德黑蘭去的時候，我們十分高興。

我們在德黑蘭的活動地段是從蘇聯司令部到蘇聯大使館那一段，它已經是蘇聯的一部分了。蘇聯軍官大方地熱誠地接待了我們，既表現了俄羅斯人的傳統的殷勤，又在同等程度上表現了世界上兩個不同部分的戰士們為同一理想而奮鬥的團結。在蘇聯大使館，我們參觀了舉行德黑蘭會議時使用過的圓桌，以及羅斯福住過的樓上的房間。現在沒有人住在那里，一切仍保留原樣。

最後，一架蘇聯飛機載我們飛往蘇聯——我們的夢想和希望實現了。我們愈深入地飛進它的灰藍色的廣闊的天空，我就愈益被一種新鮮的、以前幾乎沒有出現過的情緒所支配。我好像正在回到一個誰也不知道的我自己的原始祖國。

我一向反對任何泛斯拉夫感情，而且也把當時莫斯科的泛斯拉夫思想看作不過是動員保守勢力來反抗德國侵略的一種策略而已。但是，我這時的情緒却似乎大為不同和更加深刻，甚至超過了我的共產主義的信念的限度。我隱約地回想起三個世紀以來，南斯拉夫的幻想家和戰士、政治家和君主，特別是苦難的門的內哥羅的不幸的公國君主兼主教們，怎樣到俄國去朝聖，從那里尋求諒解和拯救。我是不是也在走他們的道路？這

难道不就是我們的祖先——他們被某种不知名的雪崩帶到多風暴的巴尔干——的祖國嗎？俄國從來沒有理解過南部斯拉夫人和他們的願望；我相信這是因為那時俄國是沙皇制度和封建的國家。但是，更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我相信莫斯科同其他民族不和的一切社會原因和其他原因都已經消除了。當時，我把這看成是四海一家的理想的實現。而且也看成是我個人同史前期斯拉夫社會的本質的聯繫。這豈不非但是我的祖先的祖國，而且也是那些為最終實現人類大同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奮鬥犧牲的戰士的祖國嗎？

我逐漸融化在伏爾加的波浪和無邊無際的灰色大草原里，我發現了原來的我，充滿了迄今無人知道的一種內心的激動。我想吻這塊俄羅斯的土地，在我腳下的蘇聯的土地，要不是因為這近乎宗教性，尤其是近乎戲劇性的話，我本來是會這樣干的。

在巴庫，歡迎我們的是一位司令官，一位沉默寡言的高大的人，由於駐防生活、戰爭和服役而變得為人粗野——他是一次大戰和一個反抗慘無人道的侵略的偉大國家的化身。他的粗野的熱誠，被我們的几乎是羞怯的克制為難住了。“這都是些什麼人？他們不肯喝，不肯吃！我們俄國人能吃，更能喝，最能打仗！”

莫斯科是陰暗的、憂郁的，使人驚訝地充滿了低矮的建築物。但是，同他們為我們準備的接待比起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受到了按官階大小而區分的禮遇和因為我們鬥爭的共產主義性質而故意加以克制的友情。有什麼能和這次戰爭的莊嚴偉大相比呢？我們相信這次戰爭是人類最後的考驗，是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命運。除了在蘇維埃國家——我們和全人類的國家——存在的現實，把噩夢化為寧靜和喜悅的現實，其他一切不都是黯淡無光和毫無意義的嗎？

(三)

他們把我們安置在“紅軍招待站”——一種招待紅軍軍官的旅館。這裡的吃食和其他方面都非常好。他們給我們一輛汽車并附帶一位司機，司機的名字叫潘諾夫，是一個上了年紀，單純，有些駝背，但是有獨立見解的人。還有一位聯絡官，柯佐夫斯基上尉，是一個年青而非常漂亮的小伙子，他由於出身於哥薩克而感到自豪，特別是因為在這次戰爭中，哥薩克人已經把他們的反革命的過去“一掃而光”。多虧他的幫助，我們無論什麼時候總是買得到戲票、電影票或任何別的東西。

但是我們卻不能和蘇聯的領導人物建立認真的接觸，儘管我曾請求當時的外交人民委員維·米·莫洛托夫接見，如果可能的話，還請求蘇聯總理、武裝部队的最高統帥約·維·斯大林接見我們。我通過迂迴曲折的辦法提出我們的請求和需要的一切嘗試都落空了。

在這方面，南斯拉夫大使館一點也不能幫助我們。這個大使館仍然是屬於國王的，儘管西米奇大使和他的一小伙工作人員已經宣布擁護鐵托元帥。雖然他們在表面上受到尊重，但在事實上卻比我們更微不足道，因而更無能為力。

我們也無法通過流亡在那裡的南共黨員取得什麼成就。他們人數不多——在清洗中犧牲了很多。他們之中最有名望的人物是維利科·弗拉霍維奇。我和他同年，都是貝爾格萊德大學反對亞歷山大國王獨裁統治的革命學生運動中出身的革命家。他是西班牙內戰的老兵，而我則參加了一次更為殘酷的戰爭。他的為人極其正直，受過高等教育，聰明，但過分謹小慎微，沒有獨立的見解。他經營自由南斯拉夫電台，他的合作是有價值的，但

是他所接触的人，地位最高的不超过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自从共产国际被解散后，季米特洛夫和 D·Z·曼努耳斯基共同领导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外国共产党部。我们吃得很好，并且受到优厚的招待，但是就我们必须提出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来说，却一点也不能取得什么进展。说实在的，必须再一次强调：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受到了特别亲切周到的招待。但是，直到我们来到莫斯科一个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特尔基奇和我，并在报纸上发表了这项消息的时候，所有臃肿的苏联行政机关和苏联社会高不可攀的显要阶层的大门才像魔术般地打开了。

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泛斯拉夫委员会，是第一个为我们安排酒会和欢迎会的组织。但是任何人（不一定是共产党人）都可以发觉，这个组织不仅是生造出来的，而且是毫无希望的。它的活动集中在公众联系和宣传方面，但即使在这方面，它的活动也显然受到限制。此外，它的宗旨也不十分明确。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都是从斯拉夫国家来的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流亡分子，他们事实上是同泛斯拉夫的互利观念格格不入的。所有这些人都暗中了解，它是在使某种早已过时的东西复活，是一种过渡的形式，其目的在于争取对共产主义俄国的支持，或者至少是瓦解反苏的泛斯拉夫潮流。

这个委员会的领导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委员会主席龔多罗夫将军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早衰的人，他的见解贫乏，甚至在斯拉夫人如何能达成团结这种最简单的问题上都无法和他谈出什么结果来。委员会的书记莫恰洛夫却更有权力，这是因为他和苏联的保安机关比较接近的缘故，这一点由于他的举止狂妄因而掩饰不了。龔多罗夫和莫恰洛夫都是红军的军官，但是他们都是属于那些不适于上前线的一类。谁都可以从他们身上觉察到那种被降级去做那些他们认为非本行工作的人们的抑郁的

心情。只有他們的秘書納扎羅娃，一位牙縫很寬的、善于逢迎的女人，才有一点近乎对苦难的斯拉夫人表示怜爱的感情。后来在南斯拉夫我們才知道，她的活动也是受苏联保安机关支配的。

在泛斯拉夫委员会总部，大家吃得很好，喝酒更多，但大多数只是聊天。頻繁的和空洞的敬酒，彼此的祝詞沒有多大区别，可是肯定沒有沙皇时代的祝詞那样美。使我吃惊的是泛斯拉夫观念缺乏任何新鮮的东西。这个委员会的建筑也正是这样——在一个現代化城市中模仿巴洛克式^①之类的建筑。

委员会是一种暫时的、肤淺的、并非完全利他主义的政策的产品。然而，为了让讀者正确地理解我，^{*}我必須补充說明，尽管我当时就已經对于这一切十分清楚，但是我却并非以厌恶和惊奇的眼光去看它的。泛斯拉夫委员会是苏联政府的一个赤裸裸的工具，用来拉攏苏联国外的斯拉夫落后阶层，它的官員都从屬於政府的秘密和公开机关并与之联系——所有这一切事实都絲毫沒有使我感到不安。我只是对它的无能和肤淺感到不滿，首先是它不能为我打开通向苏联政府和解决南斯拉夫需求的途徑。像一切共产党人那样，我也受过熏陶并且深信，在苏联和另一个民族之間，特别是和一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南斯拉夫的党之間不可能存在对立。虽然泛斯拉夫委员会在我看来是太陈旧了，因而是对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合适的工具，但是我仍然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尤其因为苏联的领导人坚持要成立这个組織。至于它的干部同保安机关的联系，难道我沒有学会把这看作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卫者——“掌握在党手里的劍”嗎？

我坚持要会见苏联政府最高領導一事的性质，也需要解釋

^① 巴洛克式(baroque)是十七、十八世紀的一种建筑風格，此处指老式建筑之意。——譯者

一下。尽管我一再催促，但是我对苏联政府既沒有糾纏不休，也沒有憤憤不平，因为我已經受过訓練，把它看做甚至比我自己的党和革命的領導更偉大的东西，看做整个共产主义的領導力量。我已經从铁托等人那里知道，长期等待——正确地說，外国的共产党人的长期等待——在莫斯科是一件很时兴的事。使我煩惱和焦急的原因，是革命的需要的急迫性，何况还是我的南斯拉夫的革命呢。

虽然沒有人談起革命，甚至連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也不談，但是早已很明显，革命是在进行着。在西方国家，他們已經写了很多关于这个革命的东西。但是在莫斯科，他們却冷酷地拒絕承认它，甚至那些（如果可以这么說）完全有理由承认它的人也是如此。每个人固执地只談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甚至更固执地单单強調那个斗争的爱国性质，始終突出地強調苏联在整个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自然，我心里从来没有想否认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中或是紅軍在反希特勒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在我的祖国的土地上，在他們自己的条件下，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显然是在进行着一个与紅軍的暂时勝負无关的战争，而且是一个在同时改变着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战争。無論对外或对內來說，南斯拉夫的革命都超越了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和它容許的范围，这就是我对于我所遭到的阻碍和不諒解的解釋。

最奇怪的是，那些本該对于这一点了解最清楚的人都順从地毫无动静并且假装不了解。我后来才知道，在莫斯科，关于政治局勢的討論，特別是决定，必須等到斯大林或至少莫洛托夫談过以后才行。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甚至那些显要人物，如前共产国际的書記曼努耳斯基和季米特洛夫。

铁托、卡德尔以及到过莫斯科的其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都曾說过，曼努耳斯基对南斯拉夫人特別有好感。这可能是他在

1936—1937 年的清洗中吃苦头的原由；那时几乎整批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清洗中死去。但是現在，在南斯拉夫人反抗納粹的起义以后，他的看法倒可以被认为是有遠見的了。无论如何，曼努耳斯基在他热情支持南斯拉夫的斗争中还加入一定的个人自豪的成分，尽管也許除了铁托以外他并不認識任何一位南斯拉夫的新领导人，而对铁托他也并不熟悉。我們同他的会見是在晚上举行的。在座的还有 G·F·亚历山大罗夫，他是著名的苏联哲学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央委员会的宣傳鼓动部部长。

亚历山大罗夫沒有給我留下鮮明的印象；观点模糊，或者說沒有主見，是他的基本特征。他是一个矮胖的秃子，他的蒼白和肥胖說明他从来也不走出办公室一步。除了几句照例的客套和溫和的微笑而外，他一字不提南斯拉夫共产党起义的性质和范围，尽管我在談話中（大概不是故意的）接触到了这些問題。显然，苏共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决定它的立場；因此，就苏联的宣傳來說，南斯拉夫的起义仍然只是一种反抗入侵者的斗争，对于南斯拉夫国内或对于国际关系毫无实际的影响。

曼努耳斯基也沒有采取明确的立場。但是他却表示出热烈的真情的关怀。我早就听说他有讲演的天才。人們即使从他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出这种才华，他以他的詞句的优美和生动簡直閃耀着光輝。他是一位瘦小和早已駝背的老前輩，黑头发，留着一撮修剪过的鬚鬚。他发 S 和 Z 音不大清楚，但講話是柔和而不費力的，这当时使我很吃惊。他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体貼，和藹到令人高兴的程度，显而易見的學識淵博。

在談到南斯拉夫起义的发展时，我指出，正在用新的方式成立一个在本质上与苏維埃相同的政府。我特別強調农民的新的革命作用这一点；实际上我把南斯拉夫的起义归結为农民暴动

和共产党先鋒队之間的紐帶。但是虽然他和亚历山大罗夫都沒有反对我所說的話，但是他們却一点也不表示贊同我的看法。尽管我认为在一切事情上斯大林的作用有决定性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仍期望曼努耳斯基在言行上有較大的独立性^①和主动精神。我与他會見之后，我对他的人格的生命力銘刻于心，并且为他对南斯拉夫的斗争的热情所感动，可是我也相信，曼努耳斯基在莫斯科的决策上并不起什么真正作用，即使在有关南斯拉夫的問題上也是这样。

他談到斯大林的时候，他試圖用“科学的”和“馬克思主义的”的公式来掩飾极度奉承。关于斯大林，他的表达方式大致是这样的：“您知道，一个人在战争的严重关头竟能起这样决定性的作用簡直是难以想像的。在一个人身上竟然具备那样多的才能——政治家、思想家和軍人！”

我的关于曼努耳斯基处于无关紧要地位的观察，后来得到了无情的证实。他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外交部长（他生来就是一个乌克兰籍的犹太人），这意味着他最終脫离了实际的政治活动。是的，作为共产国际的書記，他曾是听命于斯大林的工具，这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过去并不完全是布尔什維克；他曾屬於托洛茨基領導的所謂“区联派”^②，这一派在1917年革命的前夕才加入了布尔什維克。1949年我在联合国見到过他，他在那里以乌克兰的名义出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和“铁托法西斯匪帮”。他的演說天才只剩了大叫大嚷，他的透徹思想只剩了陈詞

① 根据《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要讀本》，这个“区联派”是一个“人数不多的集团，从1913年起便存在于彼得格勒，其中所包括的是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一部分从党内分裂出去的从前的布尔什維克。‘区联派’在大战时是个中派主义的組織，他們进行过反对布尔什維克的斗争，但在許多問題方面他們对孟什維克也不表贊同，因此他們所采取的是中間的、中派主义的、动摇的立場”。（1949年解放社版第309、310頁）——譯者

濫調。他已經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衰弱的小老头兒了，當他從蘇聯特權階級的陡峭的梯子上滑下來時，關於他的幾乎一切痕迹都消失無餘了。

季米特洛夫卻不是這樣的。在我逗留期間，曾會見過他三次——兩次是在蘇聯政府的醫院里，第三次是在莫斯科附近他的別墅里。每一次都使我覺得他是一個病人。他呼吸短促，皮膚的顏色是屬於一種不健康的紅里帶白，他的兩耳周圍的斑點已干結，好像生過濕疹似的。他的頭髮稀少，露出已經枯萎的黃色腦壳。但是，他的思想却很敏銳而清新，同他的緩慢和疲乏的動作恰好形成對照。這位早衰的、身體差不多枯竭的人，卻仍然放射出一種強大的、自覺的活力。他的面貌也說明了這一點，特別是他的凸出的淺藍色眼睛的緊張的眼光和他的抽動的隆起的鼻子和下巴。雖然他不是暢所欲言，然而他的談話是坦率的，堅定的。不能說他不了解南斯拉夫的局勢，雖然他也認為——考慮到蘇聯和西方國家的關係——承認南斯拉夫鬥爭事實上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時機尚未成熟。當然，我也覺得我們宣傳的主要努力應當着重在對侵略者的鬥爭上，因而這也意味着不強調鬥爭的共產主義性質。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蘇聯領導人以及季米特洛夫應當了解——至少在南斯拉夫問題上——堅持要共產黨和資產階級政黨聯合起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大戰和國內戰爭早已證明，共產黨是唯一的真正的政治力量。我的這種看法的意思是，不承認流亡的南斯拉夫保皇政府，實際上也就是不承認君主政體。

在第一次會見時，我向季米特洛夫敘述了南斯拉夫的發展和局勢。他坦率地承認，他過去沒有料到南斯拉夫的黨會證明是最有戰鬥性和最機智的黨；他曾把更大的希望寄予法國的黨。他回憶道，1939年末，鐵托在離開莫斯科的時候曾發誓說，南斯

拉夫的党将洗刷掉被各种派系分子塗上的污点，证明它无愧于它的名称。当时季米特洛夫劝他不要发誓，而要明智地和坚决地行动。他进一步詳細地叙述道：“你知道，当委派誰担任南共书记的問題提出来的时候，曾有一些犹豫不决，但我是贊成瓦尔特（瓦尔特是当时約瑟夫·布罗茲在党内用的化名；后来他采用了铁托这个名字）。他那时是个工人，在我看来他是可靠的，严肃的。我很高兴，我没有看錯人。”

季米特洛夫几乎是道歉似地說，苏联政府沒有能在南斯拉夫游击队最需要的时候給予援助。他自己曾亲自促使斯大林关心这件事。这是真实的。早在1941—1942年，苏联駕駛員曾經努力想打通同南斯拉夫游击队基地的联系，而同机的一些回家去的南斯拉夫流亡分子却突然退縮了。

季米特洛夫还提到我們同德国人关于交换俘虏的談判，他說：“我們为你們担心，幸好結果不坏。”

对这个問題，我没有表示什么意見；我也不願讲超过他所肯定的东西，即使他坚持問我細節，我也不会讲。但是他当时也不会說或者問他不該說不該問的事情，因为在政治上，結果好的事情不久就被忘掉了。

事实上，季米特洛夫并不坚持任何事情；共产国际确实是解散了，他的唯一的任务是收集各国共产党的情报并向苏联政府和党提供意見。

他告訴我，解散共产国际的主意最初是怎样来的。那是在波罗的海国家被苏联吞并的时候。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經很明显，傳播共产主义的主力是苏联，因此一切力量都必須直接集合在它的周圍。由于国际形势，解散一事曾被推迟，以免給人一种印象，以为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下这样做的。当时和德国人的关系不坏。

季米特洛夫是得到斯大林的稀有的尊重的一个人，而且，也許不那么重要的是，他是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可爭辯的領袖。后来两次我同季米特洛夫的会晤，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第一次会晤时，我向保共中央委員們叙述了南斯拉夫的情况；第二次会晤时，曾談到可能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合作和保加利亚的斗争。

在同保共中央委员会会晤时在座的，除了季米特洛夫外，还有科拉罗夫、契尔文科夫等人。我第一次訪問时，契尔文科夫就曾向我致意，可是他沒有留下来，我当时把他当做是季米特洛夫的私人秘书。在第二次会晤时，他也坐在背后——沉默而謙虛，虽然我后来对他得出了不同的印象。我早已从弗拉霍維奇和其他人那里知道，契尔文科夫是季米特洛夫的妹夫，在清洗的时候他原是該被捕的——对于他所任教的那个政治学校的“揭发”已經发表了——但是他到季米特洛夫那里去避难。季米特洛夫干預了內务人民委員部，才把事情办妥。

那次清洗对流亡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特別严厉，他們是那些除了到苏联以外就走投无路的不合法的共产党的黨員。保加利亚的流亡分子是幸运的，因为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的書記而且具有很大的权威。他拯救了他們当中的許多人。南斯拉夫人却沒有靠山；毋宁說，他們为了爭夺党内权力和热衷于证明自己对斯大林和列宁主义的忠誠而彼此互掘坟墓。

科拉罗夫已經老态龙鍾，他七十多岁了，而且已多年不从事政治活动。他是保加利亚党激烈的建党初期的遺老。他屬於“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左翼，后来发展成为共产党。1923年，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曾对贊科夫將軍的軍人集团举行武装反抗，后者在不久前曾发动政变，并杀死了农民領袖亚历山大·斯坦布利斯基。科拉罗夫有一个巨大的头，更像是土耳其

人的头型而不像斯拉夫型。他有雕琢的面貌，高大的鼻子，厚实的嘴唇，但是他的思想却过时了，而且我并无恶意地说，他想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我向科拉罗夫叙述的南斯拉夫的斗争，并不只是一种分析，而且是一幅可怖的毁灭和屠杀的情景。在战前的一万名左右党员中，目前还活着的不到两千人，而我估计我们部队和人民当时的损失在一百二十万人左右。然而，在我的详细叙述之后，科拉罗夫认为宜于问我的一切，却只有这样一个问题：“照你看来，马其顿的语言近似保加利亚语呢，还是塞尔维亚语？”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同保共中央委员会早已发生过多次严重的争吵，因为保共中央认为，由于保加利亚占领了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在马其顿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就应由它管辖。最后共产国际制止了这场争论，它表示同意南斯拉夫的观点，但只是在德国进攻苏联以后。不过，由于马其顿问题以及有关反抗保加利亚占领者的游击队起义的问题上的磨擦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德国和同它一起的保加利亚必然复灭的时刻日趋接近，这种磨擦更趋严重了。弗拉霍维奇在莫斯科也已注意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对南斯拉夫的马其顿的无理要求。说实在的，必须补充一下，季米特洛夫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有些不同的：他最关心的事情是保南和解的问题。但是哪怕是他，我也不相信他坚持马其顿是一个单独民族的观点，尽管他的母亲是马其顿人，而且他本人对马其顿人的态度有显著的感情。

也许我在回答科拉罗夫的时候，说话太不留情了，我说：“我不知道马其顿的语言是接近于保加利亚语还是塞尔维亚语，但是，马其顿人决不是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也决不是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听了很不高兴。他的脸涨红了，摇着手说：“这无关紧要！”于是他转到了另一个问题。

我不記得誰參加了我同季米特洛夫的第三次會晤，但一定少不了契爾文科夫。那次會晤是在1944年6月初我動身回南斯拉夫的前夕。當時要談的是南斯拉夫的和保加利亞的共產黨人之間的合作問題。其實這是不值得討論的，因為當時保加利亞實際上並沒有游擊隊。

我堅持認為，在保加利亞應當開展軍事行動和建立游擊隊，並且認為指望保加利亞的皇家軍中發生叛變是一種幻想。我的意見是以南斯拉夫的經驗為根據的：南斯拉夫游擊隊從舊的南斯拉夫軍隊中只得到個別軍官，而共產黨不得不在非常頑強的鬥爭中建立一支由小部隊組成的軍隊。季米特洛夫顯然也抱有那種幻想，儘管他的確同意必須積極建立游擊部隊。

顯然，有些事情他知道而我卻不知道。當我強調說，甚至在南斯拉夫——那裡的占領已經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也還需要相當長的時期來對付它的殘余分子，他打斷我的話說：“無論如何，在三四個月之內，保加利亞將發生革命；紅軍不久將開到保加利亞邊境！”

雖然保加利亞沒有和蘇聯處於戰爭狀態，可是在我看來很清楚，季米特洛夫已把紅軍看做是決定性的因素。說實在的，他並沒有明確地宣布紅軍將進入保加利亞，但是顯然他當時就知道這將發生，而且他是在給我一個暗示。我知道季米特洛夫的看法和期望以後，再堅持開展游擊戰和建立游擊部隊就沒有任何重要性和意義了。談話便轉到交換意見和向鐵托及南斯拉夫戰士們致以兄弟般的敬禮。

季米特洛夫對斯大林的态度是值得談的。他也怀着欽佩和尊敬的心情來談論他，但卻沒有顯眼的奉承或崇拜。他同斯大林的关系，明顯地是一個對領袖有紀律地服從而又進行獨立思考的革命者的关系。他特別強調斯大林在戰爭中的作用。

他詳細地敘述道：“当德国人进逼莫斯科郊外的時候，接着发生了普遍的慌張和混乱。苏联政府已撤退到古比雪夫。但是斯大林仍然留在莫斯科。那时我和他一起在克里姆林宮里。他們正在把档案从克里姆林宮搬走。我向斯大林建議，由共产国际向德国士兵发表一項宣言。虽然他认为这无补于事，但仍然同意了。不久以后，我也必須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却不离开，他决心要保卫莫斯科。而在那个戏剧性的时刻，他在十月革命紀念日在紅場閱兵。在他面前的部队就要开赴前綫。当人民知道斯大林坐鎮在莫斯科，并且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这件事所起的鼓舞士气的作用之巨大，是难以表达的。它恢复了他們的信念，提高了他們的信心，它比一支勁旅更有价值。”

在那次会晤的时候，我認識了季米特洛夫的夫人。她是一位苏台德区的德国人。这是秘而不宣的，因为俄国的老百姓对德国人有一种普遍的自发的憤怒情緒，他們对这一点比对反法西斯宣傳更容易了解。

季米特洛夫的別墅是雅致豪华的。別墅里应有尽有——只是沒有欢乐。季米特洛夫的独生子已經死去，亡儿的像片就挂在他的书房里。这位战士一度是經得起挫折也能体会胜利的喜悅的，但是作为一个已經失勢的老人，季米特洛夫却再也不能得到幸福或者从一步步逼近他的四周寂靜的可怜境界中解脫出来。

(四)

在我們抵达莫斯科前几个月，莫斯科曾宣布，一个南斯拉夫旅已經在苏联建立起来了。在这以前，波兰和捷克的部队也已相继建立。我們在南斯拉夫想像不出，怎么会有这么大数目的

南斯拉夫人在苏联，因为連那些少数的政治流亡分子也大多在清洗中消失了。

現在，在莫斯科，一切事情我都明白了。南斯拉夫旅的大部分人力，是被克罗地亚卖国賊巴維里奇作为团結的象征而派到苏联战綫的德国人那里去的一个团的人員。但是，巴維里奇的軍隊很不走运，这个团被打垮了，在斯大林格勒被俘，并在例行的清洗以后，改編为以指揮官麦錫奇为首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旅。从各处招来的几名南斯拉夫政治流亡分子在这个旅里担任政治职务，而苏联軍官——軍事专家和那些从保安机关来的人員——則主管装备和考核人員。

最初，苏联代表坚持这个旅的軍徽必須同南斯拉夫皇家軍一样，但在遭到弗拉霍維奇的反对后，他們才同意采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的軍徽。依靠电报来使軍徽一致是困难的，但是弗拉霍維奇还是尽其所能，因此我們发现那軍徽是和解和妥協的結果。在我們的坚持下，这个問題最后得到了解决。

关于这个旅，除了我們对于原任指揮官仍被留用感到不滿意以外，就沒有有什么其他重要問題了。可是俄国人却庇护他，說他已經悔悟了，又說他对他的士兵有影响。我的印象是，麦錫奇是一个毫无斗志的人，像很多人一样，他的轉变只是为了不被送进战俘营去。他本人并不滿意这个职务，因为他在部队里的职责显然等于零——純粹是形式上的。

这个旅駐扎在科罗姆納城附近的森林里。他們住在草皮房子里，而且不顾俄国冬天的严寒每天进行操练。最初，这个旅施行的苛刻的紀律，使我大吃一惊。这里存在着某种矛盾，即这个部队被认为要达到的目的和被认为要向它的士兵們灌輸这种目的的方式之間存在矛盾。在我們的游击队里，流行着一种同志愛和团結，懲罰只有在对付搶劫和不服从时才是严厉的。而这

里，一切都建立在盲目服从上，这种服从性，連普魯士的腓特烈一世都会羡慕的。但是我們也沒有能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因为苏联教官頑固粗魯，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士兵昨天还在德国人一边作战。我們进行了一次視察，发表了一次演說，表面上討論了問題，而让一切原封不动，的确，最后还同軍官們举行了不可避免的宴会，这些軍官們在頻頻为铁托和斯大林祝酒中喝得酩酊大醉，并且为斯拉夫人的兄弟友爱彼此拥抱。

我們的附带任务之一，是制造第一批新南斯拉夫的勳章。关于这一点，我們得到了充分的諒解；如果这些勳章——特别是1941年紀念勳章——做得不好的話，那与其說是苏联工厂的过錯，毋宁說是我們的儉朴和从南斯拉夫帶來的图样质量不高。

对外国部队的監督，是由內务人民委員部的朱可夫將軍負責的。朱可夫是一位身材細长面色蒼白的人，年紀还輕，精力充沛，不是沒有幽默和优雅的玩世不恭——特务机关人員中并不少見的品质。关于南斯拉夫旅，他对我說：“考虑到我們必須与之合作的諸色人等，它还算是不坏的了”。这是对的。如果，后来它在南斯拉夫同德国人作战的时候，表現并不出色，这不应当归咎于士兵的战斗素质，也不应当归咎于它在組織和經驗方面的缺陷，它是一支不同于苏軍的軍隊的一部分并且处在不同于东战場的作战条件下。

朱可夫將軍為我們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墨西哥的武官和我交談时表示願意給我們援助，但不幸我們却想不出怎样能把援助物資送到在南斯拉夫的我們的部队。

就在我快离开莫斯科之前，我曾在朱可夫將軍家里的晚宴上作客。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个小小的两間屋的公寓里。一切都很舒适而簡朴，虽然在莫斯科來說这几乎是豪华的了，特别是在战时。朱可夫是一位出色的干部，他从自己的經驗出发，他更

傾向于用武力而不是用思想意識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一定的親密，然而又有一定的保留，因為任何事情都不能把我們在習慣上和看法上的分歧拋開。只有彼此保持原來面目，政治上的友誼才是好的。在我離開他的公寓之前，朱可夫送給我一支軍官用的自動手槍——一件朴素的禮物，但在戰時倒是挺合適的。

另一方面，我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下同蘇聯特務機關會了面。通過科佐夫斯基上尉，我在“紅軍招待站”受到一位穿著朴素的瘦小的人的訪問，他並不隱瞞他是從國家保安機關來的。我們約定在第二天見面，見面的方式十分鬼鬼祟祟，而由於我曾多年從事地下工作，我恰恰認為這一切都過分複雜，簡直是迂腐不堪。一輛汽車在附近的一條街上等我，在東兜西繞開了一段路程以後，我們又換了一輛車，開到這個大城市的某條街後，我們下車步行到第三條街，在那里，從一所大樓的窗戶里有人扔下一把小鑰匙來，使我們終於能夠走進四層樓上的一個寬敞而華麗的房間里。

這個房間的主人——如果她是主人的話——是那種長著明亮眼睛的北方的金髮美人，丰满的體態更增加了她的美麗和魅力。至少在這個情況下，她那光彩奪目的美麗並不起什麼作用。而我發現她比帶我進來的男人更重要。她提問題，他把答語記錄下來。他們對共產黨的各級委員會的人物比對其他黨派的人更感興趣。我感到像受警察詰問般地不自在，可是我知道，提供所需要的情報是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如果是蘇聯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位委員召見我，我是不會猶疑的。但是，這些人的職務是對蘇聯的敵人或共產黨內部的奸細進行鬥爭，他們要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人的材料做什麼呢？儘管如此，我還是回答了他們的問題，避免作出任何確切的或否定的判斷，特

別是避免提到內部的磨擦。我这样做的时候，既出于在道义上討厌背后談論自己的同志，又出于对那些从心坎里有反感，我认为他們沒有权利侵入我的內心世界、我的看法和我的党。我的窘态无疑地被我的主人看出来，那次会見的公事部分持續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就轉变为一面喝咖啡和吃点心，一面进行不太勉强的同志式的談話。

我和苏联公众的接触却更頻繁，也更直接。那时在苏联，公众同来自盟国的外国人的接触并不严格限制。

由于战争正在进行，而我們又是发动反抗希特勒起义的唯一的党和人民的代表，所以我們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作家到我們这里来寻求新的灵感，电影制片人来找有趣的故事，新聞記者来要求写文章、找消息，而青年男女們則要求我們幫助他們坐飞机到南斯拉夫去当志願軍。

最有权威的日报《真理报》要我写一篇关于南斯拉夫的斗争的文章，《新时代》則要我写一篇关于铁托的文章。在这两件事情上，我都碰到了編輯方面的困难。《真理报》删掉了几乎所有論及斗争的性质和政治后果的地方。修改文章使其适合党的路綫，是我們党的工作方法的一部分。但是只有在牵涉到重大的偏差或微妙的問題才这样做。然而，《真理报》却刪掉了每一件与我們的斗争本质有关的事情——新政权和社会变化。它甚至修飾我的文章的風格，把并非不寻常的一切比喻都刪掉了，縮短了句子，并且把措詞的語气加以改变。文章变得沉悶而平凡。在同他們的一位編輯人員爭論以后，我同意这样刪改；在这样的事情上造成对立是沒有意义的，而且发表那样的文章总比不发表好。

跟《新时代》打交道，引起了更严重的麻煩。他們对我的風格和灵感的閹割倒不那么厉害，但是他們却冲淡了或刪去了几

一切肯定铁托的独创性和特殊意义的地方。在我第一次同《新时代》的一位編輯商談时，我只对一些不重要的改动表示同意。在第二次商談时，我才同意其他的修改。那时我已逐渐知道，在苏联，除了斯大林以外，沒有人可以受到推崇；这位編輯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說：“很为难，因为有斯大林同志在；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而由于文章保存了它的情調和精华，就更可以同意了。

对于我和其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來說，斯大林的领导地位是无可爭辯的。但是，使我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其他共产党領袖——在这件事情上是指铁托——不能得到贊揚，如果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他們是理所应得的話。

值得一提的是，铁托本人对这篇文章十分滿意，而就我所知，苏联报纸从来沒有发表过对任何其他在世人物如此高度的贊揚。

这只能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解釋：苏联的輿論——即共产党的意見，因为不存在別的輿論——对于南斯拉夫的斗争是热情的；而且在战争期間，苏联社会的气氛变了。

当我回顾过去，我可以說，有一种信念在苏联自发地流傳开来，那就是：这次战争已經证明苏联人民对祖国、对革命的基本成就忠心耿耿，经过这次战争，再也沒有理由实行政治限制或者让一小撮领导人、特別让一个領袖去壟断思想意識了。世界正在苏联人民的眼前发生着变化。显然，苏联将不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新的革命領袖和革命論壇正在出現。

当时，这种气氛和这种意見并未对苏联领导人有所妨碍，相反，这种意見却有助于加强作战努力。对于领导人本身說来，沒有理由不去鼓励这种幻想。再說，铁托，或者更确切地說，南斯拉夫人的斗争，在巴尔干和中欧引起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但沒有

削弱苏联的地位，反而在实际上加强了它。因此，沒有理由不宣傳和幫助南斯拉夫人。

但是在这方面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尽管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結成联盟，苏联的制度，或者不如說，苏联的共产党人，却感到在孤軍奋斗。他們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单独地为他們的生活方式而战。由于在对苏联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不开辟第二战場，也就是在西方沒有重要的战斗，甚至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士兵都感到孤单。南斯拉夫的起义帮助消除了領導人和人民的那种孤独感。

我既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南斯拉夫人，我被到处遇到的热爱和尊敬所感动，特別是在紅軍那里。在一个繳获的德軍武器展覽会上，我問心无愧地在来宾签字簿上写道：“我感到驕傲，这里沒有从南斯拉夫来的武器！”——因为这里有从全欧洲各地繳获来的武器。

他們建議我們訪問西南方面軍——第二烏克蘭方面軍——这个方面軍归伊·斯·科涅夫元帅指揮。我們乘飞机前往乌克兰的一座小城烏曼，那是一个滿目蒼夷的地区，这块地方是战争和无限的人类仇恨的遗迹。

当地的苏維埃为我们办了一頓晚餐和同城里的要人們的会見。在一所沒人管的、破破烂烂的房子里举行的那頓晚餐，并不是一件愉快事。烏曼的主教和党的書記甚至当着外国人的面也不能隱瞞他們彼此間的互不相容，尽管他們两人都在各自进行对德国人的战斗。

我以前曾从苏联官員那里知道，战争一爆发，俄国的大主教沒有征求政府的意見，就开始散发反抗德国侵略者的油印通諭，他們获得了远远超过他屬下的教士的响应。这些呼吁书的形式也是吸引人的，在千篇一律的苏联宣傳中，它們以其古老的和宗

教上的爱国思想放射出清新之感。苏联政府迅速地适应了它，并且也开始指望教会的支持，尽管他们仍然认为它是旧秩序的残余。在战争的苦难中，宗教复活了，并有所发展，苏联驻南斯拉夫使团团长考尼夫将军说过，许多人——包括十分负责的人士——在德国人入侵的生死关头，曾考虑把正教转变为一个较永久性的思想动员组织。他解释道：“我们甚至会靠正教来拯救俄国，如果那是不可避免的话！”

今天，这听起来似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但只有那些不了解突然降临在俄国人头上的打击之重的人，那些不懂得一切人类社会都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并发展那种在一定时刻最适合于保持和扩大其生存条件的思想的人，才不相信。考尼夫将军虽然是个醉鬼，但他并不愚蠢，他对苏维埃制度和共产主义是忠心耿耿的。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随着革命运动而成长，并必须靠坚持思想的纯洁来为生存而战斗的人来说，考尼夫的假设似乎是荒唐的。然而，当乌曼的主教举杯为斯大林祝酒，称他是“俄罗斯国土的统一者”的时候，我却丝毫不感到惊奇，因为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更不用说民族主义，已经如此广泛流行了。斯大林直觉地知道，他的政府和他的社会制度是经受不住德国军队的打击的，除非他们依靠俄国人民年深日久的渴望和民族精神的支持。

乌曼苏维埃的书记对于主教的巧妙而谨慎地强调教会作用，尤其对于人民的消极态度，感到十分冒火。他所指挥的游击队人数太少，甚至还对付不了亲德的乌克兰宪兵队。

真的，乌克兰人对战争和对苏联胜利所持的消极态度，是不可能加以掩饰的。当地居民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忧郁的沉默，他们丝毫不注意我们。尽管跟我们联络的军官掩饰乌克兰人的态度，但我们的俄国司机却破口大骂，说乌克兰人不出力作战，而

現在俄羅斯人不得不來解放他們。

第二天我們動身穿過烏克蘭春天的泥地——順着勝利的紅軍所經過的道路。我們不時看到被打得稀爛的和七歪八曲的德國裝備，這更加顯示出紅軍的本領和威力，但最使我們感到驚嘆的還是俄國士兵的堅韌和忘我精神，他們能够在德國人拚命進攻的暴風雨般的炮火下，埋在深及腰部的泥泊中，沒有面包，沒有睡眠，成天成周地支持下去。

如果我撇開偏見的、教條的和浪漫主義的熱情，我在今天，仍和那時一樣，對紅軍、特別是對它的俄羅斯核心的素質，給予高度的評價。說老實話，蘇聯的指揮幹部和在更大程度上它的士兵和下級軍官，受的是片面的政治教育，但是在其他一切方面，他們却在取得廣泛知識的同時發揮了主動精神。紀律是嚴峻和絕對的，但不是不合理的，它是和主要的目標和任務相一致的。蘇聯的軍官不僅十分精通技術，而且还擁有最有才干和最大膽的那部分知識分子。雖然相對地說，他們的待遇是優厚的，但他們本身卻沒有形成一個階級。雖然對他們並不要求精通馬克思主義，但是更加期望他們勇敢，在作戰中不退却——例如，在雅西的軍團司令的指揮部距離德軍戰綫只有三公里。斯大林曾進行了徹底的清洗，特別是在高級指揮官中，但是清洗的影響卻比現在人們時常以為的要小，因為他在同時毫不猶豫地提升年輕的和有才干的幹部；每一個忠于他和他的目標的軍官都知道，他自己的志向會受到鼓勵。他在戰爭期間實行改組高級統帥部的速度和決心，証實了他的適應能力和為有才幹的人開辟發展前途的願望。他在兩個方面同時行動：他在軍隊里實施對政府、對黨以及對他本人的絕對服從，同時他不惜一切來備戰、提高軍隊的生活水平和迅速提拔最優秀的人。

在紅軍里，我從一位軍長那里第一次聽到一種當時使我驚

奇的大胆思想。他的結論是：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战争将具有最痛苦的性质。根据苏联的司令官和我同样了解的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战争完全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由于共产主义将消灭阶级，人类进行战争的必要性也将消失。可是这位將軍、許多俄国土兵和我，都从我曾参加过的最酷烈的战争中开始进一步認識了战争的可怕的真理：只有当一切的人都处于同样的社会制度之下的时候，人类的斗争才会有最痛苦的性质，因为像那样的制度是站不住脚的，各种派别都将为了自己的更大的“幸福”而輕率地从事人类的毁灭。在那些受过馬克思主义训练的苏联軍官当中，这种想法是偶然的，隱藏的。但是，我却沒有忘掉它，而且当时也沒有把它认为是偶然的。尽管他們还不曾認識到，甚至他們所保卫的那个社会也不是沒有深刻和对抗性的分歧的，然而，他們仍然能模糊地看出，虽然人类不能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之外，也不能沒有有秩序的思想，但人类的生活却还是受到其他强有力的势力的支配的。

我們逐漸习惯于苏联的一切事物。虽然如此，作为以苦行的清廉取得了对自己的信心和人民的信任的党和革命的儿女，我們却不能不对于在我們离开前綫的前夕，在比薩拉比亚某一个村庄的科涅夫元帅司令部里为我們举行的酒会大吃一惊。

充当服务员的女郎十分漂亮，打扮得过于妖艳。她們端上巨量精致的菜肴——魚子醬、熏鮭魚和鱒魚、鮮黃瓜、腌茄子、煮熏火腿、冷烤猪、热肉餅和辣干酪、紅菜湯、噼噼发响的牛排、最后是一呎厚的蛋糕，大碟子盛的热帶水果，这些东西把桌子都压弯了。

甚至在酒会以前，人們就发觉苏联軍官們偷偷地巴望着参加宴会。因此，他們一来就拚命大吃大喝。但是南斯拉夫人却好像經受一次大考驗，他們不得不喝酒，虽然这是不符合他們的

“共产主义道德”的，也就是說，不符合他們的軍隊和黨的要求的。但他們還是善于自處，特別考慮到他們是不習慣于喝酒的這一事實。意志力和道德感的巨大發揮幫助他們頂住了許多次的干杯，從而終於避免了醉倒。

我始終喝得很少，而且謹慎，借口我頭痛，而我當時真的在害頭痛。我們的特爾基奇將軍卻是一副可憐相。儘管他並不覺得喜歡喝酒，然而不得不喝，因為他不知道怎樣推辭一位俄國同志，那位同志在為鐵托祝酒時沒有放過他，而剛剛一秒钟後又舉杯為斯大林祝酒。

在我看來，我們的護衛人員的處境更慘。他是蘇聯總參謀部的一位上校，因為他是“從後方”來的，元帥和他的將軍們就充分利用他們更高的軍階把他當作目標。科涅夫元帥不顧這位上校身體較弱，他是在前綫受傷後送回到總參謀部工作的。他簡直命令上校說：“上校，為第二烏克蘭方面軍的勝利，干一百克伏特加！”接着一片靜寂。大家都轉身看着這位上校。我想替他說情。但他卻站了起來，立正，並且一飲而盡。立刻，汗珠從他的蒼白的前額上涌出來了。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喝酒，那些值班的和同前綫聯絡的人沒有喝。在前綫的參謀一般也不喝酒，只是在絕對平靜無事時才喝酒。他們說，在芬蘭戰役時，日丹諾夫向斯大林建議批准每天給每個士兵一百克伏特加。從那時起，在紅軍里保持着這個慣例，只是在進攻前份量加倍。有人向我們解釋說：“士兵們覺得更加舒暢！”

科涅夫元帥也沒有喝。他沒有上級來命令他；而且他有肝病，因此他的大夫不准他喝酒。他是一位白面金發的高個子，五十歲左右，有一張精神飽滿的瘦削的臉。雖然他鼓動人們大吃大喝，因為他篤信“人必須時常享享福”的公認的“哲學”，但他本

人却不屑去做这类事情，他有自信，也信任他的在前线的部队。

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陪同我们一起来到前线。虽然他越来越容易为他的国家的英雄气概和美德所激动，他告诉我一件关于科涅夫的超人的理智和勇敢的轶事。有一次，科涅夫在一个处于德军迫击炮火轰击下的了望哨，他仍假装用他的望远镜在进行观察，但实际上他却斜眼察看他的军官们的动静。每个军官都知道，如果当时表现一点动摇，就会当场遭到降级处分，因此没有人敢向他指出对他的生命的危险。于是就这样继续下去。士兵们有死的有伤的，但是他视察完毕后才离开那个哨所。又有一次，弹片打中了他的腿。他们把他的靴子脱掉，包扎了他的腿，但是他仍然留在那个阵地。

科涅夫是斯大林的新的战时司令官之一。他不如罗科索夫斯基那样快的提升，因为他的发迹不像后者那样突然和轰轰烈烈。他是在刚刚革命后参加红军的，那时他是一个青年工人。然后一级一级地、并通过陆军学校逐步得到提升。可是，他也是在作战中发迹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红军的标准经历。

科涅夫一般是沉默寡言的，他用几句话向我讲解了刚刚结束的科尔逊—谢甫琴考夫斯基战役的经过，那次战役在苏联是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提并论的。他向我描述德国的最后大灾难的情景，掩盖不住他的兴高采烈的心情：八万左右——如果不是十万的话——德国人不肯投降，被迫退守一个狭小地区，后来坦克摧毁了他们的重型装备和机关枪阵地，而哥萨克骑兵最后把他们消灭。“我们让哥萨克人尽情歼灭敌人。他们甚至把那些举手投降的人的手都砍掉了！”元帅微笑地说。

我不能说在那一瞬间对于德国人碰上这样的厄运而不感到高兴。在我的国家里，纳粹主义也以优秀种族为名进行了一场

毫无过去的一切人道考虑的战争。但在当时我却有另一种感觉——恐怖，它必须那样，不能有别的办法。

坐在这位非凡人物的右首，我有几个特别感到兴趣的问题急于得到澄清。首先：为什么苏联参加战争时的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其他高级司令官被调离他们的指挥职位？

科涅夫回答说：“伏罗希洛夫是一位具有无穷胆量的人。但是——他不能了解现代化战争。他的优点很多，但是——战争只能取胜。在国内战争时期，伏罗希洛夫开始出了名，那时红军几乎没有遭到飞机或坦克的攻击，而在这次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这些机器。布琼尼从来没有什么学问，而且他从来也不学习。他证明自己是完全不合格的，并且错误百出。沙波什尼科夫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一个技术性的参谋。”

我问道：“斯大林呢？”

科涅夫小心翼翼地对这个问题的不露惊讶之色，想了一想回答道：“斯大林是全面的天才。他能天才地了解整个战争，这就使他有可能出色地指挥。”

他没有再说什么，没有说那些听来像老一套的对斯大林的歌颂。他避而不提斯大林的指挥的纯军事方面。科涅夫是一位坚定地效忠于政府和党的老共产党员，可是我想说，他对军事问题的看法是坚定的。

科涅夫也送给我们一些礼物：送给铁托的是他本人的望远镜，送给我们的是手枪。我保存着他送给我的那一支，直到1956年我被捕时，才被南斯拉夫当局没收。

在前线，普通士兵的个人的英雄气概和坚忍不屈以及主动精神的事例是很多的。俄国全体人民奋死抵抗，不惜一切牺牲，决心争取最后胜利。在那些日子里，莫斯科，我们也和它一起，幼稚地沉醉于“放礼炮”——庆祝胜利的烟火，在这些烟火后面

隱約地出現戰火和死亡，還有痛苦。對於遭受着他們本國的苦難的南斯拉夫戰士來說，這也是歡樂。在蘇聯，除了一個遼闊廣大的土地和千百萬人民的這種巨大、逼人的努力以外，好像什麼也不存在了。我也是只看到這一點，並按照我的偏見，把俄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和蘇維埃制度等同起來，因為我的夢想和我的鬥爭正是後者。

(五)

大約是下午五點鐘的光景，當我剛在泛斯拉夫委員會結束了我的講演和開始解答問題的時候，有人低聲叫我立即結束，因為有一件重要而急迫的事情。不僅是我們南斯拉夫人，而且連蘇聯官員都曾認為這次講演是異乎尋常地重要的。莫洛托夫的助手 A·羅佐夫斯基把我介紹給一些經過挑選的聽眾。顯然，南斯拉夫問題在盟國之間正日趨尖銳。

我表示了抱歉，或者說他們代我表示了抱歉，然後就在事情進行中途被帶到了街上。他們在那里把我和特爾基奇將軍塞進一輛奇特的但不很華麗的汽車。只是當汽車開動以後，國家保安機關的一位不認識的上校才告訴我們，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將接見我們。在那個時候，我們的軍事使團已經搬到了莫斯科郊區的塞列布蘭尼·保爾（銀色的森林）的一所別墅里。我想起了送給斯大林的禮品，我擔心如果我們到那麼遠去取的話，恐怕就要遲了。可是萬無一失的國家保安機關也已留意到了這一點，禮物就放在汽車里上校的身旁。一切事情都安排妥當，甚至我們的制服也辦妥了；我們穿着蘇聯的一家工廠縫制的新裝已經有十來天了。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只要安靜地聽上校的話，尽量少向上校提問題就行了。

我早已習慣于少提問題了。但是我仍不能抑制我那興奮的心情。它發自我的內心深處。我自知我的臉色蒼白和又高興又几乎是驚慌失措的激動。

對於一個來自戰爭和革命的共產黨人來說，还有什么更興奮的事呢？被斯大林接見——這是對我們游擊戰士和我國人民的英雄氣概和苦難的最大可能的賞識。在地牢里和在戰爭的大屠殺中，以及在同樣激烈的精神危機和同共產主義的內外敵人的衝突中，斯大林決不只是一位作戰的領袖。他是一種思想的化身，這種思想在共產黨人的心里被美化為純潔的理想，從而成為絕對正確的、十全十美的東西。斯大林就是今天的戰爭勝利和明天的人類大同。我知道，碰巧我本人是被他接見的第一個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我感到一種驕傲的喜悅的是，我將能夠向我的同志們講這次會見，並且也可以向南斯拉夫的戰士們談談這件事。

突然，一切對蘇聯產生的似乎不愉快的事情都不見了，所有我們自己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分歧都失去了它的意義和嚴重性，就好像它們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在我即將碰到的動人的莊嚴和美之前，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消失了。在進行中的鬥爭的偉大意義面前，我個人的命運有什麼要緊？和顯然不可避免地要實現的我們的理想比較起來，我們的分歧又算得了什麼呢？

讀者應當知道，在那個時候，我相信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黨內的其他反對派都確實是間諜和破壞分子，因此認為對付他們和其他所謂階級敵人的嚴厲措施都是正當的。如果我曾經注意到，在三十年代中葉清洗時期到過蘇聯的人傾向於把某些事情不說出口的話，我相信那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和過甚其詞的事情。季米特洛夫在一次同鐵托談話時曾經有過這樣的提法：為了割掉壞肉也切着了好肉。因此，我把斯大林的一切殘

酷行为看作恰恰像他的宣傳所描繪的那樣——一个不可避免的革命措施，这些措施只是增加了他的身价和他的历史性作用。就是在今天，要是我原已知道这些审判和清洗的真相的話，我也不能正确地說当时我該怎么办。我可以肯定地說，我的良心将会經受一次严重的危机，但是无疑地我仍然会是一个共产党人——确信有一种比現有的那种共产主义更理想的共产主义。因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理想来看的时候，最主要的事情不是正在做什么，而是为什么去做。此外，对于我和对于那些在我的分裂的、奋战的国家期望着跳过几百年的奴役和落后并繞过现实的人們來說，它是最合理的、最令人陶醉的、无所不包的意識形态。

还没有等我平靜下来，我們的汽車一下子就开到克里姆林宮的大門口。在这儿，由另一位軍官来照料我們；接着汽車往前开过冷靜而清洁的院子，那里除了一些細长的沒有发芽的小树以外，就沒有別的有生命的东西了。这位軍官指点我們注意看沙皇的大炮和沙皇的钟——这是荒唐的俄国的象征，那炮从未发射过，那钟也从未敲过。左边是伊凡大帝的紀念钟楼，然后是一排古代的大炮。不久我們就来到了一座类似十九世紀中叶的衙門和医院的矮长建筑物門前。这里，又有一位軍官来迎接我們，他帶我們进去。在楼梯下我們脫掉了大衣，在一面鏡子前梳梳头发，然后被引导乘电梯到三楼，走进一条相当长的鋪着紅色地毯的走廊。

在每一个轉弯的地方，都有一名軍官用脚跟相碰的响声向我們敬礼。他們全都年青，漂亮，笔挺，头戴国家保安机关的藍色帽子。这次和后来的每一次，我都发现清洁得使人惊奇，十全十美，好像不可能有人住在这里或在里面工作似的。地毯上沒有一块污迹，发亮的門把手上找不到一个斑点。

最后，他們領我們走進一個較小的辦公室，朱可夫將軍已經在那里等候了。一位矮胖麻臉的年老官員請我們坐下，他自己則從一張桌子後面慢慢地站起來，走進隔壁房間去。

一切都是以驚人的速度發生着。這位官員不久就回來通知我們可以進去。我以為我們大概要穿過兩三個辦公室才能看到斯大林，可是我一開門，跨過門檻，就看見他從相連的一個小房間里走出來，通過那小房間的敞開的門可以看見一個大地球儀。莫洛托夫也在這裡。他身體結實，面色蒼白，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站在一張長會議桌後面。

斯大林在屋子中央迎接我們。我第一個走近他，並介紹了自己。然後特爾基奇也照樣做了，用軍人的口氣列舉了他的全部職銜，並且咔嚓一聲腳跟相碰。我們的主人對此回答——幾乎是滑稽的——說：“斯大林”。

我們也和莫洛托夫握了手，並在桌子旁邊坐下。這樣，莫洛托夫就坐在斯大林的右側，斯大林坐在桌子頂頭，而特爾基奇、朱可夫將軍和我則坐在左側。

這個房間不大，相當長，不夠富麗堂皇，也沒有什麼陳設。牆角的一張不太大的桌子上方掛着列寧的像；在會議桌上面的牆上，用相同的木框掛着蘇沃洛夫和庫圖佐夫的画像，它們很像是在鄉下看到的五彩石印版畫。

而我們的主人則是最樸素的。斯大林穿着元帥制服和軟靴，除了在左胸佩帶一個金星——蘇聯英雄勳章以外，就沒有任何勳章了。他的舉止毫無裝腔作勢的地方。這不是相片上或新聞片里的那個威風凜凜的斯大林——一步態死板而從容不迫。他一刻兒也不閑着。他不是玩弄他的煙斗（煙斗上有英國鄧希爾公司的白點標記），就是用一支藍鉛筆在寫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上畫圈子；當討論的每一部分將近結束的時候就用斜綫將它划

掉。他在座位上很不安詳，不斷地把頭搖來擺去。

我還對別的一些事感到惊奇：他的身材很矮小；体态不匀称。他的軀體又短又窄，四肢過長。他的左臂和左肩看來有點不靈活。他有一個很大的肚子，頭髮稀少，但是還沒有完全禿頂。他的臉色白晳，兩頰帶紅。後來我知道，這種顏色是那些長期坐在辦公室里的人的特徵，在蘇聯高級幹部中被称为“克里姆林宮氣色”。他的牙齒是黑的，長得不整齊的，並且向里凹。他的鬍子既不密也不硬。可是他的頭卻長得不壞；它是一種平民的、農民的、家長式的頭——長着一對黃眼睛，既粗暴又奸詐。

他的口音也使我感到惊奇。人們可以聽得出，他不是一個俄羅斯人。雖然如此，他的俄文詞匯是豐富的，他的措辭很生動、多變化，充滿了俄國的諺語和格言。後來我才知道，斯大林很熟悉俄羅斯文學——雖然只是俄羅斯的，而他在俄國範圍以外的唯一真正的知識，是政治史的知識。

有一件事情並不使我惊奇，那就是斯大林有幽默感——一種自以為是的粗魯的幽默，但並非完全沒有巧妙和深邃之處。他的反應迅速而敏銳——而且帶結論性，這並不是說他不聽完別人說的話，但顯然他是不愛聽長篇大論的。他与莫洛托夫的關係也很特殊。就像後來我証實的那樣，他顯然把后者看做是一位很親密的伙伴。莫洛托夫是被斯大林用親密的代名詞“你”字來稱呼的唯一的政治局委員，這本身就有很大的意義，因為必須記住，俄國人的客氣的方式是用“您”的，即使在極親密的朋友之間，這樣稱呼也是正常的。

談話是由斯大林開始的，他問我們對蘇聯的印象如何。我回答道：“我們高興極了！”他接着說：“可是我們並不高興，雖然我們正在盡力把俄國的事情搞得更好。”我牢記着斯大林用的是“俄國”這個字而不用蘇聯，這就表明他不僅在鼓舞俄羅斯民

族主义，而且他本人也受到它的鼓舞，并且把他自己和它等同起来。

但在当时我来不及去想这些事情，因为斯大林接下去谈到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他转过脸对莫洛托夫说：“难道我们不能设法骗取英国人承认铁托？铁托正在单独打德国人。”

莫洛托夫微笑着——一种含有讽刺和自满的微笑，说道：“不，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完全了解南斯拉夫的发展情况。”

我喜欢这种干脆、直截了当的作风，到那时为止，我在苏联官方人士中，特别是在苏联的宣传中，还没有碰到过这种作风。我感到我是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尤其是和一位用随便、公开的方式来处理实际问题的人在一起。无须解释，斯大林只是在自己人中间，即在对他效忠的嫡系共产党人中间才像这样。

虽然斯大林没有答应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但是很显然，他是有意承认它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他的立场既然如此，我也就没有直接提出问题来；也就是说，如果苏联政府认为条件成熟，并且发展情况没有波折，苏联政府显然是愿意立刻这样做的，但须先由英国和苏联达成临时协议，再由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保皇政府达成协议。

因此，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必须等待时机拟订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斯大林在给予南斯拉夫军队以援助的问题上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以此来弥补承认的问题。

当我提到二十万美元的贷款时，他把这叫做小事，说用这笔钱干不了什么，但又说这一款项可以立即拨给我们。当我说解放以后我们将偿还这笔贷款以及所有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时，他真的生气了：“你侮辱我。你们是在流血，而你却要我开这些武器的价钱！我不是商人，我们都不是商人。你们和我们一样在为共同事业而战斗。我们有义务同你们分享我们的一切。”

但是援助怎样运来呢？

当时决定請求西方盟国在意大利建立一个苏联空軍基地，从那里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斯大林說：“讓我們試試看，我們將看到西方采取什么态度和他們准备給铁托多大的帮助。”

我应当提一句，这样一个基地——包括十架运输机，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不久就建立起来了。

斯大林还解釋道：“但是，用飞机恐怕不能給你們多大帮助。一支軍隊不能靠飞机来供应。你們已經是一支軍隊了。需要用船只来解决。而我們却没有船。我們的黑海艦队被消灭了。”

朱可夫將軍插进來說：“我們在远东有船。我們可以把它們調到黑海港口，装上武器和其他必需品。”

斯大林粗暴地和断然地打断了他的話。从一个拘謹的、差不多像頑皮的小鬼似的人身上，突然出現了另一个斯大林。“你究竟在想什么？你精神正常嗎？一个战争正在远东进行。有些人肯定是不會錯過机会来击沉这些船的。真的，必須购买些船只。但是向誰去买？目前大家都缺乏船只。土耳其？土耳其人沒有多少船，而且他們也决不会卖給我們。埃及？对了，我們可以從埃及买一些。埃及会卖的——埃及肯出卖任何东西，所以他們一定会卖船只給我們的。”

是的，这就是真正的斯大林，他說話不是吞吞吐吐的。可是我在我們党内已經习惯于这样的事，所以在最后作出决定时我自己特別喜欢这种作風。

朱可夫將軍不声不响地敏捷地把斯大林的決定記下。但是购买船只和用苏联船只来供应南斯拉夫人这件事却从未实现。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东戰場上作战行动的发展——紅軍不久就进抵南斯拉夫边境，因而能够从陆上援助南斯拉夫。我认为当时斯大林要援助我們的意图是坚决的。

这就是那次会谈的要点。

顺便讲一下，斯大林表示有兴趣听听我对个别南斯拉夫政治家的意见。他问我对塞尔维亚农民党领袖、首任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米兰·加夫里洛维奇的看法。我对他说：“一个精明的人。”

斯大林好像自言自语地表示意见道：“不错，有些政治家认为精明强干是政治中的主要的东西——可是，加夫里洛维奇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笨人。”

我又说：“他不是是一个眼界宽闊的政治家，然而我认为不能把他說成笨人。”

斯大林问起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在哪里找到妻子的。当我告诉他，彼得二世娶了一位希腊公主时，他调皮地轉身說：“維亞契斯拉夫·米哈依洛維奇，要是你或我娶一个外国公主，怎么样？说不定会有些好处的。”

莫洛托夫笑了，可是笑得拘謹，不发出大声来。

最后，我向斯大林呈献我們的礼品。这些礼品現在看起来特別土气、寒伥。但是他一点也沒有显出輕視的样子。当他看到农民的凉鞋时，他喊起来：“拉普蒂！”——即俄文凉鞋的意思。至于步枪，他扳开枪栓并扳动枪机，掂了掂份量，然后說道：“我們的要輕些。”

这次会见持續了約一小时。

当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宮的时候，已經是黃昏时刻。伴随我們的軍官显然发觉了我們的热烈心情。他高兴地望着我們，并設法用每句話来討好我們。在一年的这个时候，北极光射到莫斯科来，一切东西都呈現出紫色并且微微发亮，这是一个不现实的世界，比我們一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更加美丽。

不管怎样，这就是我的灵魂深处的感受。

(六)

但是我同斯大林还有一次更有意义和更有趣味的会见。我确切地记得那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在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夕。

这一次也是事前没有人告诉我什么。他们只是通知我，让我到克里姆林宫去，在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他们就把我装上汽车开到那里。甚至使困里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到哪里去。

他们把我带到斯大林曾接见过我们的那座楼，但不是上次那间房间。在那里莫洛托夫正在准备动身。他一面穿大衣和戴帽子，一面告诉我，我们将和斯大林共进晚餐。

莫洛托夫不是一位很健谈的人。当他和斯大林在一起的时候，当他情绪好、和同那些与他合得来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接触是随便和直截了当的。否则，莫洛托夫总是冷淡的，甚至在私人交谈中也是这样。尽管这样，但是在汽车里的时候，他问我除了俄文以外还会讲什么外国语。我告诉他，我还会讲法文。然后就谈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力量和组织。我强调说，大战爆发时南斯拉夫党是非法的，并且人数较少——约一万名党员，但都是出色地组织起来的。我又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

莫洛托夫反驳道：“你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党处于非常弱小的状态，组织散漫，分散，党员人数很少。”他接着说：“我记得，在战争初期，我为了党的工作，是怎样从彼得格勒不合法地到莫斯科来的。我没有地方过夜，只好冒险住到列宁的妹妹那里！”莫洛托夫还提到列宁的妹妹的名字，如果我记得不错，她叫瑪利亚·伊里尼契娜。

汽車以相當快的速度向前疾駛——時速約六十英里，沒有碰到什麼交通阻礙。顯然交通警多少認得出這輛汽車，因而让它通行無阻。車子駛出了莫斯科以後，我們開上一條柏油路，後來我知道這條路叫做“政府大道”，因為在戰後的長時期內，只准政府的汽車在這條大道上行駛。今天還是這樣嗎？不久，我們來到了一個關卡的前面。坐在司機旁邊的軍官從擋風玻璃那里撓一撓一塊小証章，於是警衛不要什麼手續就放行了。右邊的窗是放下来的。莫洛托夫看到我因刮風而感不適，就開始把車窗搖上來。這時我才注意到車窗的玻璃很厚，于是我明白我們坐的是一輛防彈汽車。我想那是一輛派克牌汽車，因為1945年蘇聯政府曾送給鐵托一輛同樣的汽車。

在那次晚餐以前約十天左右，德國人曾對德瓦爾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最高參謀部發動了一次襲擊。鐵托和外國的軍事使團只得逃往山區。南斯拉夫的領導人被迫採取長期的艱苦的行軍，這次行軍使得進行軍事和政治活動失去一些寶貴的時機。糧食問題也緊張起來了。蘇聯軍事使團把一切情況詳細地報告給莫斯科，我們駐莫斯科的使團也經常同負責的蘇聯軍官聯繫，請他們設法援助南斯拉夫的部隊和最高參謀部。蘇聯飛機甚至在夜間飛行，空投彈藥和食品，但是實際上沒有多大成效，因為包裹分散在一個廣大的森林地區，而這些地區必須很快地撤離。

在路上，莫洛托夫想知道我對於由此而產生的局勢有什麼意見。他是十分注意聽的，但毫無激動之色——尤其因為要得到真實的情況。

我們行駛了約二十英里，向左轉入一條小道，不久來到一排幼小的樅樹叢前。又是一個關卡，然後又開了一段短短的路程，就到了大門口。我們停在一座不很大的別墅前面，它也是在濃

密的樅樹叢中。

我們從門口一走進一間小客廳，斯大林就出現了——這次穿的是鞋和一身普通軍衣，扣子一直到下巴，這是人們在他的戰前的照片里所熟知的。這樣打扮顯得身材更矮小了，但也更簡樸和非常隨便。他領我們進入一間小小的、令人驚奇地空無所有的書房——沒有書，沒有圖片，只有光禿禿的木板牆。我們圍着一張小書桌坐下來，于是他立即開始詢問關於南斯拉夫最高參謀部的事件。

他詢問的態度顯示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鮮明對比。以莫洛托夫來說，不僅他的思想，而且他的概括方法，都是莫測高深的。同樣地，他的心理狀態始終是密封的、不讓人理解的。斯大林呢，他是一個生氣勃勃的，几乎是脾氣急躁的人。他不停地發問——問自己和問別人，並且不停地爭論——和自己爭論也和別人爭論。我並不是說莫洛托夫不容易激動，或者說斯大林不知道怎樣控制自己或矯揉造作；後來我發現他們兩人都演着這些角色。但是，莫洛托夫几乎是始終一樣，沒有什麼變化，不管是在考慮什麼事或什麼人；而斯大林在他自己的環境中、也就是共產黨人的環境中却是完全不同的。丘吉爾曾把莫洛托夫形容為一個十足的現代機器人。這是正確的。但這只是他的一面，外在的一面。斯大林像他一樣，也是一部冷冰冰的計算機。可是，恰恰因為他的性格比較急躁而且是多方面的（然而各个方面都是相等的和令人信服的，以致好像他從來沒有裝假而總是忠實地體驗着他的每一種角色），因而他比較能被人看透，並提供較大的可能性。我得到的印象是，莫洛托夫把一切事物——甚至共產主義及其最後的目標——都看做是相對的，看做是他不得不——而不是應當——使自己的命運從屬於它的東西。對他來說，好像任何事情都不是永久的，好像只有一個每天有所不同

的、瞬息万变的和并不理想的现实，而他不得不为之效力和献出他的全部生命。斯大林也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变迁的。但那是他的哲学观点。在这种非永久性的背后和在它的内部，隐藏着某种伟大的和最终的理想——他的理想，对于这种理想，他可以用操纵或者揉和现实的办法，操纵或揉和组成现实的活人的办法来接近它。

回顾往事，在我看来，莫洛托夫具有相对论观点和处理繁琐的日常事务的妙诀；斯大林则具有狂热的教条主义，同时又有比较宽阔的眼界、对更远的未来可能性的猛烈追求，这两个人是合乎理想地互相补足的。虽然莫洛托夫若没有斯大林的领导是无能的，但在许多方面，他对于斯大林来说也是不可少的。虽然他们两人在方法上都是不择手段的，但在我看来，斯大林是慎重地选择方法并使之适合于环境，而莫洛托夫则事先就把方法看做是附带的，不重要的。我认为他不仅鼓动斯大林去做许多事情，并且支持他和消除他的疑虑。虽然斯大林由于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和较大的洞察力，可以称为把落后的俄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帝国的主要角色，但是如果低估莫洛托夫的作用，特别是作为实际执行人的作用，却是错误的。

莫洛托夫甚至似乎是天生地适合于演这样的角色的：彻底、谨慎、沉着、坚韧。他喝酒比斯大林多，但他祝酒的贺辞却短些，而且有意使它产生特殊的政治效果。他的私生活也是平凡的，而且在一年以后，当我遇到他的妻子——一位朴素、厚道的女人的时候，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任何一个别的人都可以满足他的定期的生理需要的。

同斯大林的谈话是从他激动地询问南斯拉夫最高参谋部及其周围的部队的下落如何开始的。他喊叫道：“他们会饿死的！”

我竭力向他说明，这种事情决不会发生。

“怎么会？”他接着說，“軍人們被飢餓压倒有过多少次了！飢餓是每一支軍隊的可怕的敵人。”

我向他解釋道：“那一帶地方总是可以找到東西吃的。我們曾經处于坏得多的境況，但我們还是沒有被飢餓压倒。”我終于使他平靜下来，并且放心了。

他于是把話題轉到送去援助物資的可能性問題。苏联战綫距离那里还太远，无法用战斗机护送運輸机。这一点使斯大林火了，他申斥那些飛行員：“他們是懦夫——不敢在白天飞行！懦夫，唉，懦夫！”

莫洛托夫是了解全部情况的，他为飛行員辯护道：“不，他們不是懦夫。完全不是。这只是因为战斗机沒有那么远的航程，这样運輸机还没有飞到目的地就会被击落。另外，飞机的載重量也是很小的。它們必須带着回程用的汽油。这就是为什么他們不得不在夜間飞行并且只能装少量物品的唯一理由。”

我支持莫洛托夫，因为我知道苏联飛行員曾經志願要求在沒有战斗机的保护下白昼飞行，以便支援南斯拉夫的战友。

同时，我完全同意斯大林的这种看法，他坚持认为，鉴于严重和复杂的环境和任务，铁托必須找到一个較固定的总部，脱离每天的不安定状态。毫无疑问，斯大林也已把这个意見通知了苏联使团，因为就在那时候，在他們的坚持下，铁托同意撤到意大利，又从那里撤到維斯島，留在那里一直到紅軍进入南斯拉夫。当然，斯大林沒有談到这次撤退的問題，但是这个主意正在他心里具体化。

盟国早已同意在意大利建立一个苏联空軍基地，以援助南斯拉夫的軍隊；斯大林強調了派運輸机到那里去和加强基地活动的迫切性。

斯大林显然被我对于当时德軍对铁托发动攻势的最后結果

所抱的乐观情緒所鼓舞，他談起了我們和盟国的关系，主要是和英国的关系。就在当时，在我看来，我們和英国的关系是他同我会見的主要原因。

他的意見的实质是：一方面，我們不应当“恐吓”英国人，他的意思是說，我們应当避免任何可能惊动他們、使他們认为在南斯拉夫正在进行一个革命或企图由共产党控制的事情。“你們帽子上要紅星做什么？形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得到的东西，而你們——戴着紅星！啊，紅星是不必要的！”斯大林生气地喊道。

不过，他并不掩飾他沒有生很大的气。这是一种斥責，于是我向他解釋道：“停止戴紅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已經是一个傳統，在我們的战士当中具有一定的意义。”

虽然他保持他的看法——不过并不十分坚持——但他又从另一个角度轉到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他接着說：“也許你以为正因为我們是英国人的盟友，我們就忘記了他們是些什么人，忘記丘吉尔是个什么人。他們最高兴的是欺騙他們的盟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他們經常欺騙俄国人和法国人。而丘吉尔呢？丘吉尔是这样一种人：如果你不当心他，他会从你的口袋里偷走一个戈比。真的，从你的口袋里偷走一个戈比！天哪，从你的口袋里偷走一个戈比！至于罗斯福呢？罗斯福不是这样。他只有大錢才伸手去掏。可是丘吉尔呢？丘吉尔——連一个戈比也要。”

他好几次着重談到我們应当提防英国的情报机关和英国的口是心非，特別要小心铁托的生命。“他們就是干这件事的人：在一架飞机上杀死了西科爾斯基將軍，然后干淨利落地把那架飞机击落——沒有证据，沒有证人。”

在这次会見中，斯大林不断重复这些警告。我回到南斯拉夫以后，就把些这警告轉达铁托，这或許对于铁托决定在 1944

年9月21日夜間偷偷地从維斯島飞往苏軍占領下的羅馬尼亞領土一事起了一定的作用。

随后，斯大林又談到同南斯拉夫保皇政府的关系問題。新的保皇政府的代表人是伊凡·苏巴塞奇博士，他答应調整同铁托的关系，并承认人民解放軍是抗击占領軍的主力。斯大林劝我們“不要拒絕同苏巴塞奇举行会談——一定不要拒絕。不要馬上攻击他。讓我們看看他要什么。和他談談。不能立刻承认你們。必須找到一个过渡的办法。你們应当和他談談，看看是否能設法和他取得妥協。”

他的劝告不是斬釘截铁的，但是很坚决。我把这一点轉告給铁托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它可能对于促成著名的铁托—苏巴塞奇協議起了一定的作用。

然后，斯大林請我們同进晚餐，但是在迴廊里我們在一幅世界地图前面停下了，这幅地图的苏联部分塗着紅色，这样一来，苏联部分看上去更显眼，并且比不塗紅色看起来更大。斯大林在苏联部分上揮舞着手，提到他剛剛讲过的那些反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話，他大声說：“他們决不会接受这样一种概念，即有这么大一块地方是紅顏色的，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我注意到地图上斯大林格勒周圍地区从西面用藍鉛筆划的圓圈。显然这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間划的。他觉察出我的注意力，而我的印象是这使他很得意，尽管他不露声色。

我不記得我是怎么談起来的：“苏联要是沒有工业化，就不能保存它自己和进行这样一次战争。”

斯大林接着說道：“正是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吵了架。”

而这就是一——在那幅地图前面——我从他那里听到过的关于他的这些对手的全部的話：他們曾經吵过架！

在餐厅里，已經有两三个苏联高級官員在等候，他們都站着，然而除了莫洛托夫一人以外，却沒有一个是政治局委員。我已經忘記他們是誰了。無論如何，在整个晚上，他們是靜悄悄的和不惹人注意的。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生动地描繪过有一次他在克里姆林宮临时和斯大林共进晚餐的情形。但是，斯大林的晚宴一般是像这样的：

在一間寬敞和不加裝飾的，但是有風趣的餐厅里，长桌子的前半段摆滿了用燙过的、沉重的銀盘子盛着的各种各样的食物、飲料、碟子和其他餐具。每个人都自己拿吃的，圍着空着的另一半桌子随意坐下。斯大林从来不坐在桌子的頂头，总是坐在他的老位子上——桌子頂头左側的第一把椅子。

食物和酒的种类极多——主要是肉和烈酒。但是其他一切都是簡單大方的。除非斯大林按鈴，服务人員都不进餐厅，只有一次我要喝啤酒斯大林才按了鈴。每个人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是人們逼劝我們喝酒未免太多，祝酒的次数也太多了。

这样的晚宴照例要持續到六个小时以上——从晚上十点直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大家一面慢慢地吃喝，一面漫无边际地交談——从故事和奇聞到最严肃的政治問題，乃至哲学問題。事实上，苏联政策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种宴会上非正式地决定的。此外，这种宴会是斯大林的單調沉悶的生活中最經常和最方便的消遣，也是他的唯一的享乐。

显然，斯大林的同僚們都慣于这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把他們的夜晚消磨在同斯大林或者同他們同伙中的一个人吃飯上。他們在中午以前不上班，然后在办公室通常呆到晚上。这就使得高級行政机关的工作复杂化和发生困难，但是后

者却能适应，甚至同政治局委員有过接触的外交团也能适应。

至于哪些政治局委員或其他高級官員可以参加这样的宴会，是没有规定的。通常参加的是那些和来宾的公务有关或和当前的問題有关的人。不过，这个圈子显然很小，因此被邀参加这种宴会是特殊的荣誉。唯有莫洛托夫总是在場，我认为这不仅因为他是外交部长，而且因为他实际上是斯大林的候补人。

在这些宴会上，这是苏联的领导人彼此最接近、最亲热的时候。人人都会談出他本部門带来的消息，他那天碰到了什么人，他正在定什么計劃。山珍海味和大量而并不过度的烈酒提高了人們的兴致，加强了亲切和不拘束的气氛。一个陌生的客人很难看出斯大林和其余的人有什么不同。但是的确有不同。斯大林的意見被小心地記下来。沒有人强硬地反对他。这很像一个家长制的家庭，家长性情怪癖，他的毛病总是引起全家人的忧虑。

斯大林吃的东西，对于一个比他身材大得多的人來說，也是太多了。他照例揀肉吃，这一点表明他是山地人出身。他也喜欢各种拿手菜，在这个具有各种气候和文明的国家，特殊風味是異常丰富的，但是我沒有看到他特別爱吃哪一种食品。他飲酒适度，經常是把紅酒和伏特加掺在一个小酒杯里喝。我从来沒有看到他帶有醉意，可是我不能說莫洛托夫也是这样，更不能說貝利亚了，他簡直是一个酒鬼。由于出席这样宴会的人都吃得过多，因此，苏联的領導人在白天吃得很少而且是不規則的，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每星期有一天只吃水果和喝果子汁，以便“解除負擔”。

广大的俄罗斯国土的命运、新取得的領土的命运，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命运，就是在这些宴会上决定的。如果这样的宴会未能鼓舞那些精神創造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做

出大事业的话，那么，也许有许多大事业倒是在那里被永远葬送了。

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听人谈到过党内反对派或如何对付它的问题。显然，这大多属于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权限；而苏联领导人既然也是人，他们乐于忘记天理良心，尤其因为凭良心做事就会使他们自己的命运发生危险。

在那次漫谈中我们轻松而自然地从一个话题转到一个话题，这里我只想举几个我认为是重要的话题。

我想起了从前南部斯拉夫人和俄国之间的联系，我说：“可是俄国沙皇不了解南部斯拉夫人的愿望——他们感兴趣的是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我们解放感兴趣。”

斯大林表示同意，但是自有他的想法：“是的，俄国沙皇缺乏眼光。”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关心与其他苏联领导人不同。他对牺牲和破坏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建立了什么样的国内关系和什么是起义运动的真正力量。他甚至不是从提问题当中收集这方面的材料，而是从谈话本身来收集。

有一次他对阿尔巴尼亚发生兴趣。“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是哪一种民族？”

我解释说：“在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事情，同南斯拉夫的差不多完全一样。阿尔巴尼亚人是最古老的巴尔干民族——比斯拉夫人，甚至比古希腊人还古老。”

斯大林问道：“那么他们居住的地方怎么用斯拉夫的名字呢？他们和斯拉夫人有关系吗？”

我也解释了这一点：“从前斯拉夫人居住在那里的山谷里，因而有了斯拉夫的地名，后来在土耳其统治时期，阿尔巴尼亚人把斯拉夫人赶了出去。”

斯大林頑皮地眨眨眼說：“我原来还希望阿尔巴尼亚人至少有一点斯拉夫的成份哩。”

我向他叙述南斯拉夫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的残酷性时，指出我們不收留德国俘虏，因为他們把所有我們的被俘人員全都杀害了。

斯大林笑着插嘴說：“我們的一个士兵押运着一大批德国人，在途中他把他們全都杀了，只剩下一个。当他到达目的地时，人們問他：‘其余的都在哪里？’他說：‘我只是在执行总司令的命令，杀到最后一人——这就是最后一个。’”

在談話中，他提到德国人說：“他們是一种古怪的民族，像綿羊一样。我小时候就記得，公羊往那里走，其余的羊都跟着走。我还記得，革命前我在德国的时候，一批出席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迟到了，因为他們一定要等查票員来查驗他們的票，或者諸如此类的原因。俄国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嗎？有人說得好：‘在德国不会有革命，因为否則就要踩着草地。’”

他要我告訴他某些东西的塞尔維亞文是什么。自然，俄文和塞尔維亞文极为相近，那是明显的。“主啊，”斯大林叫道：“沒有疑問了：是同一个民族。”

还讲了一些奇聞逸事。斯大林特别喜欢我讲的一个。“一个土耳其人和一个門的內哥罗人在难得的休战期間談話。那个土耳其人不了解为什么門的內哥罗人經常打仗。門的內哥罗人回答道：‘为了搶劫。我們很穷，因此希望得到些战利品。你們作战又是为了什么呢？’土耳其人回答道：‘为了荣誉和光荣。’門的內哥罗人回答道：‘每个人都是为了他所沒有的东西而战。’”斯大林大笑，他評論道：“主啊，这很深刻：每个人都是为了他所沒有的东西而战。”

莫洛托夫也笑了，但还是有节制的，沒有声音的。他确实是

一个既不会拿出又不会接受幽默的人。

斯大林問我在莫斯科碰到了哪些領導人。当我提到季米特洛夫和曼努耳斯基的时候，他說：“季米特洛夫是比曼努耳斯基更精明的人，精明得多。”

这时他談到了共产国际的解散，“他們西方人很狡猾，他們對我們从来不提到它。要是他們提出的話，我們就会倔强起来，根本不解散它！共产国际的情形越来越不正常了。在這問題上，維亞契斯拉夫·米哈依洛維奇和我絞尽脑汁，而共产国际却自作主張——因此冲突越来越严重。和季米特洛夫共事是容易的，但是同其他人可就难了。最重要的是，当各国共产党应当寻求全国一致和在他們本国的条件下作战的时候，还保存一个总的共产主义論壇，那是不正常、不自然的。”

那天晚上收到了两封电报，斯大林把它們都交給我看。

一封是报告苏巴塞奇对美国国务院說的話。苏巴塞奇的立場是这样的：我們南斯拉夫人不能反对苏联，我們也不能奉行反俄政策，因为在我們中間，斯拉夫民族的和亲俄的傳統是很强烈的。

斯大林对此发表議論說：“这是苏巴塞奇吓唬美国人。但他为什么要吓唬他們呢？是的，是在吓唬他們。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他也許注意到我臉上吃惊的样子，于是接着說：“他們偷我們的电报，我們也偷他們的。”

第二封电报是丘吉尔拍来的。他通知，在法国登陆将于次日开始。斯大林便拿这封电报开玩笑說：“是的，如果沒有霧的話，会登陆的。直到現在，总是有点什么事情妨碍它。我猜想明天又該有些別的什么了。說不定他們会碰上一些德国人！如果他們碰上一些德国人，那怎么办呢！也許就不登陆了，但还是照

例作出保证。”

莫洛托夫像他平常那样結結巴巴地开始解釋道：“不，这次是真的了。”

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并不真正怀疑盟軍的登陆，可是他的目的是要嘲笑它，特别是嘲笑以前几次推迟的理由。

我今天来总结那天晚上的事情，我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斯大林是在故意恐吓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以便减少他們同西方的联系，同时他还企图使他們的政策从属于他的利益和他同西方的关系，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

由于他的思想和方法、个人经历和历史遗产，他认为只有被他牢牢掌握的东西才是靠得住的，而他的警察所不能控制的任何人都是潜在的敌人。由于大战的条件，南斯拉夫的革命已脱离了他的控制，而发动革命的力量正充分意識到它的潜力，以致他不能简单地对它发号施令。他是意識到这一切的，因此他只是做他所能做的事——利用南斯拉夫领导人反资本主义的偏見来反对西方国家。他试图迫使那些领导人受他的支配，并使他們的政策从属于他的政策。

苏联的领导人在其中生活过的那个世界——那也曾是我的世界——在我眼中慢慢地呈现出一个新面貌：在一切方面都在进行着殘酷的无休止的斗争。一切事情都在显露原形，变为爭吵，改变的只是爭吵的形式；在这种爭吵中，只有更强的和更圓滑的人才能生存。在此以前，我早就对苏联的领导人满怀仰慕，现在我更沉醉于那种一刻也不离开他們的无穷的意志力和自觉性了。

那是一个除了胜利或者死亡以外沒有其他选择的世界。

那就是斯大林——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締造者。

在我告别的时候，我又一次詢問斯大林对于南斯拉夫党的

工作有什么意見。他答道：“不，我沒有。你們自己最了解該怎麼辦。”

我到达維斯时，向铁托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員作了报告。我是这样总结这次莫斯科之行的：共产国际事实上已不存在了，我們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必須自謀生存。我們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軍隊。

那天晚宴后我告别的时候，斯大林交給我一把送給铁托的宝剑——最高苏維埃贈送的礼品。为了搭配这个堂皇高貴的礼品，我在返国途中經過开罗时添加了我自己的一份薄礼：一副象牙做的棋子。

从斯大林別墅周圍的樅树丛中，升起了一片雾和曙光。经历了又一个不眠的夜晚而疲倦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門口和我握手。汽車把我載入黎明，載入尚未苏醒的、浸在六月的藍色的烟雾和露水中的莫斯科。在我踏上俄国土地的时候有过的那种感觉重新出現了：从这块土地来看，世界毕竟不是那么大。有了斯大林，有了被认为最后将向人类揭示出社会 and 个人的真理的那种思想，世界也許不是不可征服的。

这是一个美梦——在战争的现实中的美梦。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在这二者之中断定哪一个更真实，我今天也仍然不能断定是梦还是现实在更大程度上未能实现自己的諾言。

人們生活在梦中和现实中。

二、疑 慮

(一)

如果我不是吃自己心直口快的亏，也許就永远不会有第二次莫斯科之行，因而也不会同斯大林第二次会見。

随着 1944 年秋紅軍的进入南斯拉夫以及貝尔格萊德的解放，紅軍的成員个别地或是成批地对南斯拉夫的人民和軍隊犯了很多严重的暴行，因此南斯拉夫的新政权和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政治問題。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紅軍理想化了。他們对自己队伍里的哪怕是最小的搶劫和犯罪行为也要作无情的处理。因此他們比老百姓更为震惊，老百姓凭历来的經驗认为所有的軍隊总是要搶劫和犯罪的。这个問題的确是存在的。更糟的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正利用紅軍士兵的这些事件来攻击这个尚未稳定的政权和整个共产主义。而由于紅軍司令部对各种控訴充耳不聞，給人以纵容这些罪行和罪犯的印象，整个問題就更加复杂化了。

铁托从羅馬尼亞——在那个时期他也曾訪問过莫斯科并首次会見了斯大林——一回到貝尔格萊德，就不得不处理这个問題。

在铁托那里开了一次会，我同卡德尔和兰科維奇都参加了——我們四人都是南斯拉夫党的最著名的领导人，会上决定同苏联使团团长考尼夫將軍討論这个問題。为了使考尼夫了解全部事情的严重性，决定不仅由铁托一人同他会談，而且我們三人以及南斯拉夫两位最卓越的司令官——彼科·达普契維奇将

軍和科查·波波維奇將軍也一起參加。

鐵托用極其溫和和客氣的方式向考尼夫提出了這個問題，但後者竟粗暴無理地加以拒絕，這就更加令人吃驚了。我們是將考尼夫當作一個同志和一個共產黨員請來的，豈知他却在這里大聲叫嚷道：“我以蘇聯政府的名義抗議對紅軍的這種轉彎抹角的指責，這……。”

想用一切辦法來說服他，都無濟於事。他突然以一個大國和“解放”軍隊的代表自居起來。

這時我說：“問題還在于，我們的敵人正利用這件事來攻擊我們，並把紅軍士兵的暴行與英國軍官的行為來比較，他們倒沒有這樣違法亂紀。”

考尼夫對我的話採取了粗暴的、完全不諒解的態度：“我最嚴重地抗議對紅軍的侮辱，竟把它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相比。”

後來南斯拉夫當局的确收集到了關於紅軍士兵不法行為的統計材料。根據公民們提出的控訴，有一百二十一件強姦案，其中一百一十件屬奸殺案，另有一千二百零四件行凶搶劫案——如果考慮到紅軍只是在南斯拉夫的東北角經過，那末這些數字就不能說微不足道了。這些數字表明，為什麼南斯拉夫領導人不得不把這些事件認為是政治問題，更嚴重的是因為這已成了南斯拉夫國內鬥爭中的一個問題。共產黨人也把這個問題看作是道德問題；那個理想的、我們老早就在期待着的紅軍難道能是這樣的嗎？

同考尼夫的會談無結果而散，雖然後來注意到蘇軍司令部對他們士兵的放蕩行為處理得比較嚴厲了。考尼夫一走，有些同志就因我所講的話而責備我，有的溫和，有的比較嚴厲。老實說，我從未想過要拿蘇聯軍隊和英國軍隊相比——英國只有一

个使团驻在贝尔格莱德——但是我讲的是明显的事实，并且只是把我对这样一个政治问题的反应告诉他。同时，考尼夫那样不了解和毫无商量余地，也把我惹火了。当然，我完全无意侮辱红军，那时我对红军的亲切之感是不亚于考尼夫将军的。鉴于我所处的地位，当妇女被蹂躏（我一向认为这是一种滔天罪行），我们的士兵被凌辱，我们的财产被劫掠的时候，我无法保持缄默。

我的这番话以及其他几件事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之间最初发生摩擦的原因。虽然事实上以后还发生了比这些更加严重的原因，但恰恰是这些话经常被举出来作为苏联领导人和他们的代表们表示愤慨的理由。我可以附带提一下，这肯定是苏联政府把苏沃洛夫勋章颁发给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其他一些领导成员而不授给我的理由。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也没有发勋章给彼科·达普契维奇将军。兰科维奇和我因此向铁托建议，由他颁发南斯拉夫民族英雄勋章给达普契维奇来还击这种故意的冷遇。我的那些话也是在南斯拉夫的苏联特务在1945年初散播谣言说我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原因之一。但他们自己后来却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这不仅因为这种指责是无聊的，而且由于我们的关系有了改善。

但是，由于我的那句话，我不久就发现自己几乎陷于孤立了，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最亲密的朋友责备我——虽然的确有过一些严厉的责备——也不是因为苏联领导人对整个事件过份夸张，而更深刻的原因也许是我自己内心的感受。这就是说，我在当时已经发现自己陷于每一个以善良愿望和利他精神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所感受到的苦闷。每个共产党人迟早一定会碰到那个理想与党的领导人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不过，在这一事件中，却不是因为红军的理想形象和红军成员的真正行为不相符合；我也知道，虽然红军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军队，

但它却“还不”能尽如理想，它仍然有着“旧社会的残余”。我的苦悶乃是由于苏联领导人和苏軍司令部对犯罪行为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說寬容吧）而造成的；这种态度由于他們不肯承认罪行和每当提請他們注意时还要抗議而暴露无遺。我們本是好意：要維護南斯拉夫共产党多年来的宣傳所建立起来的紅軍和苏联的声誉。而我們的这些好意遭到的是什么呢？是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所特有的那种傲慢和不理睬态度。

由于苏联代表們力图利用我那句基本上出自好意的話来支持他們对南斯拉夫领导的傲慢、挑剔的立場，这种苦悶格外加剧加深了。

是什么东西妨碍着苏联代表們了解我們呢？是什么道理我的話被夸大和曲解？为什么苏联代表用顛倒是非的手法利用我的話来达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将南斯拉夫领导人描繪成对紅軍忘恩負义的人，而紅軍則被說成在某一时刻內对南斯拉夫首都的解放起了主要作用并把南斯拉夫领导人安置在那里？

但是，这些問題得不到答案，在当时也不可能得到答案。

像其他許多人一样，我也被苏联代表的其他行动弄得思想混乱了。例如，苏軍司令部宣布它要贈送相当多的小麦給貝尔格莱德作为援助，但事情却是这样：那些小麦实际上是德国人从南斯拉夫农民那里征收来的，并且是存放在南斯拉夫土地上的。苏軍司令部把小麦以及其他許多东西都简单地看作他們的战利品。此外，苏联的情报人員还大批招募白俄流亡分子，甚至南斯拉夫人，其中有些人恰恰是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任职的。雇用这些人来反对誰，干什么？在我所领导的宣傳鼓动工作方面，与苏联代表的摩擦也可以深刻地感觉得到。苏联报纸有系統地歪曲和貶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斗争，同时苏联代表先是謹慎地、然后越来越公开地企图使南斯拉夫的宣傳符合于苏联的需要和

模型。

同时，苏联代表們的酒会越来越带有真正大宴会的性质，他們竭力勾引南斯拉夫领导人去参加。在我和其他許多人看来，这种酒会只能证实苏联人的理想和行动不一致，他們滿口仁义道德，而行动却是胡作非为。

两国的革命和两国的政府，虽然建立在同样的社会和意識形态的基础上，但一經接触却不能不发生摩擦。因为这是在一种排他的和封閉着的思想体系中发生的，这种摩擦在最初只能表現为一种精神上的苦悶和南斯拉夫方面对于正統的中心不了解一个小党、一个穷国的好意而感到的痛心和遺憾。

由于人类的反应并不是自觉的，我突然“发现”人与自然的分不开的联系——我回想到我在少年时代的打猎旅行，并突然認識到，在党和革命之外也存在着美。

但是悲哀痛苦才剛剛开始呢。

(二)

1944—1945年冬天，有一个規模相当大的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去，成員中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員兼工业部长安德里雅·赫布朗、最高參謀部參謀长阿尔索·約凡諾維奇和我当时的妻子米特拉·米特洛維奇。她除了向我談苏联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外，还能告訴我关于他們在性情方面的特点，对这一点我是特別敏感的。

这个代表团，無論个人还是整体，在关于南斯拉夫的一般情况和某些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問題上，自始至終受到斥責。苏联官員往往开头还談正确的事实，然后則加以夸大和概括。使事情更糟的是，代表团团长赫布朗竟与苏联代表勾結，向他們作书面

报告，并把苏联人的不满推卸到其他团员身上。从一切事情来判断，赫布朗的这种活动，是由于他对被撤去克罗地亚党委书记职务的不满，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想用这种做法来隐藏他过去在狱中时的怯懦行为——这一点是到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向苏联党提供情报并不被认为是大罪过，因为没有一个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要使他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党对立。何况苏联的中央委员会是容易得到关于南斯拉夫党的情报的。但是即使在当时，赫布朗的这种做法也具有破坏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的性质。他所报告的内容从来没有人知道。但是从他的立场，从代表团个别团员所讲的详细情况看来，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就在那时，赫布朗向苏联中央委员会提供情报的目的也是想获得它的支持并煽动它来反对南斯拉夫的中央委员会，以便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实现适合于他的改组。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原则为名来干的，并且以南斯拉夫人的或多或少明显的错误和缺点为借口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这样的：赫布朗认为南斯拉夫不应该不依靠苏联而独立地建设经济和制定经济计划，而中央委员会则赞成同苏联密切合作，但不能损害我国的独立。

给那个代表团精神上的当头一棒，当然是斯大林干的。他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以照例的宴会和只有在莎士比亚的戏里才能找得到的场面来款待它。

他批评了南斯拉夫军队及其管理不善的问题。但是他指名攻击的只有我一个人。看看他是怎样攻击的！他激动地讲到红军所受的苦难以及他们不得不在被蹂躏的国家奋战几千公里而遭受的种种惨事。他哭泣起来，叫嚷道：“对这样一种军队横加侮辱的不是别人，正是德热拉斯！德热拉斯，我简直没有想到他会干出这种事来，我待他多好呀！而这个军队曾不惜为你们流血！难道德热拉斯，他自己还是个作家，竟不懂得什么叫人的痛苦和

人的情感嗎？如果一个在鮮血、战火和死亡中横扫几千公里的士兵，同妇女开开心或者拿些小东西，难道他不能理解嗎？”

他不断地举杯祝酒，向这个人說几句好話，跟那个人开开玩笑，把第三个人刺痛一下，吻吻我的妻子，因为她是塞爾維亞人，然后又为紅軍的艰苦和南斯拉夫人的忘恩負义而流泪。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按照他們的个性演戏似地各自扮了不同的角色：莫洛托夫冷酷地煽風点火，而斯大林則陷入一种悲剧式的伤感心情。斯大林在吻我的妻子时大声喊道，他作出这种恋爱的姿态，是冒着被控为强奸的危險的，这时他的情緒确是达到了最高潮。

关于党、共产主义、馬克思主义，他談得很少，或者說根本不談，但是关于斯拉夫人、关于俄罗斯人与南方斯拉夫人的关系却談得很多，而且，又一次談到了紅軍的英勇牺牲和所受的苦难。

我听了这些話，真是感到战慄和茫然。我在今天看来，斯大林拿我做替罪羊主要并不在于我的“失言”，而是在于他想設法把我拉过去。这是由于我对苏联和对他这位大人物的一片真誠热爱，才促使他这样的。

我回到南斯拉夫后，就立刻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斯大林会見記》的文章，这篇文章使他大为高兴。一位苏联代表請我注意，以后再版时，应当刪掉关于斯大林脚太大的話，并且應該更強調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之間的亲密关系。同时，由于斯大林能很快地把人摸透，并且特別擅长于利用別人的弱点，他一定已經知道，用政治野心为誘餌来把我拉过去，是办不到的，因为我对这些事情很淡漠；他也不能在思想上把我拉过去，因为我爱苏联党并不甚于爱南斯拉夫党。他只能利用我的感情——由于我的真誠和热情——来影响我，因此他就采取了这条途徑。

虽然富于情感和真誠是我的优点，但是在我遇到伪善和不

平时，这种优点却很容易轉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正因如此，斯大林不敢公开籠絡我。当經驗向我证明了苏联的非正义的霸权主义的意图时，我就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坚定了，这就是說，我已摆脱了我的感伤心情。

今天的确难以确定斯大林的行动中有多少是演戏，有多少是真正的怨恨。我个人相信，在斯大林身上要把这两者加以区分是不可能的。在他身上，假做作是完全自发的，以致似乎他本人也相信他所說的都是真誠的了。无论討論什么新問題，甚至对于每个新人物，他都能应付自如。

总之，代表团在茫然若失和灰溜溜的心情下回国。

同时，我的孤立感加深了，这还因为斯大林因我对紅軍的“忘恩負义”而流泪的緣故。虽然越来越孤立，但我并不气馁。我日益轉向写作和讀書，从內心里寻求一条出路来摆脱那纏繞着自己的困难和誤解。

(三)

光阴荏苒。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不能老停留在过去由軍事使团和軍隊所确定的那个状态。联系頻繁了，关系增多了，取得了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国家与国家之間的形式。

4月間，一个国家代表团将启程去同苏联簽訂一項互助条約。代表团由铁托率領，与他同行的有外交部长苏巴塞奇博士。代表团中还有两位經濟部长B·安德烈耶夫和N·彼得罗維奇。我之成为代表团的一分子，一定是出于这种願望，即用直接接触的办法来消除关于“侮辱”紅軍問題的爭执。铁托把我列入了代表团，而因为苏联方面未加反对，我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員一同登上了飞机。

这时正是4月初，由于气候恶劣，飞机一直在颠簸。铁托和大多数随行人员都病了。连驾驶员也不舒服了。我也感到难过——但是另有原因。

从我开始知道我要去苏联起一直到会见斯大林，我都觉得侷促不安，好像我是那种悔过的人。但我不是一个懺悔者，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要做那种人。在貝尔格莱德，我的周围已经产生了一种越来越难受的气氛，好像我是那种失势的人——“把事情弄糟了”——因此这种人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乞求斯大林的寬容来設法贖罪。

飞机飞近莫斯科了，早就受慣的孤立感涌上了心头。我第一次感到我的同志們，战友們，輕輕地甩开了我，因为同我有任何接触都可能使他們在党内的地位受到危害，而使人看来好像他們也已“誤入歧途”。甚至在机舱里，我都不能摆脱这种感觉。我和安德烈耶夫的关系因战争和在獄中共患难而十分亲密，因为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显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們之間老是善意地开开玩笑和开誠相見。但是現在呢？他似乎很可怜我，爱莫能助，而我則不敢接近他——我怕丢臉，尤其怕迫使他处在一种不方便和不必要的同我友好的地位。和彼得罗維奇也一样，我在地下生活和工作的艰难时期就和他熟識了；我們的友誼偏重在學問方面，但現在我却不敢同他重提关于塞爾維亞政治史的漫長的討論了。至于铁托，他对整个事件保持沉默，好像沒有发生过一样，对于我並沒有表示明确的感想或意見。然而，我认为，他在心里——为了政治上的原因——是站在我一边的，而这就是为什么他帶我一起去和为什么他不表示态度的原因。

我初次体验到我的單純的良知（即普通人追求善和真的心理）和我处在其中而我的日常活动受其制約的环境（即一种受其

本身的抽象目的所限制并受其实际可能性所束缚的运动)之间的冲突。但是在这时候,这种冲突在我的意识里还不是以那种形式出现,而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即我要改善世界及我所属的运动的善良意愿同作出决定的那些人方面缺乏理解这两者之间发生冲突。

越临近莫斯科,我越感到不安。

在我的下面,掠过一片土地,它的黑色刚从溶雪中冒出来,这是一片被河流和在许多地方被炸弹撕裂的土地——荒无人烟。天空也是乌云密布、阴沉,不见天日。我飞越一个空虚的也许是梦幻的世界,同时我又觉得它是比我过去所曾生活过的世界更为真实的世界,但是对我说来,既没有天也没有地。我在天和地、良心和经历、愿望和可能之间摇摆不定地飞翔。在我的记忆中只剩了空虚和痛苦的颠簸——最初的那种斯拉夫民族感情已荡然无存,连那种在初次碰到俄国人、苏维埃的土地及其领导人时曾经出现过的革命狂喜也没有了。

第一件事是铁托的晕机。他精疲力尽,脸色发青,使尽了最后一点毅力来念颂词并坚持参加欢迎仪式。主持招待委员会的莫洛托夫同我冷淡地握握手,面无表情,好像不认识我一样。还有一点也很不愉快:他们将铁托接到专用的别墅里去,而让我们其余的人住在大都会饭店。

灾难重重,简直具有一个运动的规模。

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我的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一个有诱惑力的女人声音讲话了:“我是卡佳。”

“哪个卡佳?”我问。

“是我,卡佳。你不记得了吗?我一定要见你。我非见你不可。”

在我的脑子里迅速地出现了好些个卡佳——但是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起了疑心。苏联特务机关知道,在南斯拉夫共产

党里，对于个人道德的看法是很严格的，所以他們是在設一个陷阱，以便以后对我敲詐。我知道，在“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像每个大都市一样，私娼充斥，这是并不新奇的。但是我还知道，除非情报机关要这样做，她們是无法同外国要人接触的，因为外国要人在这儿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被看守和監視得更严密。且不管这些想法，我总算做了我該做的事；我鎮靜而干脆地說：“別打擾我！”——于是我放下了听筒。

我怀疑我是这个明显而淫猥的計劃中的唯一目标。然而，由于我在党内的高級地位，我感到有必要断定一下，同样的事情有沒有在彼得罗維奇和安德烈耶夫那里发生，此外，我还要對他們两人当面訴苦。是的，他們的电话鈴也响了，但不是卡佳，而是娜塔莎和伏娃！我将自己的經歷說了一遍，实际上是命令他們不許有任何接触。

我的感情很复杂——感到寬慰的是我不是唯一的目标，但同时也加深了怀疑。这一切是干嗎的？我从未想到去問苏巴塞奇博士，对他是否也有过同样的試探。他不是共产党员，把苏联及其手段不利地暴露在他面前，對我說来是尷尬的，况且他們是針對共产党人的。然而我敢肯定，没有什么卡佳去勾搭过苏巴塞奇。

我还不能得出結論說，苏联霸权借以在东欧各国坐穩的枪把子和工具，恰恰是共产党人。但是我很怀疑是这样的。我对这些做法不寒而慄，并对我的人格受到这种捉弄而感到憤恨。

当时我仍敢相信，我可以做一个共产党员而依然是一个自由的人。

(四)

关于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同盟条約，沒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

这个条约是例行公事，我的工作只是核实译文。

签字仪式于4月11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参加的官员人数极其有限。公众方面——如果这种用语可以适用于那个环境的话——只有苏联的摄影人员在场。

当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插曲：斯大林举起一杯香槟酒，转向一位服务员，请他碰杯。这位服务员局促不安，但当斯大林说了“怎么，你不愿意为苏南友谊干杯吗？”这句话的时候，他就顺从地拿起酒杯，一饮而尽。整个场面有些譁众取宠，甚至肉麻，可是人人都笑容可掬地把它看作是斯大林关怀普通人和同他们亲近的表示。

这是我再次会见斯大林的第一个机会。他的态度毫不亲切，虽然没有莫洛托夫那种生硬的冷淡和假装的和藹。斯大林没有和我当面讲一句话。在红军士兵的行为问题上的争执，显然没有被忘记，也没有被宽恕。我还得继续受炼狱之火的熬煎。

在克里姆林宫的内部宴会上，他也一言不发。宴会后我们看了电影。由于斯大林表示他对炮火已感到厌倦，所以他们放映的不是战争片，而是一部肤浅的关于幸福的集体农庄的影片。在整个电影放映期间，斯大林对影片中的情节不断发表意见，好像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将艺术上的现实当做真的事实一样。第二部影片是一部战前摄制的关于战争主题片子，《如果明天战争》。在那部影片里，战争时使用了毒气，而在侵略者——德国人——的后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爆发了起义。电影放完后，斯大林沉着地说：“和实际情况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没有用毒气，德国无产阶级也没有起义。”

人人都对于敬酒、佳肴和电影厌烦了。斯大林又一言不发地也和我握了握手，但在这时我更不在乎和镇静了，虽然我说不

原因來。也許由于氣氛比較輕鬆了。是不是也由于我的內在的決心和果斷呢？也許兩種原因都有。總之——得不到斯大林的寵愛也能活下去了。

一兩天之後，在葉卡德琳娜大廳舉行了正式的宴會。按照蘇聯當時的禮節，鐵托坐在斯大林的左面和當時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加里寧的右面。我坐在加里寧的左邊。莫洛托夫和蘇巴塞奇坐在斯大林和鐵托的對面，而南斯拉夫和蘇聯的其他官員則圍席而坐。

呆板的氣氛似乎更加不自然了，因為除了蘇巴塞奇博士外所有在座的都是共產黨人，然而他們在祝酒時互稱“先生”，並且嚴格地遵照國際禮節，仿佛這是一個不同制度和不同意識形態的代表們的會晤。

除了祝酒和禮節以外，我們彼此仍以同志相待，這就是說，像互相親近的人一樣，像投身於同一運動、具有同一目標的人一樣。禮節和現實之間的這種對照更加強烈了，因為蘇聯共產黨人和南斯拉夫共產黨人之間的關係仍然是誠摯的，並未因蘇聯在共產主義世界的霸權主義和爭奪威信而有所損害。然而現實生活是不管欲望和野心的，它一定要貫徹誰也不能預見到的它自己的規律。

蘇聯和西方盟國之間的關係仍處在戰時蜜月的狀態。蘇聯政府想以遵守這種禮節來避免那種抱怨，即認為蘇聯正是由於南斯拉夫是共產黨的国家而對南斯拉夫不以獨立國家相待。後來，當蘇聯在東歐的地位鞏固以後，蘇聯政府就堅持把那些繁文縟節當作“資產階級的”和“民族主義的”偏見而拋開。

斯大林打破了拘束的氣氛。只有他才能這樣做，因為只有他不致有被批評為違反常規的危險。他站起來，舉起酒杯，稱鐵托為“同志”，並補充說，他不願意再稱呼他“先生”。這才恢復了

真正的亲切并活跃了气氛。苏巴塞奇博士也高兴地微笑着，虽然很难相信他出于真心，这位政治家没有主见，没有什么稳定的基础，但却是不乏假惺惺的姿态。

斯大林开始开玩笑，妙语横生，连抱怨别人也显得和颜悦色了。气氛活跃起来，再也不沉闷了。

加里宁老伯的眼睛简直不行了，找酒杯、碟子、面包都有困难，我整个时间都一直热心地从旁照顾他。铁托在一两小时前才对他作过一次礼节性的访问，他告诉我，这位老人并不完全老态龙钟。但是从铁托所讲的以及从加里宁在宴会上所讲的话看来，人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斯大林当然知道加里宁已衰老了，因为在后者向铁托要一支南斯拉夫香烟的时候，他给加里宁开了个非同小可的玩笑。斯大林说：“别拿——那是资本家的香烟。”加里宁慌张地从他的颤抖的手指上扔掉了烟，于是斯大林就哈哈大笑，他的脸上的表情活像个色鬼。过了一会儿，正是斯大林自己向“我们的主席”加里宁敬了一杯酒，但是这显然是对这位长期以来的傀儡领袖讲的一句应酬话而已。

在这个相当广泛和比较正式的圈子里，将斯大林奉为神明的情况更加露骨和直接了。今天我可以得出结论说：将斯大林奉为神明，或者像现在所谓的“个人迷信”，既是那些需要这样一个领袖的、斯大林周围的人 and 官僚制度搞出来的，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前一因素至少并不亚于后一因素。当然，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斯大林既变成了神，他的权力如此之大，因而他就不再注意那些捧他出来的人们变化着的需求和欲望了。

一个体态不匀称的矮子走过金碧辉煌、大理石的帝国大厅，在他的面前让开了一条路，欣喜和崇敬的眼光注视着他，同时朝臣们竖着耳朵听他的每一句话。而他呢，由于对自己和对他的

事业很有把握，显然对这一切毫不注意。他的国家疮痍满目，饥饿，筋疲力尽。但是他的军队和元帅们却穷奢极欲，满身勋章，沉醉在伏特加和胜利之中，他们已蹂躏了半个欧洲，而他深信在下一个回合他们将践踏另外的一半。他明白自己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专制的人物之一。但是这一点也不使他烦恼，因为他深信他是在执行历史的判决。他的良心毫无不安，尽管有成百万人已为了他和根据他的命令而遭到毁灭，尽管有成千名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被他当作叛徒加以谋杀，因为他们怀疑他是否在领导国家和人民走向幸福、平等和自由。这个斗争是冒险的，长期的，特别是阴险的，因为他的对手人数少，力量弱。但是他成功了，而成功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何谓良心？究竟有没有良心？在他的哲学中，良心是没有地位的，在他的行动中更不用说了。人毕竟是生产力的产物。

诗人们从他那里得到灵感，管弦乐队演奏向他致敬的圣歌，研究所的哲学家们写出成卷关于他的语录的书，烈士们在断头台上高呼他的名字而死。现在他是他本国的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的胜利者。他的权力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是绝对的，并正在不停地向外扩张。这使他深信，他的社会没有任何矛盾，并显示出在各方面对其他社会的优越性。

他也和他的朝臣们——“同志们”开玩笑。但是他的开玩笑并不完全出自一个统治者的雅量。只有在他的玩笑不使自己吃亏时才看得出他的至高无上的雅量。不，他之开玩笑是因为他喜欢从他的奥林匹斯山高峰^①上下降；他终究是生活在人们之中，因而不得不随时表明，个人脱离了集体是毫无意义

① 奥林匹斯山高峰(Olympian heights)，是希腊境内的山峰，古希腊神话中传说那里是神仙的住处，这里意指斯大林高高在上。——译者

的。

我也被斯大林和他的妙語迷住了。但在我的內心和是非感的一小角里，我是清醒的并感到不安：我也看到了俗气，我在內心里不能接受斯大林的开玩笑态度——也受不了他故意不跟我讲一句合乎人情的同志式的话。

(五)

当我也被邀参加在斯大林的別墅举行的亲切的宴会时，我还是高兴地感到意外的。当然，苏巴塞奇博士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只有我們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部长們在座，苏联方面参加的是斯大林最密切的心腹：馬林科夫、布尔加宁、安东諾夫將軍、貝利亚，当然还有莫洛托夫。

像往常一样，約在晚上十时左右，我們都已圍着斯大林的餐桌就座。我是和铁托同車到达的。桌子的一端坐着貝利亚，他的右边是馬林科夫，然后是我和莫洛托夫，然后是安德烈耶夫和彼得罗維奇，而在貝利亚的左手坐着斯大林、铁托、布尔加宁和副总參謀长安东諾夫將軍。

貝利亚也是个相当矮的人——在斯大林的政治局里几乎沒有一個人比斯大林高。貝利亚也有些臃肿，臉色白里帶青，有一双柔軟而潮湿的手。他的方形的嘴巴和藏在夹鼻眼鏡后面的一对金魚眼睛，突然使我想起伏伊科維奇来，他是貝尔格莱德皇家警察局的头子之一，擅于折磨共产党人。我竭力想消除这种不愉快的比較，但它更加牢牢糾纏住我，因为那种相似甚至扩大到了他的表情——某种自滿和尖刻，夹杂着小職員的巴結和小心翼翼。貝利亚像斯大林一样，是格魯吉亚人，但是人們从他的容貌上完全看不出这一点。格魯吉亚人一般都是又瘦又黑；連在

这方面他都不像。把他当做斯拉夫人或列特人^①倒更说得过去些，而且最好说他是一个混血种。

馬林科夫的个子更矮更胖，但他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带有蒙古血统——黝黑、高颧骨，脸上略有麻点。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缩手缩脚、谨小慎微、风度不很潇洒的人。看起来，在那一层的肥肉下面活动着的好像是另一个人，生气勃勃和内行，有一双聪明伶俐的黑眼睛。人们早已知道他是斯大林在党务上不露面的继承人。实际上，一切有关党组织以及官员的提升和降级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就是发明“干部名册”的人，这个“名册”是一个拥有几百万人的党的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的详细履历和自传，它被严密地和分门别类地保藏在莫斯科。我乘与他会面之便，向他索一本斯大林的著作《论反对派》，这本著作在公开发行后又被收回，因为其中有許多引用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话。第二天我收到了一本旧的，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房里。

布尔加宁穿着一身将军制服。他相当结实、英俊，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留着一撮老式的山羊胡子，谈吐极其谨慎。安东诺夫将军还年轻、很漂亮、皮肤黝黑，行动轻快。他也不参加谈话，除非事情与他有关。

同斯大林面对面坐着，突然之间我有了信心，虽然他的脸好久没有转向我。直到气氛被酒、干杯、开玩笑搞得热烈之后，斯大林才认为和我清算那场争执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是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来办的。他给我斟满了一小杯伏特加，并叫我为红军干杯。我没有马上领会他的意思，愿为他的健康干杯。他一面微笑着和刺探性地注视着我，一面坚持说：“不，不，就是要为红军干杯！怎么，你不肯为红军干杯吗？”

① 列特人(Lett)，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人种之一。——译者

自然，我喝了，虽然即使在斯大林的宴会上，我也避免喝啤酒以外的酒，首先因为酒精对我不合适，其次因为酩酊大醉是不符合我的主张的，虽然我从来不是一个提倡禁酒的人。

于是，斯大林问我关于红军的那件事。我向他说明，我并无侮辱红军之意，只是想提请注意红军某些成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及他们正在给我们造成的政治上的困难。

斯大林打断我的话说：“嗯，想必你是读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的？你有没有了解，人的心灵、人的精神是多么复杂的东西？那么，设想一下，一个人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越过他的祖国的数千公里被蹂躏的土地，跨过他的同志和最亲爱的人的尸体！这样的人的反应怎么能正常呢？在经历了这种惨事以后，同一个女人玩玩，有什么了不得呢？你以为红军是理想的。它并不理想，也不可能是理想的，即使红军里面没有一定比例的罪犯——我们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把所有的人都安置在军队里。有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个空军少校调戏一个女人，一个侠义的工兵出来保护她。这个少校拔出枪来说：‘嘿，你这个从后方来的地鼠！’——就把这个侠义的工兵打死了。他们把少校判了死刑。但是不知怎么搞的，这件事提到我这儿来了，我就加以调查——在战时我作为总司令，是有权调查的，于是我释放了这个少校并把他派到前线去。现在他成了我们的一位英雄。大家都必须了解军人。红军并不理想。重要的是它同德国人打仗——而且打得很好，旁的一切就无所谓了。”

不久以后，在我从莫斯科回国后，我吃惊地听到了一个重要得多的，关于斯大林对红军人员的罪行抱“谅解”态度的例子。就是，当苏联士兵，特别是坦克部队，在经过东普鲁士的时候，接连不断地向德国难民——妇女和儿童开炮，把他们全部打死了。有人把此事报告斯大林，并请示如何处理。他回答道：“我们对

士兵訓戒得太多了；讓他們有點主動性吧！”

那天晚上在他的別墅里，他還問：“我們的使團團長考尼夫將軍怎麼樣，他是哪一種人？”

我避免說他和他的使團的壞話，雖然事情要提有的是，但斯大林本人卻下了斷語：“這個可憐的人並不糊塗，但他是個酒鬼，一個不可救藥的酒鬼！”

隨後，斯大林看見我喝啤酒，竟和我開起玩笑來。其實，我連啤酒都不喜歡。斯大林說道：“德熱拉斯在這兒像德國人那樣喝啤酒，像德國人一樣，——他是個德國人，啊，是個德國人。”

我根本不覺得喜歡這個玩笑；那時候在莫斯科，對德國人，甚至對那些少數共產黨流亡分子，都恨透了，但是我聽了這個玩笑並不發怒，內心也沒有憤恨。

從這些事看來，關於紅軍行為問題的爭執已消除了。斯大林對我的關係又恢復到原來的真摯了。

而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1948年南斯拉夫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中央委員會發生裂痕為止，那時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他們的信里又把那個關於紅軍的老爭執以及我對它們“侮辱”問題掏出來了。

斯大林顯然故意揶揄鐵托——用一種既懷有惡意又是開玩笑的態度。他的做法是：一面講南斯拉夫軍隊的壞話，同時又大捧保加利亞軍隊。前一年冬天，南斯拉夫部隊，包括許多第一次在很激烈的正面攻擊中作戰的新兵，遭到了失敗，而斯大林顯然是很了解情況的，卻乘機指摘說：“保加利亞軍隊比南斯拉夫的好。保加利亞人有他們的缺點，敵人混進了他們的隊伍。但是他們處決了幾十人後，現在一切都正常了。保加利亞軍隊很好——有訓練，有紀律。而你們的南斯拉夫軍隊呢——他們還是游擊隊，不適於打認真的陣地戰。去年冬天，德國的一個團就

打垮了你們整整一个师。一个团打垮了一个师！”

不一会，斯大林又向南斯拉夫军队祝福，但是他不忘记补充一句：“但是它在平地上还是会打得好的！”

铁托对斯大林的意见不表示态度。每逢斯大林讲些俏皮话挖苦我们的时候，铁托就强作笑容，悄悄地望着我，我以默契和同情的眼光回看他。可是当斯大林说保加利亚军队比南斯拉夫军队好的时候，铁托受不了了，并大声叫道，南斯拉夫军队会很快扫除它的缺点的。

人们可以觉察到斯大林和铁托的关系有点特殊，心照不宣——好像这两人彼此怀恨在心，但每一个人又由于自己的原因而克制着。斯大林很注意不冒犯铁托本人，而同时却不断地对南斯拉夫的情况旁敲侧击。另一方面，铁托对斯大林像对长辈一样尊敬，但是也能看出他的愤恨，尤其是对斯大林的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话。

在谈到一个地方时，铁托发表意见说，在社会主义中出现了新现象，现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与过去不同了，这就使斯大林乘机说：“今天甚至在英国的君主政体下，也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了。革命已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了。最近恰好有个英国工党代表团在这里，我们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是的，有许多新现象。正是，甚至在英国的国王统治下也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斯大林从未公开提出过这种见解。英国工党不久在大选中获得了多数，并将20%以上的工业生产国有化。然而，斯大林从来没有承认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承认工党人士是社会主义者。我认为，他之所以不承认，主要是因为他和工党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有分歧和冲突。

在谈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插口说，南斯拉夫实质上存在着一个苏维埃式的政府，共产党占有所有要职，而且没有一个重

要的反对党。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一点：“不，你们的政府不是苏维埃——你们的政府是介乎戴高乐法国和苏联之间的东西。”

铁托说，在南斯拉夫，有些新事物正在形成中。但是这场讨论没有谈完。我在内心里不能同意斯大林的看法；我也不认为我同铁托有什么分歧。

斯大林就正在进行的战争的特殊性提出了他的看法：“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

他还不加详细说明地指出了他的泛斯拉夫政策的意义：“如果斯拉夫人万众一心，保持团结，那末将来谁也不能动我们一个手指头。连一个手指头也不行！”他反复地说，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一下来说明他的想法。

有人怀疑德国人能否在五十年之内恢复元气。但斯大林却有不同意见：“不，他们会恢复的，而且很快。那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有十分熟练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技术知识分子。给他们十二年到十五年的时间，他们就会重新站起来的。而这就说明了斯拉夫人团结之重要。但是甚至撇开这点不谈，只要有斯拉夫人的团结，那末谁都不敢动一个手指头。”

谈到一个地方，他站起来了，提提裤子，好像他就要去摔角或拳击的样子，并且几乎欢天喜地般大声说道：“战争不久就该结束。我们将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内复原，那时我们又得来再干一场。”

他的话里包含着一些可怕的东西：惨酷的战争还在进行中。然而也有些给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他认识到他应走的道路，以及他所生活的世界和他所领导的运动的必然命运。

那天晚上，他所讲的其余的话就不值得去追忆了。大家吃

得很多，喝得更多，還有數不清的無聊的祝酒。

莫洛托夫詳述了斯大林是怎樣諷刺丘吉爾的：“斯大林為特務和特務機關干杯，以此諷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丘吉爾在加利波利^①的失敗，其所以失敗是因為英國缺乏充分的情報。”莫洛托夫還興致勃勃地舉例說明丘吉爾的奇妙的幽默感：“丘吉爾在莫斯科醉熏熏地宣稱，他應該得到紅軍的最高勳章和表揚，因為由於對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干涉，他把紅軍教得這麼會打仗。”可以總的來說，丘吉爾給蘇聯領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認為他是一個有遠見而危險的“資產階級政治家”——雖然他們並不喜歡他。

在乘車回到鐵托的別墅的路上，鐵托，他也受不了大量的酒，在汽車里說：“我真不懂這些俄國人怎麼搞的，喝得那么多——簡直是墮落！”我當然同意他的話，並試圖找出為什麼蘇聯上層社會中的人這樣嗜酒如命的原因，但無論怎麼想，都不知其所以然。

在從鐵托住的別墅回到市內的路上，我理了一下那天晚上我所得的印象，確是沒有什麼重要的事發生：沒有分歧之點，然而我們之間的距離似乎比以前更遠了。一切爭執都為了政治上的理由而解決了，因為在兩個獨立國家的關係中，有些事是很難避免的。

在我們的訪問結束時（繼出席斯大林的宴會之後），我們在季米特洛夫家裡度過了一個晚上。為了消磨時間，他請了兩三位蘇聯演員作了簡單的表演。

當然談到了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將來結成聯盟的問題，但是談得很一般和簡短。鐵托和季米特洛夫互相追憶了共產國際

① 加利波利(Gallipoli)，是意大利最南部的一個海港。——譯者

的往事。总而言之，这与其說是政治性的会晤，不如說是友好的聚会。

季米特洛夫当时很孤独，因为所有保加利亚的流亡分子早就跟在紅軍后面到保加利亚去了。人們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感到厌倦和沒精打采，我們至少知道一部分原因，虽然誰也沒有談起过这一点。保加利亚虽已获得解放，但斯大林却不准季米特洛夫回国，借口还不到合适的时候，因为西方国家会拿他的回国作为在保加利亚建立共产主义的公开迹象——好像沒有这件事，这种迹象就不明显了！在斯大林的宴会上也談到过这件事。斯大林眨着眼睛泛泛地說：“还不到季米特洛夫回保加利亚去的时候，他在这里也蛮好。”

虽然无法证明，但即使在那时还是有人怀疑，斯大林是在阻止季米特洛夫回国，除非等他本人把保加利亚的事情都安排好以后！我們的这些怀疑那时还不是指苏联的霸权，尽管这也已經露出了苗头；我們把这个问题认为是斯大林深恐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亚把事情向左推进得太快所作的必要的安排。

但是即使这一点也就意味深长并且足够了——作为一个开端来看。这引起了一系列的問題。斯大林是一个天才，但季米特洛夫也不是个庸才。凭什么证明斯大林比季米特洛夫更了解应当在保加利亚怎么办？違背季米特洛夫的意志将他扣留在莫斯科，这不是破坏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和保加利亚人民中間的威信嗎？而总的來說，干嗎要在季米特洛夫回国的問題上要这一手，而俄国人又不向任何人、甚至不向季米特洛夫把这件事讲清楚呢？

事情的开端总是来源于义憤，来源于怀疑別人的好意，这在政治上尤其是如此。

(六)

我們取道基輔回國，由於我們自己和蘇聯政府的願望，我們停留了兩三天去訪問烏克蘭政府。

烏克蘭黨的書記兼政府總理是尼·謝·赫魯曉夫，而他的外交人民委員是曼努耳斯基。就是他們兩位來迎接我們的，我們同他們在一起過了整整三天。

那時是1945年，戰爭還在進行，人們是被許可表示適度的願望的。赫魯曉夫和曼努耳斯基表示了一個願望——烏克蘭可能同“各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然而，這並沒有成為事實。甚至在“各人民民主國家”，斯大林很快地遭到了反抗，因此他不想去加強烏克蘭的任何分離傾向了。至於長于雄辯、精神抖擻的老戰士曼努耳斯基——一個沒有部的部長——後來他在聯合國發表演說有兩三年，可是有一天突然失蹤了，淪為觸怒了斯大林或其他什麼人的大批不知名的受害者之一。

赫魯曉夫的命運則大不相同。但是那時候誰也无法給他算命。就在那時，他已身居最高政治領導層中——1939年以來即已如此——雖然人們以為他不如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甚至卡岡諾維奇那麼同斯大林親近。在蘇聯的高級階層中，他被認為是一個極為精明的工作人員，擅長經濟和組織事務，但不是一個作家或演說家。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清洗後，他登上了烏克蘭的領導地位，但是我不熟悉他在清洗中擔任了什麼角色，當時我對此也不感興趣。但是大家知道，在斯大林的俄國，一個人怎樣才能飛黃騰達：一定要靠在血腥的“反富農”和反對“反黨集團”運動中的堅決和靈巧。對烏克蘭來說，這是尤其正確的，那里除了上

述的“大罪”外，还有“民族主义”。

虽然他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成功，但就苏联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的发迹不足为奇：他是通过政治的和其他的学校、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出头的，凭他的忠诚、机警和智慧爬上了党的阶梯。像多数领导人一样，他属于革命后党和苏联官员中斯大林主义的新一代。战争使他在乌克兰高居首位。由于红军不得不在德国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从乌克兰撤退，他被授予红军里的一个高级政治职位，但不是最高的——他仍穿着陆军中将的制服。在德国人被赶走後，他回到基辅当了党和政府的首脑。

我们不知在哪里曾听说，他不是乌克兰出生的人，而是俄罗斯人。虽然别人不谈论这件事，他本人也避免提到这点，因为，如果连乌克兰政府的总理都不是乌克兰人，那就会很不好办的！即使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在乌克兰人——一个人数同法国人相等、而在某些方面比俄罗斯人更有教养的民族——中间，竟没有一个人能当政府的总理，也确是异乎寻常的，尽管我们共产党人善于为一切可能使我们的理想美景黯然无光的事情辩解和搪塞。

也不能对我们隐瞒这一点：当德国人向乌克兰地区挺进时，乌克兰人整批地从红军里开小差。在德国人被赶走後，约有二百五十万乌克兰人被征入红军。虽然对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小规模的作战还在进行（天才的苏联将军瓦杜丁就是这些民族主义中的受害者之一），我们仍然不能十分相信这种解释：乌克兰的情况完全是由于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顽强造成的。问题本身就是骗人的：如果苏联各族人民是真正平等的，这种民族主义从何而来？

我们对于公众生活的显著俄罗斯化不胜惊讶。戏院的舞台上讲的是俄罗斯话，甚至还用俄文出版的日报。

但是，我們絕對无意把这件事或任何其他事情的責任推在我們熱心的主人尼·謝·赫魯曉夫身上，因為作為一個好共產黨員，他除了執行他的黨、他的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和他的領袖和導師約·維·斯大林的命令之外，什麼事也不能做。所有蘇聯領導人都是以他們的講求實際，而在共產黨的圈子裡以直截爽快著名的。在這兩方面，尼·謝·赫魯曉夫都比其餘的人更為突出。

無論在那時或現在——在仔細讀過他在幾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以後——我的印象都是：他的知識不超出古典俄國文學和俄國歷史的範圍，而他對理論的掌握只達到中級黨校的水平。在這種從課本上獲得的皮毛知識之外，重要得多的，是他作為一個自學的人靠着經常充實自己而獲得的知識，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從活躍的多方面的活動中所取得的經驗。要斷定這種知識的數量和質量是不可能的，因為同樣令人吃驚的是他知道某些生僻的事實，而對於某些基本真理卻一無所知。他的記憶力是出色的，並能清楚而生動地表達意見。

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不同，他說起話來絮絮不休，雖然他像他們一樣，愛用民間諺語和格言。在當時這是一種時髦，也是一個人同人民聯系的證明。但是，由於他純朴而自然的舉止和說話態度，他在这方面不大矯揉造作。他也有幽默感。斯大林的幽默富於智慧，也很尖刻；赫魯曉夫的幽默，則以簡單平易為其特點，因此往往近乎粗魯，但卻生動，源源不竭。他現在既已達到了權力的最高峰並成了全世界矚目的中心，人們可以看出，他是注意自己的態度和表達方式的，但基本上仍沒有改變。從目前這個蘇聯國家和黨的首腦身上，不難看出他是一個來自人民大眾的人。但必須補充一句，他不像任何共產黨的自學的和沒有完成學業的學者那樣有那麼多的自卑感，這就是說，他並不感到有必要去把他

的无知和弱点隐藏在表面的才华和概括能力的后面。在他的談話中很多的口头禪，表明了他既是真正的无知，又死記馬克思主义的原理，但是即使这些口头禪，他也是以确信不疑和坦率的态度讲出来的。他用来表达意見的語言和态度所吸引的人比斯大林的讲話要广泛得多，虽然他也是对同样的党同样的公众讲話。

穿着一身不十分新、沒有熨过的將軍服，他那时是苏联領導人中唯一追究細節、深入共产党普通黨員和市民的日常生活的人。必須了解这一点：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改变現狀，而是要加强現狀并使之完善。他真正調查实情并加以补救，而其他的苏联領導人則从办公室內发命令和听汇报。

沒有一个苏联領導人到集体农庄去过，除非偶尔去参加宴会或檢閱。但赫魯曉夫陪我們到一个集体农庄去，在他的內心深处絲毫也不怀疑制度本身的正确性，他不仅用大杯伏特加同集体农庄的农民碰杯，而且还視察了菜园的溫床，看了看猪圈，并开始討論实际問題。在坐車回基輔的途中，他又不断地回头来談集体农庄的問題，并坦率地提出缺点。

在烏克蘭政府經濟部門的一次會議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极不平常的实际感。与南斯拉夫的部長們不同，他的人民委員們都极其熟悉情况，更重要的是，他們实事求是地估計各种可能性。

他相当矮胖、結实，但精神飽滿，輕快，他是粗綫条，一个大块头。他几乎狼吞虎嚥地吃很多东西——好像希望尽量少用他那鋼质的假顎骨。虽然斯大林和他的亲信給人以讲究吃的印象，而在我看来，对赫魯曉夫來說，不管吃什么东西都一样，重要的是塞滿肚子，就像那些干苦工的工人一样，当然，如果他們有錢的話。他的伙食也很丰盛——但是是公家供給而并非私人花錢。赫魯曉夫不是一个讲究吃的人，虽然他吃得不比斯大林少，

喝得更多。

他拥有很强的活力，而且像一切讲求实际的人一样，有很大的适应力。我并不认为他会花很多精神来讲究方式方法，只要它能给他带来实际的效果。但是，像所有往往自以为是的譁众取寵的煽动家一样，他可以随便拋棄不切实际的方法，而借口道义上的理由和最高的理想，很容易为这种改变辯护。他爱引用这句格言：“在打架时，不要停下来挑棍子。”这句格言对他非常有用：他可以为即使不打架也用棍子的做法辯护。我在这里所談的一切，完全不是人們在今天所談的赫魯曉夫。但是我已經談了从另一个時間所得的印象，同时也讲了我今天的偶然的感想。

那时，我在赫魯曉夫身上看不出有任何不同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地方。每逢談到斯大林，他总是怀着敬意來說他，并強調他們之間的亲密无間。他詳述了在德国进攻的前夕，斯大林曾如何从莫斯科打电话給他，提醒他要保持警惕，因为斯大林已經得到情报，說德国人可能在第二天——6月22日开始行动。我把这作为事实提出来不是为了反駁赫魯曉夫对斯大林沒有料到德国人进攻一事所作的指責。这种措手不及是斯大林在政治判断上錯誤的結果。

不管怎么样，在基輔，人們感到一定的清新气氛——这应当归功于赫魯曉夫的无限精力和讲求实际的作风，归功于曼努耳斯基的热情，以及由于这座城市本身的美，它有一望无际的地平綫，有俯瞰一条混浊的大河的山巒，令人想起了貝尔格萊德。虽然赫魯曉夫給人的印象是坚强、自信和现实主义的，基輔給人以自觉和优雅的美的印象，然而在我的記憶里，烏克蘭却始終是和丧失个性、厌倦和絕望分不开的。

我越是挖掘苏联的现实，我的疑虑就越增加。那种现实和我的人的良心之間的調和越来越沒有希望了。

三、失 望

(一)

我第三次会見斯大林，是在1948年初。这是最重要的一次会見，因为当时正是苏联和南斯拉夫领导人之間发生分裂的前夕。在这次会見以前，南苏关系中已經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和变化。

苏联和西方的关系，这时已經形成了两个集团之間冷战的局面。我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性事件是苏联拒絕馬歇尔計劃，希腊发生內战，以及一些共产党建立情报局——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南斯拉夫和苏联是当时唯一坚决反对馬歇尔計劃的两个东欧国家——前者多半出于革命的教条主义，后者則由于担心美国的經濟援助会动摇它剛剛用軍事手段建立起来的帝国。

当我代表南共参加法国共产党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代表大会后到巴黎时，莫洛托夫正在巴黎同西方国家的代表就馬歇尔計劃問題举行会談。莫洛托夫在苏联大使館接見了我，我們一致同意抵制馬歇尔計劃和批評法共的所謂“民族路綫”。莫洛托夫特別注意我对法共代表大会的印象，他談到杜克洛主編的期刊《新民主》，据說这个刊物是用来表达各国共产党一致意見的，他說：“需要做的和應該做的并不是这个。”

关于馬歇尔計劃，莫洛托夫当时曾认为召开一次东欧各国也参加的會議未尝不可，但只是为了利用公开場合进行宣傳，然后在适当的时机退出會議。我对这种不三不四的作法并不热心，

但是如果俄国人坚持，我也不反对；这便是我国政府当时所采取的立场。然而，后来莫洛托夫收到莫斯科政治局来的电报，要他甚至連这样的作法也不应当同意。

我剛剛回到貝尔格莱德，就听说东欧国家将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以决定对待馬歇尔计划的态度。我被任命为南斯拉夫的代表。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是要共同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不反对参加馬歇尔计划。当时苏联飞机已經在貝尔格莱德机场等候，但是第二天我却沒有启程，因为莫斯科来电报說，这个会议不需要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經放棄了它原来的立场。

这种附和苏联的态度，也表现在建立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問題上，虽然动机和苏联不同。有必要成立一个机构，以便各国共产党之間增进协调和交换意見，这样一种想法，早在1946年就已討論过；那年春天，斯大林、铁托和季米特洛夫曾談到这个問題。然而，由于許多原因，这一点一直沒有实现，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什么事都要靠苏联领导人来判断时机是否成熟。成立情报局的时机终于在1947年秋天成熟，这大概同苏联拒絕馬歇尔计划和它巩固了对东欧的控制有关。

成立大会在波兰西部、亦即前德国領土上召开，会上只有南斯拉夫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坚决贊成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哥穆尔卡表示反对，他謹慎地但是毫不含糊地坚持“波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想提一件与此有关的趣事。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的名称《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是斯大林想出来的，他的想法是：西方报刊每次引用这个刊物上的話时，都得重复这个口号。但是斯大林的愿望并沒有实现：由于名称太长并且具有明显的宣傳性质，因此西方提到这个刊物时——似乎是出于厌恶——

通常总是簡称之为“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共产党情报局的設立地点,最后也是由斯大林决定的。原来代表們已一致同意設在布拉格。捷克代表斯兰斯基当晚會乘汽車赶回布拉格,就此事請示哥特瓦尔德。虽然哥特瓦尔德已經勉强同意,但当天晚上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同斯大林商談(即使身处这么偏僻的寓所和遙远的地方,他們也从不間断同莫斯科直接電話联系)以后,斯大林便指令把情报局的地址設在貝尔格萊德。

在南苏关系的深处,也发生这种貌合神离現象:表面上,双方在政治上、特別是意識形态上完全一致,但实际上双方的行动和見解却背道而馳。

1946年春季,由铁托、兰科維奇、基得里奇和涅斯科維奇等南斯拉夫高級领导人組成的相当龐大的代表团訪問莫斯科时,两国领导人之間表面上显得格外亲热。斯大林拥抱铁托,贊揚他在全欧洲的作用,而大大地貶低保加利亚人和季米特洛夫。但是不久,两国关系便因联合股份公司問題而趋于緊張、不和。

隱蔽的摩擦不断地发生。这是非共产党世界所看不見的。在党的秘密會議上爭吵过苏联情报組織招募情报人員問題;事关国家和党的机关,所以尤其令人难堪。在意識形态方面也发生了爭論,特别是由于苏联詆毀南斯拉夫革命。苏联駐外使节們对于南斯拉夫人认为铁托的地位仅次于斯大林,很不以为然,对于南斯拉夫单独与其他东欧国家交往以及它在东欧国家中間威望日增尤其敏感。

摩擦不久扩大到經濟关系方面,尤其是当南斯拉夫人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以后,即除了保持普通商业关系以外,不可能指望苏联帮助他們实现五年計劃。斯大林发现这种反抗以后,便強調說明友好盟国之間搞联合股份公司不合适,而答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与此同时,苏联貿易人員却乘南斯拉夫与西

方关系恶化和錯誤地把苏联当作一个无私的非霸权主义国家的机会榨取經濟利益。

在东欧国家中，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只有南斯拉夫是在沒有紅軍的決定性援助的情况下，把自己从納粹的侵略下解放出来并进行了国内革命。南斯拉夫在社会改革方面走得最远，但在苏联集团中也处于后来的那种最暴露的突出地位。当时希腊正在进行內战。南斯拉夫一方面在联合国被指責給予希腊內战以物质援助和鼓励；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緊張到了快要破裂的地步。

現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苏联政府不但滿意地观望着南斯拉夫与西方关系的恶化，甚至还从中煽动，这种煽动当然是以不妨害自己的利益和不超过自己的可能为限度。当南斯拉夫境内击落两架美国飞机以后，莫洛托夫在巴黎高兴得几乎要拥抱卡德尔，虽然他也告誡卡德尔不要再击落。苏联政府并未就希腊起义采取直接行动，实际上让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单独应付这种困难局面；苏联政府也沒有采取任何決定性步骤来促使休战——在斯大林认为对他有利以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同样的，貝尔格莱德被指定为共产党情报局的所在地，表面上是对南斯拉夫革命的承认，但实际上，苏联是另有阴谋的。苏联企图借此使南斯拉夫领导人自滿其革命成果而高枕无忧地睡大觉，同时要南斯拉夫服从某种假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其实就是服从苏联的霸权，或者更确切地说，服从苏联政治官僚机构的食得无厌的要求。

現在是談一談斯大林对待革命（包括南斯拉夫革命）的态度的时候了。由于莫斯科常在決定性的关头停止支持中国革命、西班牙革命，甚至于南斯拉夫革命，因此就有很多人认为斯大林一般是反对革命的。这种說法不无道理，但也并不完全正确。斯大

林仅仅有条件地反对革命，就是说，只有当革命的发展超出苏联国家利益时他才反对。他本能地感到，在莫斯科以外出现一些革命中心可能威胁到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地位，当然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帮助革命只限于一定程度——以他能够加以控制为限度，而一旦这些革命超出他的控制，他便会随时任其处于危险境地而棄置不顾。我认为，苏联政府的这种政策，即使在今天也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

斯大林既然使他本国的一切活动都服从于他自己的观点和个性，他的对外做法也就不能不是这样。他把国内的进步和自由从属于一个党的利益和特权，他在对外事务中也就不能不是一个霸权主义者。常言道，美貌基于善行。斯大林既然把专制制度、官僚政治、偏狭和奴隶性强加于他的国家，他自己也就变成这一切的奴隶。

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人的自由而不丧失他自己的自由，这句话实在很对。

(二)

我这次到莫斯科去是因为南斯拉夫和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发生了分歧。1947年12月底莫斯科拍来一份电报，斯大林在电报里要求南斯拉夫派一名中央委员——他只提出了我的名字——到苏联去，以便设法协调两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

两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不协调，从许多方面都能感觉得到，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纳科·斯皮洛自杀以后，这种不协调更明显了。

当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联合关系正在各方面发展起来。南斯拉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各种专家越来越多。虽然

南斯拉夫本身缺粮，它还是把粮食运給阿尔巴尼亚。两国的联合股份公司已經开始組織。两国政府原則上已經同意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合并，这样一来，南斯拉夫境内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問題就可获得解决。

南斯拉夫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条件，对于阿尔巴尼亚人來說，比較苏联政府向南斯拉夫提出的条件，要有利和公平得多。但是，問題显然不在公平的程度，而在于这些关系的真正性质。有一部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內心里和暗地里反对南斯拉夫的态度。

納科·斯皮洛——一位身体瘦弱、非常敏感但很有学問的人——当时負責阿尔巴尼亚政府的經濟工作，他是第一个背叛南斯拉夫并要求阿尔巴尼亚独立发展的人。他的立場不仅在南斯拉夫，而且在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会內部也引起强烈的反应，尤其受到阿尔巴尼亚当时的內政部长科奇·佐治的反对。科奇·佐治后来就以亲南斯拉夫的罪名被枪毙。科奇·佐治是一位来自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工人，一位老革命家，尽管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的是无疑更有学問和更加机灵得多的人物恩維尔·霍查，但科奇·佐治却被誉为最坚定的共产党人。霍查也参加了对斯皮洛的批評，虽然他的实际立場并不明确。可怜的斯皮洛，当发现自己处于孤立地位、被指責犯了沙文主义而且有被开除出党的危險时，便自杀了。他这一死引起了 he 絕未料到的事——南阿关系恶化了。

斯皮洛自杀事件对公众是秘而不宣的。后来，当 1948 年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公开决裂以后，恩維尔·霍查就把斯皮洛推崇为民族英雄。但是斯皮洛自杀事件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中間已留下了恶劣的影响，这一影响用斯皮洛是个懦夫、具有小资产阶級气质等等共产党的陈腔濫調是消除不了的。

关于斯皮洛自杀的真正原因以及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活动，苏联政府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它駐地拉那大使館的人員越来越多。而且，当时苏联、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政府之間是这样相处的，即后两者并不特意向前者隱瞞它們兩者之間的关系，虽然也应该指出，南斯拉夫政府并未就它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の細节請教过苏联。

苏联使节愈来愈頻繁地抱怨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同时看得出以霍查为中心的集团和苏联大使館之間越来越亲近。人們不时听到这个或那个苏联使节的怨气：为什么南斯拉夫人一方面拒絕在他們国内同苏联合作組織联合股份公司，另一方面却与阿尔巴尼亚組織这种公司呢？当南斯拉夫軍隊仍然需要苏联軍事教官的时候，为什么它却把自己的教官派到阿尔巴尼亚軍隊去呢？当南斯拉夫自己正在向国外寻求专家的时候，它怎么有力量派遣专家去开发阿尔巴尼亚呢？本身貧困和不发达的南斯拉夫，怎么会忽然想起要开发阿尔巴尼亚呢？

与苏南两国政府发生分歧的同时，莫斯科企图取代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的地位的趋向日益明显。苏联从未建議与阿尔巴尼亚合并，而且苏联也并不与阿尔巴尼亚接壤，因此苏联的这种做法对南斯拉夫人來說显得极不公平。阿尔巴尼亚領導人之轉向苏联，也越来越明显，并且在他們的宣傳中更加强烈地表現出来。

苏联政府邀請商談消除两国在阿尔巴尼亚問題上的分歧，貝尔格萊德拱手接受，但是直到現在还不清楚为什么斯大林偏偏指名要我去莫斯科。

我看他是根据两个理由。斯大林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坦白忠厚的人。我想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內也是这样看我的。这样看

来，我就成为对一种复杂而非常敏感的問題作直率談判的合适人选了。同时，我总认为斯大林是有意要把我拉过去，以便分化并控制南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早已把赫布朗和朱約維奇拉过去了。但赫布朗由于战争期間在監獄里的曖昧行为，已被驅逐出中央委员会并交付秘密审查。朱約維奇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但是纵然身为南共中央委員，他也未曾插足領導核心，这一領導核心是在为党的統一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以及在革命过程中，圍繞铁托形成起来的。

1946 年铁托逗留莫斯科期間，曾告訴斯大林說我患有頭痛病，当时斯大林曾邀請我到克里米亞去訪問他，以便进行疗养。但是我沒有去，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沒有再通过大使館邀請我，所以我就把他的邀請看作一种礼貌性的表示，只是談話中提到我时順口說說而已。

因此我去莫斯科时——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是 1 月 8 日，肯定差不了几天——怀着一种說不出的感觉：我一方面因斯大林特別邀請我而感到高兴，但我也产生一种碍难出口的模模糊糊的疑心，觉得斯大林指名邀請我既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对铁托和南共中央委员会毫无企图。

我在貝尔格萊德沒有接到什么特別命令或指示，其实我也不需要什么指示，因为我是南斯拉夫的核心領導人之一，而且熟悉阿南关系。我們的立場早已确定，那就是：决不允許苏联代表采取不通人情的行动或执行不同的方針来妨害早經宣布的南阿合并的政策。

南斯拉夫軍隊方面趁此机会派了一个軍事代表团与我同行，以便向苏联要求軍火援助和要求苏联帮助我們发展軍事工业。这个代表团包括当时的总參謀长科查·波波維奇和南斯拉夫軍事工业負責人米雅尔科·托多羅維奇。同行的还有当时南

斯拉夫軍隊政治部主任斯維托扎·伏克曼諾維奇—泰波，他去莫斯科的目的是了解紅軍政治工作的經驗。

我們乘火車出發時，情緒很高，甚至有較大的信心。但同時也抱着既定的觀點：南斯拉夫應該以自己的方法、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三)

這種觀點，過早地在南斯拉夫駐布加勒斯特大使館的一次宴會上露了風聲，參加那次宴會的有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安娜·波克和其他幾位羅馬尼亞官員。

除了高魯博維奇大使（他以後移居蘇聯，成了莫斯科的忠實信徒），所有在座的南斯拉夫人都程度不同地公開表示，蘇聯並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絕對典範，因為形勢已經改變，而且東歐各國的條件和情況各不相同。我注意到安娜·波克或者謹慎地保持緘默，或者勉強同意我們的某些意見，但總是避免談論這種非常敏感的問題。有一位羅馬尼亞人（我記得是波德納拉斯）反對我們的看法，而另一位羅馬尼亞人（他的名字已記不起了）則真誠地贊同我們的看法。我覺得這麼一種談話很別扭，因為我深信我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會傳到俄國人的耳朵，他們除了把這些話看作“反蘇”（他們認為這是地球上最大的罪惡）以外，不會有別的看法。但是我又不能放棄我的立場。於是，為了沖淡這些觀點給人的印象，我強調了蘇聯的功績和蘇聯經驗的理論意義。但所有這些話都幾乎無濟于事，因為我自己已經強調過每個人應該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確定自己的道路。這些話也沒能把那股別扭勁驅除掉。我有一種預感，我知道蘇聯領導人對於任何細微的差別和妥協都是不同情的，在他們自己的黨內尤其

如此。

虽然我們路过的国家只有羅馬尼亚，但是我們已經发现我們到处有理由提出批評。首先是关于苏联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仍然处于苏联的实际占領之下，它們的財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拿走了，最常見的是通过联合股份公司，在这种公司里，除了被他們简单地宣布为战利品的德国資本以外，俄国人沒有任何投資。苏联与这些国家的貿易不同于同世界其他地方的貿易，与东欧国家的貿易是根据一种特別安排进行的，根据这种安排，苏联以低于世界市場的价格收购，而以高于世界市場的价格出售。只有南斯拉夫是例外。这一点我們知道得很清楚。羅馬尼亚的悲慘处境及其官員們沒骨气和自卑的心理，只能增加我們的憤怒。

最使我們驚訝的是苏联使节的傲慢态度。我还記得我們听了苏联駐雅西司令說的一些話以后是多么吃惊。他說：“啊，雅西这块骯髒的羅馬尼亚地方！还有这些喝玉米粥的羅馬尼亚人！”他并且重复了爱倫堡和維辛斯基諷刺羅馬尼亚貪污盜竊行为的名句：“他們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行业！”

特别是在这一年的溫暖的冬天，雅西的确显得是一片死水似的巴尔干城鎮，它的美——它周圍的小山、街心花园和一排排的房屋——只有会欣赏的人才体会得到。可我們也知道，苏联的城鎮如果不是更坏的話，也不見得比雅西更好。最使我們气愤的，正是苏联人的这种以“优越种族”和大国自居的态度。俄国人对我們有礼貌和非常客气，这不但更加强調說明羅馬尼亚人的屈辱，同时也使我們对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更加自豪。

我們早就承认下面这一点是活生生的事实，即像羅馬尼亚人所承受的这种关系和态度“竟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也有可能”存在，原因就在于“俄国人是那样一种人”——落后、长期孤立于

世界其他地区之外，以至于完全忘掉他們的革命傳統。

我們在雅西不耐煩地停留了几小时，直到挂着苏联政府專車的苏方火車来接我們。例行公事的科佐夫斯基上尉当然隨車前來，他在苏联国家保安机关里的专业仍然是对付南斯拉夫人。这一次他已經沒有先前那样爽朗活潑了，这也許仅仅是因为他現在所面对的都是些部长与將軍的原故吧。一股难以捉摸的、不可言状的、冷冰冰的官僚气，硬沁入我們与我們的苏联“同志們”的关系里来。

我們的譏評甚至不饒过我們乘坐的这列火車。这列火車除了設備舒适、食物精美和服务周到以外，再沒有什么可取的了。車門上的龐然大黃銅把手，牆壁上小題大作的旧式裝飾，以及廁所里高得使人两条腿悬在空中晃来晃去的馬桶，这一切我們认为都是滑稽可笑的。难道这些都是必要的嗎？难道一个大国、一个主权国家就必须借这些东西夸耀嗎？然而在这列有着沙皇时代豪华陈設的專車上，最最滑稽可笑的还是乘务长竟在他的車室里摆下一个鸡籠子养着一只下蛋的母鸡。这位工資微薄、穿着簡陋的乘务长难为情地向我們抱歉地解釋道：“有什么法子呢，同志們？工人么，就得想办法拼湊过日子。我家人口多，生活不好过啊！”

南斯拉夫的火車虽不能自夸准确，但是在苏联，沒有一个会由于火車誤点几个小时而感到着急。你若問还有多久才能到达，乘务員会简单地回答你：“总会到的。”看来，俄国已确认它的人性和民族性是不可改变的，它的全部本质都妨碍着工业化的速度和管理效能。

被厚及屋簷的积雪复盖着的烏克蘭和俄罗斯，至今还遺留着战争破坏和战争恐怖的烙印——被燒毀的車站和兵营，靠着开水和黑面包片糊口的妇女們，裹着头巾在清扫車道上的积

雪。

这一次，也是只有基輔才給我們留下一種精緻、清潔、文明的印象和一種時髦與風雅的感覺，雖然它也是貧困和孤立的。因為是夜間，我們沒有看見第聶伯河和那一望無際的平原景色。但它畢竟還是引人想起了貝爾格萊德——未來的、擁有一百萬人口的、在勤勞和和諧中建設起來的貝爾格萊德。我們在基輔停留了不一會，便換掛開往莫斯科的列車。烏克蘭的官員沒有一個人到車站來迎接我們。不久我們便上路，駛入又是白雪茫茫又是悲哀昏暗的夜晚。在這無垠的枯寂和貧困之中，只有我們乘坐的火車閃耀着舒適和富足的光芒。

(四)

我們到達莫斯科後僅僅幾小時，在我們同南斯拉夫駐蘇大使弗拉基米爾·波波維奇津津有味地作真誠敘談的時候，他的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蘇聯外交部來電話問我是否疲倦，說斯大林願在當晚立即接見我。這樣的急促在莫斯科是不尋常的。外國共產黨人一般在那裡總是要等候很久才蒙接見，因此在他們中間流行着一種說法：莫斯科去時容易回時難。說實在的，即使我很疲倦，我也非常願意接受斯大林的邀請。代表團中的每一個人都興奮地望着我，雖然也不無幾分醋意。科查·波波維奇和托多羅維奇一再提醒我不要忘记他們是為什麼來莫斯科的，雖然我已趁同行的機會詳細地了解了他們的要求。

正因為這次會見來得如此急促，所以對即將到來的與斯大林的會見雖然感到高興，但同時也抱着謹慎的態度，我的心里並不是全無戒意。在我和斯大林及其他蘇聯領導人一起度過的那天晚上，我始終沒有消除這種顧慮。

像过去一样，那晚九时左右，他們把我帶到克里姆林宮，帶進斯大林的辦公室。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日丹諾夫已經聚會在那里。据我所知，日丹諾夫当时在政治局里負責同外国党的联系。

照例寒暄过后，斯大林立刻言归正傳，劈头便說：“瞧，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会的委員們正在为你們的緣故而自杀！这真叫人不安，真叫人不安。”

我开口解釋說：納科·斯皮洛反对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联合；他使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中处于孤立地位。我还没有說完，斯大林便使我吃惊地說：“我們在阿尔巴尼亚并没有特殊的利益。我們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这时他把右手捏成一个拳头放到嘴边，作出一种好像要把它們吞下去的姿势。

斯大林講話的神态和吞咽的姿势，使我驚訝得几乎瞠目結舌。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臉上是否流露了这种表情，因为当时我还企图借它开个玩笑，并且把它看作是斯大林慣于使用的激烈和形象化的講話方式。我再次解釋說：“这不是吞并，而是合并！”

这时莫洛托夫插进來說：“这的确是吞并啊！”

斯大林又用他那种姿态說：“是，是，是吞并！不过我們贊同你們：你們應該吞并阿尔巴尼亚——愈快愈好。”

斯大林談話的姿态虽然如此，但是整个气氛还是誠摯而友好的，即使莫洛托夫讲那句关于吞并的話时，他所用的也是一种在他身上不常見的談諧而亲切的語調。

我贊成同阿尔巴尼亚和解和合并，是出于真誠的、同时当然也是革命的动机。同其他許多人的看法一样，我认为在阿尔巴尼亚領導人真正同意之下实行南阿合并，不仅对两国有直接的好处，而且最終会消除塞爾維亞人和阿尔巴尼亞人之間傳統

的互不相容与相互冲突。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南阿合并以后，南斯拉夫境内人数相当众多而且聚居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就可以同阿尔巴尼亚合并为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联邦中的一个单独的共和国。关于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的任何其他解决办法，我认为都不切合实际。如果采取把阿尔巴尼亚族人居住的南斯拉夫领土让出的简单办法，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便会引起难以压制的反抗。

我对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这种偏爱只能加强我赞成合并的理想。阿尔巴尼亚人，特别是北部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上同我出生于其中的门的内哥罗人是相似的，同时他们的生命力和维护独立的决心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虽然我从来没有与我国领导人的看法不同，也从来没有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但是斯大林的强烈语气终究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两种思想。一种是怀疑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可能有些不正确，另一种是，苏联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合并是通过吞并实现的。正是莫洛托夫的话使我想起了这件事。

两种思想又合而为一，成为一种烦闷不安的心情。

但是，想到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可能有某些含糊和矛盾的地方，并没有使我因而承认这是一种“吞并”政策。然而这种思想的确使我觉得，这种政策不符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意志和愿望。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意志和愿望也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志愿。斯皮洛为什么真自杀了呢？他并不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也不是“受民族主义之累”，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阿尔巴尼亚人像我们在对苏关系上所做的那样，也愿意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那又将怎么样呢？如果不顾阿尔巴尼亚

人的願望并利用他們的孤立和艰难的处境实行合并，这难道不会导致无法和解的冲突和困难嗎？阿尔巴尼亚人有其种族特点和古老的一致性，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却是年輕的，因此阿尔巴尼亚人充滿一种不可遏制但仍未實現的民族意識。难道他們不会把合并看成是消灭他們的独立，看成是排除他們的个性嗎？

至于第二种思想——即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我把它同第一种思想联系起来，我再一次說服自己：我們南斯拉夫人不願意，也不敢采取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的方式来同阿尔巴尼亚人合并；同时也看不出有任何直接威胁，某个帝国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可能向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利用它作为反对南斯拉夫的基地。

但是斯大林使我回到現實中。“你看霍查怎么样，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沒有直接明确地答复，但是斯大林对霍查的評論，却与南斯拉夫領導人对霍查的看法完全相同。他說：“霍查是个小資产階級分子，而且有民族主义傾向吧？是的，我們也这样想。佐治看起来是那里最强有力的人物嗎？”

对他的誘导性的問話，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用以下的話結束了这次几乎不到十分钟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問題的談話：“我們之間沒有分歧。請你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将这一点草拟一份給铁托的电报，明天交給我。”

我担心沒有听明白，于是又問了他一下，他重复了一遍，說要我草拟一份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电报。

当时我认为这是斯大林特別信任我的表示，也是苏联同意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政策的最高表現。但是第二天在起草电稿时，我忽然想到，这份电报可能有朝一日被利用来作为反对我国政府的材料，因此电稿的措詞很謹慎而且只有寥寥几句，大意

是：德热拉斯昨天到达莫斯科，当天即与他举行会谈，会谈结果，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之间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份电报从未拍发给南斯拉夫政府，后来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发生冲突时也没有被用来反对南斯拉夫政府。

其余的谈话没有继续多久，而且都是围绕着一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兜圈子，如共产党情报局设立在贝尔格莱德、情报局的机关报以及铁托的健康，等等。

但是，我趁机提出了苏联向南斯拉夫军队提供装备和帮助我们发展军事工业的问题。我强调说，我们同苏联代表来往当中常常发生困难，因为他们借口“军事机密”而拒绝向我们提供这种或那种东西。斯大林站起来大声说：“我们对你们无所谓军事机密。你们是一个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你们无军事秘密可言。”

然后他走到办公桌旁，打电话给布尔加宁，简短地吩咐说：“南斯拉夫人到了，是南斯拉夫代表团——应该立即听听他们的意见。”

在克里姆林宫的这次谈话历时约半小时，然后我们一起到斯大林的别墅去参加宴会。

(五)

我们坐的是斯大林的大轿车，这辆汽车好像同我1945年跟莫洛托夫一起坐过的那一辆一样。日丹诺夫坐在后座我的右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坐在我们前面的折叠式座位上。途中，斯大林把他前面嵌板上的小电灯开亮。在这嵌板的下面，挂着一只怀表，上面指明差不多已是十点钟。斯大林坐在我的正前方，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已经驼了的背和灰色的后颈，后颈的厚皮

在元帅服的硬衣領上面皺起。我不禁想到：坐在我前面的是当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而且他的同僚們也在这里；假如現在有一顆炸彈在我們中間爆炸，把我們全都炸成粉碎，那將是一件多么震撼人心的大事變啊！但是，这个想法仅仅一掠而过，它是邪惡的，而且来得如此突然，連我自己也感到恐怖。我怀着一种伤感的心情，觉得斯大林好像一位一輩子直到如今都在照料着整个共产主义家族的成就和幸福的小老祖父。

在等候其他人到来的时刻，斯大林、日丹諾夫和我都在別墅的門厅里，靠近一幅世界地图站着。我又一次把眼光投在地图上用藍鉛筆圍繞斯大林格勒画出的藍色圓圈——斯大林像上次似地又发觉我的举动了；我不能不看到，我的举动使他感到愉快。我和斯大林交換眼色，日丹諾夫也注意到了，于是便湊过来和我們一起看地图，并且說：“这指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开始。”

但是，对此斯大林沒有說話。

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斯大林开始在地图上寻找哥尼斯堡，因为它就要改名为加里宁格勒了。我們在列宁格勒周圍找来找去，无意中发现若干地方仍然保持着叶卡德琳娜时代的德文名字。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轉向日丹諾夫，直截了当地說道：“改掉这些名字——这些地方还用德文名字，真不像話！”日丹諾夫掏出小筆記本，用一支小鉛筆把斯大林的命令記下来。

此后，莫洛托夫和我上別墅地下室的廁所里去，这个廁所里有几个馬桶間和尿斗。我們还在走，莫洛托夫就一边解着褲子的鈕扣一边說：“我們把这叫做装貨前的卸貨！”我坐过長時間的監獄，在監獄里人們都被迫忘記了害羞，而現在，在莫洛托夫这位年紀大些的人面前，我却害羞起来，于是我进了一个馬桶間，把門关上。

之后，我們兩人就上餐厅里去，斯大林、馬林科夫、貝利亞、日丹諾夫和沃茲涅先斯基已經聚集在那里了。日丹諾夫和沃茲涅先斯基是我的回忆录里的新人物。

日丹諾夫身材也相当矮，留着剪得很短的褐色鬍子，高额头，尖鼻子，臉上泛着不健康的紅色。他是受过教育的人，在政治局里被认为是个大知識分子。尽管他有人所共知的偏狹和教条主义，但我还是願意說，他的知識并非微不足道。另一方面，他虽然什么都懂一些，甚至还懂一点音乐，但我可以說，却没有一門精通——他是那种通过閱讀馬克思主义著作而懂得和得到其他方面知識的典型的知識分子。他还是个在知識方面很不严肃的人，但是使这一点更其丑恶的是，在那种知識分子气质的背后，人們明白无誤地感觉到他还是一个对待文人“寬洪大量”的大君主。在那个时期，苏联頒布了一些“法令”——苏联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学和其他艺术部門的若干決議，这些法令等于猛烈进攻这一点：战时幸免于官僚主义的党的控制的（或者說从那种控制下搶救出来的）在选择題材和表現形式方面最起码的一点自由。我記得，那天晚上日丹諾夫当作最新的笑話詳述他对諷刺作家佐什欽科提出批評后，列宁格勒如何理解他的批評：他們简单地沒收了佐什欽科的配給证，直到莫斯科作出寬大处理以后才发还給他。

苏联計劃委员会主席沃茲涅先斯基还不到四十岁，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金发碧眼，顴骨突出，头額略高，留着一头鬚发。他給人的印象是一位有条理、有修养尤其沉着的人，他很少說話，总是帶着愉快的含蓄的微笑。我以前讀过他著的一本关于战时苏联經濟的书，它給我的印象是：作者是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人。后来，这本书在苏联受到批評，沃茲涅先斯基被清洗了，其原因至今还没有透露。

我和沃茲涅先斯基的哥哥很熟，他是一位大学教授，那时他刚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1946年冬天在貝尔格莱德举行泛斯拉夫大会的时候，我同他有几次非常有趣的討論。我們不但一致认为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論太偏狹，而且对于随着一些新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尚未从理論上加以討論过的資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而出現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中的新現象，我們也有一致的意見。他的漂亮而善于思索的脑袋，或許也在无聊的清洗中落地了。

宴会是从有人——我記得好像就是斯大林本人——提議每人猜一猜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几度开始的，誰猜錯几度，就要罰几杯伏特加。幸亏我在旅館里时已看过寒暑表，这时想到夜間气温会下降便添了几度，因此我只猜錯一度。我記得貝利亚猜錯三度，但他說他是故意这样的，从而可以多喝几杯伏特加。

宴会以这种方式开始，使我不得不产生一种異端的想法：这些关在小圈子里的人們，甚至还会发明出更加无聊的喝伏特加的理由——猜餐厅有几呎长，餐桌有几吋长。誰知道，或許他們正是那么搞的！无论如何，这种根据气温的度数来摊派伏特加杯数的作法，使我感到：这些聚在他們老朽的首脑周圍的苏联领导人，正当他們对人类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时，却过着与世隔絕、空虛和无聊的生活。我回想起当年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当他操纵着俄国和俄国人民命运的时候，也曾同他的大臣們举行这样的晚宴，他們在席上拚命大吃大喝，直到不省人事。

对这种生活空虛的印象，在整个宴会过程中，始終縈繞在我的脑际，无法摆脱。斯大林的年齡和他的显而易見的老态龙鍾的迹象，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在我內心里頑固地养成的对斯大林个人的敬爱，無論多少也不能消除我的意識中的那种感受。

在斯大林的晚年中，既有些悲剧性的东西，也有些丑陋的东西。悲剧性的东西是肉眼所看不见的——它们是我脑子里对于即使如此伟大的人物也不免衰老这一点所产生的一些感想。丑陋的东西则是时时不断出现的。虽然斯大林向来吃得不错，但现在却显出馋嘴的样子，好像担心会没有足够的可口食品留给他似的。另一方面，他喝得更少和更谨慎了，好像每一滴都要打量一番，以免任何不好的结果。

他的智力甚至衰退得更加明显。他喜欢回忆年轻时的往事——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在高加索的童年，并且把现在的一切事情同过去发生的事情比较：“对了，我记得，同样的事情……”

令人费解的是，在两三年之内，他怎么变得这么厉害。我上次在1945年见他时，他还充满活力、头脑机智，并有一种尖锐的幽默感。但那是在战争期间，而看来那已经是斯大林的精力的最后极限了。现在，他对那些无聊的事物和肤浅的笑话哈哈大笑。有一次我对他谈起一件表现他比丘吉尔和罗斯福更加精明的轶事，他却不但不抓住这个轶事的政治性的妙处，而且我的印象是，他像一般老年人那样生起气来。我从在座的其他人脸上看出了一种尴尬的惊讶之色。

然而，他在一点上还是过去的那个斯大林：当有人同他意见不一致时，他顽固、尖刻、多疑。他甚至不理睬莫洛托夫，人们都会感觉到他们之间的紧张形势。每个人都奉承他，避免在他表示意见之前发表意见，然后急忙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他们照例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我的叙述因而也将这样进行。

在那次宴会上，斯大林明确地谈到了原子弹：“那是个有威力的东西，有一威一力！”在他的表情之中充满了羡慕，这使人清楚地了解，在他也拥有这种“有威力的东西”之前，他是决不甘

心的。但是他沒有提到，究竟他已經拥有了原子彈呢，还是苏联正在着手制造。

另一方面，一个月以后，当卡德尔和我在莫斯科碰見季米特洛夫的时候，季米特洛夫好像机密地告訴我們，俄国人已經有了原子彈，而且比美国投在广島的那种还要好。我认为这个說法不确实，而是俄国人当时才开始制造一枚原子彈。但这些都是事实，所以我都写出来。

那天晚上和不久以后，斯大林在接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代表团时都曾強調說，德国将保持分裂：“西方国家将把西德变成它們自己的，我們也将使东德成为我們自己的国家。”

他的这个想法是新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从苏联在东欧的政策和对西方的政策的整个趋势出发的。1946 年春天，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曾向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发表声明說，整个德国都必須是我們的，就是說，是苏联的，共产党的。我对这个声明始終不了解。我問过一位在座的人，俄国人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点。他回答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怀疑甚至那些发表声明的人也未必知道怎样实现，他們只不过是得意于軍事胜利和寄希望于西欧在經濟和其他方面瓦解而心血来潮罢了。

在宴会临近結束时，斯大林出乎意料地問我，为什么南斯拉夫党内沒有很多犹太人，为什么这些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在党内沒有担任重要职务。我向他解釋說，在南斯拉夫本來就沒有很多犹太人，而且他們大都屬于中产階級。我又补充說：“唯一卓越的犹太族共产党人是皮雅杰，而他认为自己与其說是犹太人，还不如說是塞爾維亞人。”

斯大林开始回忆道：“皮雅杰，矮个子，戴眼鏡的？对啦，我記得，他来过我这里。他担任什么职务？”

“他是中央委员会委員，一位老共产党员，《資本論》的譯

者，”我解釋說。

斯大林打斷我的話說：“在我們中央委員會里，一個猶太人也沒有！”于是他嘲弄地笑道：“你也是個反猶分子，你，德熱拉斯，你也是個反猶分子！”

我把他的話和他的笑理解為相反的意思，正如我應當理解的那樣——這是他自己的反猶主義的表現，並以此來刺激我，要我表明我對猶太人、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猶太人所採取的立場。我輕輕地笑了笑，沒有說話。既然我從來不是反猶分子，並且只把共產黨人分為好的和不好的，因此這對我來說並無困難。斯大林自己很快放棄了這個狡猾的問題，滿足於他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挑釁。

坐在我左邊的是沉默寡言的莫洛托夫，右邊是多嘴饒舌的日丹諾夫。日丹諾夫談到他同芬蘭人的接觸，並贊嘆地強調他們交付賠償的準確性：“一切都按時交付，包裝內行，質量最好。”

他最後說：“我們不占領芬蘭是個錯誤，要是我們占領了的話，一切都好辦了。”

莫洛托夫說：“哼，芬蘭——那是一顆花生。”

就在那個時候，日丹諾夫正在和作曲家開會，並在準備一項關於音樂的“法令”。他喜歡歌劇，並順便問我：“你們南斯拉夫有歌劇嗎？”

他的問題使我吃驚，我回答說：“在南斯拉夫，上演歌劇的劇院有九家。”同時我在想：他們對南斯拉夫的知識何其貧乏。的確，除了作為一個固定的地理位置以外，看不出南斯拉夫還有什麼東西引起他們的興趣。

日丹諾夫是席間唯一喝桔子汁的人。他向我解釋說，這是因為他有心臟病。我問他：“你的病嚴重嗎？”

他以他慣有的嘲弄口吻苦笑地回答說：“我隨時都可能死，

也可能活得很長。”他的確過於敏感；他反應很快，也太隨便。

當時蘇聯的一個新的五年計劃剛剛公布。斯大林沒有特別對着誰地宣布說，教師的工資應該提高。然後他對我說：“我們的教師都很好，但他們的工資太低——我們得想想辦法。”

每個人都講了幾句贊成的話，這時，我却不無痛苦地想到南斯拉夫文化工作者待遇菲薄，境況悲慘，而我卻無能為力。

沃茲涅先斯基始終一言不發，他的舉止就像一個置身于老前輩中間的後生。斯大林僅僅直接和他談了這樣一個問題：“能在計劃之外弄到建築伏爾加—頓河運河的物資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我們一定要弄到物資！從軍事觀點來看，這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萬一發生戰爭，敵人可能把我們逐出黑海——我們的艦隊弱，而且在一段長時間內還將是弱的。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的船隻怎麼辦？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我們的黑海艦隊要是開進了伏爾加河，想想看，它會多么寶貴。這條運河是頂頂重要的。”

沃茲涅先斯基表示同意，他說物資可以弄得到，他並掏出一個小筆記本，把它記下來。

我早就——差不多秘密地——對兩個問題發生興趣，希望听听斯大林的意見。一個是屬於理論方面的：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或任何其他書籍中，我始終找不到關於“人民”和“民族”這兩個詞的區別的解釋。因為斯大林在共產黨人中間早已被認為是民族問題的專家，所以我向他請教，並向他指出：在他所著的關於民族問題的书里也沒有談到這個問題；他的這本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出版，從那時以來一直被看作是權威性的布尔什維克見解。

對於我的問題，莫洛托夫第一個參加進來說：“‘人民’和‘民族’是一回事。”

但是斯大林不同意，他說：“不，胡說！它們是不同的！”于是他開始簡單地解釋道：“‘民族’？你早已知道它是什么了：資本主義的產物，具有固定的特征。而‘人民’呢——是某一個民族的勞動者，就是說，具有同樣的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勞動者。”

關於他所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他說：“那是伊里奇的——列寧的意見。伊里奇還校訂過這本書。”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從少年時代起，就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許多方面說都是現代最偉大的作家，因此，我在內心裡決不能同意馬克思主義者對他的攻擊。

斯大林對這個問題的答復也是簡單的：“他是一個大作家，也是一個大反動分子。我們不出版他的書，因為他對青年有壞影響。然而，他確是一位大作家！”

我們轉而談到高爾基。我指出，我認為《克里姆·薩木金的一生》——無論在藝術手法方面，还是在描寫俄國革命的深度方面——是他的最偉大的作品。斯大林不同意，但卻避而不談藝術手法問題。他說：“不，他最好的作品是早期的東西：《奧庫洛夫鎮》、他的短篇小說以及《福馬·高爾杰耶夫》。就《克里姆·薩木金的一生》對俄國革命的描寫來說，那里很少講到革命，而且只有一個布爾什維克——他叫什么名字，柳提科夫，還是柳托夫？”

我給他改正說：“庫圖佐夫。柳托夫是個完全不同的人物。”

斯大林最後說：“不錯，是庫圖佐夫！這本書僅僅從一個方面描寫革命，而且寫得不充分。而從文學觀點來說，也是他的早期作品更好。”

我已明白，斯大林和我彼此不了解，而且我們的意見不能一致，雖然我曾有過一次機會聽到重要的文學家的意見，他們像他

一样，也把高尔基的这些作品认为他的最优秀的作品。

談到当代苏联作家时，我或多或少地像所有的外国人那样，提到肖洛霍夫的文笔气势磅礴。斯大林說：“現在有更好的了！”他举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女的。这两个人都是我沒有听到过的。

我避免討論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軍》，这本书即使在当时也已受到攻击，說它的主角“党性”不强；我也避免討論亚力山大罗夫的《哲学史》，这本书由于正相反的原因受到批評：教条主义、肤淺、平凡。

斯大林对 K·西蒙諾夫的一本爱情詩集的意見，是日丹諾夫告訴我的。他說：“这本詩集应当只印两本——一本給她，一本給他！”斯大林假正經地微笑着，其余的人則哄堂大笑。

那頓晚飯不带点庸俗味道是过不去的，确切地說，少不了貝利亚的粗話。他們强迫我喝一小杯“彼列佐夫卡”(peretsovka)——一种加胡椒的烈性伏特加(perets——詞在俄文里的意思是胡椒，这种酒便因此得名)。貝利亚吃吃地笑着解釋道，这种酒对性腺有坏作用，他在解釋的时候还用了最下流的表情。貝利亚說話时，斯大林凝視着我，眼看就要大笑出来，但他看見我愁眉不展的样子，便忍住了。

即使抛开这件事不談，我也忘不掉貝利亚和貝尔格莱德皇家警官伏伊科維奇两人維妙維肖的印象；他們相似的程度，使我感到好像我真的陷入了伏伊科維奇——貝利亚的肥大而阴冷的魔爪之中。

然而，我认为，在那次宴会的整整六个小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圍繞着言談的那种气氛。在大家所談的話的背后，显然隱藏着某种更重要的事情——某种应当說出来，但沒有人能够也沒有人敢于提出的事情。那种奉命唯謹的談話方式和对話

題的用心選擇，說明這件事似乎是非常真實的，几乎是精神健全的人都可以覺察得出的。我心里甚至確信，它的內容就是對鐵托和南斯拉夫中央委員會的批評。在那種情況下，我就會認為這種批評等於是蘇聯政府對我的拉攏。日丹諾夫特別起勁，他不是用具體和有形的方式，而是在同我談話時表現出一定的誠摯親切。貝利亞用他那對暗綠色的、張大着的眼睛注視着我，一種自覺的譏諷表情從他那張方方的、有氣無力的嘴邊流露出來。斯大林站在他們所有人之上——他殷勤周到，格外穩健而冷靜。

話題與話題之間沉默無言的間隔越來越長，我內心的和周圍的緊張氣氛增長了。我很快地想出了抵抗的策略。顯然，在此以前，這種策略已經在我心里半自覺地逐漸形成。我本可以直率地對他們說，我認為南斯拉夫領導人和蘇聯領導人之間沒有分歧，他們的目标是相同的，等等。一種無言的倔強的反抗情緒在我心里奔騰着，雖然以前我內心從未有過動搖，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如果斯大林和其他人強迫我在他們和我的良心之間——在那種情況下，也就是在他們的黨和我的黨之間，在南斯拉夫和蘇聯之間——進行抉擇，要我處於這種道義上的困境的話，那末我的守勢就有可能很容易地轉為攻勢。

斯大林採用了他親自表示親切的拿手好戲，但這一企圖也沒有得逞。他回憶起1946年通過鐵托邀請我那件事說：“你為什麼不到克里米亞來？你為什麼拒絕我的邀請？”

我預料到要提出這個問題，然而對於斯大林沒有忘記這件事，却相當不愉快地感到吃驚。我解釋道：“我曾等待從蘇聯大使館轉來邀請。我覺得勉強從命和給您添麻煩是很別扭的。”

“那里的話，一點麻煩也沒有。恐怕是你不願意來吧！”斯大林試探我。

但是我縮回来了——意气沮丧，默默无言。

因此沒有发生什么事。斯大林和他那帮冷酷、暗算的阴谋家——我觉得他們是那样的人——一定觉察到了我的抵抗。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躲开了他們，他們也不敢挑起我的抵抗。他們或許以为他們已避免了一个过早的、因而是錯誤的作法，但是我却明白了那个阴險的把戏，而在內心里感到一种內在的、沒有过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能拋棄我所賴以生存的那种东西。

宴会結束时，斯大林举杯紀念列宁說：“讓我們为紀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导师——我們的一切，干杯！”

我們在肅穆莊嚴的氣氛中站起來，干了杯，但由於醉意，我們很快地就把這種氣氛忘記了。然而斯大林還是帶着真摯、嚴肅甚至陰沉的表情。

我們離開了餐桌，但在我們開始散去時，斯大林卻打開了一架巨型的自動唱機。他甚至跳起他家乡的土風舞來。可以看出，他並非不懂音樂的旋律。但是不久他就停下來，灰心喪氣地解釋道：“年歲不饒人，我已經是一個老人了！”

但是他的同僚們——或者更恰當地說，他的近臣們——却安慰他說：“不，不，瞎說。你的氣色很好。你壯健得叫人不相信。真是，像你這樣的年紀……”

斯大林接着又放了一張唱片，在這張唱片里，一個歌唱家的花腔女高音的顫音，是用狗的吠叫聲來伴唱的。斯大林興高彩烈地大笑起來，可是當他發現我臉上露出不解和不快的神色時，他好像申辯似地解釋道：“嗯，這還是聰明的，鬼聰明！”

其他人留在後面，但都已準備走了。在這麼長的聚會以後，確實沒有什麼話要說了；在宴會上什麼都討論過，就是沒有談舉行這次宴會的原因。

(六)

我們只等了一两天，就被邀請到总參謀部去提出我們的要求。早在赴莫斯科的火車上，我就提醒过科查·波波維奇和米雅尔科·托多羅維奇，說他們的要求是过份的和不切实际的。特別使我不能理解的是：俄国人既然不願意认真地幫助我們发展民用工业，怎么会同意幫助我們建立軍事工业呢？在我看来更为不可能的是，当他們自己还缺少舰队的时候，怎么会給我們一支舰队呢？有人爭論說，不管是南斯拉夫还是苏联在亚得里亚海有一支舰队，那都是一样，因为两国都是一个团結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团結显露出裂痕，这种說法就更其不能令我信服了，更何况，苏联对于他們所不能控制的一切事情，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且他們也不掩飾，他們所关心的基本上是他們本国的利益。可是，既然这些要求都是在貝尔格萊德认真加以研究并且已經批准了的，那末，我除了加以支持以外，还有什么可說的呢。

总參謀部的大樓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外观很粗俗，内部虽然用了豪华的帷帘和鍍金来加以修飾，也无济于事。会談由布尔加宁主持，他的周圍坐着最高級的軍事专家。參謀总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在座。

首先，我一般地談了一下我們的需要，由托多羅維奇和波波維奇作了詳細的說明。苏联官員們沒有作什么許諾，但却仔細研究了我們的問題，并将每件事記錄了下來。我們离开时感到很滿意。深信事情已越过了停頓状态，并认为实际的具体工作不久即将开始。

事情看来的确有点眉目了。托多羅維奇和波波維奇不久即

被請去參加进一步的会談。但一切突然停頓下來，苏联官員們暗示，情况“复杂”起来了，我們須等待。

显而易见，莫斯科和貝尔格萊德之間正在发生什么事，虽然我們不确切地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也不能說感到很突然。我們对苏联現在这种做法的不以为然的态度以及莫斯科对待貝尔格萊德的立場，越发使得我們的会談延期感到更加难熬，特别是因为我們无事可做，只好以聊天或到莫斯科的老式的但屬第一流的戏院去消磨時間。

沒有一个苏联公民敢來訪問我們，因为虽然我們是从一个共产党国家來的，但我們还是屬於外国人的范疇，根据苏联的法律条文，苏联公民是不能和外国人交往的。我們的一切接触被限制在苏联外交部和中央委員會的官員圈子內。这件事使我們感到恼怒、生气。由于南斯拉夫沒有这样的限制，特别是对苏联的代表和公民沒有这样的限制，我們更加气愤了。但这也是促使我們得出否定性結論的原因。

我們对苏联的批評还没有达到全面开花的地步，但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可以举出許多令人不滿的事例。伏克曼諾維奇—泰波发现了陸軍建筑物方面的缺点，他老实不客气地說出来了。为了減輕煩悶，科查·波波維奇和我退掉了莫斯科飯店的单人房間，但是直到“电工”将双人房間安排就緒才讓我們进去住，我們把这种安排理解为安裝偷听器。尽管莫斯科飯店是一座新盖的和最大的旅館，但是里面的設備却运行得不正常——房間冷，水龙头漏水，至于从东德买來的浴盆，由于放水时漏得地板上滿是污水，也无法使用。浴室里沒有钥匙，波波維奇便抓住机会俏皮地說：建筑师考虑到钥匙会被丢失，他就把厕所造在紧挨着門边，以便上厕所的人可以用脚去頂住門。

我常以羡慕的心情回忆起 1944 年我在大都会飯店的小住。

那里的一切設備虽旧,但用起来都很方便,年老的服務員都能說英語和法語,他們舉止端莊而謹嚴。但在莫斯科飯店里……有一天,我聽到有人在浴室里發牢騷。我發現有兩個工人在里面。其中一個人正在修理天花板上的裝飾,另一個則用肩膀去支撐着他。我說:“哎喲!同志們,你們怎么不搬個梯子來?”他們抱怨說:“我們已向經理要過多次了,但沒有用,我們向來是這樣對付着干的。”

我們出去散步時觀賞“美麗的莫斯科”,而莫斯科的大部分地區卻是一個沒人管的、不發達的大村莊。我送給了汽車司機潘諾夫一只手表,作為南斯拉夫人給他的一份禮物,我們之間已建立了友誼。他雖然並不隱諱對蘇聯新汽車的質量表示不滿,但是卻不相信紐約和巴黎的汽車比莫斯科更多。

當我們在克里姆林宮參觀皇帝的陵墓時,一位女嚮導帶着民族主義的情調說到“我們的沙皇”。俄羅斯人的優越性到處在宣揚,並且以可笑的形式表現出來。

如此等等……我們每走一步都遇到蘇聯現實生活中前所未見的某些東西:落后、原始、沙文主義、大國意識,雖然有時也夾雜着想擺脫過去和趕上事物自然進程的過人的努力。

我們對蘇聯領導人和官員的頑固不化早有所知,最起碼的批評都會被說成是反蘇,因此,當我們在俄國人面前時,我們便自然而然在我們自己的範圍內進行防范。由於我們也是一個政治性的代表團,我們就彼此提醒,以免我們的舉止或言詞有什麼“不確當”。這種防范逐漸形成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性質。由於意識到有偷听器,我記得我們便開始注意在旅館里和在辦公室里的講話,談話時便將收音機打開來。

蘇聯代表們一定注意到了這種情況,因而緊張和猜疑很快地增長了。

列宁的石棺在战争期间曾被藏在内地什么地方，这时已运回到红场来了。有一天早晨，我们去瞻仰石棺。参观一事本来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如果它没有在我和我的代表团成员之间引起一种新的、说不出的反感的話。当我们慢慢地走进陵墓时，我看见一些头戴围巾的质朴的妇女在胸前划十字，好像是走到一个圣人的遗骨匣面前似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早被遗忘的、远在青年时代具有的一种神秘感。而且，一切都安排得使你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大块的花崗石、笔直的卫兵、籠罩着列宁的不見来源的光綫、列宁的遗体像一支又干又白的粉笔，头上几根稀稀落落的头发，好像是有人給裝上去似的。尽管我敬佩列宁的天才，但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是很不自然的，特别是列宁遗体周围的神秘气氛，这是反唯物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

即使我們沒有空閑，我們也想到列宁格勒去看看，因为它是一个革命的城市，一个有着許多胜景的城市。为此，我向日丹諾夫提出了这件事，他欣然同意了。但我发现他还有一定的保留。我們的会晤不过十分钟。然而他并没有放过机会問我对《真理报》上登載的季米特洛夫在訪問布加勒斯特期間发表的一次談話的看法。在这篇談話里，他极力主張保加利亚与羅馬尼亚两国协调經濟计划和建立关税同盟。我回答說，我不喜欢这个談話，因为那是把保加利亚和羅馬尼亚的关系孤立地加以处理的，而且时机还不成熟。日丹諾夫也对这个談話不同意，但未說明理由。不久以后他們把理由发表出来了，我在后面將詳細介紹。

大約就在这个时候，南斯拉夫的一位对外貿易代表鮑格登·茨尔諾勃恩雅到莫斯科来了。由于他无法克服同苏联机构交涉的某些基本障碍，他再三要求我同他一起去見苏联对外貿易部长米高揚。

米高揚冷淡地接見了我們，显出不耐煩的样子。我們的要

求之一是：苏联把已經答应給我們的火車車廂从他們的占領区交給我們——因为其中許多車廂是苏联从南斯拉夫运走的，而且俄国人无法加以使用，因为他們的铁道軌距比我們的寬。

“你們打算要我們把車廂交給你們，是按照什么条件？什么价格？”米高揚冷淡地問。

我答道：“你們作为礼物送給我們！”

他直率地回答道：“我不管送礼的事，我只管貿易。”

茨尔諾勃恩雅和我为了修改对南斯拉夫不公平和不利的苏联出售影片的协定而作的努力，也告失败了。米高揚借口其他东欧国家可能会以此为先例，甚至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可是，当談到南斯拉夫的銅的問題时，米高揚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願意預付任何数目的任何货币或实物来买。

因此，除了使这种无益的和漫长的談判拖延下去外，我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結果。很明显，就南斯拉夫來說，苏联机器的輪子已停下来了。

然而列宁格勒之行却使我們得到了一些寬慰和新鮮感。

在訪問列宁格勒之前，我认为，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和起义地区居民的英勇和牺牲精神是举世无双的。但是列宁格勒却超过了南斯拉夫革命的現實，如果在英勇精神方面沒有超过的話，那在集体牺牲精神方面肯定是超过的。这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被切断了与后方的联系，沒有燃料和粮食，經常处于重炮猛攻和飞机轰炸之下，在1941—1942年的冬季，約有三十万人死于饥寒。人們只能以人肉充饥，但絕无投降的念头。然而这仅是一般的情况。只有在我們接触到現實——接触到牺牲与英勇精神的具体事例，接触到参加过或目睹过那場保卫战的倖存者——以后，我們才感到列宁格勒这史詩的偉大，才感到人类——俄国人民——在他們的精神、政治和生存的基础遭到威

胁迫时所能发挥的威力。

我們和列宁格勒官員的会見，在我們的敬佩之外又增添了人情的溫暖。他們全都是純朴的、受过教育的、努力工作的人，他們繼承了这个城市的悲劇性的偉大之处，并仍然把它銘記在心中。但他們过着孤独的生活，很願意同从另外一个国度里来的人交談。我們同他們相处得輕松愉快，如同遭受过同样命运的人一样。虽然我們从未想到过要埋怨苏联的領導人，但我們仍观察到这些人处理他們的城市和居民生活的方式，較之莫斯科更平易近人和合乎人情。而这个城市是廣闊的俄罗斯国土上最有文化和工业化最高的中心。

在我看来，我只要使用人道的語言，就可以同他們很快地取得一种共同的政治語言。誠然，我在两年后听說这些人仅仅因为敢于做真正的人而沒有能逃出极权主义者的殘害时，并不感到惊奇。

在我們这次的既愉快而又可悲的列宁格勒之行的插曲中，也有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污点——那就是我們的护送人員列沙科夫。甚至在那时，人們还可以在苏联遇到一些来自底层劳动群众的官員。由于列沙科夫識字不多和粗鲁无礼，人們一看便知，他不久以前还是个工人。这些缺点本来算不得是什么大毛病，如果他不打算加以掩盖，并故意卖弄不是他所具备的那种本領的話。实际上，他并非凭借自己的能力，而且被硬拉到最高层和安插在中央委员会机关里去专搞南斯拉夫事务的。他既是一个諜报人員，又是一个党干部。他是在黨員任务和“党性”中鑄造出来的，他用生硬的手段搜集南斯拉夫党及其領導人的情报。

列沙科夫身材瘦长，面上多节瘤，牙齿黃而短，領帶打得歪歪扭扭的，衬衣則露在褲子外面，他总怕人家以为他“沒有文化”。如果他不担负着这样一份重任并不断地挑逗我們——特別是

我——參加不愉快的討論的話，列沙科夫作為一個普通工人，本來是很討人喜歡的。他夸耀“日丹諾夫同志”是怎樣“清洗了中央委員會中的全部猶太人！”——而同時却又稱贊當時幾乎全部由猶太流亡分子組成的匈牙利政治局。這一定是在暗示我：蘇聯政府雖然暗地里實行反猶太主義，但卻認為猶太人高踞匈牙利上層對蘇聯是有利的，因為猶太人在那里沒扎下根，因而會更加順從蘇聯的意志。

我早就聽說并覺察到，當蘇聯領導人想要除掉某一個人，但還缺乏使人信服的理由時，他們總是用特務來散布關於他的一些不名譽的事。例如，列沙科夫“機密地”告訴我，朱可夫元帥已被免職，因為他在柏林搜刮珠寶。他說：“你知道，斯大林同志是不能容忍這種不道德的行為的！”還有，關於副總參謀長安東諾夫將軍，他說：“他已被揭發是一個帶有猶太血統的人！”

儘管列沙科夫的知識有限，但他很熟悉南斯拉夫中央委員會的事務及其工作方法，這也是很明顯的。他說：“在東歐，無論哪個黨都沒有像你們黨的四巨頭那樣受到注視。”

他沒有提到這四巨頭的名字，但是我不用問就知道，他是指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和我。我自問并推斷：這四個人蘇聯領導人眼里不也是一顆“花生”嗎？

(七)

由於無事可做，幾天之後，科查·波波維奇決定回國，讓托多羅維奇留在莫斯科听結果，就是說，等待蘇聯領導人發善心，恢復談判。我本想同波波維奇一起走的，豈知這時接到貝爾格萊德的來電說，卡德爾和巴卡里奇即將到達莫斯科，因而我不得不同他們一起去參加同蘇聯政府舉行的關於“情況複雜化”的談

判。

卡德尔和巴卡里奇是在1948年2月8日星期日到达的。实际上，苏联政府是邀请了铁托的，但是在贝尔格莱德，他们却推托说铁托身体不好——就从这一点上人们就可以看出双方的互不信任——因此卡德尔代替他来了。同时被邀请的还有一个保加利亚政府的代表团，也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关于这个代表团，十分活跃的列沙科夫故意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说：保加利亚的“巨头”来了。

在此以前，《真理报》于1月29日已经批评了季米特洛夫，并同他的“成问题的和荒唐的联邦和邦联”以及关税同盟断绝了关系。这是一个警告，是苏联政府将要采取的明确措施和强硬方针的预兆。

卡德尔和巴卡里奇住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别墅里，因此我便搬去和他们一起住。当天晚上，卡德尔的妻子正要睡觉，卡德尔躺在她身旁，我坐到他旁边的一张床上，尽可能小声地把我在莫斯科期间所得的印象，以及我同苏联领导人接触的情况告诉他。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苏联是在实行令人听命的政策，企图迫使南斯拉夫降到被占领的东欧国家的地位，我们就不能指望得到苏联的积极援助，而应当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

不知是当时还是刚刚到达之后，卡德尔告诉我，同莫斯科之间发生争执的直接原因，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关于两师南斯拉夫军队进驻阿尔巴尼亚的协定。当这两师军队已经组成，而南斯拉夫的空军战斗机的一个团早已驻在阿尔巴尼亚时，莫斯科提出了强烈抗议，它拒绝接受这样一个理由，即必需由南斯拉夫军队来保卫阿尔巴尼亚，以防来自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的可能攻击。在莫洛托夫给贝尔格莱德的电报中，竟以公开分裂相威胁。

卡德尔到达后的第二天,当我们在公园里散步时,苏联的特务便来监视。从特务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因未能偷听到我们开了一次会的情况而感到恼怒。卡德尔和我继续在谈话,巴卡里奇也在一起。这次的谈话内容更广泛了,分析也比较深刻,尽管我们在结论中有微不足道的分歧,最后还是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和往常一样,我表现得比较严肃和专断一点。

在第二天,即2月10日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们任何消息,苏联方面也没有什么动静,当晚九点钟的时候,他们突然请我们上汽车,并把我們送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那里。我们在那里等候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和科斯托夫——约十五分钟左右。他们一到,我们便全都被带去见斯大林。座位是这样安排的:斯大林坐在首席,右边是苏联代表——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佐林;左边是保加利亚代表——科拉罗夫、季米特洛夫、科斯托夫;接着便是南斯拉夫代表——卡德尔、我和巴卡里奇。

那时我曾向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一份关于那次会谈的书面报告,但是,由于今天我无法查阅那份报告,我将依靠我的记忆和已经发表过的关于那次会谈的材料来写。

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以他那种惯常的简洁口吻说,在以苏联政府为一方,以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政府为另一方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从党的和政治的观点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他举出下面的事实作为这些分歧的例证,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不仅事先没有通知苏联政府,而且违反了苏联的观点,两国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苏联政府认为,保加利亚政府在签订和约之前,不应签订任何政治性的条约。

莫洛托夫打算较详细地评论一下季米特洛夫在布加勒斯特

所发表的談話，其中談到关于建立一个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联邦，羅馬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关税同盟以及协调两国的經濟计划。但是斯大林打断了他。他說：“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記者招待会上太着迷了——沒有留神自己說了些什么。季米特洛夫所說的每一句話，还有铁托所說的一切，外国人都认为是事先通知了我們的。举例來說，波兰人到这里來訪問，我問他們說：你們对季米特洛夫的談話看法怎样？他們說，一件好事情。我告訴他們說，这不是一件好事情。于是他們也回答說，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苏联政府也是这样看的話。因為他們认为季米特洛夫发表的談話已事先通知了苏联政府并征得到它的同意，因此他們便贊成它。季米特洛夫后来想通过保加利亚通訊社來更正他的談話，但已完全无济于事了。而且，他还指出奥匈帝国如何阻撓保加利亚和塞爾維亞之間的关税同盟，这自然会使人得出这样的結論：以前是德国人搗鬼，現在則是俄国人在搗鬼。事情就是这样！”

莫洛托夫接着說，保加利亚政府正在着手与羅馬尼亚建立一个联邦，这件事甚至还没有和苏联政府商量一下。

季米特洛夫想緩和一下这件事，強調說，他只是泛泛地談了一下建立联邦的問題。

但斯大林打断了他說：“不，你是同意建立关税同盟和协调經濟计划的。”

莫洛托夫跟着說：“……关税同盟和协调經濟，不是建立一个国家又是什么？”

当时虽然沒有人說出口來，但會議的实质已經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如果不符合苏联政府的利益，沒有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意，“人民民主国家”之間建立任何关系都是不許可的。很显然，苏联领导人由于他們的大国思想（它表現在把苏联作为“社

会主义的领导力量”的概念中)，特别是由于他们认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红军解放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和南斯拉夫的不守纪律、刚愎自用，不仅是异端行为，简直是否定了苏联的“神圣”权利。

为了替自己辩护，季米特洛夫曾试图解释，但斯大林总是打断他的话，不让他讲完。这就是斯大林的真面貌。他的智谋变为恶意的粗暴，他的专断已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但他仍克制了自己，总算没有达到发狂的地步。甚至一分钟也没有丧失对实际情况的知觉，他斥责保加利亚人，把他们痛骂一顿，因为他知道他们会对他屈服，但实际上，他是做给南斯拉夫人看的——俗话说得好：她骂女儿，是为了骂女婿。

在卡德尔的支持下，季米特洛夫指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并没有在布莱德宣布已签订了一项条约，而只是声明双方已达成导致签订一项条约的协议。

“不错，但是你们没有跟我们商量！”斯大林大声说，“我们是从报纸上才知道你们这种勾当的！你们就像那些乱嚷嚷的女人一样，想到什么就乱说一通，于是就被新闻记者抓住了！”

季米特洛夫继续为他同罗马尼亚建立关税同盟的主张转弯抹角地辩解：“保加利亚的经济是这样困难，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合作，它就不能发展。就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来说，我的确是着了迷。”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你是想靠标新立异来出风头！那你完全错了，因为这种联邦是不可思议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什么历史联系？一点也没有！我们用不着谈保加利亚同谁的历史联系，比方说，同匈牙利还是同波兰。”

季米特洛夫表示异议说：“保加利亚和苏联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没有分歧。”

斯大林断然而坚定地說：“有严重的分歧。为什么要隐瞒它呢？永远要承认錯誤然后尽快地把它消除，这才是列宁的作风。”

季米特洛夫用一种和解和近乎屈服的語气說：“我們的确是錯了。但是通过这些錯誤，我們在学习外交政策上的做法。”

斯大林粗暴地嘲罵道：“学习！你在政治上已混了五十年了，而現在才来糾正錯誤！你的問題不是錯誤的問題，而是立場和我們不同。”

我瞥了季米特洛夫一眼。他的两耳通紅，臉上浮現出大块大块的紅暈，复盖在他那湿疹小斑点上。他那沒有生气的稀疏头发散落在有皺紋的頸子上。我真替他难过。这位“来比錫审判”^①中的猛将，当年在戈林和法西斯主义声势显赫时，曾坚决地反抗过对他的陷害，如今却落得这个垂头丧气的样子。

斯大林接着說：“什么羅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間的关稅同盟和联邦——这簡直是胡鬧！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联邦是另一回事。它們倒有历史的和其他方面的联系。这种联邦應該建立，而且越快越好。对了，越快越好——馬上建立，如果可能的話，明天！是的，明天，如果可能的話！立即取得一致的協議。”

有人——我想是卡德尔——提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联邦已經在进行中。

但斯大林強調說：“不，應該是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联邦，然后再加上阿尔巴尼亚。”

随后他补充道：“我們认为羅馬尼亚和匈牙利應該組成联邦，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应该組成联邦。”

① 指1933年德国希特勒匪帮一手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当时季米特洛夫被誣入獄，在审讯时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罪行。——譯者

討論到这里，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斯大林那时沒有就这个联邦問題进一步加以發揮。后来，他用命令的方式反复說，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联邦应当立即組織起来。但是，从他所阐明的主張以及当时苏联外交官的模糊的暗示看来，似乎苏联領導人也正在玩弄改組苏維埃联邦的把戏，办法是让“人民民主国家”加入苏联——匈牙利和羅馬尼亚加入烏克蘭，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加入白俄罗斯，而巴尔干国家則加入俄罗斯！不管这些計劃是多么隱蔽和純屬臆造，有一点是肯定的：斯大林企图为东欧国家寻求解决办法和組織形式，以便巩固和确保莫斯科的长期統治和霸权。

关税同盟，也即保一罗協定的問題似乎已解决的时候，老科拉罗夫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似的，他說：“我看不出季米特洛夫同志有什么錯誤，因为我們事先曾将我国同羅馬尼亚訂立的条約草案送給苏联政府，而苏联政府除了关于‘侵略者’的定义之外，对于关税同盟沒有提出什么意見。”

斯大林轉向莫洛托夫說：“他們曾把条約草案送給我們了嗎？”

莫洛托夫不慌不忙，但也不无辛辣地答道：“嗯，是的。”

斯大林生气而又无可奈何地說：“我們也做了蠢事。”

季米特洛夫抓紧了这个新的事实說：“这正是我发表談話的原因。条約草案已經送到莫斯科了。我猜想你們是不会反对它的。”

但斯大林仍倔强到底。“胡說！你就像一个共青团的青年那样橫冲直撞。你想震惊世界，好像你还在当共产国际的書記。你們和南斯拉夫人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們在干些什么，什么事我們都得靠外边的傳聞才知道。你們讓我們面临既成事实！”

当时負責保加利亚經濟事务的科斯托夫也想讲几句话，他

說：“作为一个既小而又不发达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我要提出一些經濟問題。”

但斯大林不让他說下去，吩咐他到主管的部去談，并指出，这次會議是討論三国政府和党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

最后，卡德尔得到了发言机会。他的臉脹得通紅，看样子很激动，他的脑袋縮在两肩之間，在不該断句的地方也断了下來。他指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布萊德簽訂的条約，事先已提交給苏联政府，但苏联政府除了对条約的期限——它主張把“无限期”改为“二十年”之外，沒有提出任何意見。

斯大林悄悄地而且帶着責备的眼光看着莫洛托夫，他低垂着脑袋，紧咬着嘴唇，实际上是在承认卡德尔的話說得对。

“除了我們采納了的那个意見外，”卡德尔坚定地說，“沒有什么分歧……”。

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話，正像他对待季米特洛夫那样面帶怒色，不过沒有那么粗暴无礼。他說：“胡說！有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阿尔巴尼亚的事怎么样？你們的軍隊开进了阿尔巴尼亚，却根本沒有和我們商量。”

卡德尔強調說，阿尔巴尼亚政府对于这件事是同意了。

斯大林大声說：“这将会引起严重的国际糾紛。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你认为怎样？不管有沒有理由，事实是，你們沒有和我們商量就把两师軍隊开进了阿尔巴尼亚。”

卡德尔解釋說，一切都還沒有定下來，又說，他不記得有哪一个外交問題南斯拉夫政府沒有同苏联商量过。

“不是这样的！”斯大林喊道，“你們根本就沒有商量。这不是你們的錯誤，而是你們的政策錯了——是的，是你們的政策錯了！”

卡德尔的話被打断了，他不作声，也不再坚持他的意見。

莫洛托夫取出一張紙，念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条約中的一段：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將“本着联合国的精神进行努力，并支持一切旨在維護和平、反对一切侵略溫床的行动”。

“这段話是什么意思？”莫洛托夫問道。

季米特洛夫解釋說，这段話意味着两国要与联合国團結一致，为反对侵略溫床而斗争。

斯大林插进來說：“不，这是一种預防性战争——最普通的共青团員都知道的把戏；这种老一套的詞句只能有利于敌人。”

莫洛托夫又回到保—罗关税同盟的問題上来，強調說，这就是两国合并的开始。

斯大林插嘴說，关税同盟一般都是不现实的。由于討論又有点平靜下来了，卡德尔說，有的关税同盟实际上证明不太坏。

“能举个例子嗎？”斯大林問道。

“好，比方說比荷卢，”卡德尔謹慎地說，“在这里，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結合在一起了。”

斯大林說：“不，荷兰沒有加入，只有比利时和卢森堡。那算不了什么，不足挂齿。”

卡德尔說：“不，荷兰也在內。”

斯大林頑固地說：“不，沒有荷兰。”

斯大林看看莫洛托夫，看看佐林，看看其余的人。我本想向他說明：“Benelux”（比荷卢）这个名称中的 ne 这个音节，就是从 Netherlands（尼德兰）这个字来的，那是荷兰的原名。但由于大家都不作声，我也沒有开口，因而荷兰还是不在“比荷卢”之內。

斯大林又回到羅馬尼亚和保加利亚協調經濟計劃的問題，他說：“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仅合作不成，不久反而会发生爭执。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統一是一回事——他們有相似之

处，这是两国一向的愿望。”

卡德尔指出，在布萊德我們已決定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間逐步組成联邦。可是，斯大林用更明确的語調插嘴說：“不，要赶快——就在明天！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應該先合并，然后再让阿尔巴尼亚参加进去。”

斯大林于是轉到了希腊起义的問題上，他說：“希腊的起义必須收起。”（他用了 *Cheprnyt* 这个字，直譯的意思是“卷起来”。）“你认为”——他轉向卡德尔說——“希腊的起义会成功嗎？”

卡德尔答道：“只要外国的干涉不增加，只要不犯严重的政治和軍事錯誤。”

斯大林沒有理睬卡德尔的意見，接着說：“只要，只要！不，他們根本沒有成功的希望。你以为英国和美国——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会允許你們切斷他們在地中海的交通綫嗎？真是胡鬧。我們沒有海軍。希腊的起义必須停止，而且越快越好。”

有人提到中国共产党人最近的成就。但斯大林还是頑固不化：“是的，中国同志們已經成功了，但希腊的形勢完全不同。美国——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在那里直接参战。中国的情况則不一样，远东的关系也不同。的确，我們也会犯錯誤！在对日战争結束后，我們曾邀請中国的同志們来就如何能同蔣介石訂立一項暂时性条約的問題达成了協議。他們在口头上同意我們的意見，但实际上，他們回去后却自行其是，他們集中兵力发动进攻。事实证明他們是对的，我們不对。但希腊的情况則不同——我們不應該迟疑不决，讓我們結束希腊的起义吧。”

甚至在今天，我也弄不清楚斯大林反对希腊起义的动机何在。也許他的想法是：在其他共产党国家都还不可靠和不馴服

的情况下，在巴尔干再建立另一个共产党国家——希腊，对他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更不用说可能会引起国际纠纷了，而这种国际纠纷的威胁正与日俱增，即使不把他拖入战争，也会危及他那已赢得的地位。

就对中国革命采取绥靖手段这一点来说，毫无疑问，他在外交政策上是从机会主义出发的，也不能排除这样的考虑：他预料到，一个新的共产党大国将会给他自己的事业和他自己的帝国带来危险，特别是因为没有希望使它在内部处于从属地位。无论如何，他知道每个革命，唯其因为它是新生的，也就成了一个单独的地震发源地，并形成它自己的政府和国家。这就是他害怕中国事件的原因，特别是这件事具有同十月革命同样重要的意义，就更使他害怕了。

讨论会开始松弛下来，这时季米特洛夫提出了同苏联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但斯大林又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将同联合起来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政府谈这件事。”

科斯托夫对一项技术援助协定的不公平待遇表示不满，斯大林回答他说，他应当向莫洛托夫提出一份备忘录。

卡德尔问起对于意大利政府要求把索马里亚置于它的托管下应采取什么立场。南斯拉夫不想支持这种要求，可是斯大林却持有相反的意见，他问莫洛托夫是否已作了答复。他是这样解释他的立场的：“从前，国王们在对战利品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总是把发生争执的土地赠给他们最弱的诸侯，以便以后机会到来时再从他们那里把它夺回来。”

大约在会谈结束以前，斯大林没有忘记用列宁和列宁主义来掩盖他发号施令的现实。他宣称：“我们这些列宁的信徒也往往和列宁有分歧，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和他争吵过，但后来我们把问题谈透了，确立了我们的立场，然后——我们就再前进。”

会談历时約两小时。

这次斯大林沒有邀請我們到他家里去吃飯。必須承认，这使我感到难过与空虛，因为我在人情上、感情上对他还是十分喜爱的。

我感到一种冷酷的空虛和痛苦。在車上我想同卡德尔談談我对这次会談的憤慨，但是由于他被搞得垂头丧气，他示意我不要再讲下去。

这并不是說我們的意見不一致，而是我們的反应不同。

卡德尔的內心是多么乱，这在第二天最明显不过地表現出来了，那天，他們把他帶到克里姆林宮去和莫洛托夫簽訂——沒有說明或儀式——一項关于苏南两国遇事協商的条約时，他把名字签錯了地方，以致不得不重新签过。

同一天，根据在斯大林的接待室里作出的協議，我們到季米特洛夫那里去参加午宴——以便对組成联邦一事达成協議。我們是机械地去做这件事的——这是紀律的殘余和苏联政府的命令。双方对联邦問題的談話都很短，而且无精打采；我們一致同意，在我們一回到索非亚和貝尔格萊德以后，就进行接触。

当然，这一切都化为泡影了，因为在一个月以后，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就在他們的信件中开始攻击南斯拉夫的領導人，而且在这件事上获得保加利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原来是一个圈套——想破坏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团結——这是任何一个有理想的人都不願意再把頸子放进去的圈套。虽然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被平息下去了，而且看起来我們还是团結的，但是主使的人却在兴風作浪。这就是后来发生的1948年6月苏联和南斯拉夫公开分裂的前奏。

在我的記憶中，我們与保加利亚代表团举行那次会談时，科斯托夫对待我們是溫厚而亲切的。由于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高

級干部中，科斯托夫被看成是南斯拉夫的敌对者，因而被当作是苏联方面的人，他的态度就更其难能可贵了。可是他也是主張保加利亚独立的，因此看到南斯拉夫人就不順眼，认为他們是苏联的主要僕从，甚至认为他們想把保加利亚及其共产党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后来科斯托夫因被誣告为替南斯拉夫服务而被枪决，而南斯拉夫的报纸却一直在攻击他，可以说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为止——这些都是在斯大林阴影下的猜疑和誤解。

季米特洛夫关于原子彈的那番談話，就是在那时說的，后来当他陪我們走出他的別墅时，他摆出好像不經意的样子說：“那并不是在批評我的談話，而是批評別的事情。”

当然，季米特洛夫和我們一样，也是心里明白的。但是他沒有軍隊，也許他本人缺乏南斯拉夫領導人的那种魄力。

我并不担心我們在莫斯科会出什么事；毕竟我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代表。波斯尼亚森林的幻影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在德国人的攻势最猛烈的时候，我們曾躲在那个森林的深处，并且在那清彻見底的寒泉旁边憩息，悠然自得。我曾对卡德尔还是別人說过：“干脆到我們的山上和森林里去得了，越快越好！”我因这番言过其实的話而遭到責难。

三四天以后，我們离开了莫斯科。破曉时，他們用汽車把我們送到弗努科沃机場，并在沒有任何礼遇的情况下把我們塞进飞机。当我们起飞时，我越来越感到无邪的幸福，虽然同时也是一种苦中之乐，而斯大林所讲的关于西科尔斯基將軍命运的故事，在我脑子里也就越来越淡漠了。

我还是四年前滿怀忠誠和純洁的感情赶往苏联去的那个人嗎？

由于接触到现实，一場梦幻再度破灭了。

这是否意味着一場新梦的开端呢？

結 束 語

許多人，当然包括托洛茨基在內，都強調斯大林的罪惡的嗜杀狂。我无意否定也无意肯定这种說法，因为許多事实对我来说，还不那么清楚。最近，莫斯科方面公开傳說，可能是他杀死了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基洛夫，以便以此为借口清算党内反对派。高尔基的死可能与他有关；他在宣傳上过分地渲染高尔基是被反对派杀害的說法。托洛茨基甚至怀疑他托辞使列宁少受痛苦而杀害了列宁。也有人說，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或者，不管怎么样，由于他的暴虐而迫使共妻自杀。斯大林的手下人还散播一种离奇的傳說，說斯大林的妻子是为她的好丈夫事先嚼食物时中毒而死的，这种說法我也听到过，的确太天真了。

斯大林是什么罪行都干得出来的，因为沒有一种罪行他沒有犯过。不論我們以何种标准衡量他，历史上最大的罪犯的荣銜必将落在他的身上——无论怎样，讓我們希望他的罪大恶极不但是空前的，而且是絕后的。因为他将古里古魯^①的絕灭人性与波尔嘉^②的阴險，沙皇“伊凡雷帝”^③的殘暴集于一身。

① 古里古魯(Caligula)是羅馬的皇帝(公元37—41年)，以殘暴著稱。——譯者

② 波尔嘉(Borgia)，是十五、六世紀意大利著名貴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他十分陰險又善于投機。為擴展自己的勢力，曾殺害他的兄弟，後在法國人的支持下，占領了意大利中部的主要城市。到1503年，威震四海，不可一世，但後來勢力日衰，最後死于敵手。——譯者

我过去非常感兴趣而现在仍然非常感兴趣的，是像这样一个阴险、狡诈和残酷的人，竟能领导最大和最强的国家之一，而且并非一天或一年，而是三十年！除非他目前的抨击者们——我说的是他的继承人——把这一点解释清楚，否则，他们不过是证明，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仅仅是在继续他的工作，证明他们自身也有驱使斯大林前进的那些同样的因素——同样的思想、方式和方法。因为斯大林在从事他的那些勾当的时候，不仅他认为这样来对付一个疲惫与绝望的革命后的社会对自己有利，而且这一社会的某一阶层，更确切地说，就是统治苏俄的苏共政治官僚体系，也认为需要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只要下了决心，他是无情的；他的狂热行为，却是极其讲求实际的。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固执地和顺从地跟着他走——因为他确实领导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后来因为权欲作祟他才开始对党也犯罪。今天，他被指责的只是对党所犯下的罪行，而关于他对“阶级敌人”——农民、知识分子、党内外左翼和右翼分子——所犯的许多更大的和肯定是同样残酷的罪行，人们却缄默不言。只要党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它的实际行动上，不同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整个精神实质割断关系，也就是说，不同思想上的一神论和所谓党的磐石般统一论割断关系，那将是一种恶劣的但却是确凿的迹象，显示苏共并未摆脱斯大林的阴影。因此，目前所谓的莫洛托夫反党集团被整肃所引起的快慰，以我看来是眼光短浅和为时过早的，不管莫洛托夫的人格怎样可惜，他的见解又是怎样陈腐不堪。因为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一集团是否比那个集团好，而是在于这些集团居然能够存在，并且在于，至少作为开端，在苏

③ “伊凡雷帝” (Ivan the Terrible) 即伊凡四世，他在1547年十七岁时便宣称自己为专制的沙皇，在他统治期间 (1547—1584 年)，俄国的领土扩大许多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译者

联由单独一个集团在思想和政治上实行壟断的情况是否将终止。斯大林的阴影仍然籠罩着苏联,而且可以假定:假若那里不发生战争的话,斯大林的阴影将相当长期地籠罩着苏联。虽然他的名字被咒罵,可是,斯大林仍然活在苏联社会的社会基础与精神基础上。

在演說和庄严的声明中經常提到列宁并不能改变問題的实质,揭露斯大林的这种或那种罪行容易,但却难于掩盖这样的事实,即是他“締造了社会主义”并給現在的苏維埃社会和苏維埃帝国奠定了基础。这一切证明,尽管苏維埃社会有着巨大的技术成就——也許主要由于这些成就的緣故吧——但它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它仍然被局限在它自己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框框里。

尽管有这种批評,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出現新的思想和現象的希望,似乎并非完全沒有可能;虽然这种新的思想和現象也許并不能动摇赫魯曉夫的“磐石般統一論”,但至少对其矛盾和本質將投下一綫光明。目前,在苏联作更本質的改變的条件还不存在。由于苏維埃經濟仍能在自己的帝国範圍內維持不衰并可弥补因与世界市場隔离所受到的損失,所以苏联的統治者自己便覺察不到教条主义和壟断統治权是一种障碍或累贅。

当然,人所占有的地位和价值,往往是根据观察的角度来定的。

对斯大林的观察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以人道和自由的观点来看,历史上沒有一个专制者像斯大林那样殘忍和冷酷无情。在犯罪方面,他是詭計多端和全能的,他是一个能够毁灭人类十分之九而仅使其余十分之一的人“享受幸福”的那些罕見的极端的教条主义者之一。

然而,如果我們想要評定斯大林在共产主义历史中实际上

所占的地位的話，那么目前斯大林就必須被看作是仅次于列宁的最偉大的人物。他并没有真正地发展共产主义思想，但他却为共产主义思想而奋斗并在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中将其付诸实现。他未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本性来看，那样的事情簡直是不可能的，但他却把落后的俄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家，变成一个愈来愈坚决和毫不容情地企图攫取世界霸权的帝国。

从成功与政治上老练的观点来看，斯大林是同时代的任何政治家所不及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政治斗争中的成功是唯一的准则。我尤其不把政治与不道德混为一谈，虽然我不否认，由于政治关系到为一定的社会集团的生存而斗争，所以政治是以漠视道德标准特点的。偉大的政治家是那些能把理想同现实结合起来，能坚持不懈地向着他们的目标前进，而同时又能坚持基本道德准则的人。

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他固守抽象的、绝对的、基本上属于空想的观念，但在实践中他所看到和所能看到的只是成功——以暴力消灭他人肉体与精神取得的成功。

然而，让我们不要对斯大林不公正！他所希望完成甚至已经完成的事业，是不能以任何其他方法完成的。推动他前进并由他领导的力量，从这些力量所信奉的绝对的理想来看，除了他不可能有其他类型的领袖，考虑到当时俄国与世界关系的情况，这些力量也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来对待。斯大林是与世隔绝的社会制度的創始者，同时又是这种制度的工具，情况改变和一切都过时以后，他又成为这个制度的罪人。虽然在暴力和犯罪方面无人能超过他，但斯大林仍然是一种社会制度的领导者和組織者。今天他被贬低，因犯了“錯誤”而臭名昭著，而同样制度下的

領袖們正打算通過這些“錯誤”來挽救這一制度和他們自己。

雖然斯大林被廢黜是以不適當的方式演出的，但它證明：真理終會出現的，即使只有在為真理奮鬥的人們犧牲之後才會出現，但真理終會出現的。人類良知是永恒的，不可磨滅的。

不幸，甚至現在，在所謂貶低斯大林運動之後，也能得出和以前同樣的結論：凡願在與斯大林創造的不同的世界上生活並能繼續活下去的人，就必須奮鬥，而斯大林所創造的世界實質上還存在着，並以其充沛的活力繼續存在。

人 名 选 注

(原出版者注)

格奧尔基·費多罗維奇·亚历山大罗夫 (1908—)

苏联第一流的哲学家，1928年加入共产党。1934年起在中央委员会宣傳鼓动部工作，1939年至1947年为該部負責人。他的《十九世紀西欧哲学史》一书，于1944年出版，因将馬克思主义当作西方哲学傳統的一部分而遭到日丹諾夫的公开抨击。1950年他是斯大林关于語言学的論文的哲学含意的公认詮釋者。1954—1955年任(苏联)文化部长，随后到明斯克白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 (1912—)

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1933年学生时代参加地下共产党。1934年被判处三年徒刑。1941年参加游击队。第二次大战后任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理。1946年为出席巴黎和平大会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員。现为克罗地亚共产党首要领导人。

拉弗倫提·巴甫洛維奇·貝利亚 (1899—1953)

格魯吉亚共产党党人，发迹于苏維埃秘密警察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和內务人民委員部^①。1938年至1948年任內务人民委員，1941年至1953年任部长會議副主

^① 这是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在不同时期的三个組織形式，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改組而成。 譯者

席，負責保安工作，在此期間，他以清除他的前任 H·M·叶若夫和許多其他官員而完成大清洗運動，同時不僅在蘇聯而且在衛星國家指導實行作為斯大林晚年特點的恐怖統治。他在斯大林死後的爭權鬥爭中被清除掉。

謝明·米哈依洛維奇·布琼尼（1883—）

1935年起為蘇聯元帥。他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積極參加者。1939年迄今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1940年任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

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1888—1938）

第一流的布爾什維克理論家。1918年至1929年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支持過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但本人又被斯大林以右派領袖的罪名趕下台並于大清洗運動期間被處死。他的許多思想觀點，在斯大林死後的修正主義運動中得到了表現，尤其是在波蘭、匈牙利和東德。

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布尔加宁（1895—）

蘇聯政治活動家。1917年參加蘇聯共產黨。1937年至1958年為最高蘇維埃委員。1941年至1944年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次年在國防委員會任職。他曾擔任的其他職務是：副國防人民委員（1944—1947年）；國防部長（1947—1949年和1953—1955年）；部長會議主席（1955—1958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48—1952年）；（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1952—1958年）。

伏尔科·契尔文科夫（1900—）

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1919年入黨）。1925年因共謀臭名

远扬的索非亚大教堂爆炸案而不得不与其妻（季米特洛夫的妹妹）一起从保加利亚逃往苏联。在苏联列宁党校毕业后参加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的工作。1937年大清洗运动期间，任列宁党校校长，直到该校在1941年停办时为止。第二次大战期间，领导向保加利亚进行广播的苏联《赫里斯托·鲍泰夫》广播电台工作。1944年9月9日回到保加利亚接管共产党书记处的工作。1950年1月继科拉罗夫之后任总理。同年11月任党的总书记，但在斯大林死后即辞去该职，任文化部长，终又恢复政治局委员。

鲍格登·茨尔诺勃恩雅（1916—）

南斯拉夫教师，第二次大战期间参加游击队。解放后任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副部长。1955年以来，任南斯拉夫驻印度大使。

彼科·达普契维奇（1913—）

共产党南斯拉夫的将军。1933年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求学时入党。他第一次的军事生活是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任国际纵队连长时开始的。1941年南斯拉夫遭到入侵时，在家乡门的内哥罗领导游击队起义，随后很快就提升到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中工作。1945年获得“人民英雄”勋章。次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军长，该军驻于的里雅斯特港内地、南斯拉夫管区委内齐亚—吉利亚，后来被派去指挥希腊北部游击队作战。1953年起任南斯拉夫总参谋长，但由于与德热拉斯事件间接有关而被降职；他的妻子米丽娜·弗拉贾克是个演员，德热拉斯曾保卫她以反对“新阶级”的侵犯。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1882—1949)

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190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在保加利亚因积极从事地下活动和工会组织活动而被捕，1921年由于苏联的干预而获释出狱，随后二十年一直在共产国际工作。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达九年之久，为三十年代人民阵线政策的创始人。因1933年柏林国会纵火案受审(后获释)而闻名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放弃苏联国籍回到保加利亚担任保共领导工作和实行国家共产主义化。1946年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

马克辛·高尔基 (1868—1936)

俄国卓越的革命小说家。作品——著名的有《母亲》、《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都是指责资本主义社会的。虽然在财力上给予布尔什维克以大力支持，但反对他们夺取政权，并于1921年至1928年期间流亡国外，回国后，领导作家协会而被宣扬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派的奠基人。原为斯大林的密友，也就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主要维护者。死于1936年，据说死因可疑。在1938年公开审讯布哈林期间，正式把他死的罪责推在“右派反苏集团”和托洛茨基分子身上。其后，斯大林自己却被谴责参与谋害高尔基。

安得里耶·赫布朗 (1899—1948)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者，克罗地亚人。第二次大战前曾因工运活动而坐牢十二年。获释后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书记。民族解放运动一开始(1941年)即为运动领导人，战后担任过许多要职，其中包括工业部长、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的国民议会主席团

委員以及联邦計劃委員會主席。1946年，党中央委員會审查了他的历史，断定他在第二次大战期間有过怯懦表现并曾与克罗地亚的法西斯分子烏斯塔希勾結。同时又因被宣布为“分裂主义者”而被解除一切职务。1948年，据称当他企图逃往羅馬尼亚时被捕。在等待审判时自杀。有人傳說他是在監獄里被杀害的。

恩維爾·霍查（1908—）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后在阿尔巴尼亚一些学校教法文。1941年創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2年建立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1943年当选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書記，并連任至1954年該职撤銷时为止，随后連任党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至今。1946年兼任部长會議主席、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阿尔巴尼亚武装部队总司令。

阿尔索·約凡諾維奇

战前南斯拉夫职业軍官，門的内哥罗人。参加游击队并組織人民解放軍，任总參謀长至1946年底为科查·波波維奇所取代为止。1948年铁托与共产党情报局破裂时公开站在苏联一边。随后企图逃往羅馬尼亚时遭边防部队枪杀。

拉薩尔·莫依謝耶維奇·卡岡諾維奇（1893—）

微賤的犹太家庭出身的共产党人，党的組織者。作为斯大林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而得势。第二次大战期間为国防委員會委員，其后在高加索和烏克蘭任要职。在斯大林晚年逐漸失势，这大概多少与（苏联）排犹运动有关。斯大林死后，他又一度成为显要人物，但因参加“反党集团”而于1957年被剝夺一切权力。

爱德华·卡德尔（1907—）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一般认为仅次于铁托的第二号人物。原为斯洛文尼亚的一个教师，1928年入党。1931年被抓进监狱关了两年。1934年至1937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列宁党校学习并留校任教授。第二次大战前和铁托合作改组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于194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第二次大战期间在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供职，1943年成立临时政府任副总理，1945年政府正式成立时连任本职，1951年起兼任外交部长及政府改组委员会主席。被认为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首屈一指的理论家。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原为锁匠，是由一个普通党员特别是通过在乌克兰的活动而爬起来的。国内战争时期曾任游击支队政委，战后被送到哈尔科夫大学附属工人学校学习。此后即在党内青云直上，进入政治局（1935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1938年被委任负责乌克兰的肃反工作，第二次大战期间则在那里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务。战后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1952年成为党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的正式委员。1953年斯大林死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并终于取代了马林科夫。

鲍里斯·基德里奇（1919—1953）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者，斯洛文尼亚人，1928年入党，过着经常受迫害的地下工作者的生活。1941年参加游击队后被派往斯洛文尼亚任政委。1945年任斯洛文尼亚总理并继续在那里实行建立共产党霸权的横蛮计划。1946年被派往莫斯科研究苏联

經濟。同年秋天回到南斯拉夫，直到他死時為止，他是整個南斯拉夫經濟的實際指揮者。提到他的政績，就使人聯想到他所實行的无情的農業集體化（他死後被放棄了）和苛求的工業生產競賽。他是政治局委員。

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1886—1934）

卓越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家，1930年當選為政治局委員。起初支持斯大林執政，但在1934年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以後則又反對斯大林個人專權。1934年12月他之被暗殺（可能出自斯大林的命令）揭開了大清洗運動的序幕。

瓦西里·科拉羅夫（1877—1950）

保加利亞共產黨員，1949年繼季米特洛夫之後任總理。同季米特洛夫一樣，是共產國際的老戰士，1922年任共產國際總書記。第二次大戰後從蘇聯回到保加利亞，歷任保加利亞共和國臨時主席（1946年）、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外交部長（1949年）等職。

伊凡·斯泰潘諾維奇·科涅夫（1897—）

蘇聯元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在解放哈爾科夫（1943年）和基洛夫格勒（1944年）戰役中出了名。戰後出任維也納盟國管制委員會蘇方代表。1946年至1955年任陸軍總司令。從1955年起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和華沙條約國武裝部隊總司令。1960年因病辭職。他是1953年處決貝利亞的特別法庭庭長。

特拉伊喬·科斯托夫（1897—1949）

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曾任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雖然

他是个反铁托分子，但持有“保加利亚第一”的观点。1949年3月被剥夺权力，同年12月被起诉。曾因受审判时翻供而轰动一时。后被处死。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1902—）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他是通过做党的机关工作而发迹起来成为中央委员（1933年）的，在党中央负责干部管理工作。1941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在国防委员会工作。战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斯大林死后在“集体领导”时期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于1955年公开承认失职之后被迫下台。1957年作为“反党集团”的成员而被剥夺权力。

德米特利·札哈罗维奇·曼努耳斯基（1883—）

苏联共产党官员和外交家。1903年入党，作为地下工作者，遭受过拘捕和流放。1917年革命后，大部分时间在故乡乌克兰担任各种职务。但更多的活动是在共产国际，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第二次大战期间从事红军政治工作。1945年至1952年任乌克兰外交部长，1952年任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阿那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1895—）

亚美尼亚共产党人，他在担任苏联对外贸易和食品工业部部长期间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1926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为正式委员。1937年以来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斯大林死后，一贯支持赫鲁晓夫而成为苏联共产党最有势力的领导人之一。被公认为“明智的”共产党人而在西方博得相当声誉，特别是1958年访问美国之后。

米特拉·米特罗維奇 (1912—)

1933 年入党的南斯拉夫女共产党人。第二次大战期間在游击队士兵中間嶄露头角。1945 年以后任塞爾維亞教育部长数年。最近升迁为联邦一級的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要职。

維亞契斯拉夫·米哈依洛維奇·莫洛托夫 (1890—)

1906 年入党的布尔什維克，党的組織工作专家。他主要是依靠作为斯大林的副官而爬上去的，最后直至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1926 年起就是政治局委員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員。整个三十年代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总理，直到 1957 年为止，一直为副主席。他是以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員 (1946 年改称外交部长) 而聞名于世界。1957 年和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人一起作为“反党集团”的成員而被剝夺了权力。从此以后只担任比較次要的駐外职务。

布萊哥耶·涅斯科維奇 (1907—)

塞爾維亞共产党人，参加过西班牙內战，1941 年加入铁托的游击队。1945 年任塞爾維亞总理。原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員，1952 年被指控为異己分子而被剝夺了职位。

安娜·波克 (1893—)

羅馬尼亞犹太人 (母姓罗宾逊)，她是 1921 年羅馬尼亞共产党的創始人之一。和党的首腦馬賽尔·波克結婚。1924 年夫妇两人离开羅馬尼亞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工作。1936 年回国后被捕。她的丈夫在莫斯科死于大清洗运动。她因两国交换政治

犯而得重返莫斯科，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指导苏联广播电台对羅馬尼亚的广播，并协助将苏联境内的羅馬尼亚战俘組成以图尔多·弗拉迪米列斯庫命名的一个师。后来随苏联紅軍回到羅馬尼亚，于1947年11月7日出任外交部长，不久后并任副总理。1952年被当作为“異己分子”而赶下台。

莫薩·皮雅杰（1889—1957）

南斯拉夫共产党理論家。1920年共产党成立时的元老。因在工会內宣傳共产主义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关在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維查監獄（即后来铁托政权监禁德热拉斯的同一監獄）；服刑期間，翻譯过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德热拉斯在門的內哥罗領導起义。这次起义在該地掀起了残酷的內战。第二次大战后任国民議會和后来的联邦人民議會副主席。1954年，由于德热拉斯案件的結果，成为联邦人民議會主席。直到死以前，一直是铁托集团的核心人物，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員。

科查·波波維奇（1908—）

貝尔格萊德名門子弟，留学巴黎的律师，詩人。1933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并参加过西班牙內战。回国后被捕，但获释后仍繼續从事地下活动。1941年加入游击队并逐步登上軍政部門最高行列。1945年至1953年任总參謀长。1946年以来連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

亚历山大—馬尔科·兰科維奇（1909—）

南斯拉夫共产党領導人，1927年参加党的塞尔維亚青年組

織。在好几个監獄里共坐了五年牢，在獄中認識了铁托和皮雅杰。1937年，当铁托改組党时，即为政治局委員并且从此以后一直是共产党的首脑人物之一。他是解放战争的主要組織者，战后以内务部长以及宪兵和秘密警察的首脑而聞名，和卡德尔一起被公认为仅次于铁托的当权人物。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罗科索夫斯基（1896—）

原籍波兰，1919年参加苏联紅軍，在苏联軍界扶搖直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成为苏联最卓越的將領之一。由于参加指揮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庫爾斯克保卫战有功，曾两次荣膺苏联英雄的称号，并于1944年晋升为元帅。1949年奉調到波兰軍隊工作，历任波兰国防部长、总司令、副总理和波兰共产党政治局委員等职。1956年11月哥穆尔卡政权把他調回苏联，一直担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

巴甫勒·薩維奇（1909—）

留学法国的南斯拉夫核物理学家，1939年入党。参加过解放斗争，并曾被調到最高司令部工作过。1949年因研究低温而受奖。

魯道尔夫·斯兰斯基（1901—1952）

捷克共产党領導人。1926年起任《紅色权利报》社长。1928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員。1935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希特勒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后，斯兰斯基逃往苏联，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至1944年。随苏联紅軍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任改組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書記。出席过1947、1948和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的會議。1951年9月

被撤去领导职务，三个月后因“罪恶活动”而被捕。1952年被判处絞刑。

伊凡·苏巴塞奇 (1892—1955)

克罗地亚政治活动家。1939年8月起任克罗地亚州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国外，在盟国坚持下，1944年6月1日被任命为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总理。在維斯島签订铁托—苏巴塞奇协定后，苏巴塞奇将其内阁与铁托内阁合并。在临时联合政府内，他曾一度任外交部长。

米哈依耳·安德烈耶維奇·苏斯洛夫 (1902—)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1921年入党，1941年进入中央委员会，战时任高级政治官员。1946年成为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的首脑，1947年为苏共中央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总编辑。自那时以来的主要职务是：苏联外交委员会主席(1954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5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在击败“反党集团”斗争中还是支持了赫鲁晓夫。

米雅耳科·托多罗維奇 (1913—)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在青年运动中开始党的生活。第二次大战期间参加游击队的斗争。解放后曾在国防部供职，并历任特需供应局长、农业部长和农林委员会主席等职。

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維奇·华西列夫斯基 (1895—)

苏联著名将领，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的苏联总参谋长。1943年晋升为苏联元帅，1945年任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从那时起一直任陆军部长。^①

尼古拉·費·瓦杜丁 (1901—1944)

苏联將軍。和科涅夫、馬利諾夫斯基一起，在从德軍占領下解放乌克兰的战役中出了名。

維利科·弗拉霍維奇 (1914—)

1935 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門的内哥罗人。参加过西班牙內战，在組織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方面起过特别积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領導自由南斯拉夫广播电台的工作。1944 年底回国任共产党《战斗报》主編和外交部副部长。作为一个理論家，曾享有声誉，尤其在德热拉斯下台以后。

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沃茲涅先斯基 (1903—1950)

苏联著名經濟学家。大清洗运动期間，很快地被提升为国家計劃委员会主席。該委员会負責整个苏联經濟的計劃和調整工作。1939 年并任副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为国防委员会委員。1941 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員，1948 年为正式委員。1949 年在馬林科夫反对日丹諾夫的追随者的运动期間，被解除一切职务，并且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逮捕和枪决。

斯維托扎尔·伏克曼諾維奇—泰波 (1912—)

門的内哥罗人，1933 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35 年入党。是地下工作中組織秘密刊物的能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工作，并任铁托駐馬其頓的私人

① 此說不确。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載：1945 年 2 月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軍司令，同年 6 月任远东軍总司令，1950—1953 年任苏联陸軍部长，1953 年以來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譯者

代表。1943 年任人民解放軍首席政治委員。战后积极从事联邦議會、中央計劃委员会和中央經濟委员会的工作。是铁托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

科奇·佐治（死于1948年）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由于南斯拉夫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結束就成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內最有势力的人物，担任内政部长和秘密警察的首脑。在铁托与共产党情报局破裂时，以进行托派和铁托派活动的罪名被处决。

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維奇·日丹諾夫（1896—1948）

从 1935 年起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書記。1934 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員，1939 年为正式委員。負責思想工作，强迫文艺界奉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战后反对西方文化影响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为列宁格勒保卫战领导者之一。在創建共产党情报局的工作中起了杰出的作用。

格奧尔基·康士坦丁諾維奇·朱可夫（1894—）

苏联元帅。1917 年参加布尔什維克軍隊工作。1941 年任紅軍參謀长并指揮抗击德軍对莫斯科的进犯。1942 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員，次年晋升为元帅。

瓦萊里安·亚历山大罗維奇·佐林（1902—）

苏联外交官。历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1941），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5—1948），外交部副部长（1948）和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1956—1958）。1960 年以来为苏联駐联合国常任代表。

米哈依耳·米哈依洛維奇·佐什欽科 (1895—1958)

苏联作家，以其諷刺作品和挖苦苏联社会上无所适从的“小人物”見称。1946年在党强行控制文化生活的运动中，日丹諾夫把他作为首要目标。被开除出作家协会而隱居到死。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